

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

郭紀舟

前言

本書根據我的碩士論文〈一九七〇年代左翼啓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改寫，主軸架構修改不多，我把「啓蒙」兩字拿掉，是因為就台灣歷史而言，七〇年代的左翼是重新出現，而不是被發明出來的。當初會挑這樣的題目，因為對於社會運動的關懷與參與，佔據生命的重心思考。在一九九三年一個初夏的午後與楊翠及蔡其昌，在東海別墅的「15巷咖啡」館閒聊，談論碩士論文的方向，我們都覺得應該要有一個運動觀的視野，來重新面對台灣史這塊處女地，並且應該選擇與自己生活最貼近的議題著手，這樣寫出來的論文，才會有「主觀能動性」，才是有生命的歷史型態，而且也不想寫完放在圖書館就沒事了。

楊翠舉出她的論文〈日據時代的婦女解放運動〉，是以她的祖母葉陶為主軸，葉陶一生參與社會運動與推動婦女意識，與她正在從事的議題息息相關，楊翠鼓勵我們思索，與這塊土地密切聯繫的地方在那裡。在這樣的問題意識出發下，其昌選擇了文學與國家機器的關係，從其外公台灣詩人詹冰的「銀鈴會」著手，探討五〇

年代台灣的文學者遭到國民黨官方機構的政策鎮壓，心靈轉折的過程。

然而我似乎沒有那樣的血緣背景，足供我自己去摸索台灣的歷史脈絡。於是從自己的思想啓蒙回溯，我要走哪一條道路？從大學時代參與各式的學生運動，東海地下社團「東潮」，到成立學運社團「人間工作坊」，一九八八年參加首次的大學法改革遊行，一九九〇年三月學運在中正廟靜坐，每年舉辦下鄉清流，參加反核、工運遊行等等，是在黨外雜誌時期就奠定這樣思考的種籽。當時認為八〇年代黨外雜誌及其政治運動，是有趣的年代，但我覺得八〇年代的社會運動仍未沈澱，許多問題至今仍未有定論，去碰觸八〇年代的歷史詮釋危險性相當大。

幾翻的討論考慮下，將時間移到七〇年代，因為七〇年代是現代社會運動的原初時期，稍微探觸七〇年代的幾處波濤，發現具有歷史連續又有較為完整的文字論述的，並且是左派的社會運動的，《夏潮》雜誌成了最適合的選擇。雖然七〇年代的政治社會運動，甚至左翼《夏潮》內部的諸多歷史問題，至今仍存在，爭辯不休，大膽的選擇這個題目，可預期的是諸多的辯論以及詰難，不過總要有人開個頭吧！

爲了詮釋論述的正當性，採用鄭梓老師給的建議，去訪問當事者，利用訪問的口述整理，做爲論文敘述的佐證，也作爲史學裡很講究的「一手史料」基礎。訪問的過程中每一位受訪者，簡直傾囊相授，打開我的視界。最後將一整年來的訪問稿，全部文字化處理，編成《夏潮重要人物訪問錄》。

本書的完成要感謝所有的受訪者，王曉波、王津平、陳映真、蘇慶黎、王杏慶、王拓、尉天聰、蔣勳、林俊義、林載爵、蔡建仁及劉國基，他們慷慨允諾接受訪問，使本文得以順利完成。限於篇幅，本書僅收錄《夏潮重要人物訪問錄》中王曉波、陳映真與蘇慶黎的訪問。

由於七〇年代的雜誌及書籍，多數被列爲違禁品，圖書館找不到，資料的尋覓相當棘手，幸好楊翠有楊達的藏書，完整的《夏潮》雜誌借予我運用。而王曉波、王津平、尉天聰、林載爵、劉超驊老師以及國代利錦祥所借或贈與的黨外雜誌、書籍，都是使得本文得以完成的重要因素，感謝他們。寫作期間，鄭梓老師不厭其煩的指導即其對歷史學破解的方法，令我受益良多；還有東海歷史研究所的老師跟學生，靜宜大學劉宇欣跟「浪濤沙社團」，我的重要精神支柱東海「台研社」與「人間工作坊」的朋友，一併致謝。

寫完這本書逐漸奠定一種信念，搞革命最重要的是生活上的思想、文化重新被推翻掉，那才是天翻地覆的革命，政治的革命不過是工具，改變革命體質的工具。很深刻的印象是突然信服葛蘭西的看法，期望透過文化霸權的重新轉換及滲透，讓每一個人成爲有機體，在每個小區域都形成陣地戰的可能。在資本深化的社會搞文化運動，如春天的玫瑰那般刺人，從生活去改變可能會比較緩慢，卻如紫羅藍花開的精彩。我想用我的兩隻手來塑造自己的雕像，才知道自己叫做什麼名字，還不想命定接受媚俗的世界。

回顧歷史的目的，不就是要重新回溯，汲取力量，希望本書對關懷台灣歷史的人有點用處。

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我們來辦一本社會主義的雜誌

第一節 歷史的問題 / 三

第二節 左翼思想的萌芽——保釣運動的波濤 / 一七

第三節 夏潮集團集結的過程 / 五八

第二章 文化啓蒙的實踐場域

第一節 《夏潮》的本土觀點

——台灣歷史與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整理 / 八九

第二節 現實主義文學的提倡 / 一一六

第三節 文化造型運動

——「夏潮—雄獅」聯盟路線／一五六
文化造型運動

——兩條路線／一七八

第三章 階級建構與民族意識

——鄉土文學論戰與現代化論戰的本質

- 第一節 鄉土文學論戰的社會基礎／二〇〇
- 第二節 鄉土文學論戰之聯盟作戰與集體動員／二三〇
- 第三節 第三世界理論的引進／二六〇
- 第四節 現代化論戰的思想路數／二八〇

第四章 政治實踐路線

- 第一節 反分離主義／三〇九
- 第二節 參與政治選舉／三二三
- 第三節 鼓聲·春風·美麗島／三四七

第五章 結論／三七一

訪問錄

- 訪問側記／四〇七
- 訪王曉波(一)／四一三
- 訪王曉波(二)／四二三
- 訪陳映真／四四一
- 訪蘇慶黎／四八二

第一章·我們來辦一本社會主義的雜誌

歷經二二八事件以及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台灣左翼運動，至一九五五年台灣自日據時代以來的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的左翼運動，在國民黨政府強大的、專制的、一元化的軍事、政治鎮壓下，從地下組織到外圍群眾，甚至思想上的清算，只要沾上左翼的人一一被槍斃、構陷、牢刑、拆解、清除，掃蕩到幾乎乾淨溜溜的地步。然而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自保釣運動以迄民族主義座談會、新詩論戰、到鄉土文學論戰及美麗島事件止，在每一次的政治、社會、文化運動之間，幾乎存在著左翼思考的論述文字，甚至實踐行動。不禁要問，為什麼七〇年代會有左翼的思考論述出現在經過徹底白色恐怖武力鎮壓、以及制式「反共教育」深化後的時空下？而我們又可以發現七〇年代的左翼論述最後集結在一九七六年出刊《夏潮》雜誌上，那麼《夏潮》雜誌的核心成員有否構成一個組織？或者僅是作者集團？並且這股左翼論述在七〇年代的重要論爭裡，起了什麼樣的作用？是以怎樣的外貌形態、意識型態立場出現在這些論爭之中？

本文想要釐清的是，在七〇年代每一次的論戰過程中，凡關於台灣現階段進程的論爭辯論：文學、藝術、歷史、思想知識、社會、政治經濟，一股新興的左翼論述運動在各種論爭場合，藉不同形貌且隱諱的言說（discourse）不斷的浮現；而此台灣新興的左翼論述構造，其運動路線的歷史脈絡為何。

第一節·歷史的問題

台灣左翼運動的歷史斷裂

一九二二年由蔣渭水發起，偕同當時屬於自由派的林獻堂、蔡培火以及左翼無產青年連溫卿、王敏川等人，成立「文化協會」宣告台灣民衆爭奪文化霸權的反抗運動開始。而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成立，後遷台的台灣共產黨，則宣告台灣左翼組織的政治化。日據時期整個的左翼組織是圍繞著文化協會的議題在推動的，而台共本身無動員能力，反而將成員散播滲入各反抗團體，成爲各團體的組織者。

日據時期的反抗運動，有著相當明確的意識型態區分，雖然對於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有著共識，卻是在一共生的緊張關係下合作的。諸如文化協會與農民組織、學運、工運的合作能達成一定的聲勢，卻無法與工友總聯盟、台灣民衆黨相合作，且成員無法互滲，彼此以議題的緊張性完成合作共識。整個日據時期左翼運動圍繞著豐富的文化議題，藉新聞、文學、行動劇喚醒的反抗意識，形式擴張，強化了學生、工人、農民、婦女的運動領域。也可以這樣的理解：在反資本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文化意識下，左翼取得整個文化政治運動的發動機位置，而獲得普遍的政治認同。直到一九三一年日本總督府開始嚴厲逮捕反抗人士，尤其是共產黨員，左翼人

士相繼被逮捕，組織遭到軍事行動的瓦解破壞，使左翼面臨第一次歷史的斷裂。

若將日據時期的左翼稱爲第一期，那麼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左翼則成爲斷裂的第二期。第二期左翼對軍事破壞的反省，使其本身自覺到需求武裝的組織化行動，且進一步的地下化，以秘密性的組織擴散成員的行動。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的推動，各地成立性質不同的支部，其性質已升高爲準革命的左翼運動，具有基地、小型公社、武裝、有著強烈的顛覆性格。相較於第一期，第二期左翼運動由於斷裂與不連續，以中共的指導員爲主（註一）組織了青年學生，更富行動能力，彼此的串聯、支援，不再對外公開活動及言論，此一斷裂性格，因應著大陸「新中國」的成立有了理想的朝向目標，且有彼岸支援的規格化行動準則。而國民黨的恐共心態構成的白色恐怖壓制，使其更具秘密性，激進的反叛性更強烈。國民黨代表著資產階級官僚主義的統治階級，而對岸的「新中國」卻正進行著新民主主義的革新運動，主觀及客觀條件上的認識，第二期左翼運動，自然有了「運動目標及任務規定」，自願地傾向擁抱另一個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

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不僅給予國民黨絕處逢生的轉機，更且由於美國第七艦隊巡防台灣，阻絕中共渡海攻台的可能，國民黨也選擇了做爲美國附庸國家之一，參與了美國全球反共協作體系的一環，於一九五〇年進行全島性的白色恐怖逮捕工作，逮捕工作直到一九五四年，約有四千人殉難，七千人受到監禁，直到一九八五年最後一個白色恐怖坐牢者林書揚出獄爲止。

第一期的左翼由於同時有日共與中共的影響力，以及各國的留學生，使其具國際視野，能有自主性的認識，具備獨立的政治大綱與行動綱領，台灣共產黨甚至與日共、中共平等地同屬於第三國際。強烈而濃厚的本土性格、反資本主義與反帝國主義成爲反壓制的主軸。而第二期卻只具指導性的認識，僅有行動綱領，接受蔡孝乾（原爲台共，戰後投奔中共的共產黨員）的指導綱領。整個革命的鬥爭目標被一元化的統一起來。

由於台灣左翼歷史的不連續性，其運動主軸產生強烈的斷裂矛盾。國際化與朝向中國爲左翼在認識論上的難題，且恐怖的壓迫處境使其無法也無暇處理此一難題。第二期的左翼由於秘密化、組織地下化，加上國民黨徹底而恐怖的清掃，左翼的行動被清空，言論被禁絕，成爲台灣史上懸缺的空白。緊接著的一九六〇年代，吹的是美國風，所有美國的上層、次級文化，乃至教育體制，台灣無反省能力的接收了。六〇年代的冷戰世界結構，台灣內部的強人統治，及美國的全球資本戰略體系，都將台灣置放在軍事的戰略位置上，長期的整備軍事狀態，加上政治的戒嚴，六〇年代的台灣禁絕左翼的思考哲學，也捨棄自主文化的發展；與其說六〇年代是安定的狀態，不如說是淒涼的人民歷史的斷裂。

分析架構

《夏潮》雜誌從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創刊，社長鄭漢民，至七月第四期蘇

慶黎接任總編輯，《夏潮》改版，內容轉向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及反制式歷史教育文化體系，開啓大量的，可說是左翼的知識論述文章，從歷史、文學、美術、學術、民歌及社會階級，政治批判的論述形式，企圖型塑一種批判、基進（radical）、動態的論述運動。《夏潮》雜誌至一九七九年二月被查禁爲止，共發行三十五期，一般談及的《夏潮》以第四期改版後的爲主。可確定的是有一批知識份子朝著社會主義的思想形態前進，企圖在台灣形成一批判性的左翼論述。

然而七〇年代的左翼運動，根據訪查，它並不是一個具有組織性的團體所進行的活動，它甚至沒有綱領，連「行動綱領」也沒有，不同於前期的左翼運動有基地，在各地有支部，有組織群眾，而夏潮集團甚至不是個政治團體。以《夏潮》雜誌作爲中心展開的思想體系論述，並且也只是知識份子的零散性的自覺的社會意識，因此造成一個巨大的問題，七〇年代的夏潮集團它是不是個左翼運動？若果它不能當作一場運動來看待的話，其大量的左翼形態的思考文字論述，與現代主義、自由主義現代化論述及官方意識型態者展開的遭遇戰及互相攻擊斃伐的文字思想鬥爭，作何解釋？

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爲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必須透過在市民社會中的文化霸權爭奪，改造傳統的文化——政治意識型態，重新拆解資本主義的歷史實體意識，並接合傳統的倫理、道德理念，重組新的文化——道德，教育群眾，普及階級意識進行霸權的革命。藉由葛蘭西的文化霸權

（hegemony）詮釋，我將夏潮集團的左翼論述體系，視爲向官方及自由主義現代化論的文化霸權鬥爭。作爲知識體系的夏潮系統集團，基本上可視作一個邊緣的文化論述戰鬥團體，向黨官僚、反共法西斯的傳統知識份子及自由主義現代化派的知識系統，進行全面性的對抗鬥爭。

葛蘭西與馬克思的最大不同，在於葛蘭西將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翻轉成上層結構中的關鍵位置，在馬克思的體系裡市民社會等同下層結構基礎。葛蘭西說：「可以指出有兩個主要的上層建築『水平面』；一個可以稱之爲『市民社會』，亦即俗稱『私的』有機體之總和；另一個是『政治社會』或『國家』的部份。這兩個平面各自符膺著對等的功能，一個是宰制集團透過社會進行『文化霸權』的職能；另一個方面則是，國家及『合法的』政府進行直接統治或支配的職能。」（註二）葛蘭西將市民社會視爲上層結構裡的一環，也是國家進行文化霸權控制的場域，是意識型態與文化政治的整體，而且是統治階級進行思想及智識教育的場所。也就是國家機器藉由市民社會的教育、傳播機構，進行灌輸統治者的思想體系及資本主義價值觀。所以葛蘭西認爲革命團體的政治教育，不能僅僅由經濟結構中進行鬥爭，必須在更爲廣闊的社會化過程中進行。在葛蘭西的觀念裡市民社會應視爲文化——政治鬥爭的場域，以及公共部門及私有部門的中介。換言之，由革命策略來考量，文化霸權的基本文化政治分析，以及無產階級反霸權的行動結構都是產生在市民社會裡（註三）。因此文化霸權的主軸線標訂在經濟、國家、市民社會，此三條線必須

同時進行，亦即強調經濟主義的同時，將政治的教育概念容納入戰鬥團體努力的目標之一，葛蘭西主要將國家及市民社會一併容納進來，作為權力運作及文化霸權的範圍。

那麼文化霸權的定義為何？葛蘭西對文化霸權的設定，是一套相關世界觀的智識與道德的改造問題。最重要在於建立一套集體意願的文化——政治認同，這個過程中是新舊世界觀改造的過程：「最重要的是批判，新歷史的第一個癥候會將舊的意識型態叢結送入這種批判之中。這樣的批判使得改變舊意識型態中諸元素之比重變得可行。從前是次級、從屬，甚至是可有可無的，現在都變成了首要的——變成新意識型態叢結的、新理論叢結的核心。舊的意識型態將被消解為相斥的單元，因為那些下層已經全面性的發展開來。」（註四）葛蘭西的意思是革命的意識型態並不是將舊有的形態全部掃蕩，而是建構在舊有內部的「次級、從屬」但卻進步的基礎因子，進行轉換及接合既有的意識型態，拆解舊的意識型態元素，重新接合及創造新的系統局面。所以新的改造局面並非帶來新的智識、道德，而是奪取既有智識、道德進行解合——再結合（disarticulation-rearticulation）的過程。葛蘭西的解釋明顯的是要求文化霸權的爭奪，並不是建構一套非人民意願的意識型態，必須從人民意願裡尋求可以結合，又必須可以做重新詮釋的智識及道德倫理。

葛蘭西同樣強調文化霸權形構的實體範圍，必須以「民族——國家」為團體及土地的界線，雖然它具有兩個概念成分，但卻在同一範圍一起作用。「民族（nation）部份是教育體制內建構的，譬如像是在特殊語言、文學、地理學和『吾——國——吾——民』的歷史的教化中建構的。國家作為強制的機器，在一定的領土內控制著法律，管理著『正義』；這樣的一套法律有助於建構從屬於該法律的『民族——』」（註五）因此在奪取霸權過程中，霸權階級必須將「使自己國家／民族化」，「關於霸權的道德／政治元素，展現現在國家與祖國命脈中的，就是『愛國』（愛國主義）與『愛民族』（民族主義），這是『人民宗教』，也就是說，它是實現領導與被領導之統合的環節。」（註六）葛蘭西的意思是將文化霸權的智識、道德領導轉換成一種「人民宗教」，進行「民族——國家」的集體相信，這樣領導階級才獲得人民代言的正當性。葛蘭西標示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劃歸為文化霸權應用的實體範圍，並非放諸四海皆準，必須是各地區形態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內涵運動。

要使文化霸權轉換成「人民宗教」的過程，需要有一知識階級來接合他的論述，雖然葛蘭西認為每一個人都是知識份子，「每個人都發展某種智識活動，是哲學家、藝術家、具有一定興趣的人，各有一定的世界觀，從而對擁護或變更世界觀，即是喚起新的思想方式，起著一定的作用。」「但並不是一切的人都在社會中執行知識份子的職能」——成為新的知識份子的可能性，……而且是提高到抽象，數學精神的作為建設者、組織者和實踐生活的積極融合；必須從勞動活動形式上的實踐，推進到科學活動的實踐以及歷史的人道的世界觀，沒有這種世界觀，就僅僅是

一個「專家」，而不是一個「領導人」」（註七）因此葛蘭西區分出兩種知識份子，一種是傳統的知識份子，如傳教士、學者、科學家、和理論家，他們認為自己是獨立的、自主的、具有自己的獨特性格，並且置外於生產關係之外的。另外則是有機的知識份子，與社會的某一階級結合成一整體，因此工人有工人的有機知識份子，中產階級也有其有機的知識份子。這些知識份子能夠和階級生活共同實踐的：新型的知識份子已不再是雄辯家，不再是煽動人們的感情和情緒的外部和瞬間活動的煽動者，而是作為締造者、組織者、永恆的推動者，而不僅僅作為說客來積極地參加實踐活動（註八）。有機知識份子必須與其所屬的群體、民族存在著生活實踐上的聯繫。歷史並不是由一群與群眾脫節的知識貴族所造成的，而是那些意識到自身與「民族—群眾」息息相關的知識份子達成的。因此知識份子必須擁有一種熱情，與「民族—群眾」共同體驗情感的熱情，同時負起教育群眾的責任，將群眾的知識底層提昇至哲學思想的高度。

在葛蘭西的觀察裡，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要達到全面性的奪權殊甚困難，他提出陣地戰（war of position）作為在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在市民社會中進行階級戰爭，對資產階級統治者的意識型態做長時期的文化進擊。「在政治藝術中也發生了像軍事藝術中所發生的情況：運動戰漸次變為陣地戰。……現代民主制度的強制結構——做為國家的各種組織以及市民社會團體中的複和體——從政治藝術觀點來看似乎是陣地戰中的一套「戰壕配係和前線的永久工事配係」它們只是運

動的「局部」因素，而以前卻是戰爭的「全部」等等。」（註九）葛蘭西提示的陣地戰是一種長久的「戰地工事」，並且是政治藝術中的文化鬥爭，必須對國家的強制結構進行人和直接的攻擊。Moutte解釋葛蘭西的陣地戰就是意識型態鬥爭的過程，兩個主要階級試圖藉此佔奪那些非階級的意識型態元素，將之整合到以自身霸權原則為核心的那個意識型態系統當中。雖然這只是鬥爭中的一小步，但是它卻是決定性的一步，因為葛蘭西說過：「在政治上，一旦我們已經贏了『陣地戰』，我們就已經贏得決定性的勝利。」（註一〇）陣地戰在左翼的運動陣營裡代表的是一種積極、主動的人民運動新形態（註一一）。

透過葛蘭西的理論系統，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左翼運動面對全面性的鎮壓型國家機器，不僅僅從經濟鬥爭中進行，並且更重要的是進行意識型態的文化霸權鬥爭。因此葛蘭西相當注重知識份子的「有機」性，以及實踐性，文化霸權的改造管道，必須在傳播機構及教育制度下展開，有機知識份子必須從既有的傳播體系以及教育機構、制度中，進行「解合—再接合」的意識型態顛覆工作。在葛蘭西的《獄中札記》中，十分重視各級學校的教育職能包括初級中學、及大學研究所的教學任務，他認為應該「改造它們，並給予它們以新的內容。」重要的是發展的方法：「是發展與集體生活、與生產界、與人們勞動相聯繫的活動。」（註一二）以及文化組織的世界觀要有新的內涵，要有民族的歷史的新詮釋系統，並建立一種新的文學批評及藝術批評，這種批評是在建立新的「民族—人民」的文化，作家要與人民的生活

感情爲自己的生活感情，創造「民族—人民」的新的價值內涵。

在此分析架構上我將夏潮系統視爲，在市民社會中進行文化霸權的奪權鬥爭，以及有機知識份子從事陣地戰的意識型態運動，以此觀察、檢視夏潮系統在七〇年代於台灣進行的左翼運動形構。因爲夏潮系統參與並滲入多層面的文化論述場域，從思想、文學、歷史、藝術，甚至政治經濟的論述領域進行強力的干涉以及挑戰，以文化霸權的陣地戰概念觀察挑戰、運動的過程；然而這股新興的左翼挑戰能量與日據時期及五〇年代的左翼組織系統完全切斷關係，反而具有自我的不同意識型態形構；所以將「左翼運動」中間加入「啓蒙」兩個字，它不僅是對台灣社會的雜誌閱聽者，進行文化霸權的教育啓蒙，也是集團成員自我意識型態再構造的啓蒙過程。借用葛蘭西的理論分析觀點時，構成了本論文在觀察與探索台灣左翼啓蒙運動的兩個步驟：一、思想、文學、歷史、藝術、政治等皆視爲市民社會裡的主要面向，夏潮成員在各面向內部的活動及其轉折過程。二、文化霸權的爭奪及挑戰，以《夏潮》雜誌文字論述，及其在爭奪及挑戰過程中的結盟及對戰集團的文章敘述，爲主要的分析場域。介紹本論文結構前，我仍要解釋在葛蘭西裡面，民族與人民是在一個相同的意符下進行，民族（nation）與人民（people）其稱謂具有同樣的位格意義，然而用在台灣這塊特殊島嶼地區，「民族」意符具有「統獨」的政治爭論，甚至牽扯上族群（ethnic group）關係的歷史分野，但是必須提示的是，在七〇年代族群意識或者統獨意識其實並不如八〇年代或九〇年代這般清晰醒目，以及

爭論繁多。是故在理論分析架構以及論文內容上，並沒有將「民族」做細緻的定義及區分，按照七〇年代政治運動系譜，「民族」在政治運動裡的定義仍相當模糊，但也正由於其模糊不定性格，「民族」的召喚替代了「人民」這種具有左翼意識的群體召喚，使七〇年代充斥著民族主義的呼聲。

歷史的問題

本文歷史觀點，要談論的是一場運動中言說與行動上接合的可能，構造一個運動史觀的形成。在運動中的對抗、批判、滲透鬥爭等等的策略與戰鬥的運用，是隨著歷史時間的變化，而有不同層面的戰略與意識構造。其自主性格與非自主性格各有所影響，因此運動非同於革命具有設計性格，其抵抗形態與批判言說會隨著時間之箭，產生自主性轉換，瞬息之間內容變造複雜，結構轉變。運動史觀主要在抓住一場運動，其自主性的「捍衛」理想與「擴充」影響，非自主性的本質「變化」與力量的「萎縮」。

過去在討論運動歷史時只注意訴諸文字言說的表述形式，也僅僅看到運動模態的格式化（興起與衰落），而運動本質放在歷史與社會之間存在各層面上造成不同程度的變化，我們缺乏批判的分析性收穫。我們所要考察的除了直接文字表述之外，間接的關於運動現場上意見的陳述與表態反映，不論直接與間接都是言說上自主性的一部份；在直接運動現場的空間上，當事人所表述的「說話」是行動上自主

性的象徵。表述文字與運動現場的對照觀察，是瞭解運動自主性「捍衛」的重要動作。而自主性的「擴充」則較難以掌握，當事人的活動範圍、人物歸屬團體的不規則性、運動策略上的聯盟糾葛，對於不同類型群眾的影響範圍，對運動對象的精確反應，這些領域的變化是使運動在自主性的掌握上，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擴充。把運動視為對社會從屬關係的抵抗，以建構新的自主空間，這樣來談較為清楚。但是社會從屬關係的多元性格，在不同層次與面向上，會產生多層的壓迫關係。運動本身如何從複雜的從屬關係，找到對立的抵抗焦點，其自主的捍衛鬥爭目標、如何組織成堅固的一致性，是觀察運動的主軸線。

回到台灣本土運動裡，這條主軸線，置放在社會關係的改造上來理解，在威權統治時期，每一形式的運動都似乎關於「民主」的言說。在基進民主運動裡，企圖將「抵抗正當」這一觀點，藉不同領域散播到市民社會各層次的壓迫關係上，塑造對抗與民主鬥爭的意識。在此，葛蘭西「陣地戰」的概念，給了我們參考觀點：基進民主運動在不同層次的變革過程，恰巧將運動的自主化聯繫起來。「陣地戰」的鬥爭影響，串連成政治空間的鬥爭，浮現基進民主的先驗理想，運動本身的自主化，才產生了他在政治意義的獨特性。所以運動史觀，在提供一批批判性歷史組織，此一歷史組織讓我們重新理解社會改變的過程，尤其左翼運動所帶來的歷史組織觀察，所產生的對抗不平等的壓迫及創造新的文化系統。在文學、藝術、歷史、國際視野、經濟、社會關懷、教育陣地裡，左翼運動會在層次重疊的不同陣地中產生同

等的自主化，必須從各類的意識型態組織系統，分析、觀察自主的歷史言說，從分散的陣地領域，揭露自主的運動主軸，怎樣抓住這條主軸線，才是歷史的問題所在。

「文化霸權」的查考，也提供「人的本質」在運動場合的實踐，社會的當事人，才使運動起了歷史的作用。當事人成了言說系統斷裂的連接環節，人的本質在陣地裡起了創造主體作用，進一步成了陣地組織的「接合」環節，人的有機作用使其遊走於各樣公共空間，施展其溝通、對話、辯論的功能，促使運動能有集會、集結、結盟、組織起來。構成各種各樣的組織效果。所以當事人如何在運動場合表現理想的實踐，如何生活化的行動鬥爭，「人的本質」作用，亦是運動史觀重要的考察因素。

〔註一〕七月蔡孝乾輾轉來台，集結舊台共幹部廖瑞發、林操材、簡吉等，建立中共地下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由蔡孝乾任秘書，領導組織。省工委主要任務在於「緊密團結工人、農民、革命知識份子」，以「反美帝、反國民黨官僚，實行民主自治」為綱領，號召全省各級人士，組織廣泛的愛國愛鄉民主自治統一戰線」。參考藍柏洲〈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下的勞動者戰歌〉，《尋訪被壓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台北，時報，一九九四，頁一〇〇。

- 〔註二〕葛蘭西《獄中札記》，頁四二五。引自蔡其達《從市民社會到無產階級國家——葛蘭西的國家理論》，《島嶼邊緣》第一期（台北，一九九一，十，十五），頁三八。
- 〔註三〕蔡其達《從市民社會到無產階級國家——葛蘭西的國家理論》，《島嶼邊緣》第一期，頁四二。
- 〔註四〕此段葛蘭西文字取自墨菲（Chantal Mouffe）《葛蘭西的霸權和意識型態論》，《島嶼邊緣》第一期，頁七八。
- 〔註五〕波寇克著（Robert Boock）田心喻譯《文化霸權》，台北，遠流，一九九一，頁四六。
- 〔註六〕同〔註四〕，頁八一。
- 〔註七〕葛蘭西《獄中札記》，中文版，出版及年代不詳，頁五〇四—五〇五。
- 〔註八〕《獄中札記選》，英文版，頁一〇。轉引自詹·約翰《葛蘭西——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台北，結構群，一九八九，十，頁九一。
- 〔註九〕葛蘭西關於陣地戰解釋的文字，同〔註三〕所引刊，所引書，頁四三。
- 〔註一〇〕墨菲（Chantal Mouffe）《葛蘭西的霸權和意識型態論》，《島嶼邊緣》第一期，頁八三。
- 〔註一一〕同〔註三〕，頁四三。
- 〔註一二〕葛蘭西《獄中札記》，中文版，頁五二七—五二八。

第二節·左翼思想的萌芽——保釣運動的波濤

一九六九年聯合國亞洲經濟開發委員會（ECAFE）在曼谷發表調查研究報告說：台灣東北二十萬平方公里，包括台灣北部釣魚台列嶼附近為石油大油田所在〔註一〕。一九七〇年九月日本向外發表釣魚台群島主權屬於日本，美國國務院同樣宣稱，而此事件經過媒體大肆報導，台北外交部發言人魏煜孫發表對於釣魚台列嶼的新聞報導，表示暫不置評〔註二〕，雪上加霜的是宜蘭縣漁民在釣魚台附近作業時遭日艦驅逐。針對此一事件，時為台大哲學研究所研究生王曉波於十一月份《中華雜誌》發表〈保衛釣魚台！〉督促政府保衛釣魚台〔註三〕，從王曉波的描述可知台灣的輿論界對於釣魚台事件已經沸騰到極點，然而國民黨爭取釣魚台主權的態度過於遲緩以及曖昧，對具「理想主義」的青年早已是無法忍受的事情。整個運動發起的理想主義心理因素，具有歷史背景的震盪：一、六〇年代後期國際地位衰落，退出聯合國及中美外交正常化，以及王曉波所言外交部只會「辦理絕交事宜」，對台灣命運給予極度的刺激；二、「五四」的學生運動精神，長久以來殘存在具有「理想主義」的青年中，王曉波文章開頭副標題以五四運動的宣言〔註四〕，企圖借用五四運動的歷史正當性，喚起青年的行動主義；三、每個擠破頭考進大學的學生，對日本侵略中國的近代史，都有深刻的「背誦記憶」，「反日」思

想容易被激發出來。

隔著太平洋的保釣運動

中國大陸一九六六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日後的歷史證實是一場政治的權力鬥爭，然而文革中期普遍的影響了各國的學生運動、馬克思主義反體制的狂飆運動，面對美國以及歐洲資本主義強勢的傾銷經濟與文化的消費生活，中國大陸的文革在實際的社會改造以及理論基礎上，呈現出一套完整的運動理論及行動體系。因此包含著美國的反越戰、日本的大學鬥爭、法國一九六八年學生大革命、西德學生運動，將毛語錄、文革中的紅衛兵精神、知青下鄉等成了各國反體制運動最受歡迎的學習對象。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捲進去美國反越戰浪潮的學生固然不多，但是這些少數的學生卻是能夠瞭解實際運動中操作的步驟：串連、組織、民主集中制、路線辯論，以及在理論領導上的重要性，北美保釣的興起有其一定的國際歷史脈絡。

終究威權政體下的制式教化體制，台灣的青年並不是那麼的有「反叛」的行動力。然而對留美學生制式教化體制的拘束，已被美國自由主義以及六〇年代反越戰的學生運動沖刷了不少。美國留學生看到王曉波登載《中華雜誌》上的文章，決定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七日已經開始具有左翼組織性的余珍珠，以及仍具理想主義的胡卜凱，加上創辦「大風社」的沈平、李德怡等七人於普林斯頓大學討論決定發起運動，而後聯絡具有全美聯絡網的《科學月刊》發行人林孝

信，於十二月份《科學月刊工作通報》刊出「釣魚台問題專號」，此專號要求各地召開有關釣魚台的座談會，並要求「必要時，到各地中、日大使館前示威。」普林斯頓大學首先成立「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緊接著紐約、芝加哥、華府、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等地區大學，各校相繼成立保釣分會。十二月十九日普林斯頓、耶魯、賓州、康乃爾、賽拉克斯等大學的代表在普林斯頓舉行座談，決定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日至紐約遊行。一月各地保釣分會紛紛附和發起遊行，美國西岸的大學西雅圖、柏克萊等校的左派學生堅持於一月二十九日發起遊行，「柏克萊之選」一九後來才知道是因為要與民國二十四年的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諧音（註五），於是決定在一月二十九、三十日於全美各地同時進行遊行示威。

美國留學生一二·九的遊行仍具較純粹的保國護土愛國行動，即使美西部份大學已經有左派學生躍入保釣運動，然而尚未掌握運動的主導力量，左派學生亦同意妥協政治立場的堅持，「不受任何黨派直接左右，大家出於一片愛國熱忱」。協議不帶國民黨旗也不帶五星旗，對於抗議口號也是中性的：「日本軍國滾出去！」「反侵略的人們團結起來！」「反對出賣釣魚台！」等避免爭議性的口號。一月二十九、三十日的遊行主要以遍地開花形式於各地區自行展開，因此具有地區形式不同、程度不同的左傾、純真的理想主義及右派等，各自不同意識型態摻雜的特色，政治意識上亦各有分裂：支持國民黨政府、支持中共政府、超越現有政權統一論者、台獨者、避免政治主張者（註六），並且許多人並沒有遊行經驗，制式教化體

制的記憶也對遊行感到恐懼，甚至紐約的遊行被紐約時報稱為「holiday mood」〔註七〕，運動初起的紛亂，呈現運動的本質在於一種「反日」情緒上的爆發，也說明其在「反日」情感上自覺性的參與，許多人對這場的遊行仍帶著情緒上的感動，沒有直接的抗議目標以及對象；這種紛亂現象對於參與過反越戰的學生而言，要將運動進一步推動，逐步進行組織、理論教育的工作，變成一種自覺性的需要，於是開始進行籌畫四月十日華府的大遊行。

從一·二九至四·一〇正是運動進行組織化的階段，傾向保守主義的劉源俊回憶：「釣運的主導權遂多落到急進份子（不一定親共）的掌握中。」〔註八〕北美保釣組織化的過程，美東地區選出李我焱、徐守藤、袁旂、白紹康、鄭治中、曹心姝、袁葆生為執行委員，主導權主要為李、徐、袁以及王正方。美中負責人為夏沛然、王渝、林孝信以及王春生等；美西為柏克萊的劉大任、郭松芬。由此主導者多為逐漸左傾的留學生，然而使得北美保釣進入基進的尚在國際情勢的推波助瀾，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尼克森宣布訪問中國大陸，美國國務院宣布取消前往中國大陸旅行的關於護照的所有限制，留學生感到震驚，那遙遠的祖國，曾經在背誦歷史記憶裡的苦難的祖國，透國美國新聞網的報導，祖國映像重現在每個家庭的電視，同時釣運學生開始感到有進一步瞭解中國的必要，「因此，每個校園的運動總部都開始慢慢累積『進步』讀物，這包括《毛選》、《人民畫報》、《北京週刊》、《紅旗》、《馬恩選集》、一些列寧的著作、斯諾的《大江彼岸》和《西行漫

記》、《金陵春夢》，……」各校園也放映「紅旗渠」、「一定要把淮河治好」、「東方紅」及「白毛女」等樣板戲。「經過這一連串的自我教育和對外的宣傳活動，每個人嘴上都能隨口說出『為人民服務』、『破私立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等政治口號。」〔註九〕

保釣運動在各地區有了不同程度的轉向。此時各地區有各自的關於保釣的刊物出現：「《科學月刊》釣魚台專輯結束後，有《學聯通訊》釣魚台專輯，舊金山的《暢言》、密西根的《大漢聲威》、紐約的《釣魚台簡報》、芝加哥的《釣魚台快訊》、柏克萊的《戰報》，一時保釣刊物出版了一百多份，言論激烈。」〔註一〇〕其中最重要的是紐約《釣魚台簡報》、芝加哥的《釣魚台快訊》、柏克萊的《戰報》，多數保釣刊物與其內容相同〔註一一〕，出版刊物除了聯絡通訊及運動訊息外，主要在於進行積極的串連以及運動路線的主導；柏克萊的《戰報》就出現了對一·三〇紐約遊行的散漫性進行批鬥，指出其不夠「戰鬥性」、「沒有氣」、「期望東海岸同學能有效運用情緒，團結力量，認清本質，使一千五百人產生敏銳影響力」，對不參加遊行及台獨者批評為自由主義「是一具沒有原則的行屍。在美國兩萬多中國留學生中，有太多的碩士行屍、博士行屍和教授行屍。」並積極的提出路線辯論：「保釣運動政治意義高於民族意義。」〔註一二〕同時可以判斷出柏克萊的左派已經積極跳入保釣運動之中，柏克萊的運動主軸由單純民族主義愛國運動轉向激進，而出現三條運動軸線：「一是反政府，反對台灣的不民主，反對台灣

妄自切斷中國的歷史。……二是民族主義抬頭，多接觸到近代中國的事物後，看到勞動人民一草一木建設了我們的國家，……三是反資本主義，……。」（註一三）

左派留學生躍入運動的同時，二月五日《中央日報》的社論說：「現代日本沒有軍事侵略的政策」、「我們必須看清毛共『反美國帝國主義』與『反日本軍國主義』的口號，是以聳動中國人的觀感與心情而破壞中日韓美的合作爲目的。」（註一四）此外國民黨不斷暗示北美洲的保釣運動有「共匪統戰份子」在其中利用，亦即國民黨對於北美保釣的懷疑態度，讓保釣運動有了急轉直下的效果，較爲右傾的劉源俊總結國民黨的措施：一由於從昏庸無能的駐外人員獲取錯誤的情報乃至無法對情勢作正確的判斷，二由於老大的作風低估了學生運動的力量，三由於退縮苟且消極的態度，使得參加釣運的留學生普遍懷有對政府不滿的情緒。」（註一五）國民黨在校園的表現更是令留學生感到極度的反感，「打小報告，在人家汽車油箱裡放糖啦，或者半夜給人打恐嚇電話。那時國民黨特務和美國聯邦調查局都有關連，芝加哥登記遊行的同學，就半夜被FBI搜家抓走，說他收藏大麻。」（註一六）讓非左派的不自覺的群眾出現兩個現象：「一個是跟國民黨決裂；一個是思想上的決裂。」（註一七）整個運動逐漸與國民黨決裂而左傾跡象愈來愈明顯。

釣運中期主導者作法大概有三點：「一、稱釣運爲一愛國的群眾運動，每個人必須參與而從中學習，『教育自己也教育群眾』。二、發起『一人一書』運動鼓勵寫信給國內親友，希望掀起國內全面性示威運動。三、因爲一·三〇遊行後檢討發

現『台獨』未參加釣運，因此藉機打擊『台獨』及『兩個中國論』。」（註一八）從而各地保釣會開始興起座談會、讀書會、放幻燈片、油印刊物、向國內寄信等。國民黨對北美洲保釣運動的冷漠甚至打壓態度，留學生開始反問「運動方向何處去？」同時看到中共的對文化大革命的宣傳，看到樣板戲，看到社會主義勞動人民的朝氣，相對的，對台灣政令宣傳媒體起了懷疑，以及思想上的決裂，中國，成了一個更大的思想朝向框架，需要重新認識，重新學習。沈平回憶當初的轉變：「當我們開始有意識地去認識中國大陸以後，思想上的確起了改變。讀『五·四』時的作品，像巴金、魯迅等人的書；像韓丁的『翻身』；韓驚的出現；讀《西行漫記》；讀《活在新中國十五年》，有人開始放棄學業，『讀書無用論』發生一定作用。」（註一九）北美保釣愈接近四·一〇愈向左傾，而更多的老左派不斷躍入釣運裡，甚至香港來的僑生也加入活動，曾參加美國反越戰的台灣學生，由於更具運動經驗，實際運作起串連、組織的工作，進行民主集中制的實踐生活，自我思想及行動上的鍛鍊，對於與國民黨的決裂愈加徹底。

三月十三日美國五十九個保釣行動委員會分會共同簽署一份公開信列舉十條「最後通牒」予以台灣政府，要求國民黨於三月二十九日正式公告釣魚台領土主權，譴責日本與美國國務院，派兵進駐釣魚台，公布與四家美國石油公司的合約，停止參加中日韓聯合開發海底資源會議，追究失職官員責任，不得壓迫國內外愛國運動，開放國內言論，報導有關釣魚台之一切發展。」並於接獲此信後，在五天内

公布於《中央日報》海內外版，《香港時報》及其他中華民國政府機關報紙。」並在信中最後要求「我們嚴正聲明，如果中華民國政府忽視民意，置此公開信於不顧，則將盡失海內外民心！」（註二〇），「公開信」措辭對國民黨政府有諸多嚴厲的態度，如「明確答覆」、「飭令駐外使領館」、「當眾答覆」等，一方面說明了運動中的多數人對國民黨政府的不信任，一方面為四·一〇的遊行示威預伏了運動分裂的前兆，在此「公開信」的同時，三月十六日另一份五百二十三名留美學者簽名的「留美學界為釣魚台事呈政府文」（註二一）向政府提出四點建議，大致與「公開信」相似，然而其措辭卻是「懇切」、「建議」、「團結起來」、「堅定地支持政府」，國民黨簡短的答覆五百二十三名學者的聯名簽署，對留學生運動措辭嚴厲的「公開信」則置之不理，保釣運動的左右分裂成爲必然。

四·一〇遊行由全美各地來的留學生約有二千五百人左右，等於說明了「紅色」左派學生已經主控保釣運動的主軸，四·一〇抗議主題轉向反美、日本帝國主義，反國民黨政府、反迫害等等，抗議遊行、呼口號、唱歌、發傳單、演講等，讓北美保釣運動達到最高潮。由於國民黨政府的遲疑以及打壓，四·一〇出現了「上書中華人民共和國請求保衛」、「哪個政府能保衛釣魚台，就承認那個政府！」（註二二）的聲音，在國家認同上出現的質疑，群眾運動開始了朝向政治運動的發展。保釣運動的主體議題並不在新大陸而在台灣，北美洲保釣運動卻拉起了政治意識，渴求一個強大政治歸趨，「它是知識份子希望有一個強大、有主權、爲人民的政府

的集體行動表現。」（註二三）由於民族情緒上的抗議示威的目標遭到挫折，知識份子轉向更內向的重新認識，在前一期的重新認識中國的浪潮下，自己往何處去？自己屬於哪一個國家？成了運動內向式的政治轉化，選擇一個可以歸趨的政治實體，以護衛被掀起的民族主義情感。政治意識使知識分子自認爲應該介入對「國是」的討論，四·一〇之後各地展開了「國是討論會」，討論的焦點置放在路線上的定論問題，即對中國大陸的再認識與保釣運動的立場。

八月楊振寧及何炳棟紛紛赴中國大陸訪問，楊振寧並見周恩來，回到美國後，向留學生報告大陸「民氣高昂」和「豐衣足食」，對中國的認同以及台灣的前途，民族情緒的擴張進一步讓留學生掉入更深的政治認同的混濁中，逐漸左傾的學生，面對更大框架的社會主義祖國，以及保釣的受挫，展開深化的檢討，「認識祖國運動」，認識勞動人民，認識四十九年後的中國歷史，企圖彌補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歷史的斷層，重新檢討「背誦的歷史記憶」，到底中國的土壤上發生了什麼事？在理論上檢視制式的教化體制，卻揚棄掉僵化的傳統教育，轉向更趨反方向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自我的民族認同以及思想模式上的絕然割裂，爲了確定在政治上更純粹的正義性，中國大陸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象徵著對政府、對黨批判的革命正義性，而且中共在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實踐經驗指出了一條道路：「這條道路包括：第一，若要擺脫帝國主義的軍事和經濟侵略，只有革命一途。第二，若要革命成功，必須走人民戰爭的道路。第三革命勝利以後，第三世界國家應向中共學習，

走自立更生的道路。」（註二四）文革的運動經驗，感動了留學生的政治意識以及在正義、真理上的認同，保釣運動遂轉向了統一運動。

八月二十一日布朗大學的「美東討論會」以及九月三日安娜堡的「國是討論會」主張統一的左派學生主導了會議的進行，面對一個起於純粹的愛國運動，然而爭奪的主體卻又在遙遠的一方，左派學生認為必須要有具體的決議，否則運動流向情緒上的狂洩，在一陣的浪漫情緒洩盡後，終究流於平常，群眾仍歸於群眾。於是幾場國是大會上積極的教育群眾「認識中國」，安娜堡的「國是討論會」就進一步通過具體的議案，「其中之一就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極度傾向中共的學生要求與國人民的政府」。（以二百三十六票對四票通過），「正當性獲得肯定。九·二一的遊行自然形成分裂了兩派的群眾，國民黨大量動員學生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而與左派學生遊行隊伍相撞，『差點衝突，群情激昂』」（註二五）。

九月底保釣運動的主導者李我焱、王正方、陳治利、陳恆次及王春生五人秘密進入大陸，由周恩來接見，但被《中央日報》刊登出來，國民黨一律將釣運份子劃歸為毛共，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扣帽子，刺激更多的留學生一批批進入中國。回歸、統一運動的熾熱在一九七二年燃燒了起來。

北美的保釣運動原本就建基於全球反體制運動的後期，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理理想主義的宣傳，從美國電視的、影片的映像裡，中國成了一塊流血流汗的勞動淨土，台灣留學生面對這塊土地，卻是一個歷史記憶的空白，當全球反體制運動效法著文化大革命的理理想主義時，北美的保釣運動自然連結上重新認識中國、自我學習的內省運動，例如劉大任認為「問題根源在許多歷史狀況都是因為兩黨的殘酷鬥爭造成的，所以一定要結束分裂狀態。釣運轉到統運，是透過一個『認識祖國運動』展開的。」（註二六）因為，「真理在海的那一邊！」（註二七）

北美洲的保釣運動由於主體在台灣，並不是直接向國民黨爭奪權力，劉大任認為它是製造「高級知識份子政治上的演習，不是真正的運動。」（註二八）然而群眾運動最主要目的不僅僅在於政治奪權，更重要的是群眾的自我意識型態的反省，反省到知識份子對階級認同上的虛妄性，因此當時出現的「讀書無用論」、「學位無用論」，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對價值觀、世界觀的認識論輸入了左翼思考模式的方程式。保釣之後一九八五年《台灣與世界》主辦的一場座談會中，一位W先生做了這樣的結論：「如果像大家講的海外保釣運動，主流是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再加上美國式民主，以及所謂理想主義，這種理想主義是指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幻想主義，那它是成功的。因為它基本上看中國的發展，隨著它的脈搏跳動，完成了它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使命。這個運動的失敗是對左派，那些少數人而言。這種左派與統一式左派是有分別的，跟中共也有不同。如果有這樣左派的話，他們是失

敗的。也不光是這一類左派，是當時世界性馬克思主義左派都失敗。」而另外一位A先生則認為：「像釣魚台運動這樣的學生運動是旨在喚起民衆，讓大家對帝國主義認識、資本主義認識、社會主義認識。從這個觀點來看呢，對當時年輕人是很成功的。」（註二九），另外一九八六年水秉和的一篇文章也勾勒出北美保釣與文革的不同特點：一、釣運是一個自發的運動；二、釣運從頭到尾都是一個不具侵犯性的運動；三、即使在極左傾非常明顯的時候，釣運裡面一直存在著討論、辯論和不同意見之間的對話。（註三〇）

運動的成敗對於運動主體而言，有其自我反省、成長與再認識的必要性，但是運動對於歷史而言，必需審視運動過程中繙現出來的熱力溫度，擴散到什麼樣的層面，即使運動的過程、轉向在北美洲的美國發生，它是否具體的影響了台灣社會內部的思考，以及有否轉換了台灣島內的保釣主軸，才成爲北美洲保釣運動的歷史意義。也正因爲北美保釣運動熱力溫度擴散的相當迅速，加上左派傾向性逐漸的濃厚，政治意識的回歸中國、統一呼聲升高，伴隨著中共在外交勢力上的節節勝利，國民黨才會極力的醜化及封鎖北美保釣的訊息，以保衛它在台灣內部威權結構轉換過程中的政權安全性。所以它不僅僅是一場「政治演習」，對國民黨而言，是來自內部人民在外國的一場政權正當性的鬥爭。

島內的保釣運動

北美保釣運動繼一月二十九、三十日的遊行後，決定再於四月十日遊行時，美國國務院於四月九日發表聲明將於一九七二年將釣魚台列島交還日本，此聲明一出，四月十二日台大香港德明校友會貼出第一張抗議海報，緊接著台大「僑生社」及「港澳同學會」的大量海報出現台大校園，四月十四日台大僑生約百餘人發起遊行，至日本大使館遞交抗議書。十五日集結更多的台大、師大及政大的僑生及本地生近千餘人再度集合抗議示威，抗議對象爲美國大使館，最後遊行至台大校門口解散，連續兩天的抗議遊行皆由僑生首先發起，由於僑生較能夠接觸到海外保釣訊息，並且也相當明白他們只可能點燃運動而不可能成爲主導性，對台大代聯會不夠積極的態度感到不滿。另外在美國的一位W先生認爲「台灣的保釣運動是香港去的學生帶動，他們混雜了中國民族主義和毛派思想。他們把毛派思想隱藏起來，但是我們是知道的，他們點燃運動。」（註三一）運動一經點燃，無法再收拾熾熱而飢渴的行動，短短兩天台大校園貼滿保衛釣魚台的海報，十六日台大代聯會舉行「保釣座談會」原本欲抒解這股激動的情緒，卻情勢反轉，法代會主席洪三雄建議設立常設機構來領導行動，大論社長錢永祥立即支持，此提議等於奪取台大代聯會的領導權，王曉波適時發言「聲嘶力竭的高呼：『保衛釣魚台常設機構委員會』立刻成立！」（註三二）台大保釣會的成立表現台大學生自覺的理想主義成熟，而顯示了

不滿的在野勢力開始興起。

其實整波保釣的興起可說是勢難可擋，除了台大的遊行外，各大學皆有掀起抗議的活動，成大早於四月十三日在成大校園遊行。並且一些學生領袖到救國團求見救國團執行長宋時選，宋時選表示示威活動只要不越出校園，則他原則上同意（註三三）。有了救國團的保證，各大學校園紛紛展開保釣活動，同時這種被控制的自發性抗議行為，說明國民黨對於群眾運動一直存在相當大的戒心，依據丘為君所編《台灣學生運動一九四九—一九七九》裡頭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大事記〉明顯的有控制性的學生運動紛紛在各大學進行著，各大學分別舉行座談、示威、代表上書、校內遊行：

四·一四 政大：集會座談、校內遊行。中興：校內討論提議遊行。

四·一五 淡江：舉行保釣座談，支持運動。

四·一六 政大：三百餘名學生向美使館抗議。師大：校內集會遊行、簽名、致抗議書請外交部轉交美國。台大：兩千餘名聯合簽名向美使館抗議。清華：聯名發表至留美學人及留學生書。

四·一七 中興：發表宣言派代表向美抗議。海洋：上書中央黨部。淡江：上書救國團。香港學生校內示威。輔仁：校內集會座談派代表向救國團表達支持。

四·一九 台大：大新——釣魚台專號。清大：代表向美使館抗議。

四·二〇 台大成立保釣行動委員會。師大：刺血書保衛釣魚台。中興：向美

日使館提抗議書。

四·二一 文化學院：座談會。

四·二三 東海：代表向美使館抗議，在校內發起五場演講及簽名活動。世新：全體簽名支持保衛釣魚台並交外交部轉交。

此種各校分起的現象，讓一向冷漠、安靜的大學校園掀起了對時事注意的波濤，各校類似時事討論的社團紛紛出現，甚至地下性的串連，都在暗地裡進行，使校園內對文化、政治注意的青年，頓時活躍起來，固然在各校園內不成為一學生運動，確是使有志青年對執政國民黨宣稱的正義、真理起到懷疑甚至揚棄的態度。

台大保釣會成立後四月二十日召開「釣魚台問題座談會」，由錢永祥、張晉城主持，應邀出席的校外人士有外交部發言人魏煜孫、立委胡秋原、李文齋、謝仁達、國際文教處長姚舜及政大教授丘宏達，魏煜孫強調要同學「瞭解政府、信賴政府」，姚舜由於奉命赴美「疏導」北美保釣運動，反倒被北美學生反駁、再教育，成了「移尊就教」（註三四）的場面，回到台灣後他卻又以一貫善良的恐嚇，要求學生「維護純正的愛國運動，切勿流於質變而被人利用為反政府的工具。」（註三五）這場座談會在學生指責外交部的激昂情緒下結束。這次座談會的歷史意義在於政府官員親自至大學校園說明政府政策，「這是國民黨政府高壓統治台灣二十餘年來，『學術孤立於政治，政治自外於學術』的第一次較具規模的突破。」（註三六）接著二十一日剛卸下駐美大使職務，轉任命為外交部長的周書楷，由北美司司

長錢復及台大校長閻振興陪同下至台大演講，演講的重點在「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要信任政府」，這些與當天《中央日報》上教育部長羅雲平的話如出一轍：「學生應信賴政府，不宜再有遊行、請願、或做校際間之聯繫訪問。」（註三七）教育部官員及外交部官員開始赴各大學說明釣魚台事件的政府的「苦衷」與「態度」，國民黨期望藉由政府官員正面的與學生溝通以及溫和的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抒解學生被激發的愛國情緒，轉換成「好好用功讀書，報答國家，支持政府」，以父權姿態壓制學生與聞政治社會事務的權力。

然而事與願違，四月二十八日美國國務院發表「台灣地位未定論」：「一、台灣的法律地位，是一個敵對政府之間尚未解決的問題。二、台灣的中華民國和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爭端，應由兩國直接的解決。」《大學雜誌》以社論名義發表〈駁斥所謂台灣法律地位未定的謬論〉，嚴正的對美國警告「這種謬論除了激起所有中國人的憤怒及破壞中美人民間的友誼外，我們看不出對美國有任何好處。」（註三八）由於美國不斷的加速與中共「正常化」的外交腳步，於保釣運動正熾熱時刻的不利於台灣的外交宣告，也不斷激發起國家與國家之間對抗的仇恨意識，同時將民族主義從「背誦的歷史記憶」再度燃起更激烈的怒火。

六月十二日「美國與日本將於十七日簽署移轉琉球管轄權的正式文件，並將釣魚台列嶼包括在內。」（註三九）此消息一見報，蓄積兩個月的愛國激情再度被燃熱起來，台大保釣會決定於六月十七日發動示威，但是被當局知悉，指示絕對不准

再有示威情形，台大校方也不敢作主答應，聯繫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磋商，磋商之後張寶樹才勉強答應示威行動，但附上四個條件：一、人數愈少愈好，二、節目愈簡愈好，三、路線愈短愈好，四、時間愈快愈好。而至少這次是學生在沒有外力下有組織、有計畫的公開遊行。六月十七日當天有二千多人遊行，呼喊口號由「保衛釣魚台！」「釣魚台是我們的！」「保衛領土主權」到「中華民族不屈服！」「中國人！站起來！」「中國人站起來了！」，甚至到日本大使館時，高喊「反對美日陰謀」、「打倒帝國主義」、「日本鬼滾出去」，情緒的激動在現場維持秩序的教官、安全人員呼籲：「請保持我們大國民的風度，我們可以決戰沙場，但絕不以眾凌寡！」但卻換來群眾的怒吼：「沙場在哪裡？」（註四〇）

是的，沙場在哪裡？六·一七的示威遊行將台灣保釣運動拉到最高點，情緒也最激昂，然而在「誓作政府後盾」的保釣運動下，釣魚台終歸於日本，而國民黨沒有任何的外交政治抗議舉動，反而不斷壓制島內的愛國運動，在不爭奪權位、沒有沙場的運動下，保釣運動命定走上無言的結局。然而在運動中被升高的政治意識，如同北美保釣一樣，必須找尋轉換的程式，必須有進一步的波濤，使政治意識有實踐的場域。歷史或有弔詭，台灣與北美保釣似乎同樣在進入運動的高潮後，開始了轉換以及分裂。然而不同的是，台灣掀起的學生運動有實踐的主體，以及面對正在結構轉型中的政治權力。

結束保釣討論之前，我們回顧北美保釣與台灣保釣之間聯繫，這兩者不可能在

隔絕的情況進行同一個運動議題，也不可能因有國民黨醜化及封鎖而有類似的歷史命運。並且台灣保釣運動於日後的轉向，向政治體制挑戰、學運轉向社會服務運動，以及高昂的民族主義再起，並不是歷史的偶然。

北美保釣一月二十九、三十日的遊行之後，四月十日，也就是北美保釣的第二次大遊行，駐美大使周書楷返回台灣就任外交部長，他向記者表示北美的保釣運動：「我們已經獲得足夠資料，顯示這項運動有共黨在背後操縱，它有濃厚的反美、反日和反政府色彩。」（註四一）周書楷的抹黑指控，只有刺激北美保釣向左轉得更厲害。但是這對於參與保釣運動留學生的在台親友而言，這是相當大的震撼，作為「毒蛇猛獸」的共產黨，如何能夠套上在台灣受完完整整「反共教育」的學生身上！台灣學生反共的「純粹性」怎麼可能被顛覆呢？引得第一個具文〈保衛釣魚台！〉的王曉波站出來（為保衛釣魚台運動說幾句話）（註四二），王曉波首先列出在普林斯頓掀起保衛釣魚台的幾位留學生胡卜凱、郭譽先、茅生燾以及張系國等人，都是當年台灣最高學府《台大青年》的主編、作者，另外主編《科學月刊》的林孝信也是一個愛國的人，因此北美的保釣應是「支援政府保衛釣魚台的立場」，由「出身論」王曉波想證明北美保釣是否為中共統戰份子發起？王曉波斬釘截鐵的說「不是」，然而王曉波卻說「可能」有共黨滲入，這種出身論而絕對純潔性的證明法，以及共黨是「無孔不入」的恐怖敵人的反共教育，對於一般人，以及對於王曉波而言，仍有一定的深刻記憶。但是王曉波話鋒一轉，向國民黨政府質

疑：「如果外交部能夠具體說明『保衛釣魚台運動』，對外交部保衛釣魚台主權有所妨礙，我們願意放棄『保衛釣魚台運動』」，「如果能夠信任我們，請以後別說我們可能受到共匪統戰利用」（註四三），顯示國民黨對於島內的保釣也正盡量的壓抑，至少北美保釣與台灣保釣內部的共通質素是對國民黨處理方式有強大的反感。

然而北美保釣在一月二十九日之後開始迅速組織起來，各地保釣會成立，並且發起一人一書、一人一信運動，企圖能夠影響台灣的社會氣氛，據陳映真描述（《訪問錄》，頁四四七—四四八），這是一種雪片紛飛戰術，從各個管道海上、天空綿綿不斷的將海外保釣訊息、刊物、理論書籍、行動想法降入台灣，在《台灣與世界》的座談會上，一位G女士就坦承她在台灣時看過柏克萊《戰報》，而她後來一九七七年出國「就是想看看海外的保釣運動」（註四四），因此可以推測北美保釣迅速組織起來的集體討論、思考以及大規模的行動，必定間接的透過秘密管道滲入台灣，而北美保釣逐漸左傾的訊息，除了是一種震撼力之外，同時是一種吸引力。

一九七二年一月王曉波在《大學雜誌》發表〈評留學生的三種政治方向〉，他將留學生歸納為三種：投機的左派、台獨份子、歸國學人；對於傾向中共的留學生予以嚴厲的批評，但在他與留學生通信的過程中，他的確逐漸受到了影響，與保釣學生有著相似的看法，認為當前的方向應為內部的改革，「朝向liberal socialism的

方向去做思考，……也就是用共產主義的暴力革命以外的方法來達成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註四五）而對於統一的方式的態度，由於北美保釣走向與中國統一的運動，王曉波無法自外於統一的思考架構時，提出胡秋原的「中國必須和平統一，但必須統一於中國人，不能統一於民賊。」提法，但他仍無法有具體的方法及內涵，並承認這只是一個口號而沒有具體的方法，因此在此問題上他亦無能為力，目前只能「致力於內政的改革及對大陸情況的瞭解。」（註四六）此種進一步的瞭解中國大陸不也是北美保釣進入統一運動以前的左傾過程嗎！重新認識中國、自我學習、認識帝國主義等，只是各自在程度上及層次上的多寡不同罷了。一九七二年四月王曉波將他所收到的北美保釣的信摘錄公佈於《大學雜誌》，其中一位W君的信提到保釣運動可能的趨向：「有些左傾的學生，也來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開始提出『中共社會主義建設固然有成就，但為什麼我們在台灣的人，不自己來搞社會主義，一定要靠攏中共？』最後這一種論調的人越來越多，反而壓過左派的氣焰。」（註四七）W君所提的是社會主義運動裡面的「就地革命論」，在自己所站的土地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進行教育、組織、意識型態散播，因為普羅階級無祖國，一個左翼的運動者、組織者，盡可在資本主義化的社會進行階級鬥爭或政治奪權，不論身在何時何處。

對於當時接觸到北美保釣運動留學生左傾訊息的人，他們的思考轉變如何我們並不清楚，然而從王曉波不斷的想法澄清、企圖掌握非親中共的留學生的思想動向，他想要釐清的是受過完整「反共教育」學生左傾的根本基因是什麼？而勢必在同時，王曉波正與過去「反共教育」的思考模式做劇烈的掙扎，因此躍入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的青年學生與北美保釣留學生間的通信，在思考、訊息溝通的過程中，就可以約略尋找出，有一批人正思考著，非中共的社會主義在台灣實踐的可能性，而這種社會主義思考建構的過程，它同時來自於「西方」的訊息，也來自於「本土」的經驗。

蔣經國於一九六九年接任行政院副院長後，開始積極培植自己的權力接班人馬，一九七二年的黨政人事「台灣化」的結果也就是蔣經國不斷進行政權轉換的結果。蔣經國擔任救國團主任時就常常接見青年學者以及學生領袖，在進行政權轉移之際，蔣經國欲進一步藉著青年的建言，提昇青年的政治位置，以建立新政權在青年中的正當性，因此《大學雜誌》作為知識份子的大集結，一方面在主觀願望上，知識青年面對國運不濟的關頭，有著參與與改變政權的欲望；另一方面客觀的條件是新政權亟欲尋求青年學者、中產階級的支持，確立政權轉移的正當性。因此在新、舊體制轉換的過程中，舊有的組織已逐漸僵化而未能精確的掌握社會浮動的變革，也不希望有政治權力慾的青年發揮，新政權體制卻正積極尋求認同支持的時刻，新舊體制間的政治鬥爭造成了政治言論上的空隙。因此《大學雜誌》在一九七二年一月的大改組，納入一百零二位國內外的青年學者，成為新政權體制藉由《大學雜誌》向舊政權體制鬥爭權力轉換的言論機制。

南方朔將《大學雜誌》的知識份子聯合分裂過程分爲四個階段：初創期，是無害性的，只是「由空泛的談知識份子的責任，當教育文化、經濟、政治，最後直接接觸到實際的權力」；大聯合大分裂時期；「洋」「土」分裂時期；「土」「土」分裂時期（註四八）。《大學雜誌》象徵著張俊宏所說的「權者與智者的結合」。《大學雜誌》在一九七一年至七二年的聯合，主要以民族主義爲號召而聯合起來，共同的目標在以民族主義爲張本向政權挑戰發言，因此它可以容納入不同意識型態、政治立場的青年學者。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刊出〈國是諍言〉，一九七二年一月又刊出〈國是九論〉，這兩篇意義在於呼籲蔣經國「革新保台」的政治訴求，隱含積極與蔣經國的政治措施連結，同時我們也要注意，蔣介石於一九七二年三月再度當選第六任總統時，蔣經國權力接班於一九七一年底的部署已接近完成。

南方朔所謂的「洋」「土」的分法，「洋」系乃是出國留學的回來後的「青年才俊」，而「土」系則是本地出產的知識份子，這兩者基本上存在著相當的不協調：一、自我價值設定；二、關切的事務不同；三、世俗觀點；四、出身不同（註四九），所以在許多的大學校園有關自由、民主的座談會上，洋系與土系人馬皆有參加，立論雖有不同，然而並未造成衝突的場面。因此在〈國是諍言〉與〈國是九論〉裡，充分顯露出聯合的特質：「革新保台論」、「新興中產階級權力論」、「現代企業化管理」等南方朔認爲這是「權力菁英」的觀點，與「土」以天下爲己任」的觀點相湊合，拿來作爲要求權力的口實（註五〇）。這種聯合的特質不僅在

《大學雜誌》裡的共同文章，面對舊有體制的官方壓力，也是一同出擊，「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反駁即爲如此。在蔣經國內閣逐漸穩定的同時，意味著「洋」「土」的分裂開始，蔣經國不斷的提拔「洋」系一派的學者，如孫震、李鍾桂、關中等，而對於土系的則進行壓制的動作，引發土系內部對政權有權力慾的怨懣。如未提名張俊宏競選台北市議員，打壓陳鼓應流放到政大國關中心，隔絕他與學生的接觸，以及台大哲學系事件的政治解聘案。然而對於「土」「土」分裂的原因，南方朔並沒有較爲清楚的描述。在洋系撤離《大學雜誌》後，《大學雜誌》逐漸的接近資本主義論，以及某些人欲以此雜誌作爲選舉工具，其政治奪權性格以及中產階級實利主義均增強，而引發另一方「非實利主義者」的排斥，而其實排斥者是從保釣運動到台大哲學系事件，正在不斷形成的左翼的意識型態。

從保釣之後，以台大爲中心的幾場辯論，凸顯知識份子對政治高壓及保守道德提出挑戰。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的〈言論自由在台大〉座談會，一一·一五的〈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當時的《大學雜誌》也跟著呼應，陳鼓應於一九七二年一月發表〈開放學生運動〉。與此同時由於聯合國納入中共，台灣退出聯合國的席位，森林研究所畢業生王杏慶宣布放棄美國密西根大學獎學金，王杏慶此舉打破台灣學生的學術格局：來台大、去美國、獲學位、拿綠卡、流落異邦。當時他說：「知識份子更應該在變動的時代裡走在衆人的前端。」（註五一）留在台灣的王杏慶開始走入學生運動。十一月王杏慶與王曉波、王拓、錢永祥等十五人於《大學雜

誌》發表（這是覺醒的時候了！），文中與以往所有論政、宣言、告全國同胞書、告政府……，等呈現不同的價值意涵，將國家的命運切入到台灣社會被資本剝削的底層：「……而這些台灣的資本家，是我們全體國民忍受了農村的凋敝，勞工的低工資，軍公教人員的清苦生活，所培養出來的，其有義務與台灣的命運認同，我們也有權制止其將全國老百姓血汗所累積的一點資金攜走。」（註五二）這一篇「覺醒」有著強勁的社會意識，並且將半年來高喊「中國人站起來」的民族主義，轉化並直接融入「本土」與「人民」的社會內涵。

學生運動展開後轉化為學生社會服務團，雖然學生社會服務團被救國團迅速介入接手，而動員中央到地方的行政軍警單位，共同協助及監督此種社會服務（註五三），這種學生調查對於社會裡的「人民」，不會有任何效果。然而卻是給予大學生藉著調查的議題，深入到社會底層觀察，「民族」、「愛國」的熱情藉著調查活動更具體的轉向了「鄉土」與「人民」的實踐實體。

由陳鼓應喊出來的「開放學生運動」，已經由「意見參與」，進一步到龐大的「行動參與」，給予國民黨相當大的壓力，尤其在三月蔣介石進行總統選舉、蔣經國全力部署接班之際，救國團介入「社會服務團」自然是讓學生的服務運動不會有任何「叛逆」現象，從而大量的官方行政系統的支援，預防了學生運動擴散成「反政府」、「反迫害」的運動變質。因此一波更大「反學生運動」浪潮由官方發動而來。

一九七二年四月四日至九日《中央日報》副刊連續六天刊載署名孤影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全文長達四萬餘字，主要針對陳鼓應的開放學生運動而來，認為大學生沒有獨立思想、獨立判斷的能力，因此搞出來的運動只會像美國、法國學運一樣製造社會動亂的根源。中央副刊此文一出，立即以人海戰術上百篇短文盛讚此文一語中的，而後中副將其整理出版小冊子，並宣傳此書為上萬人爭購，然而卻是各公務機關、行政系統、軍中、學校、大公司被規定必須購買，以及逐一散發，目的造成齊一的言論攻勢。使其發行量達到六十萬冊，當年初、高中學生不斷寫報告、閱讀，甚至認為可能成為聯考題目。〈小市民的心聲〉引發一場朝野對偏安的右傾機會道德主義提出批判及辯論。此也標示國民黨擔憂由保釣引發的一連串的辯論及運動，動搖其社會的安定基礎，展現試探的壓抑態度。

北美保釣於一九七二年熾熱的回歸、統一運動，一批接一批的留學生飛往「祖國」的懷抱，體驗理念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勞動實踐」的真實性，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創造「新社會」、「新思潮」在一九七二年其實已經到了尾聲，然而對於北美留學生而言社會主義祖國象徵著在舊制度上建立起來的新社會，「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的光芒，閃耀著他內心對故土的吶喊，這裡面沒有省籍的分別，只因為歷史的記憶，中國一直是文化的母體。因「民族主義」發軔的保釣運動，由於中共外交上節節的勝利與國民黨醜化與打壓，有了紛呈的解釋與理解。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四日〈民族主義座談會〉在台大大論社舉辦，陳鼓應、王曉波、許信良皆在場發言，且引發與校方火爆場面，在民族主義座談會後台大校內掀起壁壘分明的論戰，參與論戰有《大學新聞》、《畢聯會訊》、《台大法言》及《台大醫訊》，洪三雄回憶「這是保釣運動以來，最具有思想性的大規模文字論爭。」（註五四）這一波論戰讓國民黨決定壓抑政治社會運動的公共辯論。一九七三年六月開始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受官方控制的系主任一口氣解聘了十三名教授及講師（註五五），台大哲學系事件不僅震撼學術界，影響學術轉向保守與趨向官方立場好惡的研究方向，此次政治鎮壓，更是結束了一九七一年以來保釣運動掀起的高潮，向當時最爲活躍的台大哲學系鎮壓，一方面顯示蔣經國「台灣化」政權轉移的穩定，並且展現其權威的力量；一方面顯示政權轉換的空隙已被彌平、填補，政治社會運動的去向均被穩定的堵死。

然而從保釣運動以來，藉著外交沈淪、學生運動，開展出幾個左翼意識型態的跡象：學生運動轉向了社會服務運動，由民族主義挑起的反帝國主義意識，對政權強制性的反迫害意識，以及進入到社會底層觀察的提倡。「鄉土」與「人民」的意義概念藉由「民族」與「社會」口號的拉高，影響了其他部門的民族性與社會性的挖掘工作，一九七二年的新詩論戰正透顯了左翼意識型態在政治社會運動上的受阻，轉向了文化霸權內部文學思考路線的爭奪。

熙熙攘攘：現代詩論戰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二十九日香港的關傑明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中國現代詩的困境〉，指出現代詩西化過深，失去傳統，然而並未引起注意，九月十、十一日關傑明再度於《中時》發表〈中國現代詩的幻境〉，此時開始響應關傑明批判立場的有《笠》詩刊鄭桐明〈批評的再出發〉、李國偉〈詩的意味〉（《中時》人間副刊，一九七二，十一，十八）、高準在《大學雜誌》發表的〈論中國新詩的風格發展與前途方向〉（一九七二，十，十二）以及史君羨（唐文標）的〈先檢討我們自己吧！〉等等的文章，其中唐文標參與了一九七一年的北美保釣運動，具濃厚戰鬥意味，使其文學批判性格強烈，成爲論戰的焦點。

現代詩從一九五六年夏濟安主編《文學雜誌》開始，提倡歐美的古典文學，以及同年紀弦宣告現代詩社「現代派」的成立，一時加入的有八十餘人，並公布了六大信條，重要的三點：「新詩乃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知性的強調」，「追求詩的純粹性」；目的上是對於五〇年代的反共文學、及懷鄉文學泛政治性入股文的反叛。然而現代詩引進的同時也正是台灣逐漸進入美國資本主義依賴體系下的一環，美國不僅傾銷跨國公司的資本，並且隨之而來的是教育體制以及文化意識的入侵，以經濟成長論爲中心發展起來的「現代化論」，以資本主義政治、文化爲主的思考形態，逐漸要求取代傳統生產模式以及教育文化的思考模式，一九六二年

的中西文化論戰象徵著文化思考的主流導向，現代化派逐漸在學院裡及新興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間佔了上風。

因此現代詩派強調純粹性的目的在於「去政治化」，「橫的移植，非縱的繼承」等，極力的導向西方現代主義的潮流，如波特來爾（Baudelaire）、艾略特（Eliot）等人的文學風格，以西方文學作為學習的目的，與傳統的文學體制絕然割裂，朝向「新的方向」去學習，從形式、文字、技巧、結構、內容、思想等，向八股反叛而朝向現代。並且將傳統的生活、意識型態劃分等級，現代詩、現代文學必須是「現代人」才能懂得的，處於「傳統的」下層階級不能瞭解現代文學，是因其不夠「現代」，所以強調去大眾性格，追求現代菁英精神心靈崇高的內涵。現代詩朝向了個人內心的感受，多數現代派詩人以自我為中心的「現代」思考模式下，詩作的主題緊緊圍繞在「人面對死亡、自我、性與戰爭四大生存的主題。」（註五六）

現代詩作品只對「現代」敏銳的人有親切感，而認為現代詩晦澀的讀者則屬於鈍感與保守，並且審美態度是老舊的。正因為連詩人都如此自外於讀者，現代詩逐漸流於詩人們的文字遊戲，但現代派詩人掌握了學院與文學的主流刊物，主導整個六〇年代的文學風尚。一九七二年一月《現代中國文學大系》出版（詩部由余光中及洛夫主編）、三月葉珊主編的《現代文學》推出「現代詩回顧專號」，兩件事不約而同的出現，顯示現代派文人的現代詩掌握了文壇的主流，並且有總結、詮釋文學流向的趨勢。

對現代詩掌握文壇的主流趨勢，關傑明吹響批評的號角，「由社會批評的觀點來看，這本書是『文學殖民地的產品』；由美學的觀點看來，那只是一批人事先商量好一起玩的一套文學上的障眼法。而由這兩個觀點同時看來，那些評論只在中國讀者和這些詩人兼評論家們之間建立一種形同威脅的關係。」（註五七）他指責台灣現代派詩人只急著割斷自己的傳統，以「世界性」和「國際性」為言，但其實只是一味西化。（註五八）現代派詩人面對關傑明的批判，並未以其學術專業或文學理論反駁關傑明，但有共同的情緒上的反應，認為關傑明是幼稚、意氣用事、傲慢甚至惡毒的。（註五九）

唐文標其實才是整個現代詩論戰的中心，〈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在《龍族評論專號》出現，唐文標總結現代詩「晦澀的不是文字，而是思想」，唐文標凌厲的批判，歸結到人的意識型態的思考上。緊接著《文季》第一期在八月十五日推出，上頭刊載唐文標的〈詩的沒落〉一文（註六〇），更加理論化表達他的批判論點，而其前言部份〈僵斃的現代詩〉也刊於八月號的《中外文學》（二卷三期），一時之間唐文標成為批判現代詩的代表人物。唐文標公開的挑明了現代詩人們的意識型態，「其實他們不過是新一代的『文化買辦』而已，憑藉外文能力的高強，理論的洋化，於是便可以向中國大販賣工業時代的文學鴉片了，……他們不會想到這一切為的又是什麼？作者為什麼要寫，他是不是在控訴什麼？指出什麼？作者處的

是什麼時代，他個人的社會背景又如何？他們不會問的，因為問一個問題一定要牽涉其他，要追問下去，便要涉及他們自己的、社會的，與其他相關連的整個地區問題、國際現勢等等；」（註六一），整個現代詩風的表達都是在「逃避現實」，從個人的逃避，到娛樂式、思想、文字、抒情以迄集體的逃避，現代詩展現的是逃離於社會的責任，轉換個人內心的感官娛樂，他要求年輕的一代要重新建立有歷史感、祖國愛、社會關懷的文學。

唐文標掀起論戰不僅在於批判現代詩的逃避與僵斃，讓新一代的文學群眾能起改造文學的認知，而且企圖將文學的社會性與民族性與當時的社會政治運動氣氛，有所聯繫，同時塑造成為文化霸權的戰鬥力量。對於文學朝向社會的要求，在現代詩論戰開啓後，逐漸形成批判方向的對壘，釐清「為藝術而文學」或為「社會而文學」的工作，成為迫切的問題，同時唐文標提出「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人」的問題，如同高信疆所說：「我們如連為什麼寫詩，怎麼寫詩，為什麼人寫詩，都茫然無識的話，那豈不是一則巨大的笑話？事實依舊是事實：問題發生了，而且正在持續著。」（註六二）《龍族評論專號》誠然做了全面性的討論，然而並沒有走出一條解決問題的道路，批判現代詩的空間被開啓了，但是當時的《龍族》詩刊或著標榜「發揚鄉土精神、追求現代精神、民族意識的覺醒」的《笠》詩刊，都沒有相應的創作出現，也沒有鮮明的主張，替代被批判的現代主義。

打著現實主義旗幟的《文季》於一九七三年八月出刊，恰好適時的填補了這個

空間。《文季》的前身其實從一九五九年尉天聰接辦《筆匯》後，歷經一九六六年《文學季刊》、一九七一年《文學》雙月刊蛻變而成。《筆匯》於一九五七年創刊，當時發行人為任卓宣，五十九年尉天聰與許國衡接手，內容不僅僅文學創作與評論，更包括音樂、電影、會話方面的評述，曾至做過紀德紀念特輯、奧尼爾特輯、波特來爾特輯、詩特輯、繪畫、電影、批評特輯等，可以看出編輯群企圖藉著媒體去引介西洋藝術思考，以及願意面對文化衝擊的思考態度。（註六三）其中陳映真即在《筆匯》上投稿其第一篇小說《麵攤》，以及《我的弟弟康雄》。然而《筆匯》身處於資本主義文化傾銷的時代裡，不可避免的仍有相當西方虛無主義蒼白的色彩。《筆匯》在尉天聰手中僅僅兩年即停刊，一九六六年《文學季刊》歷經五年到一九七〇年停刊，它仍持有著強烈的學院氣氛，《文學季刊》由尉素秋任發行人，何欣任社長，尉天聰任主編，而其編輯風格有許多「從西洋搬過來的中產階級的文學理論，或多或少的頹廢傷感的現實主義情調、超現實的抽象作風、藝術至上的抽象趨勢……等等」（註六四），然而這份刊物與同樣是學院派主持的《現代文學》，開始出現競爭的態勢，而有著不同的材料尋求傾向，逐漸把握住「不滿」這樣的感情基礎，傾向建基於「現實」與「土地」的結構環境中，陳映真的《唐倩的喜劇》、《第一件差事》，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五月十三節》，黃春明的《看海的日子》、《兒子的大玩偶》等小說均發表於《文學季刊》中，幾篇小說的傾向開始觸及到對知識階層沈溺於卡夫卡（Kafka）、喬埃斯（Joyce）的存在主

義的反諷，以及下層階級人物的面對經濟困苦生活的描述，現實主義且具鄉土性小說逐漸在《文學季刊》顯露頭角，是《文學季刊》逐漸推向現實主義的歷史起點。但是它仍然僅僅是一份「純文學」的刊物，仍有著強大的實驗性，以及相當程度的過渡和折衷色彩，例如還刊載七等生及李昂的早期的小說，紀弦、洛夫、管管等人的現代詩。

《文學季刊》裡最具現實主義色彩的要算是陳映真，其小說《唐倩的喜劇》，以刻薄的語調，諷刺當時學院知識份子沈溺在邏輯實證論與存在主義的頹廢情感中，面對政治白色恐怖的壓迫且無力反抗，而祭起西方的最不具攻擊力的卡繆及卡夫卡派的存在思想，自我放逐於官能畸形的世界。另外陳映真發表兩篇文章《現代主義底再開發》和《期待一個豐收的季節》（註六五），陳映真指出現代主義是一種西方文學的亞流的形式主義，並且思考上和知性上具有明顯的貧弱症，總之是使整個實際的生活、實際問題脫了線的把戲（註六六）。陳映真的最後還指出一條反叛的路線：回歸到現實上、建立知性與思考。陳映真積極的表現，一方面後來得知與其開始閱讀左翼理論有關，透過其日本朋友偷渡相關大陸文化大革命與日本左翼評論的報導，掌握到現實主義批判的基調，不再滿足於只是作個小說家，開始組織讀書會，試圖擴大對社會主義再認識的過程，但一九六八年五月被參與讀書會的一位文教記者出賣，演變成羅織「民主台灣聯盟事件」，繫獄七年，同案被牽連者三十六人被捕判刑。

《文學季刊》於一九七〇年二月因經費問題而告停刊。之後由尉素秋任發行人，何欣任社長，尉天驄任主編的《文學》雙月刊於一九七一年一月出刊，尉天驄在第一期選編《現代作家的任務》（何欣）、《在困境中迎接創造》（卡繆）（Camus）、《何為文學、為何寫作》（沙特）（Sartre）三篇文章的《編輯手記》裡說：「一個藝術家應該把自己置身於現實生活之中。這種置身是連自己也包括在其中的，這樣他才能領略這時代的痛苦和歡樂。」（註六七）《文學》雙月刊較前期的《文學季刊》敢於表白他們的立場。（註六八）有了《文學》雙月刊促銷對現實社會反省的同時，關傑明發表對新詩的批判文章於一九七二年二月及九月見諸《中國時報》，批判現代主義的空間被廣泛的打開了。

因應著這股氣勢，《文學》於一九七三年八月登場：首先有了發刊詞，向台灣宣告了第一個現實主義文學團體的存在（註六九），其次《文學》以相當猛烈而集中的砲火攻擊現代主義文學。例如唐文標的《詩的沒落》，以及尉天驄批判歐陽子的現代主義與王文興的個人主義。第三特色是，出現了意識型態掛帥的作品，黃春明的《莎喲娜啦，再見》及王禎和的《小林來台北》，兩篇一致聲討台灣的買辦經濟形態，標誌黃春明與王禎和向批判精神的轉變，也宣告台灣從純文學進入使命文學的時期。

《文學》僅僅發行三期，然而三期裡鎖定現代主義無根、自我、晦澀、陰霾的風格為批判對象。唐文標對現代詩、對台灣現代主義小說的批判，構成了「文學該

否有社會性？文學是否該有目的？」的討論，尉天驄質疑王文興《家變》小說凸顯的個人主義的人際關係，顯現「資本主義的商業倫理在這裡充分表現出來了。」〔註七〇〕以及黃春明的《莎喲娜啦·再見》、王禎和的《望你早歸》、王拓的《廟》、《炸》這些具濃厚本土社會意味的小說均刊載在《文季》中。也開始對台灣日據時代文學的整理，包括對鍾理和小說的考察，重刊楊遠的《模範村》，以及林載爵的《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回顧》，顯示《文季》的作家群以文學作為對台灣現實面的探索工具，一方面對台灣文學史的整理，一方面批判並擺脫六〇年代現代主義的潮流，建立起「鄉土回歸」的社會性文學。

重新檢視《文季》的結構背景，它出刊於保釣運動之後，而它的作者群中有最早左傾的陳映真，雖然陳映真並沒有與《文季》的編作者有過思想上的溝通，然而從作品中透露出來的對現實的關注以及不滿，在陳映真坐牢後，卻發酵出更大的影響力。另外在《文學季刊》時期，劉大任即參與編輯、寫作，但劉大任卻是一九七一年北美保釣的學生運動幹部之一，其左傾的意識型態甚為明顯。不難看出《文季》雖然是一個文學刊物，但是其成員與社會脈動的勾連極其密切，甚至不斷的跳入社會政治運動的參與中，因此呂正惠認為其為台灣第一個現實主義文學團體，並非是孤立的個人思考的傾向，《文季》三期發展出來的議題，正恰好與台灣社會變動的基礎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從保釣開始喊出來的「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以及反資本主義化的個人主義，此種鬥爭性格特強的哲學思考脈絡，其實正是整個

《文季》編輯作者群的能動力。

銜接在一九七一年以來的社會政治運動開拓出來的「民族」、「社會」的思索，《文季》承繼了兩者的內涵，以文學的方式表達了出來：台灣文學史、鄉土小說、批判的現實主義、以及深一層的對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整編的反叛，三期的《文季》，可以說達到了他們的歷史任務（呂正惠語）。

〔註一〕〈保衛釣魚台運動大事年表〉，丘為君編著《台灣學生運動一九四九—一九七九》，頁六二一。

〔註二〕同〔註一〕，頁六二四。

〔註三〕茅漢（王曉波）、王順〈保衛釣魚台！〉，原刊《中華雜誌》八十八期，引自丘為君編著《台灣學生運動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台北，龍田，一九七九，十二，頁四〇五。

〔註四〕五四運動宣言為：「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而這兩句話，後來由台大大學論壇社書寫成巨幅標語，懸掛在農經館的門口，刺激台大學生的歷史記憶，藉以喚起想要學習北大精神的台大人。

〔註五〕劉源俊〈我所知道的留美學生保釣運動〉，同〔註三〕所引書，頁五四〇。

〔註六〕王曉波〈漫談留學生的政治氣候〉，《時代呼聲》，台中，藍燈，一九七九，十

二，頁九二。

〔註七〕同〔註六〕，頁五四二。

〔註八〕同〔註五〕，頁五四二。

〔註九〕水秉和〈保釣的歷史回顧〉，《當代》第二期，一九八六，六，頁六五。

〔註一〇〕楊肅獻〈學生民族主義的昂揚——保衛釣魚台運動〉，同〔註三〕所引書，頁八二。

〔註一一〕王永中〈留美學界的保釣運動〉，同〔註三〕所引書，頁五〇四。

〔註一二〕同〔註一〕，頁五〇三。我沒有柏克萊《戰報》原始史料，然而從王永中的文章中，抽出其引用的戰報文字內容，重新比對整個運動的過程以及節奏，較為傾向政府的王永中以及劉源俊皆認為《戰報》是「左傾盲動者」、「毛共」的激進象徵，而從反面推演出，《戰報》文字內容象徵著左翼留學生正進行著釣運主導權的爭奪戰。

〔註一三〕座談會〈保釣人士聚首話當年〉，《台灣與世界》，一九八五，十一。轉引自《夏潮論壇》第七期，台北，柯水源發行，一九八六，七，頁五七。

〔註一四〕同〔註五〕，頁五四五。

〔註一五〕同〔註五〕，頁五四四。

〔註一六〕同〔註一三〕，頁六四。此為夏沛然所言

〔註一七〕同〔註一三〕，頁五九。此句為座談會中D女士所言，而顯然她是不自覺的群眾

的一員。

〔註一八〕同〔註五〕，頁五四七。

〔註一九〕同〔註一三〕，頁六一。

〔註二〇〕全美各地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一封給中華民國政府的公開信〉，同〔註一三〕所引刊，頁七五。

〔註二一〕〈留美學界為釣魚台事呈政府文〉，同〔註三〕所引書，頁四〇八—四〇九。

〔註二二〕同〔註五〕，頁五五三。

〔註二三〕同〔註一三〕，頁六三。

〔註二四〕水秉和〈保釣的歷史回顧〉，《當代》第二期，一九八六，六，頁六七。

〔註二五〕同〔註五〕，頁五五八。

〔註二六〕平路 v. s. 劉大任〈釣運反思錄〉，楊澤主編《七〇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一九九四，頁一四六。

〔註二七〕劉大任〈不安的山——記七〇年代的一次旅行〉，同上註所引書，頁七六。我無意對轉向統運的北美學生做進一步的探討，一方面資料缺乏，一方面轉向統運的保釣，進入深沈的個人思想、信仰的轉換，這裡包含著對文革的幻滅、統獨的糾葛、左翼的路線，必須有進一步的回憶錄及口述資料，或著對運動過程中繃發出來的理論討論，才有可能深一層次的瞭解轉向了統運的保釣本質，有否影響到後期台灣的民主運動及左翼運動的發展，這是另外一個很好的議題了。

- 〔註二八〕同〔註二五〕，頁一四三。
- 〔註二九〕同〔註一三〕，頁六七。
- 〔註三〇〕同〔註二四〕，頁七一。
- 〔註三一〕同〔註一三〕，頁六七。
- 〔註三二〕洪三雄《烽火杜鵑城——七〇年代台大學生運動》，台北，《自立晚報》，一九九三，頁一五。
- 〔註三三〕李緣《台大學生運動三十年回顧》，《夏潮論壇》第十期，一九八三，十一，頁四三。
- 〔註三四〕同〔註五〕，頁五四七。
- 〔註三五〕同〔註三二〕，頁一九。
- 〔註三六〕同〔註三二〕，頁二一。
- 〔註三七〕同〔註三三〕，頁四四。
- 〔註三八〕大學雜誌編委會《駁斥所謂台灣法律地位未定的謬論》，《大學雜誌》四十一期，轉引自陳鼓應《言論廣場》，台北，遠景，一九七八，頁一二九。
- 〔註三九〕同〔註三二〕，頁二九。
- 〔註四〇〕同〔註三三〕，頁四五。
- 〔註四一〕同〔註三三〕，頁四二。
- 〔註四二〕王曉波《為保衛釣魚台運動說幾句話》，刊於《大學雜誌》一九七一，七，轉引

自《時代呼聲》，頁三七。

〔註四三〕同〔註四二〕，頁三九。

〔註四四〕同〔註五〕，頁六五。G女士說：「我有點感慨，我在台灣看過《七十年代》，也看過《戰報》。後來出國有個很大的願望，就是來看看海外的學生運動。」

〔註四五〕王曉波《評留學生的三種政治方向》，同〔註四二〕所引書，頁八四。

〔註四六〕同〔註四五〕，頁八六。

〔註四七〕王曉波《漫談留美學生的政治氣焰》，同前引書，頁九〇。

〔註四八〕南方朔《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夏潮》四卷三期。

〔註四九〕同〔註四八〕。

〔註五〇〕南方朔《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三)》，《夏潮》四卷四期。

〔註五一〕同〔註三二〕，頁一七一。王杏慶在當時拒絕美國密西根大學的獎學金，及其所寫的回函，均被報紙披露刊登，甚至受到蔣經國的接見、肯定，王杏慶成爲當時的理想青年典範。

〔註五二〕《這是覺醒的時候了！》，引自丘爲君編《台灣學生運動一九四九—一九七九》，頁五七五。

〔註五三〕參考郭紀舟《一九七〇年代台灣左翼啓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碩士論文，

台中，一九九五，六，頁三五。

〔註五四〕同〔註三二〕，頁三八一。

〔註五五〕趙天儀《台大哲學系事件真相》，台北，花孩兒，一九七九，九，三版。

〔註五六〕羅門《新詩所面臨的挑戰》，丘為君、陳連順編《中國現代文學的回顧》，台北，龍田，一九七八，十二，頁一九三。

〔註五七〕關傑明《中國現代詩的困境》，趙知悌編著《現代文學的考察》，台北，遠景，一九七六，七，頁一四四。

〔註五八〕陳映真《試論施善繼的詩》，《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台北，遠景，一九八四，頁二六六。

〔註五九〕同〔註五八〕，頁二七〇。

〔註六〇〕唐文標《詩的沒落》一文，文末唐文標附記此篇於一九七二年三月葉珊編《現代文學》「現代詩專號」時向他邀稿，然而稿去卻沒刊登，後於《文季》第一期（一九七三，八）刊出，「讓多一些朋友看看它究竟說什麼，免得以訛傳訛，該是比較好的。」，趙知悌編著《現代文學的考察》，台北，遠景，一九七六，七，頁三九。

〔註六一〕同〔註六〇〕，頁一七。

〔註六二〕同〔註五八〕，頁一六四。

〔註六三〕吳浩《文季研究資料初編》，《台灣文學觀察雜誌》第一期，台北，李瑞騰發

行，一九九〇，六，頁一一六。

〔註六四〕王拓《一步一步踏進現實的世界——訪問尉天聰》，《出版家》第五十七期，一九七七，五。收於尉天聰《民族與鄉土》，台北，遠景，一九八一，六，頁二四〇。

〔註六五〕《現代主義底再開發》，刊《劇場》第四期，一九六七，三。（期待一個豐收的季節），刊《草原雜誌》創刊號，一九六七，十一。

〔註六六〕陳映真《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收於趙知悌編《現代文學的考察》，頁三〇。

〔註六七〕《編輯手記》，原刊《文學》雙月刊第一期，一九七一，一，十五。參考吳浩《文季研究資料初編》，頁一二四。

〔註六八〕呂正惠《七、八十年代台灣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新地文學》一卷二期，一九九〇，六，頁三八。

〔註六九〕參考呂正惠《七、八十年代台灣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一文。

〔註七〇〕尉天聰《站在什麼立場說什麼話》，《文季》第二期，一九七三，十一，十五，頁二六。

第三節·夏潮集團集結的過程

由毛澤東刻意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一九六六年的中國大陸如火如荼的展開，這場溯延十年的運動，影響到六〇年代國際上反資本主義的狂飆運動，美國的反越戰運動，日本的「大學鬥爭」，法國一九六八年五月學生運動。而一九七〇年代留美的台灣學生，自然也逃避不了這整個狂飆的思潮，即使在戒嚴體制下的台灣知識份子，嗅覺敏銳的也感染到這股國際氣氛。本文要探討的是從國際潮流傳遞進來的左翼氣氛，在台灣本土是如何集結的。

一九七〇年代尼克森政府刻意與中共修好外交關係，進行乒乓外交，逐漸打開中國社會主義的內部訊息，隨著電視視訊的傳遞，留美的台灣學生，在重新認識中國的過程中，對台灣政權親美的反思，對社會主義的重新認識，「認同」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議題，在留美學界被提出來討論，一九七〇年的鈞運基進的學生，選擇了較具理想性格的社會主義一方的中國，乃是無法避免的事實，使得在美國的鈞運，由「認同運動」而轉向了「統一運動」。當時也在美國的林俊義，就這樣的描述：「任何在西方或美國唸書的知識份子，只要關心政治，沒有辦法避免掉接觸到左翼的思想，我不曉得要如何逃避，不可能的，只要你原本就關心台灣的社會，也嚮往從美國的政治社會學到一點東西，在美國的學術環境是沒辦法逃避左

派思想的影響，連美國的知識份子都很難逃脫。可是接觸左派與是一個左派的信仰者是兩回事，以我為例，我也看了很多左派的書，然而我到現在為止，我碰觸到的學科，科學、核能、文學、社會等，多少都是反體制、反主流的不同思考的書籍，然而我的思考跟左派的思想未必有很大的關係。」（《訪問錄》林俊義）（編者按：本書附有作者「《夏潮》重要人物訪問錄」三篇，另有林俊義、王津平、王拓、尉天聰、蔣勳、蔡建仁、林載爵、王杏慶等人未收錄，書中所引林俊義等談話，均出自作者原碩士論文之《訪問錄》。）曾是《文季》編輯的劉大任便是從文學的領域直接躍入政治社會運動之中。

但是也同為保釣的運動過程，以台灣土地作為認同的共同陣營，進入台灣本土進行政治社會改造，以社會主義的知識理念作為改造工具，在當時也被廣泛討論著，而轉成只談在地的階級運動或者更激烈的是獨派的社會主義運動，林俊義就接觸過，在經過保釣後也會有人認為「去他的中國」，直接轉向本土化的運動。因此認同於何處，就會決定存在於哪一種的思考框架，當時在美國的王津平就回憶從一個在反共體制教育下的台灣學生，進入了一個言論自由開放的教育環境後，卻陡然遇到國家認同上的困惑：「我整個是在建中被美國意識型態培養長大的年輕人，豁然發現作為台灣土生土長的中國人 identity 認同的問題，我腦筋裡都是美國的價值觀，而另外一個理智的聲音告訴我，我是一個中國人，我立足台灣，我要在那裡、往哪裡走？那時候的困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一個困惑。」（《訪問錄》王津平）

對一個知識份子而言，在困惑的認同尋求出路時，必須決定知識上及信仰上的去路：「我不能誑騙我自己，台灣雖小，台灣的偏遠地區窮鄉僻壤，我們都還沒有走過，我們算老幾？如果我們要對中國有貢獻，首先要為台灣有貢獻，要對中國有瞭解，宏觀的瞭解外，微觀的瞭解首先要從台灣開始，這是做一個人根本的東西。」（《訪問錄》王津平）由此可以有較深刻的瞭解，北美保釣給予知識份子參與的運動的過程中，最大的影響是在知識、思考上的轉換，當政治意識被挑起後，「不滿」以及「實踐」的欲望無法再往回退縮到過去的教化反共思考體制了，「我想保釣運動在台灣民主運動史裡的地位，就是讓知識份子有藉口，能對政治封鎖有某種程度的突破，也由此大家比較敢出來從事政治活動。」（《訪問錄》林俊義）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同樣的歷經保釣的唐文標，為什麼在回到台灣後，就積極與尉天驄等人針對現代主義的逃避思考的知識形態，進行強烈的批判，企圖在文學的理論、作品創作過程中，輸入具有批判性的現實主義概念，強勢而凌厲的文學批判態度，無法因為《文季》停刊而止息。美國台灣留學生並且藉著保釣運動，串連起海外的台灣留學生，蔣勳則是在這樣的串連裡面認識了唐文標（註一）。從海外經過社會主義浪潮回來的知識份子，對台灣社會實踐的渴望，一九七六年出刊的《夏潮》也就成了左傾知識份子最佳的實踐場域，唯一能吸引他們的旗幟。

隨著保釣運動在美國的開展，台灣學生強烈感覺到保衛釣魚台運動，應該是五四學生運動愛國精神、中國傳統的反抗精神的延續（註二）。保釣以及退出聯合國運動，從一九七一年四月延燒了半年多的保釣運動，要求具社會內容的民族主義的口號，銜接著愛國運動在此時響起。

台灣的保釣由香港僑生所點燃火花，無法確知僑生的知識傾向，然而僑生的資訊管道畢竟比起台灣學生暢通，因此即使是在戒嚴體制下，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仍然可能透過種種的傳遞機制，滲透入台灣的知識份子界裡，藉由能夠輕易取得國際資訊的大學僑生為主，僑生身份的特殊性，使其成為國民黨資訊戒嚴下的漏洞，僑生不僅私下傳遞海外資訊給台灣的知識份子，且帶入台灣大學的校園。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由台大王杏慶及王復蘇發起的「社會服務團」，此種知青下鄉的社會意識，無法瞭解是否有著文革資訊的傳遞或者社會主義思想的滲入，總之它扣連起保釣愛國政治運動的政治意識，陡然轉向了社會意識實踐的運動，代表其具有知識及行動上的「自覺」。王杏慶等人醒覺到台灣知識份子必須「向社會進軍」，此由台大代聯會組成的社會服務團（原名本為「社會服務軍」，後由於台大校方覺得「軍」字太刺眼，要求改名為「團」）。「社會服務團」的工作內容著重「社會調查」，分為五項目進行調查，包括勞工、農村、貧民、選舉、警民等五項。「社會調查」對於長期來被國民黨禁錮在校園的大學生而言，成爲一種外向式與內向式的雙重反省，對社會內容一無所知的反省和最單純的知識份子自我救贖，在「社會調查」行動中不斷的被提出來討論。由保釣的愛國運動，轉向爲對社會關

切的初步實踐，為何會有這樣的自覺？

以王曉波而言，他自小生長在一個被政治迫害的家庭，過著貧窮困苦的生活，對於貧窮的中國人具有相當大的同情，「到現在為止還可以記得《水滸傳》裡的一首詩：『夏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苗半枯焦，農夫心激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很強烈的一種階級對照。」（《訪問錄》，頁四二四）這種基本的人道主義在經過釣魚台事件發現了美國帝國主義的本質，然後由美國帝國主義的本質再進一步探討中國的命運，跟到被壓迫階級的命運，在這種情況底下，我們也偷偷的看了一些書，譬如Snow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下的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的自傳，尤其是自傳的第三章從皇帝到做人，我們看了很感動，我們也看到了中國的窮人，中國被壓迫的農民，怎樣翻身起來，然後來建設自己的國家，當時兩岸的資訊是完全隔絕的，我們認為如果中國是照Snow、照溥儀這樣描寫的話，我們覺得這樣的社會應該才是中國的前途，應該才是人類未來希望之所寄託。而且當時戒嚴時期非常嚴厲，我們看這樣子的書，甚至於只能躲在棉被裡看，看了以後還要濕掉半個枕頭，當時是這樣的一種情形，這樣子的一種思想感染下，所以保釣運動到後來的發展，我們就漸漸走向社會運動，然後有台大學生社會調查團，當時我們也到過最貧窮的農業區，到過山地去，到過花街柳巷，都市最黑暗的死角，去瞭解、去探望被損害、被污辱、被迫害的人。」（《訪問錄》，頁四二四—四二五）

王曉波有一種素樸的社會主義中國的憧憬，自身成長感覺到的社會階級經驗，同樣在蘇慶黎身上，也可以找得到。然而蘇慶黎的自覺過程卻是在被刻意的教導下，形塑而成，蘇慶黎談到雖然其父親是台共黨員蘇新，然而直到大學前她並不知道她的父親的背景，反倒是教育她的姨媽，不斷刻意灌輸她素樸生活的社會意識：「姨媽、姨媽對我父親都非常崇拜，好像就是說為我父親做一件事情，所以他們一直希望不只把我帶養長大，希望我的教育我的政治立場也是一樣的，因為每天是那樣在生活所以我也不覺的有甚麼特別，當我長大以後才知道他們是如此地刻意，比如說我姨媽要去拜訪窮人，她會帶我去，她不見得會帶我表妹去，因為一路上她就要開始教育我窮人是怎麼樣，她說：我們都說窮人是懶惰，但是他們看起來又笨又懶惰，但事實上窮人是不是懶惰？是不是笨？我們家有時候被窮人偷了衣服，我真的看見他們偷了衣服，但是我姨媽說我們不可以去抓他們，因為他們貧窮沒有衣服穿，但是誰使得他們貧窮？是這個社會使得他貧窮，她一再的重覆，就是說這種給小孩子社會主義的教育，在我小的時候可以說是非常的豐富，包括我們怎麼去對待那些傭人，我們是絕對不可能像其他有錢人家那樣對待傭人，其實小時候常常覺得傭人是頭大的問題，因為他們好像會告狀，根本不可能去欺負傭人或虐待傭人，所以我也許也不須要去念甚麼馬克思，我想我對階級的看法就會很素樸的接近馬克思，那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訪問錄》，頁四八六—四八七）

由此可以瞭解王曉波、蘇慶黎、王杏慶等人本身擁有的素樸的社會主義的思

想，在悶局的情況下是被掩藏著的，一旦客觀的環境上有著劇烈的變動，這種素樸的社會主義潛意識立即跳脫出來，成為積極實踐的能動力。如同本為自由主義者的陳鼓應，一九七二年六月赴美，九月返台，「已將他原來對西方的態度和對自由主義的認識做了調整」（註三），態度轉變，大肆反美，而與王曉波站在同一戰線極力抨擊帝國主義與台灣的「文化買辦」（註四），在台大掀起保釣的幾個知識份子，潛藏著的社會主義意識，與島外的左傾知識份子的結合，形成一股共同的「自覺」共識。

在台大所掀起的這一整波的運動風潮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共識主軸正緩緩的集結運作著，「那時已有一些同學開始聚集，比如說王杏慶、王曉波、徐正光，王曉波比我高兩屆，徐正光可能多好多多年，就是一票這樣的人，包括一些僑生，我想他們都有很素樸社會主義的思想，很素樸，就是說，沒有經過很理論化的。」（《訪問錄》，頁四八八）蘇慶黎描述以台大哲學系為主，以及包括徐正光、鄧維禎及王拓（註五）成為強調民族主義而有素樸的社會主義的這一群，藉著不斷閱讀由海外保釣滲透入台灣的資訊，集結成一個小群體。

當時學術圈知識份子的發言空間以《大學雜誌》為主要向外傳輸媒介，南方朔曾透過黃默的文章指出「促成當時『知識份子』集團集結於《大學雜誌》的主因，可以說有相當程度的受到國民黨鼓勵和默許」（註六），然而《大學雜誌》所集結的知識份子，卻有極大的異質，它是在台灣土生的知識份子與出國留學放洋後的知

識份子的聯合集團，意即「土」、「洋」兩系知識份子的聯合，「由於基本特性的差異。『洋』的一系代表人，其所存的思考方式是官方式的思考方式，而『土』的一系則並非如此，其奪權的方式是典型思考方式」（註七），「土」的一系包括有台大的五名學生，分別是王杏慶、錢永祥、陳玲玉、王復蘇、洪三雄，以及編委陳鼓應，常委張俊宏、許信良（註八）等人，但是在「土」系裡有不同陣營的分裂，南方朔進一步的分析，「在『土』的一系中，若干極力主張進入決策層者，將選舉視為知識份子參與決策，獲取政權的唯一途徑」（註九），以選舉進入決策層者即為張俊宏、許信良等人。

南方朔的分析，隔開了《大學雜誌》裡的三個系統：「洋」系的官方思考、「土」系的選舉奪權思考，最後則為反資本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社會實踐」系統，這系統正是以陳鼓應與王曉波為主。

當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大學雜誌》進行著知識份子的聯合與分裂的同時，由於陳鼓應與王曉波言論上的進步性，對台大學生群有較大的吸引力，包括聯合《大學雜誌》裡的五位台大學生運動領袖，企圖進行著非選舉式的社會奪權方式；南方朔與王復蘇所提的社會調查，「社會服務團」便植基於向社會、向台灣社會進行現實性解剖的方向努力。「社會服務團」刻意去選取社會最底層的群眾的生活作調查，社會服務團擬定的調查項目有勞工、農村、貧民、選舉、警民等五項，標示著最初步的社會實踐步驟，展開對社會最底層的關懷。

緊接在「社會服務團」的社會調查後，被挑起的民族情感與實踐慾望的騷動，進一步轉化到「以喚醒青年知識份子走出象牙塔，投向十字路口、鄉村、工廠、礦區、為廣大社會基層服務」為主旨的「百萬小時奉獻運動」（註一〇），一九七三年暑假「百萬小時奉獻運動」，正式成軍，民粹社會主義式的知青下鄉、社會實踐，在民族主義的口號保護及包裝下，引領著大批的知識份子，重新體認台灣社會現實，並且挑起回歸鄉土的情懷。蘇慶黎的「我們這一幫」的知識份子，可以稱之為民族主義社會實踐路線，對於重新認識社會主義與關懷社會的民族主義兩者間的交織，讓「我們這一幫」的知識份子產生對理論知識不足及鄉土現實真相瞭解不夠的急迫感，加上威權體制下的白色恐怖統治，意識底層孕育著更大的反叛體制的實踐慾望。

這種民粹式的知青下鄉社會實踐的積極表現，本身就蘊藏在具有素樸社會意識的知青的思想底層，王拓回憶當時的氣氛，企圖從一個苦悶的局勢掙脫一點空間：「因為當時仍殘留著白色恐怖的時代，很多政治禁忌不敢去碰，就轉變成一種比較隱藏式的關心社會，那關心社會關心什麼呢？自然又會去關心工農階層的人，因為這群人從五〇、六〇年代中，台灣的工商業經濟起飛時候，被犧牲最大的一群人，這一群人生活的苦楚，因為很多知識份子都是從這個階段來的，像我這樣，很自然就會注意這個角落，那就展開了上山下海的運動，整個保釣運動慢慢發展成有一點點社會主義的味道，上山下海的運動對我的影響很大，我過去對自己成長環境只是

熟識而已，沒有想到我可以做什麼替他們改變，即使我在文學上對他們有一些表達，也僅限於我個人感情上的感動而已，在文學上感動，自然就寫出來。」（《訪問錄》王拓）因此可以在王拓身上看到對社會實踐具有狂熱的青年，是如何轉換在文學、文化拓展的工作方向，「但是保釣運動、這些上山下海的運動，可能在思想上給我一些衝擊跟啓發，開始我就自覺地應該為他們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就寫了很多報導。報導農村、漁村、礦工這些人現實的生活，跟他們的願望，那麼這些東西我們看起來都是所謂左翼的東西，很具體地、清楚地歸納成左翼的，這些思想不是來自書本的、來自馬克思的，也不是來自中國左翼政府思想教材，那些我都沒有看過，完完全全是台灣在五〇年代到六〇年代整個社會發展過程裡面，土生土長的左翼思想，也沒有很理論，那後來會去整理一些理論，是因為寫了一些文學評論或社會評論，我原來只是寫報導、小說，創作性文學或報導文學這類的，後來在文學評論當中，會不知不覺的將我的土生土長的左派思想作為評論的理論基礎，那麼在這裡我就可能展現些過去我在創作或報導裡沒有表達的東西。所以我整個的理論來自生活，並且加以結構化而已……」（《訪問錄》王拓），在政治上沒有出路，往社會的、生活的底層挖掘本土的寫作資料，卻使這群知青重新審視腳底下的土地的現實面，對本土社會、生活環境的感動，常反饋成思想實踐的動力中，即使來自生活的感知經驗，亦會尋求理論化及結構化的過程，王拓的例子正說明尋求過程的飢渴性，自然會趨向一個集結的共識團體。

「民族主義座談會」後的兩個月，一九七二年二月台大哲學系副教授陳鼓應與講師王曉波，以及學生錢永祥、盧正邦被警備總部拘留查問有關組讀書會閱讀「毛共」書籍，預備羅織入獄，但最後查無實據被釋回。此事件顯示閱讀社會主義書籍的小集團活動已在暗地展開，但也預示著國民黨準備收編這場學運的成果。民族主義社會實踐派準備進行更大的社會實踐運動時，同時國民黨也嗅到了社會實踐路線對其政權的威脅，「社會服務團」為台大學生自發而進行的，然而到了「百萬小時奉獻」，明顯就由國民黨政系統的介入干涉（註一一），並將整個知青社會奉獻的意涵，由救國團主導成日後以娛樂為主的服務隊，失去原有的認識社會、自我反省的實踐意義了。一九七三年六月爆發「台大哲學系事件」，陳鼓應、王曉波、趙天儀等十四位哲學系教師遭解聘（註一二），陳鼓應被安排到政大國關所研究員位置，只領薪資，不准發言的狀況下，民族主義社會實踐派失去了運動據點後，暫時地沈寂。

進步文藝青年

另一方面，以文藝創作為主的文學家，開始了對現代詩、現代主義的批判，一九六六年創刊的《文學季刊》編者尉天驄比較起一九五九年的《筆匯》月刊，就已經感受到「回歸現實」的潮流在逐漸的衝擊著，「《筆匯》是一份比較是學院式的刊物，比較從學院的角度來寫一些文學的東西，到了《文學季刊》就比較是接近

『現實的』東西，那個時期，整個社會氣氛開始動起來，《文學季刊》裡面表達的就是較接近台灣現實的文學產品。」（《訪問錄》尉天驄），從《筆匯》時期開始陳映真已有多篇小說，由於編者與作者的關係，尉天驄與陳映真的關係相當密切。到了辦《文學季刊》時期，尉天驄找了陳映真、七等生、劉大任、施叔青、黃春明，及後來加入的王禎和參加編輯工作。（註一三）鄉土作家與《文學季刊》的結合，呈現在一九六〇年代的末期，然而此時，陳映真的思想已經轉向，「一九六七年，他陸續讀到了關於在六六年展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日本左翼的評論和報導。……他感到大陸是一個知識和理論的國家，對於把那麼深刻的理論問題，認真地訴諸於國民的公聽的中國共產黨，他產生了由衷的佩服。」（註一四）左傾的陳映真展開了對社會主義理論的渴求，一九六八年組了讀書會，卻被讀書會裡的某成員出賣，造成轟動一時的民主台灣聯盟事件，陳映真、吳耀忠、邱延亮、林華洲、李作成等人被捕，陳映真繫獄七年。

即使陳映真入獄、劉大任留學美國，然而尉天驄邁向現實主義文學的路程並沒有停止，《文學季刊》在一九七一年二月復刊，成為《文學》雙月刊，編輯者加入了何欣，開始以批判的角度面對現代主義文學，例如對唐書璇的小說《董夫人》做全面性的討論以及反省。但《文學》發行一直並不理想，時常脫期、延誤。此時期正好碰到保釣所掀起的民族主義浪潮，於是文學的「民族性」、「民族風格」、「文學的社會關懷」等問題被提出來討論。一九七二年《中國時報》上兩篇關傑明

的文章〔註一五〕，引發了對現代詩批判與擁護的論戰，緊接著強化批判現代詩火力的的是《文季》。《文季》網羅了年輕的鄉土作家，與火力旺盛的海外學人，包括前一時期的黃春明、王禎和，以及王拓、李南衡，主要的戰將型人物則為唐文標。《文季》僅僅發行三期，然而三期裡鎖定現代主義無根、自我、晦澀、陰霾的風格為批判對象，一系列的「當代中國作家考察」專題，分別考察了歐陽子、張愛玲的作品。《文季》裡面，也開始了對日據時代文學的整理，包括對鍾理和小說的考察，重刊楊逵的《模範村》，以及林載爵的《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回顧》，網羅收集日據時期台灣文學資料的李南衡，顯示《文季》的作家群以文學作為對台灣現實面的探索工具，一方面對台灣文學史的整理，一方面批判並企圖擺脫六〇年代現代主義的潮流，以建立起「鄉土回歸」的現實主義社會性文學。同時唐文標加入《文季》的編輯群中，說明了《文季》批判轉向的因素，自覺的走向了現實及普羅意識的尉天驄，與歷經保釣運動鬥爭洗禮的唐文標，兩者在文學思考上的激盪，說明了具左翼味道的現實主義文學批判，越趨濃厚。

對此現代主義派主將余光中有很深刻的反諷：「它（《文季》）和大陸三十年代的文學一樣，是一個既幼稚又武斷的左傾文學觀。」〔註一六〕余光中的反諷批評恰恰指出《文季》的風格與開創的方向，尉天驄也指出了「《文季》的確是比較左傾，批判性就變得比較強了，像我們批判余光中的現代主義的作品，其實並不是批判哪一個『個人』的東西，而是批判六〇年代以來的現代主義，那種虛無的、頹廢的思想，所以《文季》雖然只有三期，然而他所造成的震撼是相當的大，裡面的文章都相當的犀利。……《文季》其實有三〇年代的左翼文學的味道。」「那時因為台灣陷入低潮期，而反對美國、日本等的帝國主義情緒是很自然的，也就在自然的情況下，要反對帝國資本主義，以社會主義的想法來批判是一種很自然的情況。當時的左傾是一種自發的狀態。」（《訪問錄》尉天驄）尉天驄其自覺而明顯傾向社會主義的批判意識，帶有對傳統文學知識理論的反省，以及直接的文學生活體驗，同樣具有著時代性的本土條件及因素。

學術界裡的民族主義實踐派，與文學界裡的現實主義文學，在一九七四年因著政治空間的緊縮與客觀環境的打壓，同時的沈默禁聲，然而屬於非官方系統的知識分子，仍在不斷地重新組合、匯集當中。南方朔在《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一文，對於《大學雜誌》時期的分裂後的知識份子去向，做了一初步的分類譜系：

陳鼓應則對《大學雜誌》的組成份子及其後序發展，做了更精確的分類與點名〔註一七〕：

一、新保守主義派：關中、魏鏞、丘宏達、李鍾桂等，有的被當局吸收，有的則納入黨政上層機構。

二、學院式的自由派：楊國樞、金神保、王文興、張潤書等，參與《聯合報》主辦的《中國論壇》等刊物，其言論表現了學院式的自由主義思想的基本面貌。

三、地方政治派：張俊宏、許信良，與地方政治人物黃信介、康寧祥結合，創辦《台灣政論》，僅五期被停刊，後再由張俊宏接辦《這一代》，但雜誌經常脫期，影響力遠不如同時期的《夏潮》。

四、社會民主派：王拓、王曉波、陳鼓應、王杏慶、高準，參與後來蘇慶黎辦的《夏潮》雜誌，和另一些作者陳映真、王津平，具有共同的社會改革思想傾向。從一九七四年《大學雜誌》分裂後，屬於陳鼓應分類的第三、四派知識份子，立即創刊了《台灣政論》，來集結保鈞後走出學院體制藩籬的知識份子。《台灣政論》由張俊宏以及政治人物立法委員康寧祥、黃信介所辦，並網羅了郭雨新、黃順興等政治人物，以及姚嘉文、黃華、孟絕子等知識份子，張俊宏由於《大學雜誌》的關係，也拉進了立場有異的陳玉璽、陳鼓應、王拓、蘇慶黎、王杏慶等人參與撰稿（註一八），《台灣政論》等於是反國民黨的在野人士，第一次的大集結。然而在蔣介石剛過世，蔣經國剛渡過權力接班的情形下，《台灣政論》在當局眼裡仍然是反叛的激進份子，《台灣政論》僅五期就被停刊。《中國論壇》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十日創刊，屬於《聯合報》系下的刊物，接續著《大學雜誌》以來的學術體制內知識份子向社會發言的空間，由於《中國論壇》向學院打開了一扇門，也由於其標榜的自由開放，於是學院裡的尉天聰、剛回國教書的林俊義及後來從法國回來的蔣勳也進入《中國論壇》了。

每一次運動的集結，就是運動分裂的開始。《台灣政論》的停刊，將黨外陣營裡的異質傾向，分裂開來。屬於民族主義社會實踐路線的王曉波、陳鼓應、王杏慶、蘇慶黎、王拓，已經藉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所裡的叢書，以及海外的保鈞資訊，開始討論起關於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文章，反省美、蘇冷戰結構體系下的台灣，其思想上的左傾，結合了保鈞以來以「帝國主義」指控美、日，以經濟支援控制台灣政治社會的資本主義國家，因此「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民族主義情感」成爲其共同的理念，相對於張俊宏、許信良的西方自由主義式的選舉運動，民族主義社會實踐路線走向了不願介入資產階級政治選舉鬥爭的基本意識型態。

然而在高壓的戒嚴體制下，「反國民黨」仍然是在野知識份子的聯合陣線，但又不願加入黨外陣營的情況下，就必須自舉大旗以鮮明的立場，平衡整個「反國民黨」陣營的文字論述，用新接觸到的左翼思考模式，重新挖掘以及認識台灣的整體面貌。《夏潮》在這樣的條件下破殼而出。

老左派與歸國學人

最早以理論來理解社會主義的陳映真在一九七五年出獄歸來，陳映真的繫獄，讓許多喜讀文學、小說的進步知識份子感到莫名的白色恐懼，但也對他小說內容表現出來的社會焦慮更具好奇心，陳映真的出獄，民族主義社會實踐派的眼光立即注視到他身上。《夏潮》雜誌原本由鄭泰安主辦，但是辦了兩期後便後繼無力，於是

找了其前妻，曾辦過《台大青年》的蘇慶黎幫忙編輯第三期的工作（註一九），素樸的社會主義者蘇慶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接辦了《夏潮》後，前期讀者文摘式性格的《夏潮》，並不是她理念圖像的雜誌，但由於《台灣政論》的停刊經驗，又必須要有一份區別於政治性強烈的雜誌，以免遭受立即鎮壓的危害，蘇慶黎立即找了思想左傾的小說家陳映真，暗地商量「我們來辦一本社會主義的雜誌」，將《夏潮》改造成一份社會主義刊物的可行性。「我第一個去找的是陳映真，我說：『我們來辦一本社會主義的雜誌』，我們也不敢在那種冰果室，以前也沒有這種咖啡店，我們就在那種大街小巷，走在馬路上，看後面有沒有跟蹤，我就跟他講，『我們辦一個社會主義的雜誌』他就問我：『你神經有沒有問題！』，因為他剛坐牢出來不久。而且我差一點被他們那個案子牽進去。」（《訪問錄》，頁四九二）蘇慶黎透過張俊宏的介紹，認識了五〇年代因白色恐怖鎮壓下坐牢的台灣老左派陳明忠，在陳明忠大力的支持，並答應幫忙籌款的允諾下（《訪問錄》，頁四九三—四九四），《夏潮》在一九七六年七月改版。陳鼓應所謂的社會民主派，經過蘇慶黎不斷的以私下個人單線式的聯絡網絡，迅速加入《夏潮》的寫作與編務工作。另一方面，由於陳映真與尉天驄的熟識，也拉入了以《文季》集結下的現實主義鄉土作家群，蘇慶黎還透過正在收集日據時期文學的李南衡，拉近了開始研究台灣史的年輕學者，林載爵、林瑞明、梁景峰等。

另外在海外的部份，雖然曾受到陳映真影響留學海外的蔣勳、王津平，其所遭受到文革及歐美各國社會主義狂飆運動的衝擊，更為直接，他們可以直接接觸到《人民日報》，開讀書會閱讀馬、列著作，參與反戰、反體制遊行，反省著自己所握有的西方知識專業，紛紛從自己專業的領域，研究從社會主義理論領域裡發展不同論述及適用台灣社會的可能性，林俊義、王津平、蔣勳的知識歷程就說明，任何想要改革台灣政治社會的知識份子，根本無法逃避左翼的知識誘惑，更加說明了左翼思想哲學在台灣知識份子身上的重新根植。

在三類人馬的集結下，民族主義社會實踐派，現實主義文學的作家，以及海外受文革、保釣衝擊留學歸國的人，在蘇慶黎一個個單線式（註二〇）的拉人編輯、邀稿情況下，在各個不同的時間底下，逐漸集結成《夏潮》的作者集團，有：陳映真、王拓、李慶榮、尉天驄、唐文標、齊益壽、楊青矗、王曉波、陳鼓應、高準、南方朔、蔣勳、詹澈、林瑞明、陳國祥（註二一）、林載爵、徐代德、潘榮禮、楊青矗、林俊義、胡晴羽、李雙澤、李元貞（註二二）等，社長為鄭漢民醫師，以及日據時代即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楊遠、黃師樵，後來更因為鄉土文學論戰議題上的結盟，加入了台籍立法委員黃順興，以及國民黨裡的左派胡秋原、嚴靈峰、侯立朝等人。一九七六年《夏潮》雜誌邁開了它的左翼步伐。

雜誌的出版及內容

《夏潮》雜誌從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創刊，至一九七九年二月被警總查禁

停刊爲止，每月出版一期總共出了三十五期。《夏潮》雜誌創刊號爲三十二開本，形狀類似《讀者文摘》式的。然而在第三期由蘇慶黎接手編輯後，開始改變整個雜誌編輯風格與內容，至第四期開始擴大版面改爲十六開本的雜誌形態大小，此形態一直持續至停刊爲止，《夏潮》雜誌具有明顯的意識型態應從第四期算起，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第三十四期因爲美國宣布與中共建交，並且投入民意代表選舉致使脫期，三十四期與三十五期爲合刊本所以總共有三十一本。

《夏潮》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到一九七九年二月的幾個階段：從一九七六年七月的第四期改版開始，《夏潮》重點擺置在歷史與文學方面，尤其以台灣本土的歷史與文學爲主，並鼓勵創作下，從一九七六年七月到一九七七年六月，即一、二卷的草創時期，以文化面爲主。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圍繞著鄉土文學論戰所繙發的議題與論爭，以及《夏潮》逐漸凸顯本身的反資本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立場，均從第三卷展開，從不斷的防衛、隱忍、偷渡的情況下，不畏懼反社會主義情緒打壓而挺立出「階級」的意識型態，是一九七七年《夏潮》最大的轉變。到了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嘗試「介入的實踐」成爲此時期的主軸，首先是民歌運動，藉著在各大學校園演唱會，串連出大學校園的知青份子。以及在一九七八年底，屬於夏潮集團系統的王拓與陳鼓應，分別競選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夏潮系統集團整批人馬投入競選的工作班底，專題報導各選區選戰情況，使得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二月份的《夏潮》雜誌，成了政論雜誌，也可說是《夏潮》政治化的實踐階段。

《夏潮》雜誌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停刊，之後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再度出版《鼓聲》，以陳鼓應任發行人、張春男任社長，在內容與編輯的風格上，均企圖延續《夏潮》的雜誌風格，以區別當時黨外系統由黃信介任發行人、張俊宏任總編輯所發刊的《美麗島》雜誌，然而《鼓聲》僅發行一期立即被查禁，緊接著夏潮系統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發行《春風》雜誌，以王拓任社長、蘇慶黎仍爲總編輯，整體編輯以工人、農人、漁民勞動階級的社會問題爲主，要在政治實踐的路上走出階級立場的道路來，但在十二月發生高雄美麗島事件後所有黨外雜誌一律停刊，《春風》在第二期也被停刊，王拓因美麗島事件被抓、蘇慶黎也被抓去警總審訊兩個月。夏潮系統從一九七八年底介入選舉後，由於整個政治化過程的聯盟，夏潮系統與黨外系統的人馬合流（註二三），成了當時一股相當大的反國民黨勢力，從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到一九七九年底，是政治實踐的階段。

夏潮雜誌的聯盟

對於一個左翼立場的集團來講，白色恐怖殘餘的七〇年代，主張社會主義比起談政治體制改革對國民黨的政治文化霸權更具威脅，因此各種左翼的論述形態必須躲在不同的文字修辭底下，而對於一份左翼的雜誌而言，莫過於能以文字來煽動運動風潮，文字運動的烽火若能夠傳遞，勢必得不斷擴大與各個團體結盟，以取得文字立場共識的擴張。夏潮系統爲了確保其立場的穩固，其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

義、反國民黨政權、民族統一的立場擴大為社會共識，向外聯盟與擴張影響，成了運動上的主軸路線。夏潮系統在《夏潮》雜誌上掛名的僅有社長鄭漢民、及總編輯蘇逸凡（蘇慶黎筆名），其餘成員在雜誌上呈現的文章署名，以匿名居多，例如林俊義的文章沒有一篇的名字是一樣的。一方面懼怕國民黨政權的鎮壓，一方面各作者在不同的場域工作著，夏潮系統成員藉著在其他雜誌、媒體上的投稿、編輯，在議題上的一致性發言，很容易能與《夏潮》形成一同一的陣線，而成為遍地烽火的狀態。

尉天聰在《文季》停刊之後，進入《中國論壇》當編輯工作，從法國留學回來的蔣勳成爲其編輯上的副手（註二四），由於尉天聰與蔣勳的關係，《中國論壇》上經常引進夏潮系統成員的文章，直到一九七七年十月尉天聰、蔣勳退出爲止，《中國論壇》一直存在著不同於學院派現代化自由主義的異質聲調。《中國論壇》從一九七五年十月十日創刊，到一九七七年十月止，共九百三十一篇文章（註二五），夏潮系統成員的文章則佔了四十八篇，佔百分之六，然而此四十八篇文章爲具有真實姓名，還有一些不具真名，以筆名、化名刊出的文章不計其數。在《中國論壇》上發表過文章的包括：尉天聰、蔣勳、王拓、唐文標、王津平、林俊義、林載爵、徐代德、黃煌雄等（註二六），直到一九七七年十月以後尉天聰與蔣勳在《中國論壇》所學辦的一場鄉土文學座談會，由於座談會的內容並未全文刊出，尉天聰特別表明「雖然《中國論壇》的楊發行人（楊選堂）當場宣布紀錄將一字不改

在下期《中國論壇》發表（指一九七七，八，二十五），但卻拖延到十月十日才刊出刪改後的紀錄。」（註二七）此座談會後，尉天聰與蔣勳退出《中國論壇》，夏潮系統成員也就很少在《中國論壇》上發表聯盟性的文章。

在鄉土文學論戰時期，與《夏潮》互相支援的還有《仙人掌》雜誌與《中華雜誌》。《仙人掌》創刊號一九七七年三月由王健壯主編，金惟純與林國卿執編，第四期後金惟純任主編，李利國、林火旺任執編，第七期起李利國任主編，耿榮水、林火旺任執編，但第七期成立了編輯委員，有王克文、朱雲漢、藍錦榮、文矩、周陽山、彭懷恩等人。第九期總編輯換爲林任重，主編由編輯委員產生，而編輯委員則無李利國，加入了林毓生、何弘、呂孝德等，由此直到十二期結束爲止，《仙人掌》總共十二期，有二百六十篇文章，夏潮系統成員的文章佔了三十六篇，佔了百分之十四，而且有三十篇文章集中在金惟純與李利國編輯的一到六期期間，金惟純去職後，夏潮系統文章銳減，由此也可知金惟純與夏潮成員的關係密切。《仙人掌》雜誌上，相關《夏潮》雜誌的議題，最重要的有：鄉土文學論戰、鄉土作家小說創作、民歌運動、中國文化造型議題、孫中山思想等，封面也以人物畫像爲主，且由與陳映真同案繫獄的畫家吳耀忠所畫。《仙人掌》至第七期起，因彭懷恩、朱雲漢、周陽山等現代化論派及保守派進入編輯，整體編輯方向大改變，甚至與《夏潮》及《中華雜誌》成員展開現代化論戰，論戰中彼此指責的對峙，甚爲火爆，也因此夏潮系統成員的文章，不再在《仙人掌》上發表。

至於《中華雜誌》一直是以胡秋原為中心的政論雜誌，《中華雜誌》的傾向則為中國民族主義，擁護中國國民黨、反中共、反帝國主義，在鄉土文學論戰時由於王曉波找了胡秋原幫忙，胡秋原看了論戰文章之後，答應支援夏潮一系的鄉土作家，甚至後來王曉波成爲《中華》的編輯之一（註二八），於是《中華雜誌》亦成爲《夏潮》擴大聯盟的伙伴雜誌之一。《中華雜誌》從一九七七年十月開始刊載夏潮系統成員的文章，從一九七七年十月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美麗島事件發生爲止，《中華雜誌》共有五百六十五篇文章，而夏潮系統的文章則有五十一篇之多，甚至中華系統的作家也向《夏潮》投稿，成爲兩邊系統成員合流的現象。

《綜合月刊》在一九七七年九月由黃年接掌編輯，一九七八年一月，金惟純加入編輯行列，在《夏潮》雜誌上所談論的議題，立即進入《綜合月刊》雜誌，包括：反分離主義，有八篇文章批判基督長老教會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六日的《人權宣言》；鼓勵民歌運動，有七篇文章報導楊祖珺的民歌運動，支持《雄獅美術》的文化造型問題，環保護題上多次訪問林俊義等，但是《綜合月刊》在內容上由於以娛樂、通俗取向，立場上雖說是中立的第三者，但在對於黨外、長老教會的立場是站在國民黨執政者的一方。

以文藝爲主的《笠》詩刊及《台灣文藝》，甚至一九七七年由高準主編出版的《詩潮》，同樣與《夏潮》一起提倡鄉土以及現實的文學作品。《夏潮》與《笠》詩刊及《台灣文藝》之間，在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其前後接觸較爲頻繁。以這

兩份文學刊物在《夏潮》上刊載的廣告來看，《笠》詩刊共有五次的廣告版面，分別在二卷六期，三卷二、三、五、六期，而《台灣文藝》有四次，分別在二卷六期，三卷四、五、六期，而這也正是鄉土文學論戰起伏迭起的時刻。《夏潮》上的廣告有一特點，廣告內容由夏潮編輯所設計、撰寫，其表現意涵是《夏潮》自身對《夏潮》的讀者講話，而不是以廣告物的立場向讀者介紹。例如《笠》詩刊的廣告，其標語是「什麼不是現代詩」、「什麼才是現代詩」，而其小標題是「不斷嘗試在台灣詩學的主流上，做更新的躍進」，由於現代詩論戰在七〇年代初期展開，現代派文人又不斷詰難鄉土作家的批判語調空洞，因此在此時標舉歷史悠久且相當本土化的《笠》詩刊，才是所謂較爲進步的現代詩，此種廣告亦應爲一種對戰策略。又如《台灣文藝》於一九七七年二月復刊，由鍾肇政任編輯，二卷六期的廣告文案以吳濁流的去世，來勉勵文學者更加倍的努力，正切進了《夏潮》在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間，不斷介紹日據時期台灣文學作家的作品，提供一個純文學且純台灣本土作家的場域，但是在三卷五期的《台灣文藝》廣告上，《夏潮》爲其所做的小標題是「爲新進文人提供發表的園地！它正茁壯的成長，而成爲中國文學的一支主流。」對照《台灣文藝》在八〇年代以後成爲一台獨派文人的主流刊物，《夏潮》在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時空下爲《台灣文藝》定位爲「中國文學的一支主流」，一方面表達了《夏潮》本身文學主張的立場，一方面又有兩面對戰的意味存在，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

另外以夏潮系統成員獨立編輯雜誌的，則有蔣勳當總編輯的《雄獅美術》。《雄獅美術》從一九七七年六月奚淞、蔣勳任編輯委員後，帶入了中國文化造型議題，企圖脫離西洋美術的觀點，尋找出屬於中國人，甚至台灣本土的藝術造型。一九七八年三月蔣勳任總編輯，則大肆將《雄獅美術》改版，朝著他在前階段裡一直提倡的文化造型議題前進。以「文藝的、民族的、現實的」作為方向的《雄獅美術》，一改以往以介紹西洋美術為主的脈絡，而加入了攝影、建築、音樂、舞蹈、影劇以及文學等專欄，在議題的聯盟上形成了「夏潮—雄獅」路線，改版後的《雄獅美術》企圖對本土文化作全面性反省及報導之下，蔣勳不僅引進了夏潮系統的成員，更加結合了各個文化領域的知識份子，包括：許常惠、樊曼儂、王立德、施叔青、夏鑄九、莊伯和、姚夢嘉、凌晨、王墨林、林啓星等人。然而在政治高壓與統獨情節的人事糾葛上，一九七九年四月蔣勳退出《雄獅美術》的編輯工作（註二九），同時《雄獅美術》恢復以往純美術路線。

一九七七年中壢事件後夏潮集團逐漸政治化，其間屬於張俊宏編輯的《這一代》黨外雜誌，由於出刊常常脫期，發行量不廣，甚至雜誌上文章的作者一律為化名，無從得知夏潮系統與《這一代》之間的實際的結盟關係。一九七九年二月停刊後的《夏潮》仍有《鼓聲》、《春風》等雜誌，並且一九七九年八月創刊的《美麗島》雜誌，實為黨外大聯合的一份政論性雜誌，而夏潮系統的蘇慶黎、陳鼓應、王拓、黃順興等亦列名其中，在反對陣營的聯盟中，夏潮與黨外是一齊並肩作戰的，

從《美麗島》及《春風》的社務委員名單中，兩派合流大聯合的現象，是無庸置疑的，當時刻意的公開化，是爲了表示其政治開明象徵，與國民黨的政治黑手做一對比。

總的看起來，《夏潮》在七〇年代「鄉土回歸」的風潮底下，將意識型態立場融入這整個潮流之中，藉著議題不斷的滾動，結盟了各個不同風格的雜誌媒體，藉著系統成員在各雜誌媒體上的文章發言、編輯，使得《夏潮》的議題不止爲雜誌內部的單一事件，由於擴大結盟，以及運用文字作品滲透的方式，使《夏潮》的議題，一再成爲各雜誌的議題，成爲社會議題的焦點，從而豐富了其社會意涵的論辯。《中國論壇》、《仙人掌》、《中華雜誌》、《綜合雜誌》、《雄獅美術》都是因爲在編輯上與夏潮系統成員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成了《夏潮》運用議題結盟的聯盟雜誌。在文學議題上的結盟以《笠》詩刊、《台灣文藝》、《仙人掌》及《綜合月刊》爲主；在人脈上有關係，而形成更進一步的文化、思想聯盟的合作關係以《中國論壇》、《雄獅美術》及《中華雜誌》爲主，但是《中華雜誌》協同夏潮系統成員參與了兩次大型論戰，鄉土文學論戰與現代化論戰，毋寧說其是在以政治上的「知識／權力」的聯盟作戰更爲恰當，因此《夏潮》與《中華》及《美麗島》的黨外系統，恰好分別是兩條路線上的政治共識，而分別與之聯合、結盟。

〔註一〕參見蔣勳訪問稿，台中，一九九五，一，十二，蔣勳與唐文標的認識過程，依照蔣勳的回憶是因為歐洲通訊，以及雙方不約而同對楊牧文章的批判，意見一致，開始了通信上的聯繫。

〔註二〕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三日在台大首先貼出來的保釣標語：「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即為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的口號。

〔註三〕南方朔〈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一)〉《夏潮》四卷六期，一九七八，六，頁四四。

〔註四〕丘為君等編著《台灣學生運動一九四九—一九七九》(上)，頁一七〇。

〔註五〕王拓表示他首先認識王曉波與陳鼓應，之後「當然曉波身旁有一些國外保釣運動領導的核心人物，我跟他們在一起又能聽到很多有關政治，也聽到雷震、殷海光，羅素、自由主義的東西，透過他們我就開始去閱讀，閱讀就開始有反權威的思想」，收於《訪問錄》王拓。

〔註六〕南方朔〈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二)〉《夏潮》四卷四期，一九七八，四，頁五一。

〔註七〕南方朔〈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四)〉《夏潮》四卷六期，一九七八，四，頁四七。

〔註八〕同〔註四〕，前引書，頁六二。

〔註九〕同〔註二〕，頁六三。

〔註一〇〕謝復生、吳永乾、盧文雄、彭懷恩、林國卿等著《建設偉大的社會——百萬小時的奉獻》，《台大代聯會訊》，一九七三，六，九。收於丘為君等編著《台灣學生運動一九四九—一九七九》，頁八八七。

〔註一一〕「百萬小時奉獻運動」乃由台大代聯會主辦，輔助單位為國民黨的黨政系統，包括救國團、農復會、鄉公所、民衆服務社等。參見《百萬小時奉獻草案》《台大代聯會訊》，一九七三，五，七。收於丘為君等編著《台灣學生運動一九四九—一九七九》，頁八九二。

〔註一二〕參考趙天儀編著《台大哲學系事件真相——從陳鼓應與「職業學生」事件談起》。

〔註一三〕丘為君、陳連順編《中國現代文學的回顧》，頁一六三。

〔註一四〕許南村〈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中國時報》人間文學，第三十九版，一九九三，十二，十九。

〔註一五〕關傑明〈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於一九七二，二，二十八發表，《中國現代詩的幻境》一九七二，九，十，均刊載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註一六〕余光中〈詩人何罪？〉，引自若林正文〈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一文，收於若林正文、松永正義著，廖兆陽譯《中日會診台灣——轉型期的政治》，台北，故鄉出版社，一九八八，頁一五〇。

〔註一七〕陳鼓應〈七十年代以來，台灣新一代的改革運動〉香港《中報月刊》，一九八

二，五，二十八，頁三二。

〔註一八〕同〔註一七〕，頁三三。

〔註一九〕訪蘇慶黎，一九九四，十二，二十七，台中東海別墅，收於《訪問錄》，頁四九二。

〔註二〇〕參見蘇慶黎《訪問錄》。另參見蔡建仁訪問稿，對當時「單線式」聯絡有較深入解釋，「那時，每一個人的關係是單線聯絡的，A跟B熟識，A與C瞭解，但是A不敢將B介紹給C，嚴密的時代，連讀書會都可能被抓……，相當的風聲鶴立，所以每一個人之間的認識是單線的，關係是很單純，卻很隱密的在進行，彼此之間是沒有聯繫的，蘇慶黎至少是個台面的人，所以線性的進行關係，會往她的身上集中，蘇慶黎一上台面後，自然就有一些人靠攏進來。」

〔註二一〕同〔註一七〕，頁二五。

〔註二二〕其後所列八位作家群為曾參與《夏潮》編輯、並常在《夏潮》上寫稿的作者。

〔註二三〕從同時期發行的《美麗島》雜誌與《春風》雜誌上的社務委員名單，可以看出兩邊人馬互滲的情況，王拓、蘇慶黎、陳鼓應均為《美麗島》社務委員，而許信良、黃信介、康寧祥等亦列名為《春風》的社務委員，在反國民黨的態度上已成為統一戰線。

〔註二四〕蔣勳訪問稿，台中東海，一九七五，一，十二。

〔註二五〕王淑女〈中國論壇兩年來談了些什麼？〉，文中對《中國論壇》一九七五至一九

七七兩年來的所有文章，作統計分析。《中國論壇》五卷七期，一九七八，一，十，頁四三。

〔註二六〕黃煌雄發表在《中國論壇》的文章為〈蔣渭水及早期「先覺者」的民族情操〉，一九七六，八，二十五，當時黃煌雄正為《夏潮》一卷七期，一九七七年十月號的編輯者。

〔註二七〕尉天聰〈鄉土文學論戰的餘話〉，《鄉土與民族》，台北，遠景，一九八一年，頁一三。

〔註二八〕王曉波第二次訪問稿，台北世新，一九九四，十，七，收於《訪問錄》，頁四三五—四三七。

〔註二九〕訪蔣勳，蔣勳回憶離開雄獅美術的過程：「可是我後來隱約的感覺到他（發行人李賢文）的壓力越來越大，謝里法就常從紐約寫信來，認為說你怎麼這個雜誌變成一個統派的雜誌，也構成他一方面有新聞局的壓力，一方面有海外朋友的壓力，也有一次座談會開始批判我做的雄獅美術，大概是一九七八年年底開始的，有一點牽涉到對本土文化的再界定，他最後用的理由是用新聞局的壓力，請我離開，可是我知道裡面還有很複雜的過程，裡面的流派越來越要清楚。」收於《訪問錄》蔣勳。

第二章·文化啟蒙的實踐場域

第一節·《夏潮》的本土觀點

——台灣歷史與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整理

歷史意識的理解

《夏潮》對於歷史的整理投注相當的心力，尤其在台灣史與日據時期台灣文學方面的篇章比例很高。日人松永正義認為夏潮系統是七〇年代新起的民族主義論，具有五大特徵：一、強烈的歷史意識；二、強烈的社會意識；三、反帝國主義論；四、中國革命傳統理念上的中國意識；五、台灣與中國的多元的重疊把握。（註一）松永正義以國家認同意識作為區分夏潮系統與當時的黨外系統，可以說是「台灣」與「中國」互相對立或者「多元的重疊把握」的意識型態，然而無法說明具有

「強烈歷史意識」的夏潮系統，爲什麼要如此奮力整理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而不相對整理中國歷史與文學？區別「台灣」與「中國」此兩個名詞的認同意識，是無法用「多元的重疊掌握」相當模稜兩可的名詞來做解釋，松永正義沒有說明夏潮系統到底「多」了幾個「元」？「台灣」與「中國」的「重疊」模式爲何？並且夏潮系統「把握」怎樣的歷史素材建築了本身民族主義論的特徵？

然而更大的問題是《夏潮》爲何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葛蘭西認爲：「在政治活動與個人行爲兩方面，只有通過歷史的意義和歷史的分析，通過社會和個人所處的精確歷史環境的瞭解，人們才能清楚的認識他改造環境和改造自我的能力。」（註二）具有政治黨性色彩的團體，必須建立起對自身環境的歷史瞭解，才能建立起社會的改造能力與方向。政治黨性反叛性強烈的夏潮系統瞭解到必須分析與詮釋所處在土地上的歷史，來找出改造社會的方向，加上研究台灣史就是主張台獨的政治高壓氣氛所致，台灣歷史的研究在七〇年代之前甚至到八〇年代，始終是個禁忌的議題，因此重新整理出台灣歷史的意義與分析，就成了政治社會改造的首要課題。

蘇慶黎在一九七八年九月當時的一篇宋國誠的訪問集裡，談到她對於歷史意義的理解：「人類的歷史，不單只是一些美化的帝王將相的英雄史，歷史是千千萬萬活生生的人的生活和奮鬥史」，「至於台灣史，我認爲不只要談，而且要研究怎樣談，怎樣看的問題。」（註三）作爲《夏潮》總編輯的蘇慶黎清楚的提示，歷史並

不僅僅在事實的陳述，尤其對於自己土地歷史的理解是「怎樣談，怎樣看的問題」，企圖重新詮釋與分析歷史。爲什麼會有「怎麼談」與「怎麼看」的問題？由於國民黨在五、六〇年代斬斷了台灣人民對本土歷史傳統的研究，連帶著台灣歷史裡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學研究，幾乎形成一種歷史的斷裂狀態，七〇年代的台灣，往前看只能追溯到國民黨在中國八年抗戰的歷史，二次戰前的台灣與二次戰後的中國，幾乎如失憶症般，不能存在台灣人的歷史記憶中。那麼夏潮系統是「怎樣談」與「怎樣看」台灣歷史與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呢？回到《夏潮》雜誌的歷史篇章裡，才能瞭解夏潮系統如何整理、解讀、建立台灣歷史意義與日據時期台灣文學，也或許多少能夠回答松永正義的「多元的重疊把握」的意涵。

台灣文學與文學史的整理

伴隨七〇年代初期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以及對日斷交、反日貨運動，在在使得當時的知識份子憂慮台灣社會境遇與命運，與中華民族近代史裡頭的苦難，有了歷史等等的聯想與聯繫。在中國三十年代的文學、歷史被禁絕的情況下，台灣日據時期的抗日文學，正好替代了中國的近代史裡頭人民反抗的傳統，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成了被挖掘與重新發現的對象。日據時期的抗日文學其實並不是被消滅，而是未被納入主流的歷史文學論述裡。即使如一九六四年吳濁流創辦《台灣文藝》即斷斷續續介紹著台灣文學裡的民族傳統（註二），但《台灣文藝》在文學界被視爲

台灣本省人的刊物，對於日據時期的研究議題，仍然被擺置在文學界、學術圈的邊緣位置。直到一九七二年五月，具有政治社會影響力的主流媒體《大學雜誌》，刊載陳少廷〈五四與台灣新文學運動〉一文為七〇年代當時的政治運動尋找出歷史依據，揭開對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再發現與表揚」的序幕（註五）。

屬於文學界主流刊物、對現代主義具有影響力的是顏元叔編輯的《中外文學》，一九七三年七月顏元叔發表〈台灣小說裡的日本經驗〉，列論楊逵、張深切、吳濁流，及戰後的廖清秀、葉石濤、林衡道等人的作品，基本上肯定了日據時期人民抗日的民族記憶，此篇後來又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一日的《中華日報》副刊重刊。緊接著張良澤也在《中外文學》及《書評書目》發表鍾理和的一連串論文（註六），林載爵也在《中外文學》發表論楊逵與鍾理和的〈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註七），《中外文學》又重刊了楊逵與鍾理和的作品（註八）。趕著回歸鄉土的流行浪潮，《幼獅文藝》也於一九七四年九月刊出楊逵的成名作〈送報伕〉。但是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現實性對於注重技巧形式的現代主義主流而言，其語言文字、表現技巧是拙劣，對現代主義派來說其重要性僅在邊緣的民族記憶裡。林載爵就反駁技巧形式論：「過去批評到台灣文學時，幾乎均以文字上的拙劣技巧來顯示台灣文學的幼稚，這種批評是不智的，不能同情日據時代下台灣的客觀環境，復不能瞭解像賴和、楊逵、吳濁流、張深切、鍾理和等作家在苦難中的不屈意志及孜孜不倦的努力」（註九），林載爵認為楊逵所代表的是台灣知識份子的抗議精神，鍾

理和代表默默承擔的隱忍精神，林載爵總結台灣文學作品的精神：「台灣作家的作品，是充滿著社會意識的，很少逃避現實」、「大多數的作家都能將自我的價值歸結到社會大眾上，社會的災難就是個人的災難，周圍人民的不幸就是個人的不幸」（註一〇）。企圖重新翻轉日據台灣文學家與作品被扭曲為邊疆、落後、奴性的成見，而標舉出在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人民，兩種精神的同質意義，都仍是抗暴精神的再現，林載爵的談法比較起顏元叔等較具基進性格，也讓楊逵等作家重現台灣文學界。

當主流刊物《中外文學》、《書評書目》、《幼獅文藝》，大力推展日據時期台灣文學之際，相對的非現代主義文學主流論述的《文季》，除了有計畫的推動現實主義的本土文學外，更結合社會與歷史的觀察分析，拉高台灣文學的歷史地位，例如對鍾理和作品做全貌觀的探討，以及重刊楊逵的作品（註一一），最重要為林載爵一九七四年五月的論文〈日據時代台灣文學回顧〉。進入《文季》集團的林載爵不僅從作品解析歷史意義，他反向從歷史意義的脈絡觀察文學作品的社會意義標記，他理解到文學是整體文化的主流支脈，並且連結了台灣與中國的歷史反抗記憶：一九二〇年台灣的抗日「轉而為文化上的反抗運動，此即結合了政治、社會、文學等各方面的台灣新文化運動」，「台灣新文學運動是這一個沛然浩然的文化運動中重要的一環，是受到祖國新文學運動的影響而產生的」，「在本質上帶有濃厚的民族革命文學色彩」，同時「台灣文學運動與台灣民族解放運動是分不開的」

〔註一二〕。七〇年代初的保釣運動掀起的民族主義與社會意識，被林載爵運用到對台灣人民抗日的本質詮釋，將台灣「反帝」精神與中國革命文學以共有的「民族」號召連結起來。

研究鄉土文學論戰的陳正醒認為發掘日據下台灣文學的工作，被《夏潮》對賴和、呂赫若諸人的介紹承襲下來，並發展而為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及之刊行在內的整理、研究〔註一三〕。對照《夏潮》雜誌裡台灣歷史與文學的篇幅及人物集結網絡，陳正醒的論點是可成立的。另外林載爵於一九七六年參與《夏潮》編輯前即發表了三篇關於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文章，更利用其軍旅時期不斷投寄稿件至《夏潮》，林載爵於一九七七年退伍後即參與編輯工作，他依其歷史學出身，有計畫的以歷史的縱剖面觀察台灣文學。

中國現代史的歷史解讀

《夏潮》整理、研究台灣文學與台灣歷史的重塑，兩者是雙向交叉互動的，逐步的聯繫台灣與中國在歷史裡頭的同質性與連帶性。《夏潮》的歷史體系裡對於中國近代史，做了一番整理、解讀與開創的工作，整理中國近代史裡國民黨的歷史文獻，一方面讓《夏潮》的雜誌本身具有與執政者某種相同歷史意見的保護作用，另一方面解讀挑選出來的史料，讓《夏潮》的意識型態亦服膺於正統歷史意識裡的正當性，從中偷渡批判及新詮釋，形成偷渡作用，再者，聯繫了批判台灣七〇年代的

現實情況，為其台灣本土觀做了奠基的工作。

《夏潮》整理出國民黨的先烈思想包括孫中山、朱執信、廖仲愷、秋瑾、陳天華。較突出的是孫中山與廖仲愷。利用解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尋找出孫中山裡頭的社會主義意識。基本上將國民黨塑造的人民歷史裡，強化政治正確的認同三民主義是中國革命的最高指導原則，將革命指導原則的主體抽離出來，解說革命的主體並不在統治者，而是全體人民：「殊不知三民主義為國民革命之主義，多少先烈的鮮血，多少先進的心智，不是為了中國之革命……否定三民主義的革命性就是否定國民革命，也就是否定國父的革命地位和中國國民黨對中國革命的領導地位」〔註一四〕，王曉波將三民主義的歷史位置給予高位的肯定，視為整個國民革命的思想重心。重構孫中山思想的形成並非天縱英明：「雖然國父的三民主義革命思想，是由不斷的研究和實踐中發展出來的，但是，由其出身被封建專制和帝國主義壓迫的身世背景中，可以瞭解到其對被壓迫的中國民衆的同情是堅定而不移的。更由於其對農業的家庭背景認同，使得他在革命的過程中，與佔絕大多數的農民站在一起」〔註一五〕，王曉波引述孫中山的話來證明孫中山出身階級導致其革命思想的構成，「國父說過：『某也，農家子弟，生於畎畝，早知稼穡之艱難。』」（《竭力農業會徵求同志書》），王曉波認為孫中山思想的構成，經過「帝國主義的壓迫」、「滿清封建專制的統治」，最重要的是認識了被「壓迫的中國工人」以及「農民抗暴與洪楊革命」，政治壓迫與經濟壓榨構成了「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覺醒」

〔註一六〕，暗含著階級覺醒的革命意味。

爲了扣連上批判戰後台灣依賴美國經援與日本的技術，造成政治孤立、經濟依賴、社會階級差距懸殊的狀況，陳鼓應發表了〈孫中山先生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批判〉〔註一七〕一文，認爲反帝與反資是中國與台灣的歷史一貫性，孫中山認爲帝國主義「以進化論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現象，爲弱肉強食做辯護」，「他們鼓吹馬爾薩斯〈人口論〉……用這理論託詞中國人民的窮困是因爲人口過多」，「他們倡導亞當斯密氏『自由競爭』經濟學，爲資本主義經濟侵略鋪路」，在過去如此，到七〇年代「一方面以己方的優越心理造成別國人的自卑心理，而有利於他的入侵，另一方面以友誼姿態藉技術援助、技術合作爲名，而役使別國人民的勞力，而吸吮別國地區的資源。」陳鼓應借用孫中山的言論使批判資本主義成爲正當：「綜合中山先生的評論，使我們得到如下幾點認識：一、資本家多由地主階級衍演而來。……二、地主蛻變爲資本家，資本家又炒地皮，他們壟斷生產資料。……三、財富是工人創造的，同時也說明了不是資本家養工人，而是工人養資本家。……四、資本家的每塊美元都充滿著勞動者的血跡的。……五、中山先生痛斥資本家『無良心』，並認爲『工人受資本家之苛遇而思反抗』，是『理所當然的』。」「帝國主義」加上「資本主義」的具體形象，就是外來資本家在中國及台灣境內的所有活動，陳鼓應指出「五十年前中山先生便以痛責中國工人受外來資本家的壓迫，今天此地引進外資利用廉價勞力來設廠，便是中山先生所痛責的一種現象」，孫中山已

被解構爲「反抗有理」的正義象徵。陳鼓應從自由主義者殷海光的弟子蛻變成痛斥資本主義者，此篇正可表明其對「反資本主義」的認識蛻變過程，比較起王曉波，陳鼓應的憤世嫉俗較爲明顯，或許由於蛻變過程的短暫與激烈，其批判性格更爲尖銳，與其後期參選國大有重大關係。

夏潮系統並且刻畫出早期中國國民黨解決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侵略與壓迫的模式，是以階級群衆運動作爲其革命的基礎，王曉波引出孫中山如是說：「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來參加革命，就是我們的革命沒有基礎」（「耕者有其田」，一九二四，八，二十三），甚至舉出了是國民黨裡最具社會主義階級鬥爭色彩的廖仲愷，廖仲愷在一九一四年國民黨進行第一次改組，聯俄容共政策下，以中央常務委員兼任工人部長，特重農工階級與民衆運動〔註一八〕，〈夏潮〉特別揭示廖仲愷傳的結論：「吾人其不欲解決吾人之痛苦，及謀國家人民之豐富則已。否則必須與帝國資本主義者戰。……吾人其不欲國民革命成功則已，否則必先去幹農民運動。」〔註一九〕當國民黨元老級黨員表達出農民革命爲國民革命之最優先與最底層的革命運動，階級運動優先的概念在夏潮系統的想像裡，已經跳脫出政治禁忌的框架，「必先去幹農民運動」也揭示其對弱勢階級的認同。農民階級不克正是中國與台灣階級結構的最底層，而階級作爲反帝、反資的概念早在七十年前爲統治者元老所提出，亦未被國民黨當局所批判，七〇年代中期經由〈夏潮〉再提出的時代意涵，其基進與偷渡作用早在七十年前已被預藏，而刻正爲反叛

與革命歷史的正當認識論來源。

甚至在鄉土文學論戰後期與現代化論戰初時，三民主義既然成了歷史記憶的最高位階，國民黨史料重刊除了具保護作用外，更成了攻擊的武器，例如最常被夏潮系統成員引用的〈中國國民黨為紀念九七國恥宣言〉，《夏潮》就如此導讀這篇史料：「近半年來由『鄉土文學』引發民族主義問題的辯論，一些與漢奸、或美國C.I.A.有關之文人及『雙重國籍』者動輒以『義和團』污蔑愛國者。中華民國是唯一根據國父遺教而立國的獨立國家，故本誌重刊此宣言，此文不但為國父個人之立場，亦唯一切國民黨黨員之立場，並且當是一切國民之立場及本誌之立場。且望辯論雙方之國民黨黨員不得違背此立場，並望能稟持國父遺教繼續奮鬥」（註二〇）。攻擊國民黨正統態度的轉向，整個與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的靠攏，並明指國民黨員之立場搖擺與忘掉該黨元老的重要言論，似乎《夏潮》在身份認同上轉成傳統國民黨的正統態度，將之教訓一番。此攻擊性的身份陡然轉換，正該是七〇年代台灣左翼的特殊現象，屬於反叛陣營的，藉著統治者的史料導讀與詮釋，而指責國民黨將台灣導向國際分工的資本邊陲位置，失去其革命歷史的宣示理想，從而反叛者《夏潮》繼承此革命理想，批判與其對戰的國民黨黨員立場；此為其高明之處，亦為不得不然之處。

台灣反支配的歷史位階

解讀三民主義裡頭具社會主義色彩，並證諸史實建立反帝國主義與反資本主義的傳統，來自於本國的歷史傳統，而非來自於外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從而再現了民族主義與階級意識的歷史意義，同時將台灣及中國包含在反支配的歷史位階裡頭，也就將台灣史拉進挖掘、討論、建立脈絡的時代。王津平就這樣的敘述：

「在合法的範圍內可以談到左翼的社會主義傳統，整理孫中山最進步的言論，包括從五四運動以來的社會運動，以及托派的言論，這樣子談，是因為台灣有它歷史地位的一個特殊性，即便在我們的理解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也有它的特殊性，所以看看《夏潮》的文章就有中國的普遍性與台灣的特殊性等等。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歷史的研究就非常重要。」（《訪問錄》王津平）

台灣歷史的特殊性，在於抗爭意識的高揚，王曉波談到：「我們整理台灣歷史，尤其是日據時代，我們還是以抗爭的焦點切入」（《訪問錄》，頁四二九）。《夏潮》總體的歷史整理，以抗爭事件維繫歷史的延續，但是因為夏潮系統成員內在左翼色彩的不一致性，使其整理的過程中有幾種類型。第一種類型以日據遺老親身經歷來訴說台灣抗爭史，如王詩琅〈台灣抗日運動新探討〉（一卷七期），吳濁流最後作品〈記北埔抗日烈士蔡清琳〉（一卷八期）；王詩琅曾是日據時代的「台灣黑色青年聯盟」成員，他覺得研究日據的抗日運動，不論是初期的武裝鬥爭、或

者後期非武力的文化人士、政治運動中的右派、左派，「其原始反抗意識的萌芽，可以說都是出自對日人統治及民族的反感，然後再挑起民族意識發展起來的。」〔註二一〕最多篇幅的是黃師樵的文章，《夏潮》特別重視黃師樵的文章，黃師樵日據時期即參與農民組合，也因一九二七年中壠農民抗爭事件被日警繫獄一年半，以當事人的見證經歷所寫的台灣抗爭史，這樣的台灣抗爭史更具說服力，黃師樵以運動史的綱要方式寫出了〈台灣的農民運動史〉、〈日據時代台灣工人運動史〉、〈日據時代台灣民衆黨〉及〈台灣工友總聯盟的工會活動〉〔註二二〕，以黃師樵的文章勾勒出現在民族鬥爭裡，民族作爲一種階級在日據時代是抗爭的焦點，「台灣農民運動不但是理論鬥爭、而且含有民族思想、階級意識、政治運動種種的色彩。」〔註二三〕描繪出模糊的總結，日據時期追求的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是當時反日的雙重而同一的軸線。

第二種類型深入探討抗爭人物的特質，此部份與台灣文學的整理相聯繫。《夏潮》曾做了八位日據時代人物的專輯，包括蔣渭水、楊逵、吳濁流、楊華、賴和、張深切、吳新榮、張文環等人，《夏潮》特別注重蔣渭水的生平，其時正好黃煌雄的論文《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完成，並準備出書，算是台灣較有系統的研究蔣渭水事蹟的論文，黃煌雄也主編了一九七六年九月的《夏潮》雜誌，而蔣渭水本身爲醫生，參與台灣文化協會組成及台灣民衆黨的創建，又特別景仰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黃煌雄在導讀他的文章裡指出，蔣渭水是「台灣同胞非武裝抗日運動中

最具影響力、最能刺痛日本當局，並最能喚醒民族與社會良知的人，也是日據時代台灣同胞之中最富有民族主義情操、最堅持民族運動路線，而又最能發揮民族運動影響力的人」〔註二四〕，黃煌雄提出蔣渭水的特質：民族運動、組黨、三民主義，此三種特質呼應《夏潮》重塑中國現代史裡頭台灣與中國的連結特性。《夏潮》不斷圍繞著蔣渭水的特質凸顯民族解放的重要〔註二五〕，甚至解讀蔣渭水之不受當時朝野的重視，主因在台灣抗日的歷史記憶被抹滅，由於世界資本國際分工下，台灣開放了市場給日本，且台灣資本家必須依賴著日本的技術「在這種空氣之下，可以想見，要紀念一位抗日的民族英雄是被認爲不合時宜的，因爲這樣做會刺激日本財閥、以致阻擋了我們財閥的財路。」〔註二六〕「歷史的記憶及現象被凸顯，蔣渭水抗日歷史位置的凋零，引導人民重新體認歷史教訓，從而《夏潮》對台灣歷史人物的再塑，成爲當代社會的反省元素。」

另外被凸顯的是楊逵，楊逵本身堅持階級實踐的理想從日據至戰後一直沒有改變，加上曾參與農民組合，社會主義階級思考成了其小說作品的理論架構，楊逵曾於一九三五年創辦《台灣新文學》月刊，使他成了整理台灣史及文學史的活史料，二次戰後因起草《和平宣言》被國民黨繫獄十二年，一九七六年楊逵當時仍建在，以親身的勞動開闢東海花園，深深的挖地，流汗種花，養活自己。當夏潮集團成員蔣勳遇到楊逵時，他回憶他當時感染到可貴的勞動實踐，「我真的從他身上看到台灣老左派的風範，他其實不談理論，他從來不跟我談理論，他是一種生活實踐的東

西，我第一次見到楊達的時候，幾乎不敢相信那是楊達。因為你知道讀過他的小說，我們對一個作家、知識份子，都會有一種形象，可是你看到他蹲在地上，身上穿的衣服汗衫是破洞的，然後叼了一個新樂園的香煙，我看他根本不像一個知識份子，他完全變成工人、完全變成農人」（《訪問錄》蔣勳），從他身上看到對理念的執著，驚訝的找到階級理想與勞動實踐結合在生活裡的真正典範。

《夏潮》刊載了多篇楊達的文章，包括〈土地公〉、〈首陽園雜記〉、〈泥偶〉等，深入訪問楊達，評論楊達的文學，原本同時稱讚鍾理和與楊達的林載爵，這時也拉高了楊達的抗議精神具有現實的改造力量，而「鍾理和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一貫的採取著隱忍的態度，並未實地的加入改造社會的行列，徒然有改造社會的理想卻缺乏遂行的力量，在殘酷的現實之前自然要感到力不從心了」（註二七），時為台大研究生的林瑞明更親自與楊達住了一年，以筆名林梵寫了一本楊達傳記《楊達畫像》，楊達本身的實踐毅力成了當時的精神偶像，也以楊達的形象開始塑造夏潮系統知識份子的實踐期許，「顯然的，楊達以為改造社會的理想不但必須倚藉知識份子的覺醒，更要將這份覺醒的力量影響民衆、帶動民衆，如果這份知識覺醒的力量，不以現實的社會為依歸，得不到民衆的團結，改造社會的理想只是一種徒託空言的諷刺罷了。」藉著對楊達的刊載介紹，使楊達重現江湖，給予夏潮集團成員相當大的鼓舞，七〇年代左翼的實踐力量，跟隨著楊達的重現，與日據時代的左翼運動精神連結起來，連楊達本身亦在當時興奮的要寫海報張貼「楊達復

活」（《訪問錄》林載爵），去告訴社會，重視台灣文學與歷史，最重要的是重視台灣的本土生命。

依照具有抗爭類型的日據時期人物的介紹，《夏潮》刊載了呂赫若、賴和、吳濁流、楊華、吳新榮、王白淵、張文環、張深切的小說、詩、傳記、評論等等（註二八），人物——作品——歷史三者的結合，抗爭者連繫了歷史主體的動態發展，《夏潮》相當強調歷史主體，尤其是抗爭主體的能動性，陳映真在評論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裡頭，就表達了動態歷史觀點，他認為吳濁流「說『歷史是反復』，恐怕是一種錯覺。歷史是變動的、前進的。歷史不在一個平面上循環，而毋寧是在一個立體上做螺旋一般的運動。但學習歷史，從歷史中吸取有益的經驗和教訓，不但是必要，而且是進而主觀、主動地改造和變革歷史所必要的吧。」（註二九），抗爭者的主動性，加上螺旋動態的歷史觀，《夏潮》翻新了七〇年代的歷史記憶，讓台灣史與台灣文學走入現實的動態裡頭，這個動態就是再閱讀以及再評價。

再閱讀與再評價日據時期台灣文學作品的同時，指向了兩個特徵：一、台灣人的中國民族性。例如梁德民在〈賴和是誰？〉一文介紹並分析賴和的小說，指出賴和「受五四運動影響、深感民族自決的重要性」（註三〇）；鍾肇政論吳濁流作品的精髓：「吳先生的諸多作品，乃是台灣知識份子以自己的意志回歸到中國上、現代史的脈絡上，以形成並推動歷史之際的必讀文獻。」（註三一）吳南星回憶其父

親吳新榮：「台灣光復時，父親歡喜若狂，為歡迎祖國來台接收的軍隊而寫一首歌：『祖國軍來了』」。（註三二），吳林英良在〈懷念文環兄〉一文追憶張文環與吳新榮在一起時「想起他們當時年輕人的文化怎樣熱愛祖國、熱愛文學、熱愛鄉土、志同而道合。」（註三三）；林載爵指出張深切是個「徹底的民族主義者」，「認同了祖國，以為祖國的革命成功必能提攜台灣的革命成功，結合台灣與祖國的共同命運，認清共同敵人，從事絕不妥協的反抗運動」（註三四）台灣人的民族主義是以中國為認同對象的。二、現實主義性格。梁德民認為賴和「並沒有像幾位作家的小說人物那樣類型化，因為賴和是以客觀的觀察者立場來創作」，何思萍探討楊逵小說的精神，認為「楊逵的小說在內容上，有不可否認的真實性，是當時社會的寫照和反映，承擔全體台灣民衆的共同命運」（註三五），前行代作家的作品具備了相當現實的基礎，寫實了當代的社會。

現實主義的特性，是《夏潮》在整理、挑選日據時期文學的特殊性，揭露日據台灣是一個殖民社會的性格，有著開發、被支配與剝削、反抗的雙重對立性格，呈現一個可歌可泣的反抗帝國主義的時代。然而歷史並不是渾然一體成形的，《夏潮》僅僅介紹台灣文學裡具備現實意義的民族反抗精神，將反抗的民族看做一個整體，被壓制在下，將日本視為相對在上位的統治高壓，縱使有陳映真的動態史觀，然而仍然是一個平面的上下民族對立關係，而沒有立體的上下對立關係，從而失去解析文學作品裡頭的階級性格，下層群眾生活，生產關係，日本實行現代化過程下

資本的積累，以及本土資本與日本資本的聯盟，無產階級的無產化過程，人性意義的扭曲等，此為不足之處。

研究台灣史的第三個類型，是以具基進性的分析法，重讀台灣史，此類型要等到後期才被凸顯。第三類型認識到即使以「抗爭」所蘊含的革命與運動意義，缺乏社會的結構分析，缺乏在歷史變動下社會條件及形態轉換，要造成階級抗爭形態的轉變是困難的。《夏潮》初期已碰到日據時期左翼的抗日的文獻，但是都有意的避開左傾的抗日運動，黃師樵撰寫台灣的農民運動只提抗爭事件，並不提左翼所領導的歷史，工人運動史也著重在民族反抗團體的成立過程，且重點在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議會設置請願、民衆黨及工友總聯盟的活動。歷史事實是不斷結盟與不斷分裂的，《夏潮》初期避免對左翼活動的描述，然而這卻讓研究者感到歷史被割裂的痛苦。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林載爵介紹詩人楊華時就透露出，「強制的政治經濟外力排除了歷史意識中對真切實體掌握的可能性，歷史形態如何形成？」（註三六）他感到歷史實體並不是渾然的整體，而是錯綜複雜的，即使在抗爭的過程，仍有意識型態的分裂，他引出台共王萬得等人的〈始政紀念日宣傳書〉（註三七）佐證，左翼使得抗日民族運動路線不斷進行著意識型態的分裂。年輕的林載爵似乎已經瞭解民族運動裡頭左翼的鬥爭路線，每每抗日運動團體分裂後都變成左翼領導的事實，「在歷史的意識裡，不知將台灣擱在什麼樣的地位」，此顯示了夏潮系統成員面對歷史真實性無法被事實地解讀所感到的痛苦。而他隱晦的揭示人民歷史的研究方

向，認為應進入人民的歷史記憶來看待台灣史，「在血流激注之外，人民對這種歷史的感覺，對外在時勢的感觸，就成了探討台灣歷史的一個主題」（註三八）。因此較為進步的提法，開始往社會結構分析努力，重新檢視做為殖民地的台灣，跟中國割離的現實下，台灣社會在世界史的位置，以聯繫到戰後台灣歷史位置依然跟中國分離的事實。

到了《夏潮》中期一九七七年四月，屬名譚英坤試圖透過社會經濟結構分析來嘗試研究台灣史，〈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台灣社會經濟〉一文運用矢內原忠雄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及潘志奇〈台灣社會經濟〉兩本書，從政治經濟發展的脈絡，解說日本資本主義如何一步步的改造台灣的農業經濟本質，台灣的糖業現代化，蔗農成了現代化下的工資農人，例如二林蔗農抗爭事件，隨著經濟上的壓迫過重，才逐漸發展為以民族為召喚的運動事件，以及對台灣島內的階級作初步的分析。此文對台灣社會經濟史做了如下的結論：「台灣社會最為突出的焦點，是殖民社會這個性格。從框架看台灣社會，是中國社會之等質的延長。」（註三九）同時此文也將台灣史定位：「因此台灣的命運，不但是和中國不可分割，和世界其他弱小民族的命運也是息息相關的。至於國內地方分離主義之所以存在，……實由於帝國主義卵翼之使然。」（註四〇）此文發表時間在一九七七年四月，是《夏潮》在台灣史觀點上的轉換，將台灣聯繫到「世界其他弱小民族」的國際位置，共為「反帝國主義」陣營的一環，雖然文字符號用的是孫中山的語言，但台灣歷史位置即使

是作為「與中國不可分割」的一環中，也已跳躍至世界史的角度，而從台灣的社會經濟結構分析，原始粗糙的呈現了日本、台灣及中國的三角問題。

第三世界發展理論與依賴理論在一九七八年大量的引進《夏潮》後（詳見第三章），「殖民社會」的世界性、全球性成了研究台灣史的重要觀點，以及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後，「階級」的概念已經光明正大的被提出來了（此部份下章會討論），以階級眼光分析日據時代的抗日運動也出現。

一九七八年三月林問耕（即林載爵）在〈中國國民革命與台灣民眾運動〉一文，將中國、台灣、世界（用九〇年代語言應該是全球性Global）做了同時「把握」的說明，他分析到中國的國民革命是「以農工群眾為基礎，結合了政治、社會、經濟的力量，民族、民權、民生的理想，反抗帝國主義、軍閥及反革命勢力，並聯和弱小民族共同奮鬥的」，台灣的民眾運動「其群眾基礎由於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直接壓榨與剝削，更顯出農工民衆的重要性」，台灣的歷史位置與中國等同，並包含在世界史裡頭「把「聯合弱小民族共同奮鬥」的路線，放在世界史的範圍看，中國與台灣同樣成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國際性國民革命運動中重要的一支；放在中國史的範圍看中國與台灣一體同心地共同進行著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台灣志士並公開聲援祖國反帝國主義運動，且包括反日帝侵華；放在台灣近代歷史的範圍看，乃是中華民族反抗異民族統治的民眾革命運動。」將台灣與中國拉到相同的地理與政治位置，同置於被壓迫與被殖民的地方，跳脫台灣做為中國邊陲歷史的

官方正統說法，台灣抗日運動與中國國民革命的共同目標：反帝國主義；成了彼此等同的重要歷史標記。

就民族而言，台灣包含於中國，就反帝國主義而言，台灣呼應中國，就革命路線（甚至應該是階級鬥爭）而言，台灣與中國同為世界之一支。這種層次鮮明的動態史觀，到了一九七八年底更形成熟。從一九七八年十月開始，連續四期，《夏潮》開闢了「台灣史料選讀」專欄，署名陳烈（林載爵），分別重新解讀了「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新台灣聯盟」、「社會問題研究會」，且以較進步的政治經濟學，作為解讀基礎。例如，對「文化協會」的分析乃因為台灣受到世界革命情勢高漲才組成的，「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國布爾雪維克革命成功；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意志共和國宣告成立，社會黨及獨立黨組成政府；一九一九年三月朝鮮爆發三一獨立運動；一九二〇年土耳其革命成功，印度推行不合作運動，日本國內勞工運動急速進展」（註四一），並分析文化協會組成份子的階級身份，由地主及知識份子組成，缺乏農民與工人，「然而由於台灣經濟結構的改變，政治情勢的變動，和思想啓蒙的逐漸深入普及，……，政治思想自然也就分歧了，導致一九二七年文化協會的分裂。」對歷史分裂的必然性認識，因為受到結構的變動與世界的影響，擺脫了早期林載爵對歷史割裂的痛苦感受，同時清楚的宣告台灣歷史作為與世界結構性變化是同步的，如同其研究指出分裂後的左翼的文化協會，正是世界階級結構變化的產物，具同步性的世界歷史位置。

同樣的分析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因為受到一九一八年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於是知識份子反同化政策，「以保持台灣之自主性與特殊性」。對於「新台灣聯盟」及「社會問題研究會」的解讀，此乃因應著台灣資本主義的深化所造成的經濟結構變動下，「日本人與台灣民衆的民族對立，政治的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對立，資本家與農民勞動者的對立，三者相一致結合，而促使了政治的直接對抗擴大為經濟問題的反省，社會制度的考察」，我們瞭解蔣渭水因具有某種程度的左傾，離開了右翼主導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他感染到共產主義理論的力量，揪結共產主義份子謝文達與連溫卿，將台灣民衆黨改組成台灣第一個左翼意識較鮮明的政黨，這種解讀意味著《夏潮》在進入政治運動的同時，依附著台灣歷史記憶裡的左翼政黨，表彰出左翼在政治運動裡的歷史正當性，有突現左翼陣營在台灣反叛歷史裡的領導位階的意味。

到了《夏潮》的最後一期，陳烈導讀《台灣民報》上的兩篇文章，一篇屬名為「炳」的〈社會改造和我們的使命〉，還有一篇為冰瑤的〈智識飢荒和救濟辦法〉，他從這兩篇文章分析當時的知識份子，已經瞭解「從事反抗運動可以完成社會改造的工作」，而且知識份子「對知識的吸取，也都帶上了反抗的性質」（註四二）。這一篇文章發表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國大代表與立委選舉後，此次選舉，夏潮系統有陳鼓應與王拓參與競選，後因美國與中共建交，蔣經國停止了這次的選舉活動，陳烈這篇史料的導讀，說明民族與階級雖是兩個層次的，但是反抗運動與社

會改造是可以並行，他不寫「抗日運動」而寫「反抗運動」，暗含著知識份子投入反抗運動，就是一種社會改造，似乎說明著《夏潮》參與政治運動與台灣歷史有著傳承上的連帶關係。總結《夏潮》的本土觀點，是逐漸在成熟中的動態史觀，它重視知識份子的主觀能动性在歷史的位置，以及社會改造力量的來源。而台灣與中國的「重疊把握」方面，將台灣的抗日運動與中國國民革命的歷史位階等同起來，它顯現了台灣與中國民族有一共同的世界性問題，民族所要面對與解決的問題是相一致的，即反帝國主義；台灣屬於世界史的一支脈，與同被資本主義壓迫的亞、拉、非洲的階級反抗是同步的，因此台灣歷史具有殖民社會的特殊性格，被資本帝國殖民的統治的特殊社會結構，由於直接被納入國際資本的生產關係當中，而凸顯了特殊的階級與民族的解放運動。因此《夏潮》整理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具函反支配的企圖，企圖敲挖被國民黨嵌入的正統歷史文化霸權，拆解文化霸權最底層的歷史堡壘的態勢。

〔註一〕松永正義〈「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收於若林正文、松永正義著，廖兆陽譯《中日會診台灣——轉型期的政治》，台北，故鄉出版社，一九八八，頁一五二—一五五。

〔註二〕詹·約翰著，黃丘隆譯《葛蘭西，「西方馬克斯主義」的鼻祖》，台北，結構群，

一九八九，頁八八。

〔註三〕訪蘇慶黎〈站在我們的土地上說話〉，時間：一九七八，九，二十九。收於宋國誠、黃宗文合著《新生代的吶喊》，台北，自印，一九七八，十二，頁一四七。

〔註四〕王詩琅發表〈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於《台灣文藝》一卷三期，一九六四，九。根據林瑞明所編《台灣文學史年表》，收於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一九九一。

〔註五〕松永正義著，葉笛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的新階段》，《新地文學》一卷一期，台北，一九九〇，四，頁三五。

〔註六〕張良澤於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分別發表了〈從鍾理和的遺書說起〉，《中外文學》二卷六期（一九七三，十一），〈鍾理和的文學觀〉，《文季》二期（一九七三，十一），〈鍾理和作品論〉，《中華日報》副刊連載四天（一九七三，十二，十三—十六），〈鍾理和作品概述〉（上、中、下），《書評書目》（一九七四年一月至三月）。

〔註七〕林載爵〈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中外文學》二卷七期，一九七三，十二。

〔註八〕〈鍾理和的遺書〉，《中外文學》二卷六期，一九七三，十一；楊遠〈鵝媽媽出嫁〉，《中外文學》二卷八期，一九七四，一。

〔註九〕同〔註七〕，頁二〇。

〔註一〇〕同〔註七〕，頁七。

- 〔註一一〕《文季》二期（一九七三，十一）有：張良澤〈鍾理和的文學觀〉；史君美〈來喜愛鍾理和〉；劉若君〈鍾理和短篇小說讀後〉；重刊鍾理和小說〈貧賤夫妻〉；楊遠〈模範村〉。
- 〔註一二〕林載爵〈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回顧〉，《文季》三期，一九七四，五，頁一三四。
- 〔註一三〕陳正醒著，路人譯，〈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暖流》二卷二期，台北，一九八二，八，頁三一。另參考郭紀舟〈一九七〇年代台灣左翼啓蒙運動〉，頁八六。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整理集中於前兩卷內，此乃因為前兩卷有研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李南衡參與編輯，李南衡於七〇年代初期開始收集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作品，李南衡將尚健在的楊遠、張文環、吳濁流、黃師樵等人引介給《夏潮》編輯群認識。
- 〔註一四〕王曉波〈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國父思想論〉，《夏潮》二卷二期，一九七七，二，頁六。
- 〔註一五〕王曉波〈國父和革命時代的中國——國父思想論〉，《夏潮》二卷三期，頁七。
- 〔註一六〕引號裡文字爲〈國父和革命時代的中國——國父思想論〉一文裡的小標題。
- 〔註一七〕仰盛義（即陳鼓應）〈孫中山先生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批判〉，《夏潮》二卷三期，頁一六。
- 〔註一八〕〈廖仲愷傳〉《中國國民黨黨史料編撰委員會》，摘自《夏潮》二卷五期，頁五。
- 〔註一九〕同〔註一八〕，頁八。
- 〔註二〇〕此段文字爲《夏潮》雜誌編輯者在〈中國國民黨爲紀念九七國恥宣言〉之前言，〈夏潮〉五卷一期，頁五四。
- 〔註二一〕王詩琅〈台灣抗日運動新探討〉，《夏潮》一卷七期，頁一〇。
- 〔註二二〕黃師樵〈台灣的農民運動史〉分四篇發表於《夏潮》一卷九期、二卷一、二、三期，一九七六，十二至一九七七，三，〈日據時代台灣工人運動史〉分爲二篇，二卷五、六期，一九七七，五、六，〈日據時代台灣民眾黨〉於三卷五期，一九七七，十一，〈台灣工友總聯盟的工會活動〉兩篇於三卷六期與四卷一期，一九七七，六、七。
- 〔註二三〕黃師樵〈台灣的農民運動史〉，《夏潮》一卷九期，頁一二。
- 〔註二四〕黃煌雄〈蔣渭水先烈的特質〉，《夏潮》一卷六期，頁二。
- 〔註二五〕《夏潮》討論蔣渭水的文章有黃煌雄〈蔣渭水先烈的特質〉（一卷六期），〈蔣渭水先生大事略記〉，蔣渭水著、彭峰先譯〈臨床講義〉，楚風〈被冷落的民族英雄——讀黃煌雄著〈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有感〉（一卷九期），袁宏昇〈從蔣渭水談起〉（二卷四期），共五篇文章。論點集中在黃煌雄所提的與國父同爲民族革命的英雄上，承一位師長提起當時王曉波及陳映真等人即對黃煌雄的論點頗不以爲然，但在《夏潮》幾篇的文章裡並未顯現，黃煌雄與《夏潮》

的關係一九七八年後較不密切，一九八〇年後更是已分立不同的立場陣營。

〔註二六〕楚風〈被冷落的民族英雄——讀黃煌雄著《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有感〉，《夏潮》一卷九期，頁八。

〔註二七〕何思萍〈除非種子死了——探討楊遠小說的精神〉，《夏潮》一卷七期，一九七六，十，頁六三。

〔註二八〕《夏潮》分別刊載了張文環〈媽祖的婚事〉（一卷四期），張文環著、蕭碧盈譯〈論語與雞〉（一卷四期），呂赫若著、謝敏譯〈牛車〉（一卷五期），賴和〈以筆名懶雲發表〉（不如意的過年〉、〈前進〉、〈筆名安都生〉（南國哀歌〉（一卷六期）、〈一桿秤仔〉（二卷三期）、〈善訟人的故事〉（二卷五期）、〈赴會〉（五卷五期），楊華〈黑潮集〉（一卷八期），吳濁流〈先生媽〉（一卷九期），吳新榮〈吳新榮作品選〉（二卷四期），王白淵〈佇立在揚子江邊〉（三卷四期），葉榮鐘先生作品選集（六卷一期），張深切〈里程碑〉（張深切與煜兒書）（三卷三期）。

〔註二九〕艾鄧〈陳映真〉〈孤兒的歷史和歷史的孤兒——讀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夏潮》二卷一期，頁五四。

〔註三〇〕梁德民〈賴和是誰？〉，《夏潮》一卷六期，頁五六。

〔註三一〕鍾肇政〈以殖民地文學眼光看吳濁流文學〉，《夏潮》一卷九期，頁六三。此段文字為鍾肇政引戴國輝給日文版「亞細亞的孤兒」裡的解說，鍾肇政認為此段簡

扼的表達吳濁流文學的精髓。

〔註三二〕吳南星〈父親的生平軼事〉，《夏潮》二卷四期，頁六一。

〔註三三〕吳林英良〈懷念文環兄〉，《夏潮》四卷四期，頁七一。

〔註三四〕林載爵〈黑色的太陽——張深切的里程〉，《夏潮》三卷三期，頁六八。

〔註三五〕同〔註二七〕，頁六二。

〔註三六〕林載爵〈黑潮下的悲歌——詩人楊華〉，《夏潮》一卷八期，頁六四。

〔註三七〕同〔註三四〕。林載爵在文中並沒有說明始政紀念宣傳書出於何處，出於何人手筆，但由林載爵的引用，說明夏潮系統已經接觸到日據台共的文獻。

〔註三八〕同〔註三四〕。

〔註三九〕譚英坤〈一九四五以前的台灣社會經濟〉，《夏潮》二卷四期，頁一四。

〔註四〇〕同〔註三九〕。

〔註四一〕陳烈〈台灣史料選註——台灣文化協會的精神〉，《夏潮》五卷四期，頁六二。

〔註四二〕陳烈〈台灣史料選讀——社會的改造與知識的吸收〉，《夏潮》六卷一期，頁四〇。

第二節·現實主義文學的提倡

如果說整理日據時代台灣文學是爲了重新解讀歷史變革動力的話，掌握七〇年代文學的發展脈絡，就成了解析二次戰後的台灣社會發展脈絡。七〇年代台灣被整編到世界資本主義分工體系裡頭，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現代經濟思考的現代化論述，廣泛的在學術、文化及文學界蔓延開來，現代化成爲判準各類學術、文化思想的統一進步指標，成爲絕對性的霸權標的，相同的在文學範疇的現代主義，就與現代化成爲進步潮流的相同指標。前文已經提及現代主義文學由於著重於形式、技巧，刻意忽略掉歷史的傳統意義，連帶的扼殺了五四運動以來多元樣貌的文化歷史，以及台灣本土的歷史傳統。

歸避歷史傳統脈絡意義的現代主義，以西方的文化潮流爲主要模仿對象，對於西方的物質及文化生產過程，失去了批評、篩選的能力，與接受跨國公司的資本、產品輸入一樣無力批駁及拒絕，甚至是自我扭曲熱烈擁抱的姿態，不斷追逐各式各樣的現代化生產體制，生活現代化、消費現代化、軍事現代化，文學也就跟著現代化。因此橫的移植、象徵、超現實、意識流等等，本質論述內容斷裂無章，而轉接到台灣六、七〇年代的無歷史中心的文學思考範疇，現代主義亦就流於高級商標品牌產品的消費時髦當中。因此接受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家在意識型態上與西方的知識

份子有著共同的會合點：疏離感（註四三）。當關傑明及唐文標開始大力批判現代詩的時候，即明示挑戰現代主義的文學論述，向失去歷史與現實關懷的自我疏離感的主流霸權地位挑戰。

七〇年代初期的現代詩論戰雖並不像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成爲一場大型的政治意識鬥爭，也沒有特定的結論，但揭示了不同性質的文學思考體系，提示文學的現實性與社會性的思考。現代詩論戰炒熱了這樣的議題，不僅震盪了文學界，民間社會也注視著這場論戰的發展（註四四）。因此掌握現代詩論戰的後續發展，就間接掌握文學向社會發言的戰鬥論述位置，也挑戰解釋社會發展脈絡的官方及現代化論述，隨著文學的現實性與社會性討論擴大與蔓延，《夏潮》開始掌握了具備現實意義的文學發展脈絡。本文要討論在現實主義挑戰現代主義霸權主流下，《夏潮》怎麼型塑現實主義的文學。

現實主義是什麼？

十九世紀三〇、四〇年代，俄國民粹主義份子在沙皇政治極度保守形式下，俄國知青展開下鄉的勞動工作。出現革命的民主主義的文藝作家，別林斯基（Belinsky）、車爾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和杜波羅留波夫（Dobrolybov）等人，這些人把文學看成對社會的批評和分析，把藝術家看成社會的啓蒙者；文學應當成爲推動社會發展的工具，藝術反映社會現實（註四五），而這些藝術的道德啓

蒙工作，指涉了「反映」的意識型態立場。馬克思其實對於文藝並沒有有一套的批評理論，但是要求作者的「客觀的黨性」，只要揭示出在某個環境中現實的和發展的力量客觀的再起作用，就具備了社會主義的批判力量。但是這樣的文學意義卻被普列漢諾夫予以定型化，他認為文學的語言可以譯成社會學的語言，文學裡的現實有其外間的現實對應。作家把社會中的事實譯成文學中的故事，而批評家的任務就是把文學故事譯回現實（註四六）。雖然普列漢諾夫機械的視「典型」及「反映」社會為現實主義的公式，然而其仍反對將文藝作為政治服務的工具。

但是二九二〇年代的「全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簡稱拉普〔RAPP〕）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規定文學應當進行一定的政治教育，這種規定的前提是認為文學確實是用一種直接的方法「反映」（reflect）或「再現」（reproduce）社會現實（註四七）。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規定了必須「反映」社會的公式，成爲一種黨的文藝機械公式，製造了文學的檢查制度，一九三四年史達林掌權，藉由蘇聯作家大會由日丹諾夫（Zhdanov）頒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原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爲蘇聯文學和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要求藝術家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歷史地和具體地描寫現實，同時藝術地具體的描寫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和教育改造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註四八）但是這樣的原則：文藝必須配合著官方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進入了官僚的政治檢查制度，在史達林統治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就被認爲是一種黨的政治檢查制度，資本主義下的國

家機器因此一概宣稱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一種歌頌恐怖統治扼殺文藝自由的文學思考，從而否定現實主義批判的可能性。

到了盧卡奇（G. Lukacs）手裡則從馬克斯主義「文學要反映社會現實」衍伸出另一套，指向黑格爾的人道式歷史主義的批判理論：整體性（totality）與典型（type），從社會面來看，「整體性」指的是社會關係，尤其是階級關係，因爲那是社會的「本質」。盧卡奇並沒有批判史達林的恐怖統治，但是他提出「批判的現實主義」（critical realism），對於歷史、現實的全面掌握以及描寫，是整個文學應該要表現反映的地方。批判的現實主義從個人面向來說，「整體性」指的個人是「社會的人」，是社會諸關係必然在其身上起作用，因而影響了他的理智與感情的人。典型指的是作品裡說話的人物，能夠在文學作品裡，最淋漓盡致地呈現出其基本的社會關係，尤其是階級關係的人（註四九）。盧卡奇特別推崇莎士比亞、巴爾札克、托爾斯泰以及十九世紀初的法國小說，認爲這些時代的小說才是真實反映歷史變動過程中，整體的動態社會真相。因此盧卡奇藉著典型的小說訴說意識是活動力量的思想，他最終仍在維護藝術的意識是創造性的介入世界，而不僅僅是對世界的反映。

盧卡奇由於擁護史達林的政策，遂使盧卡奇成爲共黨理論中的正統派，過於唯心的認定十九世紀小說的典型可以且必須套用在各個時代的藝術批評，遭到了布萊希特（B. Brecht）的批判，布萊希特譴責盧卡奇盲目崇拜十九世紀現實主義小

說，教條主義地要求一切其它藝術按此範例辦理，早期的階級鬥爭形式的典型，如何能簡單地拿來後期的歷史階段用呢？布萊希特認為盧卡奇是學究式的，是不顧文學變化中的歷史條件的。布萊希特反對官僚干預文藝自由，因此布萊希特提出十項左翼功利現實主義：現實主義藝術是戰鬥的藝術，對抗有損人類真正利益的力量及觀念，提倡正確觀念及支援生產性的力量；強調感性、親切及廣義的典型；歷史上重要的等等（註五〇）。布萊希特認為現實主義不是一種藝術的風格或體裁，不僅僅是形式問題，而是：它發掘社會的規律與發展，站在最能解決社會問題的階級的立場，揭露盛行的思想意識。這樣的作品不一定逼真，不一定在狹隘意義上再現事物的表象（註五一）。

因此布萊希特重新掌握表現主義，他認為表現主義是反抗法西斯極權下的，具有前衛、先鋒、活潑能量的形式，他認為不應懷念「過去的好日子」，要立足於「現在的壞日子」進行藝術的生產創造。布萊希特進行了戲劇的實驗，他將其劇場稱為史詩劇場（epic theater），徹底顛覆資本主義戲劇完整故事敘述方式的劇場模式，他認為觀眾不應該靜靜的坐在台下，無能力的接受戲劇角色的浸透，而默默完成一場消費的意識型態戲劇。他認為藝術應該揭露資本主義的本質及表象，觀眾應該是主動的批判者，觀眾與角色扮演者共同進入作品，不加迴避，共同批判作品建構的現實生活裡的荒謬與矛盾。布萊希特認為作品本身不應當勻稱和完整，而應當像其他社會產品一樣，在使用過程中達到完整（註五二）。布萊希特實踐了馬克思

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導言〉說法：一件產品只有經過消費才能充分地成為產品；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

另外班傑明（W. Benjamin）的論文《作為生產者的作家》（一九三四），對於文學作品也提出問題：文學作品在當時的生產關係中間處於什麼地位？他重視藝術生產過程中的形式、技術、組織的運作者與生產的關係，電影、照相、電台、錄音等科技，造成能將藝術作品不斷複製的情況，藝術的生產過程，在大量的複製情況下，震驚了觀眾；尤其是電影，將事物及經驗運用擬真的影像技巧，重新凝聚與解散在觀眾眼前，造成巨大的震撼效果。因此他認為一個進步的藝術工作者，應該掌握藝術生產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班傑明所注意到的是，藝術複製所產生的大眾化，及各種顛覆的可能性。

以上的左翼文藝理論的歷史辯論，並不是要說明夏潮系統的現實主義是在左翼文藝批判理論系絡裡的哪一個位置，恰恰好要說明的是夏潮系統對於左翼現實主義文藝辯論的過程是無力批判的，反而是接收作為意識生產的武器，成為批判台灣現代主義的一項利器，但是夏潮系統的現實主義亦非囫圇吞棗的移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夏潮系統並不是規定文學應當要有現實政治性，卻是在要求進行「介入」生活與「反映」從不被挑起的矛盾過程，刻意的銜接上民族的中國文藝傳統，以及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的抗議精神。

基本上夏潮系統認為意識與階級結合起來的文學就是立場的說明，如果將立場

的說明結合在歷史的認識與批判的描述，以直接經驗作為文學作品的活動，就成為重新建構在台灣本土的「批判的現實主義」。當夏潮系統的作家個人感知到資本主義的異化日益加劇，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分裂，將分裂的、辯證的經驗，以文學形式反映在複雜的社會整體本身，就可以看到七〇年代中期由於黃春明、楊青矗、王禎和、王拓等人的本土小說相繼集結成書，是順應著現代詩論戰之後的發展，刻畫跨國資本的侵入、人民的現實生活、注重低收入者等，極具批判性的文學作品立刻被整編到夏潮系統文學論述脈絡。夏潮系統成員往往從作品的評論與分析中，暴露經過五〇、六〇年代的全球冷戰結構，台灣社會所發生的結構的變化，企圖連結同步驟的台灣文學變化的腳步，所以面對台灣本土的文學作品，勢必要解讀、提倡、掌握以及鼓勵，作為爭逐文化霸權的擴大戰線。

夏潮系統現實主義的理論構造

掀起現代詩論戰的唐文標與一九七五年出獄的陳映真瞭解到新詩論戰，在文學思想發展脈絡的重要性，「新詩論戰就是重新認識文學，文學為誰服務？只有左派文學才有文學寫誰？為誰？怎麼寫的問題。」（《訪問錄》，頁四七一）現代詩論戰時唐文標就發表了〈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人〉，尉天驄也發表〈站在什麼立場說什麼話〉（註五三），從文章篇名就透現出對「什麼立場」要求的討論。一九七五年陳映真出獄立即以筆名許南村發表了〈試論陳映真〉，陳映真將自己定位在

「市鎮小知識份子」的社會位置，區分了上、下不同的社會位階，「當景氣好時，出路很多的時候，小知識份子容易向上爬升，從社會上層得到不薄的利益。但當社會的景氣阻絕，出路很少的時候，他們不得不向著社會的下層淪落。」（註五四）而此篇將階級的觀點帶入了文學作品的討論，也剖析出本土文學作品的轉變是因「立場」的轉變。對於省籍問題他也提出了交代，「陳映真在處理大陸人和本省人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將他們置於一個從來不認識大陸人、本省人的社會規律下，以社會人而不是畛域人的意義開展著繁複底生之戲劇的。」（註五五），就聯盟策略來看，某種程度他刻意撇開省籍問題而談階級立場的文學，另一方面，或許是擴大統一戰線連結尚未發芽的分離意識的作家。陳映真主要的目的在於陳訴，意識與歷史的變動關係：市鎮小知識份子會隨著主觀與客觀的異動，立場也跟著異動。

作家到底要創作怎麼樣的文學才是符合於陳映真所要求的「立場」？陳映真在〈試論陳映真〉裡很模糊的回答：「市鎮小知識份子的救贖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實踐行程中，艱苦地作自我的革新，同他們無限依戀的舊世界做毅然的訣別，從而投入一個更新的時代。」文學創作者要怎樣才是「介入的實踐」？由於陳映真因執著自己的理念而繫獄七年，出獄後立即投下這篇重量級的文章，自然引起文學界作家們的重視；其實到一九七七年七月尉天驄仍在問陳映真，怎麼樣才是「介入的實踐」（註五六）？圍繞著這個問題的追尋，夏潮系統開始從歷史的及當代的文學作

品解讀，也開始鼓勵批判性的台灣文學創作，提出「現實主義文學」以開發出七〇年代的文學氣象。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尉天聰為陳映真《知識人的偏執》一書做序，發表了〈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文學〉，文章的篇名再度是立場強硬的態度，一九七七年二月在《仙人掌》雜誌發表〈什麼人唱什麼歌〉（註五七），兩篇文章所檢討的是文學藝術的價值觀，強調隨著不同的階級，表達對社會現象或者文學的理解有不同的價值系統，雖然他不提「階級」兩個字，卻處處透顯這樣的意涵。例如他批評張愛玲在《傳奇版》再版〈自序〉裡談到她喜愛看繃繃戲，而羞於找人陪同她去看戲，尉天聰批評，「很明顯的，這種『破爛、低級趣味的東西』所以能使『不好意思向人開口』的大小姐『如此感到興趣』，主要的便由於那些窮苦人的『慘傷』可以做為他們『感冒』的發汗劑。」（註五八）將張愛玲的愛好抨擊為貴族的習氣，將窮苦人的慘傷視為人道式的正義，對於文學裡頭的階級價值觀的掌握，逐漸的變為清晰的對立關係，連帶的提示立場與階級的價值觀。

一九七七年四月王拓在《仙人掌》雜誌發表〈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王拓首先以批判的角度分析七〇年代的政治經濟狀況，接著藉尉天聰所著的《路不是一個人走得出來的》一書分析六〇年代現代主義文學所陷入的墮落、頹敗、倒錯、麻木、荒謬、病態的文學觀。他接著辯解「鄉土文學」的定義太狹隘且易引來誤解，他覺得描寫社會內部，具有批判意味的寫實作品，「這樣的文

學不只反映、刻畫農人與工人，他也描寫刻畫民族企業家、小商人、自由職業者、公務員、教員以及所有在工商社會為生活而掙扎的各式各樣的人。也就是說生自這個社會的任何一種人、任何一種事物、任何一種現象都是這種文學所要反應和描寫、都是這種文學作者所要瞭解和關心的。」（註五九）王拓稱此為現實主義文學。接著在五月十日的《中國論壇》上，王拓更鮮明的解說現實主義文學的條件與方向，一、正確地反映社會內部的矛盾；二、文學運動必須能發展為一種社會運動（註六〇）。至此我們已經看到對於傳統藝術價值系統的質疑，文學「應該」或者「必要」用來「反映社會內部矛盾」，文學介入生活，文學作為社會運動的利器等，逐漸的拼湊出文學的功能作用。

一九七七年七月陳映真在《仙人掌》雜誌上發表〈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嘗試用政治經濟學分析戰後台灣的文學思想史，想要藉著這篇文章導引出「如何說明」戰後台灣的社會結構（註六一）。基本上他展開一種挑戰的觀點，挑戰「大有為政府」的政治經濟領導形象，他展示台灣會有高度的經濟發達，不是國民黨的傑出領導，而是「開始是美國，後來是日本的資本和技術的一種絕對性的影響下成長出來的」，這種情況下台灣社會產生了「對西方的附庸化」，文學上就是現代主義「橫的移植」的蔓延。然後陳映真揭示七〇年代在政治上展開保釣運動、社會調查、社會服務，而在青年中有了「社會意識」、「社會良心」和「社會關懷」。「在這樣的變化下，文學在創作上以現實主義為本質的所謂『鄉土文學』的文學思

潮，展開對西方附庸的現代主義的批判，提出文學的民族歸屬和民族風格，文學的社會功能；在文學史上，前行代台灣省民族抵抗文學的再認識和再評價，使日治時代民族抵抗文學中反帝、反封建的意義得到新一代青年的認識」（註六二），這樣的論述直接向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官方歷史解釋挑戰，也向保守自由主義的現代化學者的自由競爭論挑戰，也標示了所謂「介入的實踐」該如同黃春明、王禎和、王拓、楊青矗等人的小說，以本身階級為立場的小說，具有「反映」社會的功能。陳映真這篇文章所具備的典型，如同王拓的文章一樣，先分析台灣的社會經濟的依賴狀況，進而批判冷戰結構的歷史詮釋，再而肯定七〇年代的文學轉向，以此為論述基礎批判各種各派的文學作品。

把這個看法提高到哲學位置的是蔣勳，蔣勳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的《綜合月刊》上藉著泰納的《藝術哲學》說明，藝術作品必須下降到創作者本身的階級從屬，以及歷史位置，才能瞭解作品的價值意義。泰納認為「藝術品並不是孤立的」，「研究它時都要經過三次還原的步驟：第一步，必須把這件孤立的藝術品還原到創作他的藝術家一群的作品中去，觀察其間必然的相關性。第二步，必須把這一個藝術家所有的作品還原到同一時期、同一地區一群藝術家的作品中去，觀察其間必然的相關性。第三步，必須把這一群藝術家還原到圍繞著他們，而趣味也與他們相同的「社會」這個廣大的總體中去，觀察其間必然的相關性。」結論是「藝術是由精神和周圍的一般狀態的全體所決定」（註六三），蔣勳認為用這樣的哲學高

度觀看七〇年代起來的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才能找到這些作品與論戰的源頭，作品的環境位置塑造了「立場」與「價值觀」，在特定的歷史背景與社會實況下，才能形塑了一個「文化花季」的開始，蔣勳呼籲一個夢想的建立，找個能夠「全體決定」的階級藝術實踐方向，所以「要建立一個時間與空間都更確定與現實的中國」。

有一點要注意的，以上的幾篇具有建構粗糙理論意義的文章，都是鄉土文學論戰的導火線，也均不是刊登在《夏潮》，而散布在各雜誌中，或許夏潮系統不是一個組織性集團，並不是具有「黨性」的工作分配，不過確是自覺的分散在各個刊物中，以天女散花的形式隱沒在各雜誌裡，有葛蘭西的陣地戰作用，爭奪各個刊物裡面的文學理論發言地位，展現現實主義文學烽火遍地的興起狀態。

在六〇年代末轉變的黃春明與王禎和，七〇年代初期出現的施叔青、王拓、楊青矗與曾心儀的小說，以及寫詩的吳晟、施善繼、高準、詹澈等，這些偏向夏潮系統的作家未必清楚左翼文藝理論的原則，然而認知到意識型態的不同，與現代主義主流霸權是懸殊相對的，作品裡頭透露出問題意識與革新意識，對於語言文字的掌握開始往平民化方向努力，可讀性紛紛提高，掌握這一些作家、作品生產關係的解釋權，使夏潮系統邁向批判的現實主義文學。

現實主義的文學評論

黃春明的小說在六〇年代就已成名，但他轉變是在《文季》上的小說，《莎啞娜啦·再見》，以及稍後的作品《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等，明顯的具有社會批判的意見摻雜在裡面，黃春明自陳「自從我看清自己的過去，認清了自己與整個社會的關係，我的心靈才有一點成長，也開始多做思想，無形中作品也慢慢的有了轉變」（註六四），這種轉變就是小說人物開始跟社會脈動有了關係，例如《蘋果的滋味》主角江阿發被美國大使的轎車撞傷住進了洋人開設的醫院，展開了無知、勞苦的台灣下層人物與美國資本主義消費物質的價值體系發生了撞擊，黃春明「把中國人的通性——愚昧、無知、麻木、沈默，不知反抗，自己又沒有主張，任憑別人擺佈——強調出來。」（註六五）也就是運用小人物的遭遇苦處，以反諷的筆調凸顯了小人物的社會位置。

《夏潮》藉著評論《蘋果的滋味》推崇黃春明的小說意義，認為是「以『吾土吾民的同胞愛和強烈的民族意識』為寫作原則，更益顯出黃春明不妥協、不落俗的獨特風格」（註六六），「黃春明不僅諷刺了有關當局沒有從自立更生、莊敬自強的原則去改善人民的生活的問題，也諷刺外國政府無道義的經濟侵略。」（註六七）黃春明所關心的是台灣接受美國、日本資本輸出下的經濟生活形態，從跨國公司資本侵入的角度，審視這種經濟結構的撞擊看小說裡的人物關係，形成一種粗糙

的階級的矛盾關係。

在《夏潮》裡被訴說最多的是楊青矗的小說，由於楊青矗寫的是工人小說，並且暴露出勞資的矛盾關係，這種階級關係的訴說更加尖銳。楊青矗本身即曾做過各種各樣的行業，棉業、布類、服裝、沙發、裝潢、出版、印刷、開西服店，也曾在工廠幹過十幾年的事務管理（註六八），並且在急於「介入的實踐」過程裡，參與了高雄市立法委員的選舉。在李昂的一篇訪問裡，楊青矗自陳他的小說，取自於生活、工作的經驗，他的小說人物以中下階層為主，乃因他認為「這些人的人生觀、宇宙觀、宗教觀與處世待人的行為是出自他們生活的真實體驗的結果，比如知識份子得自書本來得真實，來得有價值。」並且他將寫作視為一種職責，要往下挖掘，「作家應該把他所拿的筆加入知性，關心他所處的時代，肩負人類的苦痛，為人類代言；反映人生，反映社會現狀，淨化人類的精神，使人生活的更好。」（註六九）楊青矗最有名的作品《工廠人》，裡頭將工廠裡的等級制度，刻畫著階級對於工人的意義。「工等」代表著一個勞動者勞動品質的評定；代表一個工人勞動之結果被承認的品級；代表著一個勞動者的勞動力的價格；代表著一個勞動者在勞動社會中的名譽，當然，更直接的代表他要過的物質生活的寬窄（註七〇），陳映真藉著楊青矗的小說，評論勞動階級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來自資本社會的制度，這種制度細緻的分化了人類勞動力的價格。對於訴說這種社會矛盾的現象，陳映真認為楊青矗的小說具有社會道德，「對於公平、公正的信仰，便是對於道德的信仰。」

不平之鳴，也就是道德之鳴；從而為公平、公正做的有組織、有原則的爭議，也是一種道德的爭議。」（註七一）

楊青矗本身寫工人小說，由於經過調查訪問，透過觀察、記錄、加上親身體驗（註七二），一步步訴說工廠的工人感受，這樣的小說凸顯了作者本身的實踐活動，王拓認為這種作品的特色是「他如實地把台灣勞工的生活情況與他們心中的願望記錄並表達給讀者，幫助我們瞭解今天台灣勞工在工商社會的僱傭制度下所面臨的問題」（註七三），然而現代主義派文學界對楊青矗的非難也更多，一是文字粗糙，二是只站在工人立場，不站在資方立場，三是有為共產主義宣傳之嫌。對於現實主義文學文字上的技巧，黃春明、楊青矗咸認那是不同意識型態價值觀的問題，因為文學作品的對象是人民，並且是下階層的人民，藝術的價值觀必須取決於內容與對象之間的反映（註七四）。王拓也替楊青矗辯解「當我們把勞資雙方的立場與問題表達完了之後呢？」「我認為這種把雙方的問題說出來之後，而在判斷時採取沈默的、不肯明示立場的態度與行為，其實正是在替不合理的現狀作最大的辯護」（註七五），因此作家的職責在於提出問題、暴露矛盾，並且要有「立場」的描述問題。從而可以瞭解到夏潮系統的作家，是有意識的感知到社會政治與社會道德的價值重建，並採取一種可以行動的立場價值。

王拓本身亦為夏潮系統的核心成員，他的小說所彰顯的批判力道更強，陳映真認為王拓的小說充滿對於貧困中的人的解析，給予一種索莫而強烈的現實主義底迫力（註七六）。王拓的小說也比較可以看到資本主義在往傳統社會底層入侵的過程與痕跡，「從不用肥皂到用肥皂，從用普通肥皂到用香皂；從婦女的棉內褲到尼龍三角褲；從對新產品的抗拒到驚訝和接受，我們看見一種新的社會——商品的社會；新的文化——商品的文化在擴張，浸透到台灣社會生活中最末梢的地區。」（註七七）陳映真解讀王拓小說的用意——「台灣商品社會化的穿透過程；商品社會在成爲一種習以爲常的過程中，其實犧牲了許多貧困、窮人的日常生活的慣常權力，間接的規定洗澡一定要用香皂，衣服要人工質料，身上穿戴著洋貨代表著身份地位等等，其餘的生活方式只要跟不上商品社會的消費守則，就是落伍了。」

王拓的〈炸〉與〈金水壩〉兩篇小說便從他最熟悉的生活環境出發，加上本身童年時期的貧困生活，體認貧困的人在生活上與道德上的錯誤不是來自本身的卑下，而來自富有人價值觀，王拓基本上認識到「工商社會的唯一動力是利潤。利潤在現實生活中的講法就是金錢。人與人的關係卑下化到單純的金錢關係」（註七八），這種以「利潤」爲唯一關係的商品社會，他尖銳的批判「這是一種猥褻、一種醜面、一種噁心、一種失態」。王拓後來在〈望君早歸〉就表現了不同階層的人物，在他認識到以利潤爲關係的工商社會裡，人性的反應與表現。

一九七八年〈夏潮〉出現了一位對商品社會，對台灣資本入侵歷史更有掌握力的小說家，宋澤萊在九月份的〈夏潮〉發表小說〈打牛浦村〉，對生活權利的維護與自我意識的介入，清楚表現在小說裡台灣典型農村青年笨仔與貴仔兩兄弟身

上。陳映真立即在十月份的《夏潮》發表評論，陳映真分析了宋澤萊小說的背景，是在六〇年代台灣的農產品被巨細無遺地組織到資本主義的商品社會裡，但是台灣農村土地的零細化與農業生產規模的細小化，是和資本主義市場要求的大量生產與統一品質相對立（註七九），所以產生宋澤萊筆下的「包田商」這樣的中間搜刮零細農產品的商人與被收刮的傳統農民，認為宋澤萊在「唯工業化論唯成長論體制底下，類如打牛浦村的現實形象，……表現了近代台灣小說在描寫、批判和抗議上獨特的積極性。」（註八〇）

對宋澤萊所運用的語言文字，陳映真是大加的鼓勵的，「宋澤萊的語言，毋寧是在他描述和序說這充滿現實性，充滿了生命力的具體生活時，被賦予無比的活力。」「就小說而言，不只是內容決定使用什麼性質的語言，還意味著內容自然地使語言彰顯出相映於表達一個特定內容時所必要的各種語言的質素」（註八一），宋澤萊的作品，成熟的掌握批判的現實主義要求的「反映」，整體的社會關係，不僅上對下，不僅資本對傳統，還有中間的搜刮者，還有「半知識份子」想要掙脫資本主義束縛的痛苦，即使是下層社會，也還有更下層的等級社會受到更貧困的待遇。

蔣勳在王拓的《望君早歸》小說的序文裡，試圖對現實主義文學作一總結的說明。王禎和與黃春明的小說都是小人物式的，滑稽、骯髒、醜陋、無知、愚昧、可憐的形象，只是王禎和是苟活形態，黃春明則還原了人性的尊嚴，然而還是「人與命運的對決」。說明人與人的關係的是楊青矗與王拓，楊青矗給予人主觀的力量，可以有改善不公平對待的期望。蔣勳認為王拓更進一步的讓人向惡勢力對抗，「〈望君早歸〉做例子：婦人罔市是一類，代表了群眾情緒式的正義和勇敢；另一類是邱永富，代表了知識份子理智的、清醒的、具分析能力的、不畏惡勢力，不為利益誘惑的道德力量。」即批判的現實主義的小說，其「典型」人物必須與具體的歷史、社會有連帶的直接關係，一旦與歷史、社會有直接的連帶，必定觸及台灣的現實社會樣貌，作者本身的靠邊站的「立場」，就容易顯露出積極的批判意義了。

最能夠說明作家意識型態的作品是詩作，詩直接描述的是作者的內心感受，是一種從底層抒發出來精神與思想，並且是文字表達最精鍊的一種文學，因此作家的「立場」與「價值觀」往往會很清楚的顯露在詩的文字表達。這也就是現代詩表現不著邊際、頹廢的「立場」，以及「橫的移植」的西方的「價值觀」系統最被攻擊的地方。

吳晟、蔣勳的詩，在七〇年代初期即表現與現代主義不同的特色，不約而同的有了較成熟的現實主義的詩作。吳晟本身生長在農村，與城市裡頭學院派的現代主義詩作理論，有著格格不入的感受，雖然吳晟也曾經捧著現代詩啃讀，但是「我生性愚鈍、粗俗」，吳晟說「因此在整個台灣詩壇幾乎都全面「現代化」以後，我也時常捧讀那些深奧難解的現代詩作品和現代詩的詩論。但覺人們所說「孤絕的世界」，和我平日在農村現實生活中所接觸、所思、所感，全對不上頭，覺得自己和

自己的生活，和他們隔得很遠，不但難以理解，也無法產生共鳴，想學，也無從學起。」（註八二）吳晟在一九七二年發表《吾鄉印象》，《吾鄉印象》表現背叛現代主義回到他熟悉的農村裡的價值觀，描述他身邊的人民的生活和勞動的詩集，陳映真認為吳晟的詩有幾個特點：一、意念清晰、語言明白；二、對人物有清晰的表現焦點；三、詩人保持著對人、對生活、對環境、對自然長期而熱情專注的觀察；四、他的風格是謙卑、熱情、溫和（註八三）。一九七七年吳晟發表《向孩子說》詩集，語言更加白話，吳晟不僅強調質樸的、勞動的價值觀，要孩子們對質樸、自然的鄉村，有堅定信念。

蔣勳在一九七二年留學法國，蔣勳在法國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浪潮的刺激與閱讀到早期十九世紀末俄國現實主義小說與三〇年代中國文學的影響（註八四），回歸祖國的情懷也讓他感到詩的寫作，該是一種個人向民族與現實訴說的情懷。蔣勳說他有兩種鄉愁，一種是父母描繪、課堂教育中的「大陸」，另一個是家門口賣油粿的攤子，保安宮前的歌仔戲，真真實實我自己的鄉愁（註八五），在這樣的情況下寫詩，一九七六年蔣勳回國，他確切掌握到夏潮系統所要求的現實主義詩的模樣，具有中國民族也具有現實台灣的重重混音合唱，給予詩具體、爽朗的風格，為新詩樹立了典範。在《少年中國》詩集裡，有讚揚希臘人民追求民主運動的勇氣，有以社會事件為題的詩，如布拉哥油輪事件、多氣聯萊事件，很適當的以詩的敘述介入生活的事件裡。陳映真甚至覺得，「蔣勳的詩，可以看成第一個按著在批評現

代詩中建立起來的新詩的哲學而寫詩，並獲致初步的、優秀成績的作品。」（註八六）

另外從現代詩論戰時就參與辯論的高準，一九七二年提出的〈論中國現代詩的流變與前途方向〉就為新詩的建設，積極的提出「五點基準」和「三項方針」（註八七），並且在一九七七年創辦《詩潮》詩刊，以鼓勵新詩的創作，《詩潮》第一集將收到的新詩創作，分為九組，分別為「歌頌祖國」、「新民歌」、「工人之詩」、「稻穗之歌」、「號角的召喚」、「燃燒的燭火」、「釋放的吶喊」、「純情的詠唱」和「鄉土的旋律」，多數仍屬於傳統的中國文言詩風格，甚至稍微殘留懷鄉及愛國詩的餘風，不如吳晟及蔣勳的「介入生活」，但是在分類取材上，走向了多樣化，詩已作為可以跟社會連結的文學作品。

《夏潮》「批判的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

《夏潮》雜誌裡面的文學作品，報導文學有五篇，散文三篇，小說六篇，評論八篇，還有徵文入選的小品文八篇，詩作挑選的舊作有十三篇，其中七篇為翻譯外國作品。這些翻譯的詩都是弱勢民族的詩，黑人為爭人權的詩、越南戰後的童詩、菲律賓等，另有二十七篇新作。

小說的選篇，《夏潮》並不刊載成名作家的文章，比較注重年輕作家，例如曾心儀、李雙澤、許達然、宋澤萊（註八八）等人的作品，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是現

實批判性很強，例如許達然的小說，極短篇小說〈鴨〉，是敘述養鴨的青年在傳統的養殖業裡原本過活得相當自然，當鴨寮旁的工廠蓋起來後，河流污染、並且進一步擴張工廠搶蝕鴨農青年的土地，青年最後被迫進城討工作，成了無生產工具的工人。刻意提倡這種批判形態的小說，在王津平替曾心儀小說寫的序文可以明顯的看出來，「二十多年來，此地西方末流現代主義陰影下成長起來的中國小說，曾不幸長期地把人從變動社會的架構中抽離出來，因而喪失了小說本應具有的現實嚴肅性及道德批判性。」王津平的「批評」要求文學作者應「面對嚴肅的現實問題」〔註八九〕，具有著道德的正義感，亦即葛蘭西所認為的，批評一旦與道德價值體系相連，就成了理性的「批判」，是一種知識的活動，也是文化霸權裡頭的道德—政治哲學〔註九〇〕。也因此《夏潮》刊載的文學作品人道色彩濃厚，例如報導文學，古蒙仁與張良澤的文章就透露了文學對人性的關懷。張良澤的〈小烏腳病者的一天〉，以實地至台南北門烏腳病防治中心看訪患者，持續兩年之後，所寫的報導文學〔註九一〕。

《夏潮》文學作品裡有一項特色是徵文的小品文，登在《夏潮》二卷一期（一九七七，一）的徵文啓事這麼寫：

「夏潮」已經進入第二個年度，我們以「我一天的工作」為題，舉辦徵文。歡迎所有士、農、工、商、學、兵、以及其他職業的朋友，將您一天的工作情

形以及工作的感想告訴我們。徵文字數不限，文體不限，不計名次，獲選者稿件將在夏潮依序刊出，……。

「徵文」總共刊登八篇徵文作品，有清道夫、苦力、賣化妝品小姐，小學老師、蕉農女兒、女工、大學生的工讀經驗等等，雖然徵求的是「士農工商學兵」不同階層的文章，《夏潮》所挑選刊登的文章都是下階層及低收入、以及白領雇傭勞動者，這些文章所指陳的社會現象可歸納兩類：一為商品社會入侵的反省，一為僵化制度下的壓迫與剝削，勞動身份的辨識是相當清楚的。例如謝男寫的〈清道夫的一天〉〔註九二〕，此清道夫金門砲戰時為軍隊連長，後退伍至中學當工友，但受到學校老師歧視，而寧願辭職當清道夫。這樣的故事我們不難在很多學校工友或大廈管理員身上，找到類似的外省老兵風燭殘年的故事。另劉不揚描述自己以大學生身份去山上做工，體會他父親當苦力的滋味，幹了四天後使他忍不住痛苦跑下山來，卻讓他反省這些苦力們，「他們早已遠離了文明的國度，胼手胝足的拚命、掙扎，也只爲了最基本的粗飽而已，……我們遺棄了他們，卻強詞奪理的看不起他們，說他們跟不上時代，想想啊！我們多殘忍！」〔註九三〕，反省知識份子的救贖之道，該去學習勞動者的辛勤。

黃淑鈞以一位大學生暑期至加工區工廠跟女工一起生活、工作，她敘述工廠女工的生活、工資、價值觀，例如她碰到一位國中畢業就到工廠，待了四年的女工，

薪水已調高，但決定辭職，她問爲什麼？「我不能再在電子公司待下去了。在這兒工作了四年、埋沒了四年的青春。你知道嗎？是青春呢，可不是人才。要是埋沒人才還沒有關係，可是——四年的青春……唉！我永不再到電子公司做事了。」（註九四）透現加工區女工以青春與勞力換取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下的微薄工資。小學老師徐麗美也暴露教育制度的僵化，控訴僵化教育下培育出來的機械性的人民思想：「會注音、會寫生字、新詞，會改正錯字，會選出對的解釋以及適用的詞句，這些加起來就等於有國語文的能力了嗎？……最好的學生，充其量只不過是會考試的兒童而已，這有什麼用？」（註九五）這種勞動身份實踐過程的徵文挑選，基本上反應群眾的創作，與群眾的價值觀，使讀者與雜誌編輯的意識型態聯繫起來，讀者成爲作者，作者成爲批判的生產者，不僅構成雙向的溝通，表現現實主義的現實張力，由在勞動職業位置上的人的文字訴說，向商品社會與僵化制度展現了直接的人民控訴。這種徵文的刊登作用，似乎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理論也被用上了，閱讀者是生活實踐的最佳革命對象，由閱讀者主動的文字控訴，彰顯《夏潮》雜誌本身的現實主義性格。

一九七八年七月《夏潮》登出新詩討論專輯，對於陳映真在六〇年代中期曾預言將有新詩出現，以相對於現代詩這種「形式主義的遊戲」的詩，而七〇年代高舉大旗的就是現實主義的「新詩」了。這篇專輯訪問陳映真、黃春明、王拓以及蔣勳。陳映真表示新詩應該有二個特徵，「第一，詩應該用明白可懂的話。通曉易

懂，和「詩味」之有無，應不相干。第二，以詩的形式，也可以寫一個故事，有敘述，有對話，有描寫。要和具體生活聯繫起來，就要描寫具體生活。」（註九六）接續著對作品立場的要求，蔣勳發表了〈詩人是什麼？〉，他認爲詩的完成，是一群人有著共同的經驗，對自然界、對人與人的關係，用共通、普遍的語言，以集中的、典型的方式表達出來，並且再回到產生它的人群中去，被瞭解、被接受，喚起這群人共有的情感，而產生共鳴。之所以對現代詩批判，在於「這二十多年來台灣產生現代詩背景的狹窄，狹窄到他們的『共同語言』和『共同經驗』只是在幾個詩人之間的事，甚至發展到極端的，這『共同語言』和『共同經驗』只有『詩人』自己可得而知。」（註九七）此專輯是一典型的跨步動作，反應夏潮系統在鄉土文學論戰後，更具有挑戰現代主義霸權的實力及張力。

在《夏潮》刊載的詩的創作方面大略有兩種形態，一種對社會議題與現象的反諷，另一種對勞動階級與底層群眾生活素描。

例如描述工人被資方解雇，無生產工具的工人無法養家活口，於是爬煙囪自殺，卻被新聞淡化成一場勞資誤解，而不是勞資衝突。署名余黑中的寫了一首〈廖明方爬煙囪〉（註九八）：

.....

煙囪上面風雨大

他的女兒直喊：

「爸爸快下來

上面太冷！」

他的女兒不知道

下面也使他心涼

辛苦做工三十年

甜頭吃盡被丟掉

跟甘蔗渣相同

經過兩小時的磨難

廖明方被救了下來

中國時報說是喜劇

又說是一場誤會

把事情說得輕鬆一點

原來自由世界

老闆有賺錢的自由

工人也有失業的自由

所以這種事不奇怪

不必激動不必激動不必激動不必

另外反諷台灣的民族性不足，唯一能與其他民族在肢體上相對抗的場合只有體育活動，而台灣的體育，又只有少棒能揚威美國的夏令營少棒比賽，但台灣將其視為每年一度的民族大事，每年少棒比賽打贏了美國隊之後，下至縣市長、省主席，上至行政院長、總統，都必須打電報賀詞，可見少棒已成台灣的政治事件。署名卜平就這樣描述少棒（註九九）

少棒！少棒！

你把大家弄得顛三倒四，

你把大家迷得如痴如狂。

少棒！少棒！

千城無聲，萬人空巷，

爭著為你守在電視機旁。

少棒！少棒！

民族的小救星。

國家的新希望。

少棒！少棒！

現代的成吉思汗，

年輕的義和團。

自從有了你，少棒！

我們可以不用努力向上，

我們可以不用奮發圖強。

自從有了你，少棒！

我們已不必有原子彈，

我們更不必有太空船。

多少國恥要靠你洗雪，

多少國難要靠你挽回。

燙平我們心頭的屈辱，

拭去我們腮邊的淚！

讓民族意氣風發，

為國家吐氣揚眉！

少棒！少棒！

國產的「小超人」，

飛！飛！飛上天！

少棒！少棒！

你是我們的白日夢，

你是我們的鴉片煙！

類似這樣的詩作，在《夏潮》內容上不斷的出現：

余黑中〈廖明方爬煙囪〉，史台生〈海邊〉，余黑中〈向吉永春子敬禮〉，楚風〈我要為微微笑一笑〉與〈清理兼職官員素描〉，（二，三，頁五九—六〇）〔註一〇〇〕

卜平〈子彈〉，吳天生〈放開你的手〉，趙天儀〈公害〉，（二，六，頁三八—三九）

卜平〈少棒〉（三，二，頁三一—三二）
蔣勳〈唐人街〉，趙天儀〈都市事件〉，李魁賢〈野草〉，（三，五，頁六六—六七）

蔣勳〈寫給陳姓兄弟〉，（三，六，頁三六）

非馬〈滿漢全席〉，詹澈〈星期六下午〉，（四，一，頁五〇—一）。

楊達〈認錯了主人〉、〈選舉扶正歌〉，（五，六，頁六三）

盛滿〈民主假期〉，（五，六，頁六四）

翩翩〈我有一個小問題〉，陳十景〈費人思索的問題〉，（六，一，頁五一）

向生活介入的詩，以蔣勳、吳晟、施善繼的詩較為成熟，後期更出現葉香、詹澈等人。施善繼曾經是寫現代詩的詩人，在現代詩論戰後開始改變詩的風格，他可

以說是橫跨兩個歷史交會的人物，在兩個文學時代交會的時候，施善繼的詩的轉變其實是相當痛苦的。例如他在《夏潮》發表的〈景安路的兩個人〉（五卷一期），所描述的是他住家旁的老鞋匠與賣豆腐腦的兩個人，用簡單清楚的語言，敘述常在生活中周遭碰到的人，卻也常忽視了這些小人物的存在價值：

老鞋匠

經年累月蹲坐在他自造的小木屋

白天開門，晚上點燈

每天都戴著老花眼鏡

替人修鞋、修傘、修拉鍊

經年累月的蹲坐在他自造的小木屋

不二價；修鞋、修傘、修拉鍊

與景安路同在

.....

下午三點鐘，挑著擔子

吆喝「豆腐腦」的，準時來到

準時，幾乎不必伸手看看腕表

冬天趁熱加一點薑湯

夏天冰凍沁人心脾

他猶未放下擔子

一群小孩便衝了過去

準時，圍站在他的身邊，迫不及待

.....

他的身影，走出我們的視域

走進夕陽，那麼專一，不可名狀

走進春天，走進

他一直沒沒無聞

他一直熱心生存

他整個投入參與

助燃而發亮的我們的社會

類似向生活、向現實經驗出發《夏潮》所刊登的詩作有：

歌手（李雙澤）〈新歌給吳濁流〉，（一，九，封底）

天行健（大和樓），（二，一，封底）。

巫永福（祖國），恆夫（信鴿），趙天儀（蓖麻與蝸牛），（三，一，頁六四

（五）

- 蔣勳〈寫給故鄉〉，（三，二，頁二九）
 蔣勳〈不寐之夜——獻給瞿先生〉，（三，三，頁五八）
 陳芳明〈為你航行——離台三週年記〉，
 陳秀喜〈你的愛，獻給故李雙澤義人〉，（四，一，頁五〇）
 施善繼〈黎明，當我們看見晨曦——送給蔣勳〉，（四，三，頁八一）
 高朋〈鐵路工人之歌〉，施善繼〈我們的兄弟〉，（四，五，頁八一—四）
 葉香〈七點半的卡〉，（四，五，頁八一—四）
 翱翔〈暴力兩帖〉，蔣勳〈希臘之歌〉，（四，六，頁六四）
 施善繼〈景安路的兩個人〉，蔣勳〈我在橋頭送你——寫給TS〉，
 詹婉君〈外資廠女工吟〉，詹澈〈他不是啞巴〉（五，一，頁五一—四）。
 金軍〈運河之歌〉，〈麥〉，蔣勳〈致X君〉，（五，二，頁六二—三）
 蔣勳〈黑夜〉，高準〈誄歌〉，（五，四，頁七〇）
 施善繼〈去華盛頓佈道——致馬龍白蘭度〉，高準〈白燭詠〉，（五，五，頁七〇）
 施善繼〈薪火相傳〉，（六，一，頁五一）

在短短三年內，總計有六十三篇的著作，此種新詩強調不具美麗的辭藻修飾，確是有規模的，逐漸的要彰顯一個階級社會的可能，運用詩作描摹各階級、各職業族群的生活狀態，以及細緻的批判被資本腐化的社會風氣，雜誌本身成爲夏潮集團

裡文學青年透視社會的利器。

《夏潮》的現實主義文學所呈現的批判性，具有外在的批判，且有內在的批判性格。歷經現代詩論戰以來，既然批鬥了現代詩，就要相對的創作出比現代詩更豐富的作品來，畢竟文學講究的是作品，也因此夏潮系統，集結起來的大量的文學作家，在《夏潮》雜誌刊物裡頭對外批判的已不再是立場以及價值觀，而是提倡對現實的觀察，對生活周遭細緻的，長期的關注、調查，以及理解社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小說、散文表達的就是一種社會網絡關係的訴說，而徵文入選的作品，已經是雙向的溝通，讓「人民說話」，讓體驗過勞動的人說話，批判對商業社會的瞭解，應不只有拼湊性的瞭解。

夏潮系統的作家群，內在自我是否轉換整體的哲學思考體系，是否以人民爲主的思考體系？從作品上可以知道正在進行整體性的轉換，但是這樣思考轉換卻是隱諱的，是各自在暗地裡，不是統一的程式轉換形成的，無法知道誰瞭解現實主義的批判目的性，而事實上也無從得知現實主義的問題意識是否有擴張開來，所謂的「文學是什麼？文學爲誰服務？文學寫什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任務是什麼？都是這些嘛！那他主要目標是什麼？就是要推翻政府嘛！推翻現在的生產關係嘛！」（《訪問錄》，頁四六九）並非每位作家都能夠提出意識型態上立場的自我質疑及解構，甚至可能僅僅只是作者在思想上浪漫的轉換罷了！也是這種內在批判、質疑、解構的不一致性，對於文學是否作爲陣地戰鬥爭武器的認識，產生了衆說紛

紜、模糊不清的情況。更不幸的是在現實主義思考體系前一，文學卻進入了鄉土文學論戰期，政治上「正確的」鬥爭思考強化並高過了文學本質性的生產，緊接著一九七八年的夏潮系統由於政治化而進入選戰的準備時期，夏潮系統的作家群大量的躍入政治作戰裡，文學哲學的思考程式被轉換到另一個部門，整個的被拉抬到政治的鬥爭領域，失去再轉換的理論準備機會。但至少現實主義文學到了七〇年代末期，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的高峰，進入到「夏潮—雄獅聯盟」時期，現實主義文學作家群已經有了茁壯的面貌（註一〇一）。但我們要緊記的是批判的現實主義在七〇年代只不過剛開始，並且同時在各個領域進行著塑型與顛覆的活動。

〔註四三〕呂正惠〈現代主義在台灣〉，《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一卷四期，一九八八冬季號，頁二〇二。

〔註四四〕楊照〈發現中國——台灣的七〇年代〉，《七〇年代理想繼續燃燒》，時報文化，台北，一九九四。根據楊照的回憶《書評書目》對現代詩做的一次民意調查，「結果發現各行各業民眾關心現代詩，對現代詩何去何從有意見的佔到一半左右。」，頁一三〇。

〔註四五〕特理·伊格頓（Terry Eagleton），文寶譯《馬克斯主義與文學批評》，台北，南方，一九八七，頁四八。

〔註四六〕同〔註四五〕，頁四八。

〔註四七〕同〔註四五〕，頁五二。

〔註四八〕馬國明《馬克思及後馬克思主義文藝批判理論》，文堂強出版社，日期不詳，頁三〇。

〔註四九〕呂正惠〈盧卡奇的文學批評〉，《小說與社會》，台北，聯經，一九八八，五，頁二七〇。

〔註五〇〕參考〔註四八〕，頁六七。布萊希特的功利現實主義主要針對對積極的實踐份子，而不是一個廣義的普遍原則，馬克思主義者皆認為其過於天真草率，甚至不認為此為現實主義。

〔註五一〕同〔註四五〕，頁七二。

〔註五二〕同〔註四五〕，頁七〇。

〔註五三〕唐文標〈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人〉，《龍族詩刊》評論專號，一九七三，八，十。尉天聰〈站在什麼立場說什麼話〉，《文季》二期，一九七三，十一，十五。

〔註五四〕許南村〈試論陳映真〉，《第一件差事》，一九七五，九，二十六，收於尉天聰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一九七八，四，頁一六四。

〔註五五〕同〔註五四〕，頁一七三。

〔註五六〕尉天聰〈死亡與就贖〉，《婦女雜誌》，一九七七，七，收於《鄉土文學討論

集》，頁一七六。尉天聰說：「我們只見到陳映真如此的說明，還見不到他為我們在群眾中塑造起另一些踏著歷史腳步的健康的人物形象。我們等待著。」

〔註五七〕尉天聰兩篇文章均收入《民族與鄉土》，台北，遠景，一九八〇。

〔註五八〕尉天聰〈什麼人唱什麼歌〉，《民族與鄉土》，台北，遠景，一九八〇，頁三二。

〔註五九〕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仙人掌》雜誌二期，一九七七，四，一，收於《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遠景，一九七八，四，頁一一九。

〔註六〇〕李拙（王拓）〈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方向〉，《中國論壇》四卷三期，一九七七，五，十，收於《鄉土文學討論集》，一九七八，四，頁一二八。全文為：一、文學必需紮根於廣大的社會現實與人民的生活中，正確地反映社會內部的矛盾；二、文學的發展必須能與當時的社會相一致，文學運動必須能發展為一種社會運動，或與社會運動相結合，文學才能更有效地發揮它改良社會的熱情和功。此處的「社會運動」引來日後鄉土文學論戰裡一個重大的詰難，王拓後來在一九七七年九月四日《自立晚報》的記者採訪裡，回答此篇文章中「社會運動」的意思：類似「十大建設」這種偉大的事業應發展成一種社會運動，而文學就應該跟這種運動結合。（《鄉土文學討論集》，頁四三〇）然而作者認為這樣的回答是一種權宜之計，作者訪問王拓曾表示，他在保釣時即有參與過「上山下海的運動」（《訪問錄》王拓），所以此時的王拓應該理解官方的與民間自主的社會

運動是不同的。

〔註六一〕對於運用左翼意識型態解釋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的論點，王拓在前述兩篇文章中均已提出，但作者認為陳映真此篇文章具有題綱的作用與總結性的味道。

〔註六二〕陳映真〈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鄉土文學討論集》，頁六七—六八。

〔註六三〕蔣勳〈灌溉一個文化的花季〉，《鄉土文學討論集》，頁四三。

〔註六四〕黃春明〈一個作者的卑鄙心靈〉，《夏潮》四卷二期，一九七八，二，頁五七。

〔註六五〕李素〈什麼是「蘋果的滋味」？——談黃春明「蘋果的滋味」〉，《夏潮》一卷九期，頁五五。

〔註六六〕同〔註六五〕。

〔註六七〕同〔註六五〕，頁二四。

〔註六八〕李昂〈喜悅的悲憫——楊青矗訪問記〉，收於楊青矗《筆聲的迴響》，高雄，敦理，一九七八，六，頁一四八。

〔註六九〕同〔註六八〕，頁一六二。

〔註七〇〕陳映真〈楊青矗文學的道德基礎〉，《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台北，遠景，一九八四，頁一三六。

〔註七一〕同〔註七〇〕，頁一四〇。

〔註七二〕楊青矗〈加工區的女兒圈〉，《筆聲的迴響》，高雄，敦理，一九七八，六。在文中楊青矗透過他寫作工廠女兒圈，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訪查，從等職最低的臨時

女工，到班長，以及白天上工晚上上學的十幾歲女生，問其對社會給予工人的形象看法、薪資待遇等等。

〔註七三〕王拓〈當代小說所反映的台灣工人〉，《街巷鼓聲》，台北，遠景，一九七七，九，頁四一。

〔註七四〕楊青矗在〈直直直·直直挖〉的莊美英訪問記裡，覺得小說「內容比技巧重要」，而且文字上的粗糙是因為他實話實寫，鄉野俚語，不加修飾，為了符合人物的身份與情節需要」(《筆聲的迴響》，頁二〇二。)黃春明也認為藝術的價值觀「只有符合了社會可以進步的一邊，才產生了價值。」(《夏潮》四卷二期，前引文，頁六二。

〔註七五〕同〔註七三〕，頁四七。

〔註七六〕陳映真〈試評金水燻〉，《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台北，遠景，一九八四，頁一五五。

〔註七七〕同〔註七六〕，頁一四六。

〔註七八〕鍾言新〈「拜物和拜金主義……是一種猥褻，一種醜面」——訪問王拓〉，《夏潮》二卷一期，頁三〇。

〔註七九〕許南村〈變貌中的台灣農村——試評「打牛浦村」〉，《夏潮》五卷四期，頁六七—六八。

〔註八〇〕同〔註七九〕，頁六八。

〔註八一〕同〔註七九〕，頁七〇。

〔註八二〕陳映真〈試評吳嚴的詩〉，《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頁一七九。

〔註八三〕同〔註八二〕，頁一七九。

〔註八四〕訪問蔣勳，蔣勳留法時間讀到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作品，以及中國社會主義的文獻，並開始討論文藝與普羅大眾的關係，蔣勳自陳他那時沒有能力去批判毛澤東的文藝政策，反而覺得是個高度的理想的東西，因此開始尋求社會主義的藝術創作。作者認為思想上的轉變會帶著創作作品的轉變，這應該是蔣勳揚棄現代主義的重要因素。

〔註八五〕蔣勳〈輕輕河畔草〉，《少年中國》，台北，遠景，一九八〇。

〔註八六〕陳映真〈試評蔣勳的詩〉，《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頁二三六。

〔註八七〕高準〈論中國現代詩的流變與前途方向〉，《文學與社會改造》，頁一二九。高準總結五點基準、三項方針的理想詩應該是又要意象好，又要音韻好；又要能看，又要能聽。

〔註八八〕在《夏潮》上的小說創作作品：曾心儀〈酒吧間的許偉〉(二卷一期)、(一個十九歲少女的故事)(三卷三期)，李雙澤〈阿金外史〉(二卷一期)，許達然〈鴨〉(三卷六期)，宋澤萊〈打牛浦村〉(五卷二期)、〈慶成之喪〉(六卷一期)。

〔註八九〕王津平〈面對嚴肅的現實問題，高揚批判的道德勇氣——序《我愛博士》〉(《夏

潮》三卷四期，頁七四。

〔註九〇〕波寇克著 (Robert Beock)，田心喻譯《文化霸權》，頁八五。葛蘭西的哲學觀點把人類看成有道德能力的立場，人在潛在中能夠理性的思考和自主的活動時，那麼這就使道德哲學有可能成爲知識的活動。

〔註九一〕張良澤〈小烏脚病者的一天〉，《夏潮》二卷六期。張良澤在《四十五自述》（台北，前衛，一九八八）裡表示這篇稿原本投寄給《中國時報》，但《中國時報》不刊，轉寄給蘇慶黎的《夏潮》，但是張良澤表示原稿被刪近半（頁二七一）。張良澤後來十分厭惡夏潮系統統派人士，然而我認爲作爲總編輯的蘇慶黎選擇文章不在派性問題，而在文章的立場，所以張良澤的文章的刊載一定程度的代表《夏潮》人道主義的立場。

〔註九二〕謝男〈少女的祈禱——清道夫的一天〉，《夏潮》二卷二期，頁五二。

〔註九三〕劉不揚〈一個苦力的自述〉，《夏潮》二卷三期，頁四七。

〔註九四〕黃淑鈞〈暑期工讀雜感〉，《夏潮》三卷四期，頁二〇。

〔註九五〕徐美麗〈小學老師手記〉，《夏潮》二卷五期，頁四五。

〔註九六〕陳映真〈「十年」——追憶「期待一個豐收的季節」〉，《夏潮》五卷一期，頁四八。

〔註九七〕蔣勳〈詩人是什麼？〉，《夏潮》五卷一期，頁五〇。

〔註九八〕余黑中〈廖明方爬煙囪〉，《夏潮》二卷三期，頁六〇。

〔註九九〕卜平〈少棒〉，《夏潮》三卷二期，頁三一。

〔註一〇〇〕以下詩作篇名後所附三個數目字，分別爲《夏潮》之卷數、期數、頁數。

〔註一〇一〕在蔣勳任《雄獅美術》總編輯時期，將夏潮系統的現實主義文學引入《雄獅美術》內，文學的現實批判性味道純度更濃厚，也更爲豐富，例如：陳映真出獄後的第一篇小說〈賀大哥〉（八十五期）、〈上班族的一日〉（九十一期），奚淞的小說〈哥兒倆〉（八十六期），曾心儀小說〈支票〉（八十七期），李雙澤小說〈阿B的〉（八十八期），王拓小說〈妹妹，你在哪裡〉（九十二、九十三期），楊青矗小說〈司機先生〉（九十四期），關曉榮〈陀螺〉（九十五期），施善繼的詩〈燒給李杞橫船長〉（八十五期）、〈小耘週歲〉（八十六期）、〈景安路的春天〉（八十七期）、〈涉水〉（九十期）、〈又一戶人家，走了〉（九十六期），詹澈的詩〈黃昏走過台北市〉（八十五期）、〈寫給祖父和曾祖父的詩〉（八十八期）、〈阿爸來看我〉（九十三期），吳晟的詩〈進城——向孩子說〉（八十六期）、〈向孩子說〉（八十七期），蔣勳的詩〈如果你覺得悲傷而疲倦〉（八十六期），葉香的詩〈裁縫師秀美〉（九十二期），王璣的詩〈老兵〉（九十四期），陳達的歌詞〈唐山過台灣〉（九十五期）等等。

第三節·文化造型運動——「夏潮—雄獅」聯盟路線

為什麼要造型？

七〇年代「現代」與「現實」在一連串的文化運動上被對立起來，其間的對立機制是以「鄉土」作為相互較勁的場域。「回歸鄉土」在七〇年代成爲一種潮流後，「鄉土」所代表的意涵成了各個不同詮釋系統追索的對象。主流媒體也將探尋的行動視爲一種使命感，七〇年代主掌《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高信疆就這麼說：「我們要突出這個時代的特殊事物，給予這個時代一個深刻的痕跡，要在每個人的心靈中，寫上這一筆。」（註一〇三）並提出「擁抱台灣」、「熱愛中國」、「胸懷天下」等實踐口號。同時遠景出版社出版了黃春明、王禎和、陳映真、七等生、白先勇等具台灣本土意涵的小說。此兩個主流媒體將「鄉土」視爲台灣當代的文化體現，其所重視的層面是一個現實的文化世界，「鄉土」成了接合現實使命的文化形態。

相對於現實的文化形態，是以《聯合報》副刊爲主的，另一類現代主義文藝的鄉土中庸媚俗化。一九七七年接掌聯合副刊的痲弦開創了「傳真文學」、「新聞詩」、「極短篇」、「錄音投稿」等，主要將社會現實化約爲新聞事件，再透過小

說或詩的形式加以虛構的再現（註一〇四），並且「利用現代人對副刊的要求」，要「現代的」群眾加入寫作的行列，認爲能夠讀副刊的讀者並不比知識份子差，因此有了「極短篇」與「錄音傳真」，藉此回應回歸鄉土的「走入群眾」提法。然而這是主流媒體傳播上的「媚俗」作用，將社會現實化約爲新聞事件，以及強調迎合現代人口味的「中庸」作法（註一〇五）。由於新聞事件具有一定程度的消費性，這種迎合「現代的群眾」的作法，反而跟新興的文化工業媒體掛勾上了。一九七八年聯合報系創刊的《民生報》，即爲最好的例子，現代人參與文化的方式便成爲等同參與新聞的方式，文化逐漸的成爲了通俗消費的產品。

早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創刊的 *Echo*（後改名爲《漢聲》）雜誌，以英文「介紹中國文化、讓外國人認識台灣」（註一〇六）報導台灣鄉土民俗廣受矚目，如媽祖、皮影戲、國劇等等，華航就曾定了一萬本放在飛機座艙裡頭，如此，鄉土、傳統與現代精緻攝影技術接合的模式，傳統成爲「鄉土回歸」的代名詞，傳統在經過高級的華麗的外皮，加上庸俗而感性精緻的文字敘述包裝下，坐在現代科技的飛機上，欣賞所謂的民俗傳統，傳統與現代融合了起來，民俗相片影像既剔除掉歷史社會的背景，又迎合了「現代群眾」的中庸口味。此種主流媒體，逐漸以消費、大量採掘與製造「傳統」訊息資料，既靠攏了商品，又靠攏了「鄉土回歸」，運用鄉土的影像消弭了現代與傳統的對立性，「鄉土」成爲商品與傳統的接合劑。《聯合報》、《民生報》、*Echo* 等等主流媒體代表的是串連起來的，以資本方式侵入民

俗傳統與鄉土生活；所鋪設的是媚俗化的通俗文化形構。其最重要的意涵，乃是當代一般人民的通俗文化逐漸獲得資本主義推銷的正當性，這種媚俗的的文化活動，正為七〇年代末期的新興文化工業開了一條道路。

新興文化工業逐漸的建制化過程，文化媚俗化與工業化在現代群眾之間逐漸佔取一定的正當性後，媚俗的知識份子為追隨資本功利性的商品浪潮，紛紛將自身的文化創造性貢獻給文化工業的生產行列。

洪通即為被彼此較勁詮釋的例子，一九七二年被 *Esno* 發掘的洪通，其素人畫所帶給台北知識菁英及美術界的震撼，使得洪通聲名一時之間水漲船高，原本在台南南鯤鯓沒沒無名，被鄉人恥笑無工作能力的瘋子洪通，經過主流媒體《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爭相報導他的素人畫，剛創刊的《雄獅美術》（一九七三，四）也特地為洪通做了一個專輯，洪通成了陡然間從「鄉土」崛起而被不斷評論的人物。另外，王拓的訪問、蔣勳及唐文標對洪通藝術的評論，洪通成了鄉土、傳統的代言人，洪通的畫成了民俗藝術與鄉土生活的代表作。由於洪通的素人畫其實與六〇年代、七〇年代初的現代畫、抽象畫或者普普主義畫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不同處在於洪通取材於他生活周遭的事物，魚、廟宇、農人、漁民、觀光客等，只是他沒有受過學院訓練，是個不識字而無師自通的鄉下畫家。然而新興文化工業在媚俗的建制過程極力的拉攏洪通作為其鄉土/產品的代言人，洪通于一九七六年在台北美國新聞處開了畫展，賣了畫，不得不被捲入商品的美術商品拜物

流程中。

媚俗化及商品化同樣滲入媒體、電影、美術、民歌以迄建築的概念型構及活動中，「鄉土」的文化形構不斷的被扭曲變成媚俗及商品的生產機制，現代主義與資本工業體系攜手鍛造以傳統與現代接合的消費化鄉土內涵。中性的反省機制，將傳統的歷史概念向「現代化」提出質疑。一九七五年八月《雄獅美術》辦了「文化造型」專題，王淳義提出〈談文化造型工作〉一文，目的在銜接上七〇年代初「回歸鄉土」的文化工作，並企圖提示一條建構造型的路線。接著《雄獅美術》在九月與十月又出現了「鳳輪」、「台灣民俗館」等的工作記實討論文章。從民俗的記載、搜索，以及鄉土所傳達出來的概念，農村的、鄉下的、非都市的民俗事物，變成與「現代」相對的文化形構，強調「現代」與「傳統」是一個二元對立的相對性概念，在現代化主流論述的概念裡，既然「鄉土」與「現代」相對立，那麼鄉土與傳統的關係就幾近於等號。

現代與傳統的二元相對性概念，顯影在文化事物上的就是主動、進步 *v. s.* 被動、靜止的相對性概念，王淳義從文化造型角度上就這樣的理解：「一個文化造型家，是要變這種被動為主動，去為文化形式的未來演變塑造導引，把才能運用到歷史的進化，促成一個前進的，有活力的活潑文化。」（註一〇七）當時為台灣省文獻會撰述《台灣文獻》的歷史學者洪敏麟也認為，「民俗工作具有回顧過去的特性，文化造型卻具有開展未來的創造性。」（註一〇八）顯露了要將民俗予以現代

化，在現代化的條件上是主動、進步概念才能描繪出文化的形態，才具有「未來的開創性」。蔣勳認為這是混淆了文化造型與民俗工作。在繪畫、民俗介紹、民歌等被「現代主義」拉抬的到主流媒體讚譽的位置，在爭相建構鄉土文化形構的文化霸權的同時，左翼的、現實主義的，就有必要搭建另一套的文化生產機制。類如洪通、台灣廟宇、陳達等的挖掘及精緻介紹，是在完成一種向鄉土尋根的媚俗心情，以契合著現代主義知識份子被捲入回歸鄉土浪潮的一種口味。在後殖民的社會當中，舊有中國傳統與殖民色彩的民俗事物，極有力的盤根錯節在台灣民間社會裡頭，但當這些東西僅僅作為「民族特色」與「民族靈魂」（註一〇九）迎合西方的、現代的前衛藝術欣賞價值時，蔣勳認為這是有衝突的。

蔣勳提到價值的形式問題，他重新提出「美是什麼？」（註一一〇）的問題，美感經驗的形式，「是共同美感經驗藉以傳達的符號，但是社會政治經濟轉變以後，……形式就成了一種累贅，……應重新在生活客觀現象中去尋找新的美感經驗，去建立新的形式。」（註一一一）台灣的美學教育從六〇年代的西化教育下，美學、音樂、建築皆以西方的價值理論為本，「學生日日月月地重複著『造型、明暗、質量……的觀察』」，「這些希臘、羅馬的翻模石膏像的『美』的權威大概早已一點一點如鴉片癮一樣的滲入骨髓了。」（註一一二）因此要造出「今天生活在台灣的中國人的面貌」，要有特定的歷史特徵與社會特徵。蔣勳在一九七七年擔任《雄獅美術》的執行編輯時，他談論巴黎美展的價值意義、談論人體素描的西方特

徵、談論民俗記錄的採集工作，都極具批判與挑戰的性格，企圖挑戰傳統民俗記錄迎合現代化的媚俗現象，把鄉土型構的文化形態的衝突與矛盾揭露出來。如何從左翼的文化路線，建構全面性的、具有現實主義的文化造型面貌，成了蔣勳接下來在一九七八年擔任《雄獅美術》總編輯極力推動的巨大任務。

造什麼型？

一九七七年五月蔣勳在《雄獅美術》發表〈當前文化造型難題〉提出造型的方針，他認為七〇年代由黃春明、王禎和、王拓、陳映真、白先勇、吳祥輝、林懷民等等人帶動起的小說，展露出「寫實主義」的文藝模式，造型美術上就要豐富自己的寫實主義精神。到了七月的《仙人掌》雜誌蔣勳發表〈期待全面的文化造型運動〉，這些作家在技巧上是寫實的，但是在具體的內容上是「廣義的、容納性強的」，寫實主義文學的下一步是「具批判性的，指明方向與目的的現實主義文學」，蔣勳以批判的現實主義作為文學與藝術上共同的發展指標。

美術作為文化造型的美感傳達，要有怎樣的內容？《雄獅美術》七十六期策畫了「環境造型專題」共有四篇文章，江澄的〈描寫骯髒地球的畫〉，介紹世界各國為公害繪畫的訊息，江聲〈來探望我們的討海弟兄〉與蘇振明〈大人惹禍，小孩抗議〉兩篇各以師大美術系學生與北海岸國小學童的日記與畫，報導並繪畫因布拉格油輪遭到污染的北海岸，以及在海岸邊撈油的漁民，所展現出來的為生存奮力撈油

的勞動群像，還有一篇是王淳義的〈環境污染與造型〉，解釋布拉格油輪事件在造型上的意義：藉由文字與攝影塑造出解決受害者的生活困境與社會教育。在此專輯的最後還有蔣勳的詩配合著奚淞的木刻版畫，形成一副名為「撈油的漁民」的「詩畫」。

這樣的文化造型共同在繪畫、攝影、雕刻、詩作、文字報導、文學評論的生產過程上，深刻的賦予文化藝術描繪社會、現實的能量，同時批判政權無法照顧受害的人民，具有批判力的造型同時與《夏潮》雜誌聯繫了起來。《夏潮》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制作布拉格油輪油災專輯事件，亦以社會批判觀點，替漁民向政府要求較為適當的賠償辦法與金額。

回到造型的路線來，那麼蔣勳為什麼要將寫實主義改稱為現實主義？「寫實主義是一種技巧，要把活生生的東西畫得很像，現實主義是說你要有一種主觀的關心在裡面，所以大陸會討論米勒跟杜米埃畫家的不同，像米勒畫晚禱，一個農人在做完一天的工作後在做禱告，或者說收割的田裡一個農人在田裡做完後，在撿起最後一個麥穗時的情景，米勒認為這是寫實主義，但杜米埃不同，杜米埃是個現實主義，他開始攻擊中產階級的掠奪性跟政權上的某種獨佔性，他認為杜米埃是現實的，我們當時的理解，現實主義有多一點的批判性，所以這個字一般人不會注意到。」（《訪問錄》蔣勳）照蔣勳的回憶寫實主義僅僅是擬真式的描摹，見不到藝術作品的時代性格與作者立場，而現實主義具有的批判性正是整體造型路線的主

軸。現實主義的提法成為從文學向各個領域拓展的文化形構，在「夏潮—雄獅」路線裡現實主義取代了寫實主義，也包含了鄉土的意義在內。

為了更精確的塑造造型人物的典型，蔣勳介紹了左翼的美術家杜米埃（Daumier，一八〇八—一八七九）。杜米埃是十九世紀初期法國人，彼時正好為法國大革命與社會主義運動與盛時期，杜米埃關心的是下層的平民，「關心的是那些一日勞累後在晚上帶著孩子站在劇場外面看白戲的這些人的藝術欲求和教育要求」（註一一三），杜米埃擅用石版畫來反映時事，反應暴力鎮壓下的群眾運動。杜米埃拒斥上流藝術社會的榮譽與金錢，而活在正巨大轉變的社會脈動裡。但是蔣勳並沒有清楚的交代美術家如何跟自己的時代緊密的扣連。

等到蔣勳接任《雄獅美術》總編輯時，則較為細緻的推出了左翼藝術家典型。一九七八年三月林秋蘭譯介德國女畫家柯洛維茲（Käthe Schmidt Kollwitz）（註一一四），柯洛維茲生於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德國，「是個生活與作品息息相契的畫家」（註一一五），她常用蝕版畫與石版畫刻畫工人的勞動形象，並且尖銳的凸顯社會內部的矛盾問題，她創作的六幅「織工」連作，Nietzsch 認為這是「平民藝術的里程碑，幾乎是第一次，織工的呻吟及他們的生活的掙扎獲取了同情，而在畫面上呈現出來。」（註一一六）柯洛維茲傳達的訊息，讓習畫者與看畫者感覺到繪畫可以不是唯美的，或者說不是工工整整、依照光線、顯影、角度、對稱、擬真等等的美感，可以是實在的人的生活境遇，女人的曲線美可以不是胴體的

線條，可以是母親抱著飢餓的孩子的淒苦神情的表現，例如柯洛維茲在「農民之戰」連作的七幅畫裡，有四幅描述女性，「在她的作品裡絕看不到誘人的或矯飾的女性，她用強有力而直接的女性率真的態度去表現女性的感情」，在資本主義下受壓榨的工人與農人，成了她最想訴說的對象，「織工」與「農民之戰」具有工農意識的繪畫為其成名作。她也不僅僅是個畫家，她投入實踐的運動裡頭，「柯洛維茲為了濟助難童，為了爭取運動場及住宅的興建，為了婦女家庭工業的展覽，為了反對戰爭、放高利貸及酗酒，她製作了大約二十幅宣傳畫。」（註一一七）為堅持自己的社會理想，進入社會的實踐行列作畫。在左翼繪畫觀念下，版畫可以是最便宜的畫，也是可以一再印刷，不斷流傳的作品。

堅持社會理想成為左翼畫家的典型。堅持為下層社會作畫，堅持畫最慘不忍睹的壓迫場面，畫失業、飢餓、死亡的情景，其特點在於不是要表達一種隱喻，不是類如普普或達達等超現實主義讓閱圖者必須花腦筋想半天的繪畫場景，而是抗議，讓閱圖者感受到震撼，而與社會的苦難矛盾聯繫起來，如同林載爵認為楊達的文學是抗議文學，向握有權力者的挑戰與抗爭。那麼台灣有沒有堅持社會理想的藝術家典型。

似乎楊達是最好的典範。《雄獅美術》介紹柯洛維茲的同期（八十五期），由曾心儀寫了一篇有關楊達生活造像的報導文學，這篇報導包括訪問、攝影楊達的勞動種花過程，描述楊達住屋的簡陋，經濟困窘狀況等等，特別注重描述楊達住屋的

情景，「室內的地上是高低不平、澄黃色的土壤。除了左右兩邊是三面接牆的木板床，所剩的空間很小。屋裡昏案，風忽忽地吹，從相對的前後門吹進來，從床尾端小窗下破裂的壁縫吹進來。……廁所就在地面上挖個小坑，坑兩邊放兩塊磚頭，門也扣不上。」（註一一八）但是就學科分界而言，楊達仍屬文學作者的典範，蔣勳似乎必須找到美學典範的左翼藝術家，才能說服美術的，甚至是音樂、舞蹈、戲劇的類型典範，在文化造型上的要求。

《雄獅美術》在蔣勳離職總編輯後的四個月，推出了洪瑞麟專輯，但是此專輯卻是由蔣勳計畫了半年推出的（註一一九）。洪瑞麟於日據時代就開始畫畫，但在戰後為了謀生到礦坑挖煤礦，從此就在礦坑作畫，在礦場生活、作畫了三十五年。蔣勳策畫洪瑞麟專輯的前提在探尋台灣老一輩的畫家，包括顏水龍（雄獅九十七期）、黃土水（九十八期）、林玉山（一百期）等刻意以「現實的」美術人物造型對抗「迎合現代群眾」的空想形人物，因為這些人物是走過從前的傳統與現在的鄉土，仍具影響力的現實中人。這種現實文化人專輯的推出，具備雙重的意涵：第一將文化造型推向本土，第二是以現實為取向的較為細緻批判的造型整理，「除了很夢幻的，除了瓊瑤小說裡的人物，還有沒有更纖細的，所以我們具體的推出洪瑞麟，他畫的蘭陽平原裡的礦工，真正在現實主義裡面生活的人，人的造型，有他自己的社會定位的情感在裡面。」（《訪問錄》蔣勳）洪瑞麟其實在一九七四年六月即被《雄獅美術》發掘，但當時僅僅如同介紹一般畫家的畫一樣，介紹其生平、畫

的性格、畫作材料、顏料等等，並沒有從「到泥土和勞動中會見藝術的」現實批判觀點看待洪瑞麟。

洪瑞麟在一九三〇年正值日本共產黨活躍末期赴日學畫，進入帝國美術學校，當時台灣有志學畫者大多到日本求學，洪瑞麟亦不例外，一九三八年洪瑞麟與張萬傳、陳德旺、陳春德等人離開氣氛沈悶的「台陽美術協會」，另組MOVIE美術會（行動美術會），行動美術會以主動出擊為宗旨，「研究作品的發表不限定回數，隨時隨處，以全員或一部份而行之」（行動美術會宗旨第二條），一九四一年改為台灣造型美術協會成為台灣第一個綜合性藝術團體，包括油畫、雕刻、美術、工藝設計等（註一二〇）。

一〇一期《雄獅美術》對洪瑞麟的介紹，比較具體的訪問了洪瑞麟選擇畫作礦坑工人的因素，為什麼緊緊選擇礦工而不選擇別的？洪瑞麟答覆：「在隨時可能因瓦斯而爆炸的坑道中，人的面孔不是美而是力。這種以生命為賭注的勞動是非常認真而嚴肅的。……雖然畫中表現不出礦工們的辛勞，但總能表現出他們的工作是神聖的。我覺得自己的畫必須和現實生活聯繫起來。將礦工們神聖的工作表現在畫幅中，這是藝術賦予我的使命。」（註一二一）洪瑞麟對於藝術的信念不同於一般畫家，作品不只是一種美的愉悅感受，是一種使命，而洪瑞麟也透露了「勞動神聖」賦予藝術的理念。《雄獅美術》不僅是擴大介紹洪瑞麟、讓洪瑞麟說話，更問到造型問題裡頭最尖銳的理想堅持，為什麼洪瑞麟與一般到日本學畫的畫家不同？洪瑞

麟也參加各種美術協會，也推動各種美術造型，也參加畫展，為什麼在戰後不再在畫壇活動，而在礦坑默默作畫？《雄獅》找出具體的答案：「留日期間日本普羅文藝以及實際礦場生活的體驗，使他徹底拋開文雅、端莊，經過過濾和昇華的美的藝術形態，而去描寫礦工的勞動和粗率。」（註一二二）這期的雄獅將洪瑞麟的三十五年礦坑畫提高到與杜米埃、梵谷、柯洛維茲、法國的盧奧（Rouault）同為具社會現實意識的等級畫家。亦即左翼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與親身實踐的要求，具體的呈現在類如洪瑞麟與楊達的身上，有著頑固不移的實踐精神，老一代台灣左翼知識份子對「勞動神聖」有相當深刻的堅持。

「夏潮—雄獅」的文化實踐路線

「夏潮—雄獅」文化路線，在《夏潮》雜誌內部，初期注重討論大眾文化、戲劇、電影、舞蹈，後期則為民歌。但是藝術部份的討論，在《夏潮》一直不佔著主要地位，只有到後期民歌運動推展時，《夏潮》才有較大的動作。也就如此，蔣勳更改《雄獅美術》的編輯架構時，將以往美術報導為主體包西洋水彩畫、中國水墨畫、各種繪畫主義介紹、世界各地及台灣藝文訊息等的傳統西方美學價值觀的編輯架構刪除，改變既有的美術報導路線，以本土的美術活動及第三世界美術活動報導為主，加上攝影、戲劇、舞蹈、建築、音樂、文學等等的面向，蔣勳具備著巨大的企圖：「我們希望連結一些朋友，慢慢整理出中國美術史、中國音樂史、中國建築

史、中國戲劇史、中國舞蹈史……。」（註一二三）他認為所有的文藝應該具有橫的聯繫基礎，這基礎建立在往現實挖掘的過程，建立在實踐的熱忱「大家應當走到大街上去，只有那裡有文藝的活路。」（註一二四）

《夏潮》如果做為左翼理論、知識發展的總體，在蔣勳任總編輯的《雄獅美術》可以說是左翼文化形構的開拓場域，各種文藝面向的科目轉向本土、現實的位置來討論，《夏潮》與《雄獅美術》的轉向使其在文化路線上形成批判的現實主義結盟。蔣勳接任《雄獅美術》總編輯後改變以往《雄獅美術》的編輯架構，在革新號標榜「文藝的、民族的、現實的」三個口號，與《夏潮》的「社會的、鄉土的、文藝的」口號有著相同的情境連帶，然而蔣勳用「現實的、民族的」取代《夏潮》的「社會的、鄉土的」口號，毋寧是鄉土文學論戰的成果，顯現夏潮系統成員更加清楚了文化結盟的態度，由於鄉土文學論戰時對鄉土一詞的混戰，以及最終歸結到民族的文學路程，現實比社會的說法更為有批判力，而民族則能將鄉土，不論中國或台灣的地域觀念，皆包含在一起，因此一九七八年的「夏潮—雄獅」文化路線更確定「民族的、現實的」作為文化意識型態上的結盟基礎。

「夏潮—雄獅」文化路線早在《夏潮》初期已經開始醞釀。《夏潮》的封面封底一直是左翼美術方面的實踐場域，《夏潮》的封面從一九七六年九月（一卷六期）開始以人頭像為封面，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卷六期）轉變以社會議題的照片拼貼為封面。初期的人頭像有蔣渭水、孫中山、胡適之、朱執信、慈禧太后、袁

世凱、秋瑾、吳新榮、廖仲愷、賴和，這些人頭像以牆反差的印刷效果造成封面上黑白顏色的強烈對比，到一九七七年六月則改以文庭澍的木刻版畫的人頭像，文庭澍為《夏潮》刻有楊逵、史惟亮、張深切、陳天華、謝緯，木刻版畫的效果與牆反差有著相同的黑白極端的色彩對比，但木刻畫顯得較有生氣、活力。但是為什麼要選擇黑白對比強烈的封面設計？「用牆反差的東西做封面，很像是一種影印的，變得很強的風格，當時在書攤上是很搶手的雜誌，台灣當時的雜誌很花，《夏潮》是黑白的，很素的，在台灣是非常有特點的一份雜誌。」（《訪問錄》蔣勳）蔣勳回憶當時他會刻意到重慶南路的書店觀察《夏潮》的銷售情況，當黑白素色的封面與五花八門的雜誌堆放一起後，《夏潮》的封面風格就特別受到路人注意，「那個東西是比較左翼的理論去做的，不去競爭中產階級很花邊的，用很素的方式去做那個美工，到現在台灣還沒有這樣一本雜誌，這麼素樸的，在形式上如此素樸的。」（《訪問錄》蔣勳）

從一九七八年開始《夏潮》封面轉往以社會議題的攝影照片為主，封面題材有：童工的工作情況、鐵工廠勞工、清道夫、工業污染、批發市場的小販、踩水車的農民，或者選舉的熱切狀況，這種照片拼貼有兩層的意義，其一《夏潮》的銷路已經打開，此時也已經過鄉土文學論戰，知名度上升，每期均賣出將近一萬本左右（《訪問錄》蘇慶黎語，頁四九五），其二蔣勳開始任《雄獅美術》總編輯，《夏潮》與《雄獅美術》聯手運用攝影照片，運用影像的複製生產，訴說社會內容的生

活造型。

從生活面去討論人物的造型，蔣勳嘗試了兩期，以女性、兒童的形體為討論核心，女性造型在《雄獅美術》八十五期表現出多面向的觀察，此期的《雄獅》各從中國傳統女性角色、當代女明星造型、介紹中國女畫家潘玉良、德國女畫家柯洛維茲，甚至談到畫家的妻子的附屬角色。八十六期討論兒童造型，刊載了中國歷代嬰戲圖、美國世紀初為童工申訴的攝影、台灣的兒童攝影、探討兒童玩具，以及國劇訓練班的兒童。從多角度、多面向的探討民族本身的性別、年齡造型，具有從本土開拓的本質意義。這種本質意義在於反西化的美學抗議行動，當美術教育不論是基礎或創造典型都是西方形象時，美學生活上的造型設計，有必要反思回歸本土的形象塑造，「學生最後會恨他那張臉，因為他跟阿波羅跟維納斯是不一樣的，所以整個的文化造型是很西方的美學形式，所以到最後我們牽涉到美容這個問題，女子的美容、割雙眼皮、墊鼻子完全是西化的，是以西方的美為他的美」（《訪問錄》蔣勳）

反西化的造型本質很難在美術作畫馬上改正過來，因為西化造型透過電視、電影、基礎教育很深刻的嵌在一般人的美學概念，能夠比較快速讓閱讀者在視覺上感染的造型圖像，就是照片了。在攝影方面《雄獅美術》開始在每一期選擇某一角色，從各個縱向橫向去造型。攝影造像包括了女性、兒童、母親、工人、小販、大學生、交通、運動、動物等，攝影其實是比較省錢、方便、快速的造型方法，台灣

的經濟已到達一定的富裕時，攝影的造像藝術使得人民都是攝影家，而人民也都是照相裡的藝術品，倡導攝影普及的情況下，更可以瞬間捕捉經濟等級的差異性，例如《雄獅美術》選刊兒童攝影時，選的是年輕、剛開始嘗試攝影的青年人，王信、姚夢嘉、梁正居、石建飴等，而他們的作品表現了兒童與生活環境的結合：山地的孩子、看牛的孩子、農地間的孩子、在學校上課的孩子、工廠受虐待的童工等的兒童的形象，並且也刻意比較凸顯一般藝術家的唯美手法的媚俗性，就在兒童造型的同期，刊出莊靈的《天使的形象》攝影作品，純粹西方資本價值經驗的「現代」作品，莊靈的作品表達的是都市裡頭富裕生活兒童的照片，那種白胖、乾淨、穿著昂貴的兒童形象，他稱之為那是「天使的形象」，而山地、看牛、農地的孩子與富裕「天使」形成強烈對比，《雄獅美術》的攝影造型揭露了美術圈價值經驗的矛盾。

造型同時也伸觸到建築的領域，由於建築往往給予人民歷史記憶的回顧，《雄獅美術》則開闢了以馬以工、黃永洪、夏鑄九為主的建築造型的討論。這一系絡包括了建築教育的反省、台灣族群聚落的研究（註一二五），甚至提到了建築與生活品質的討論（註一二六）。以批判的現實主義取向的造型而言，雖然在當時僅僅能夠提出討論與批判，卻給予建築界一個可以辯論的空間。

例如七〇年代因為人口的興盛，台灣開始興建低廉的國民住宅，這種國民住宅，正是經濟力強起來後改造磚瓦傳統建築形態，改以混泥土、挑高二至三樓的連棟式建築，於是不同於傳統農村三合院住宅，也不同於歐美的獨棟住屋，以平面設

計缺乏層次構造的國民住宅，迅速增加。取其實用而不取美觀的建築觀點，且盡量壓低建築材料價格，大量應用在普遍興蓋的四四方方的國民房舍。原本傳統中國建築相當注重門面，門牆甚至有匾額以彰顯家的肅穆感，重視對稱性結構。到了國民住宅中，門面成了薄薄的鐵捲門，這種建築的最大美學特徵是，除了房屋的後面外，其餘正面、左、右牆皆貼滿了馬賽克的磁磚。黃永洪認為貼滿馬賽克具有台灣建築的歷史社會特徵，「開始大量使用馬賽克是近十年（一九六七—七七）的事情，正是國內的交通和工業在沒有詳盡設計下畸形迅速發展的階段，空氣和環境品質日益敗壞，要有一種材料去保護我們的房子，那真的是像要找一種材料去保養廁所一樣。」（註一二七）除了反應現實的實用特色外，黃永洪認為馬賽克仍有其美學觀點：「其一它色彩繽紛，任君選擇；其二是它具有亮晶的外表，必要時還可加進金粉」，既具實用又具美學考慮下，台灣房舍大量的貼滿了馬賽克磁磚。

但是「夏潮—雄獅」的文化路線是「現實的」「民族的」相互交叉，具有現實主義觀點的建築美學，對於譽滿國際的中國建築設計師貝聿銘卻是採取批判的角度，在一場討論貝聿銘建築風格的座談會就出現出現實與民族的交叉對話（註一八）。具建築專業的馬以工、黃永洪、夏鑄九首先介紹貝聿銘的建築風格，夏鑄九則開始以社會學觀點批判貝聿銘建造的摩天大樓，「是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權威與財勢之表現。」（註一二九）蔣勳接著表達了對紀念性建築的看法，他認為都是服務於權威的建築體系象徵，「所以可以說貝聿銘完全為資本家服務。」（註一三

〇）但夏鑄九認為貝聿銘有其長處，從現實主義觀點貝聿銘「尊重環境」，「只是在視覺上交代環境的調和，至於其他社會功能問題，他是不會去傷腦筋」黃永洪接著表示貝聿銘建造的東海教堂似乎有著中國風格。蔣勳卻反駁，貝聿銘或許是借用了中國的風格設計，但是「他完全是外國經濟、社會環境下造就的建築師，他的成就就是那個文化的評價，他與中國的關係是很薄弱的。」討論會的最後夏鑄九總結：「台灣知識份子，因為貝聿銘在美國的成就，就把他與中國連在一起，其實是一種虛榮的幻想。」這場討論會的目的在批駁「現代化」建築的虛構及媚俗性，但也預埋了「現實的」左翼與「民族的」左翼之間，不同立場的討論。

這種「現實」與「民族」兩者交叉互現的批判、解讀方式，同樣的用在同期的《雄獅美術》，批判在海外的藝術家趙無極、音樂家周大中等人的藝術形象，對海外的華裔藝術家給予批判的眼光，正是正面挑戰台灣「現代派」知識份子的媚俗與商業化心態，「藝術的主體竟然是不斷外流出去，去豐富其他的民族，而讓自己的文化主體迷失在這種浮誇的虛榮心理上，使本土文化永遠累積不了成果。」（註一三一）蔣勳這段編輯報告的引言，很強勢的表達了反西化的本土立場。

很可惜的是文化造型運動在蔣勳任總編輯一年後，一九七九年三月被迫離職的情況下（註一三二），不僅暫歇了這場美學文化霸權的爭奪，「恰巧」《夏潮》也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同時被警總停刊，我們不得不臆測國民黨意識到「夏潮—雄獅」的文化路線，已經威脅到威權政體的社會文化發言位置，停掉《夏潮》與逼迫蔣勳

去職，使得左翼文化路線立即失去了戰場與正當的文化發言位置。

- 〔註一〇三〕杜南發〈燃亮龍族的歷史——高信疆談副刊主編的理想和責任〉，引自《風過群山——當代名家對話錄》，台北，遠景，再版，一九八二，頁一七二。
- 〔註一〇四〕張劍維，《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一九七〇年代台灣現代民歌發展史——建制、正當性論述與表現形式的形構》，台北，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二，六，頁一二〇。
- 〔註一〇五〕杜南發〈走出現代的傳統——瘖弦的主編經驗和理想〉，前揭書，頁一三五。
- 〔註一〇六〕何言〈從文化傳承中創新——訪《漢聲》雜誌四巨頭〉，《書香》第三期，一九九一，頁四一六。
- 〔註一〇七〕蔣勳〈當前文化造型的難題〉，《藝術手記》，台北，雄獅美術雜誌社六版二刷，一九九二，頁九八。
- 〔註一〇八〕同〔註一〇七〕，頁九九。
- 〔註一〇九〕同〔註一〇七〕，頁九八。
- 〔註一一〇〕參考蔣勳〈看巴黎雙年美展〉，《雄獅美術》七十三期。轉引自《藝術手記》，頁三〇。
- 〔註一一一〕同〔註四〕，頁三七。

- 〔註一一二〕蔣勳〈怎樣理解人體素描在造型美術中的定義〉，《藝術手記》，頁九五。
- 〔註一一三〕蔣勳〈作一個自己時代的人——杜米埃〉，《藝術手記》，頁四五。
- 〔註一一四〕Carl Zigorser 著、林秋蘭節譯〈柯洛維茲——世界傑出女畫家〉，《雄獅美術》八十五、八十六期。
- 〔註一一五〕同〔註一一四〕，頁四八。
- 〔註一一六〕同〔註一一四〕，頁五一。
- 〔註一一七〕同〔註一一四〕，頁九三。
- 〔註一一八〕曾心儀〈大家一起來開鑿——談楊遠殘障福利的構想〉，《雄獅美術》八十五期，頁一二六。
- 〔註一一九〕李賢文在〈代編者的話〉（《雄獅美術》一〇一期，一九七九，七）表示「我們在半年前即開始籌畫『洪瑞麟專輯』暨『洪瑞麟三十五年礦工造型展』」，蔣勳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不再任總編輯，由時間長度推算洪瑞麟專輯仍為蔣勳所策畫或主導。
- 〔註一二〇〕相關洪瑞麟事蹟參考廖雪芳〈到泥土和勞動中會見藝術的畫家——洪瑞麟〉，《雄獅美術》一〇一期。
- 〔註一二一〕同〔註一二〇〕，頁二五。
- 〔註一二二〕同〔註一二〇〕，頁二九。
- 〔註一二三〕蔣勳〈文藝的、民族的、現實的——寫在本刊革新號之前〉，《雄獅美術》八

十五期，頁四。

〔註一二四〕同〔註一二三〕。

〔註一二五〕馬以工〈在大料炭溪沖積扇上披荊斬棘——新屋鄉范姜族群住宅研究〉，《雄獅美術》九十期。

〔註一二六〕雄獅本社〈「我們的生活、居住與環境」座談會節錄〉，《雄獅美術》八十八期。

〔註一二七〕黃永洪〈陣痛中的台灣建築〉，《雄獅美術》八十五期，頁七八。

〔註一二八〕此座談會有馬以工、黃永洪、夏鑄九、蔣勳參加，由陳惠民整理（I.M. PEI 不是我們的），刊在《雄獅美術》九十三期。

〔註一二九〕同〔註一二八〕，頁一〇七。

〔註一三〇〕同〔註一二八〕，頁一一一。（以下對話皆出於座談會紀錄）

〔註一三一〕蔣勳〈編輯報告——華裔藝術家特輯引言〉，《雄獅美術》九十三期。

〔註一三二〕《訪問錄》蔣勳。蔣勳認為他去職的因素一為國民黨的壓力，另一方為獨派給予發行人李賢文的壓力：「可是我後來隱約的感覺到他（李賢文）的壓力越來越大，謝里法就常從紐約寫信來，認為說你怎麼這個雜誌變成一個統派的雜誌，也構成他一方面有新聞局的壓力，一方面有海外朋友的壓力，也有一次座談會開始批判我做的《雄獅美術》，大概是一九七八年年底開始的，有一點牽涉到對本土文化的再界定，他最後用的理由是用新聞局的壓力，請我離開，可

是我知道裡面還有很複雜的過程，裡面的流派越來越要清楚，越來越接近美麗島事件。」

第四節·文化造型運動——兩條路線

要注意的是「夏潮——雄獅」文化路線，內部有著些微的歧異，這也導致日後夏潮系統特殊化的因素之一。對於要採取怎樣的文​​化路線，在「現實」與「民族」間有著錯綜複雜的認知心態，「夏潮——雄獅」路線對現實與民族有著交叉互現的掌握，因為它直接挑戰的是媚俗與商品化機制的現代主義。但夏潮系統成員對左翼理論理解的路徑原本各不相同，加上一九七六年中國大陸四人幫垮台後，教條主義受到資本國家的大力抨擊，因而新馬克思理論與第三世界理論紛起，也逐漸的流入台灣。也因此如何面對資本主義正在入侵的台灣的文化辯論，形成伏流式的時而出現，時而消失的角力。

唐文標在《夏潮》一卷五期談論〈快樂就是文化〉一文，他強調現在的大眾文明是資本主義逐漸發達後建造起來的閒暇文明，「這種文明是以多面目的姿態出現的，但它只有一種功用，純然是爲了當時的需要，補足了許多人某一瞬間生理或心理上的缺乏，……。」（註一四三），同時他體認到台北正是大眾文化的集散中心，「台北正在逐漸形成一個中產階級的社會，其中發散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種觀念，自然的農村系統抗拒不了，而且慢慢的投降了。」（註一四四）這種大眾文化的典型是電視與電影的庸俗娛樂文化侵略，唐文標覺得應該進入電視、電影的

批判，甚至掌握這種文化生產的機制，因為消費資本主義掌握下的電視、電影，傳達出來的訊息是「快樂就是文化」，「並不拒斥什麼異端，他們並不反叛，至少不是在追尋才能的表現中尋求快樂，他們也不孤獨，他們過的都是群體的追求快樂，群體的賭，……。」（註一四五），唐文標的理解是既然現在大眾的文化是追尋快樂的，那麼活在快樂群眾裡頭的左翼知識份子，要如何承擔與面對呢？唐文標並沒有能提出作法與答案，只提出批判性的問題：「是否我們永遠把電視當作娛樂，當作過渡的文明，只適合大部份的人閒暇時間觀看？而不是一種藝術？一種可供知識份子的食物？」但這種批判性問題已經逐漸接近新馬克思主義布萊希特、班傑明等的論點，要求與群眾發生關係，主動批判作品本身與控制作品的生產機制。

但是唐文標的觀點受到夏潮內部的質疑，署名胡途松立即在一卷六期發表〈也談大眾文化〉，劈頭就說「那樣一篇文章是混淆事實的，是以作者的自我滿足來自圖其說的」，這一篇的立足點認爲文明乃至文化是生產與勞動所建立起來的，「閒暇純粹是脫離生產而不愁衣食的人所專有」，胡途松認爲電視這種訊息媒介是掌握在資本家手裡，「電視節目的製作，大眾都不能有意見」，電視所傾銷的文化只是外來的買辦式的文化，不是大眾的節目，也沒有大眾的多樣性「在大眾選擇無力之下會產生的也只是墮落的文化。」（註一四六）其認爲當時台灣的社會結構變化，台北不是中產階層的社會，而是更多本地與外來財團興起的結果。胡途松的觀點顯然從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唯經濟主義出發，上下分裂的社會構造應具有普遍的適應

性，配合上民族主義，具體的反對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所帶來的生產關係與文化形態，因此胡途松會覺得「八百壯士」類的政策性軍事電影是「一種具有理想的電影」，強調民族對抗的基調，才能改變自己的文化生產關係。

這一點摩擦出來的小火花，並沒有繼續辯論下去，但有著內部隱藏式的角力發展。署名夏傳書在二卷六期提出〈有人的所在就有藝術〉，以往雖然藝術品為封建貴族服務，但現在這些藝術可以透過行銷機制到平民之間，承認資本主義深化的好處，機械文明讓藝術品可以不斷的複製，也可以輕易的流入大眾的眼前，「避免不了的，複製藝術品，機械的文明如電影，電視也帶來了世界的古代文明，說明有一些人是這樣活過來的。」在無法避免的情況下，他要求以一種批判的觀點來看這些藝術品，夏傳書覺得現在並不是爭論如何改變的時刻，而是「要求一個民主、自由、全民平等的社會吧！」（註一四七）如同班傑明所認同的機器複製藝術作品的生產，改變傳統的藝術生產關係，欣賞者可以在任何的時空下，任何不管高貴或低級的場所環境，藉由機器複製的科技組織形態，欣賞到藝術品。同時班傑明也注意到現代媒介危險的一面，因此他強調要對現代媒介予以民主的控制（註一四八）。但是夏傳書最後又提出，他所要求的是「一個「自由的平等的民族文化」，此種提法模糊掉階級分化的分析結構，將群眾視為不分化的整體，所以「有人的所在就有藝術」，這個「人」的涵蓋面是全體的（totality），包含了相對資本、財團的下階層社會的「人」，包含了在台灣的中国「人」，批判藝術時就不僅是以階級觀點批判

藝術，更重要的是以「人」的觀點進行批判。

這種模糊掉唐文標以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類別分析文化形態，與胡途松以古典馬克思主義加民族主義否定外來資本文化的作法，具有妥協的意思，後來在王墨林分析電影內容的〈中國電影意識發展史〉裡再度突顯出來。

分析電影的意識型態是唐文標較為感到興趣的，王墨林發表〈中國電影意識史〉之前，唐文標即嘗試的分析批評了「大金剛」與「計程車司機」兩部電影，即使唐文標藉「計程車司機」分析社會的中間形人物，司機、公務員、售貨員「是服務性的人員，這些人因為不需要有很專門的技術，由於生產過剩、失業人多，……他們構成了美國社會中所謂「沈默的大多數」。」（註一四九）這種特意分析電影裡頭的階級類別，企圖提供讀者、欣賞者對沈默的大多數人民與以重新的體認，是因為唐文標分析的是西方電影，正是「邪惡的」資本國家拍攝的電影，不論評論的方法如何，評論主體面對的是西方資本國，而不是台灣內部的文化階級結構，並不構成文化路線上分歧的看法。

但兩種路線的文化意識，卻讓開始分析電影的王墨林感到搖擺不定。王墨林〈中國電影意識發展史〉在〈夏潮〉總共連載了五篇，王墨林提出對電影需要有一套群眾性的、積極性的分析模式，王墨林藉著貝沙盧（Pescaro）提出的第三世界電影文化觀，作為其分析電影史的基礎。貝沙盧將傳統影展與新電影影展互相比較，用問題提出答案，例如他問：「為什麼？」傳統影展爲了提高觀眾的欣賞水平，新

影展爲了提供觀眾自覺觀影的機會；「爲誰？」傳統影展給城市的人看、給不關心的人看，新影展給工人農人看、給有階級自覺的人民看；「怎樣來看？」傳統影展電影作者是決定性的，新影展，階級性的群眾才是決定性的（註一五〇）。貝沙盧具普羅性的提出第三世界影展的文化批評路線，明顯的影響了王墨林的敘述分析。

王墨林對中國電影的分期，其實是依照著意識型態的歷史分期，他認爲清末民初電影是買辦文化傳遞進來的，到了國共鬥爭時期，共產黨優先意識到電影的群眾性格，電影製作左右分裂，左翼電影「逐漸走入社會並與群眾發生密切的關係，這正是左翼需要的政治工具。」（註一五一）相對弱勢的國民黨在二次戰前即整編了電影，制訂電影檢查法、設置檢查機構，制訂一套消滅左翼電影的措施（註一五二），以及國民黨敗退來台後攝製政策性電影，政權穩定時放任了娛樂性電影的生產。王墨林前四篇的文章，重點在買辦意識於中國電影的運作，具有高度的民族主義批判意識，但到了連載的最後一篇（第五篇，距離王墨林第一篇文章相隔半年）他認爲當時的電影是「製造中產階級之夢」，他引用唐文標在《中國論壇》的文章論點轉折了他對電影的批判方向，唐文標認爲「國產影片、電影劇的一般目的不再以現實主義的觀點，去描寫、探討都市中低收入家庭中的問題，而是在表現另一種神話，即都市中產者的神話。」（註一五三），王墨林引出唐文標的話後接著附和補充「在這種神話下，所謂藝術就變成了使人產生快樂或供人消遣的東西。」

同期《夏潮》接在王墨林文章的隔頁，署名傅心名也發表文章，要求「知識份子應以『關心』或『介入』的方式參與電影文化」，在此唐文標式提法，有比較具體的說明了如何批判電影，及爲什麼要介入電影媒體。對於電影媒體的觀察，「一涉及『現實的批評』，則需嚴守『國片地方意識』的標準以行之」，再以買辦的提法批判電影，要介入電影媒體，是因爲很難對抗電影影像震撼的社會滲透力。而且傅心名對拒絕深入本土通俗文化的知識份子殷殷告誡，「到有一天，許多富有改革意識的知識份子再來指責電影界固定的意識型態，再來抱怨國內的環境，以及廣大的群眾心理形態，再不是事倍功半就是太遲了。」（註一五四）這種進入大眾文化，批判大眾文化內部機制的意識型態作法，就具體展現在《雄獅美術》影劇項目的討論。對電影的討論如同美術、攝影、建築的造型討論，從各方面、多面向的觀察，包括西方、中國歷來的及當代正上映中的電影。

《雄獅美術》對中國電影的介紹以整理導演的戲劇手法爲主，一方面回顧過去老一輩的導演的戲劇手法，一方面開始建立批判本土電影的文化批判方法。對老一輩導演的介紹包括了卜萬蒼、唐煌、易行、陶秦等，將台灣電影歷史有了初步的規畫整理。對七〇年代的電影，則比較深入的解讀了李翰祥的電影哲學，《雄獅美術》的作者皆認爲李翰祥的幾部影片裡，如「傾國傾城」、「瀛台泣血」有著強烈的歷史感，蔣勳認爲李翰祥這兩部片裡頭對知識份子不畏強權的正義塑造，乃是六〇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四人幫蹂躪知識份子的重新思索（註一五五）。王墨林認爲李翰祥的歷史意識也表現在「乾隆下江南」片中的小人物的塑造上，「充滿著鄉土

性的民族精神」(註一五六)，李翰祥所掌握著的是下層人民遇著政權的同時，那種普遍的被壓抑性格傾向。「沈痛的憤怒來自於『民』，因為他們的被壓迫太切身，站起來的姿態，也特別堅定，這是李翰祥最成功之處。」(註一五七)

《雄獅美術》八十九期製作鹿港專輯，六月的鹿港在端午節有著盛大的民俗表演，然而這項鹿港全鎮性的活動，在《雄獅美術》的解讀下，鹿港的民俗表演成了文化的消費活動，電視台主導了整個的民俗消費活動，此專輯有一段傳神的描寫：「媽祖神轎經過華視錄影台，也必須畢恭畢敬，聽命於『導播』，所以在這樣一次民俗才藝大競賽的廟會表演中，三十幾座廟中的家神都甘拜下風，新的衆神之神是華視，而張小燕顯然也已替代了媽祖的地位。」(註一五八)這種實地性的考察、調查，民俗作為「現代群眾」的消費活動，蔣勳清楚的劃開了媚俗傳統與真正的鄉土文化運動的界線，媚俗性的回歸鄉土「他們一般以『復古』『落伍』來理解『民族的』原則，以『地方性』、『特殊性』來理解『平民的』原則，以不自覺的『觀光客』及『文化人』的心態歌頌『傳統』及『民俗』，便使得鄉土文化運動又被扭曲為掛羊頭賣狗肉的東西。」(註一五九)在此種批判及解讀下，接著表示左翼的下一階段任務及目標：「分清商業操縱下偽裝的『假鄉土』」。

總的來說，「夏潮—雄獅」對本土文化的立場要求比較寬鬆，只要不在媚俗、被商業操縱的行列裡，唐文標—蔣勳式提法給予較大的鼓舞。例如林懷民的「雲門舞集」，受到《雄獅美術》相當多的讚賞與注目，或許是蔣勳與林懷民的熟識，瞭

解林懷民是從現代主義逐漸摸索，到展露出模糊的中國形象的「烏龍院」、「白蛇傳」、「孔雀東南飛」，這是「主觀唯心的意願去嚮往一個非生活的、從來不存在的中國」(註一六〇)，一直到建立了具有本土意識、現實主義的舞蹈「小鼓手」、「吳鳳」、「看海的日子」等，「『雲門舞集』的掙扎、矛盾，都涵蓋了今天台灣整個文化界共同的矛盾與掙扎，雲門舞集的現實意義在此。」(註一六一)因此《雄獅美術》對雲門舞集的報導，顯得推崇甚至鼓勵。

但是林懷民本身一定程度的知識菁英心態，使當時雲門舞集的表演仍停留在知識份子能理解的意象上，雲門的舞者仍是學院裡接受過芭蕾舞訓練的學生。一九七七年一月雲門舞集團員與文化大學學生參與延平北路一段慈聖宮主辦的子弟戲演出(註一六二)，受到重大的考驗，因為觀眾不像坐在藝術館裡的知識份子安安靜靜的欣賞戲劇舞蹈，子弟戲(歌仔戲)的觀眾是各式各樣的人，會去好奇的觀賞野台戲的，是都市裡頭從農村來打拚的下階層人物，伙計、商品推銷員、店員，而且是流動的，想像從大學的象牙塔走出來演野台戲的學生，面對著流動的群眾、攤販、賣香腸的吆喝、交通的噪音、小孩哭鬧，他們的窘迫形象，「要和戲台下一切的聲音、動作、氣味、顏色、競爭，他們的嗓音被逼得高亢尖銳，……他們的動作被逼得更誇張」(註一六三)，群眾的干擾使得表演並不順暢，成了一場失敗的表演，這種與群眾互動最為密切的歌仔戲，在資本化的都市表演成爲一種落差極大的現象。即使如此，蔣勳也以關懷的心態來勉勵這些「年輕的藝術工作者，就會在這裡

面生長得更結實、健壯，培養出更豪闊、質樸、熱烈的品質。」（註一六四）

但這種菁英形態的舞蹈，一眼就被古典馬克思主義著刺穿。雲門舞集於一九七八年底演出的「薪傳」，描述大陸人民度過台灣海峽至台灣開墾拓荒的先民事蹟。為了表演先人的勞動、粗糙質感，林懷民帶領團員至新店溪河邊搬運石頭，感覺自然的重量，在高雄佳洛水練唱勞動的節拍「嗨嗨嗨嗨」（註一六五）。署名夏傳觀賞完「薪傳」舞蹈後，立即於《夏潮》六卷一期抨擊雲門的菁英心態（不知台灣生作什麼樣？），對於林懷民極力想要描述先人開墾的苦況，夏傳給予極不客氣的批評，「在冷氣間裡看見一群精神飽滿的青年男女，喜氣洋洋的象徵一下，我們委實體諒不出來。」（註一六六）對於林懷民這種到大自然體驗的排舞方式，也不以為然，夏傳認為要體驗不一定要到河邊去體驗，應該先閱讀歷史，歷史不僅是書本記載而已，更應該透過「各種耳語、口傳、記載、神話、故事……各種方式尋找我們先人的血淚史」（註一六七），即使開拓史無史可知，也要去親身體驗，夏傳認為「不妨到農村去跟農民生活一段時間，或幫他們鋤田，收割一下。因為在新店溪的郊遊是沒有「結果」成分的，「勞動」如果除去「生產收成」這個觀念，恐怕不外遊戲而已。」（註一六八）雖然夏傳最後仍以肯定語氣評雲門「但是，這是一個好的開始。」但是也已經對菁英心態提出了反省的批判。

另一方面《夏潮》較推崇的是實驗性的小劇團，對耕莘影劇實驗劇團與李元貞的戲劇給予較大的鼓舞。一九七七年七月耕莘影劇團演出王禎和的小說《望你早

歸》，在黃以功導演、王禎和親臨指導的情形下，這齣獨幕劇以國、台語演出，在配樂上取用的是當時的流行歌曲，「貼切的表現了台北今日的人和地」，更進一步的耕莘影劇團注意到戲劇形式的屬性問題，「什麼時候我們看過菲律賓的歌謠劇，馬來西亞的悲情劇，什麼時候我們上演過非洲的史劇，南美的民間戲？沒有！從小到大我們腦袋中已灌滿莎翁莎婆，希臘悲劇……」（註一六九）對資本國的價值觀反抗，意識到可以在戲劇、舞蹈滲入階級矛盾的觀念，以群眾的語言表達文化的批判態度，耕莘影劇團向現實主義開了一個例子。《望你早歸》演出成功後，由李元貞帶領淡江學生編導的「彩鳳的心願」，更加樸素的展現現實主義的戲劇風貌，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在國立藝術館演出的「彩鳳的心願」，李元貞自己評論這齣戲，「把戲劇拉近目前的現實和抨擊目前的現實，可惜只做到清晰而不夠深入。」（註一七〇）且李元貞結合的演員都不是專門科系的學生，編劇也相當俗氣，「敘說百貨公司的女店員劉彩鳳，參加該公司舉行的時代歌后競選，所發生的種種遭遇。」（註一七一）《夏潮》卻給予了極大的評價：「要不是現實主義手法的真實深刻，要不是對唯利是圖的商業社會，有敢於暴露敢於譴責的勇氣，這麼通俗不過的題材，又怎能產生灼灼逼人的光輝來？」（註一七二）這種評價比起《雄獅美術》給雲門的推崇，彰顯戲劇是具有社會批判性的。

兩條路線伏流式的角力及辯論，卻在民歌運動領域上達成了一致的協調與行動。一九七六年底淡江文理學院舉辦一場陶曉清主持的西洋民謠演唱會，李雙澤突

然跳到台上，手拿著可口可樂，「從國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興，但我現在喝的還是可口可樂，……這使我覺得羞恥，……（向歌手問）你是中國人，你為什麼不唱自己的歌而要唱外國的？」（註一七三）陶曉清問他現代中國民歌在哪？接著李雙澤說在沒有自己的歌前，要唱前人的歌，「唱到我們能寫出自己的歌來為止」，接著李雙澤唱了「補破網」、「望春風」、「雨夜花」及「國父紀念歌」等。此事件稱為「淡江事件」（註一七四），此時淡江任課外活動組主任的正是夏潮系統成員王津平。王津平在張建邦的授權下，串連了李元貞、梁景峰、曾憲政等老師，掌握校內活動重要資源與權力，包括審稿、社團輔導以及《淡江週刊》的主導權等等（註一七五），淡江事件的同時，王津平也拉近了後來極力推廣民歌運動的楊祖珺。（註一七六）

「淡江事件」也給了李雙澤與梁景峰努力作自己的歌的方向，李雙澤後來做了九首歌，包括「美麗島」、「少年中國」、「我知道」、「老鼓手」、「愚公移山」等，李雙澤的歌詞與楊弦的「中國現代民歌」採取余光中的現代詩的詞，有著截然不同的現實主義與民族的雙重概念。由陳秀喜詩改編的「美麗島」意指筆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台灣，「少年中國」則為蔣動的詩〈寫給故鄉之三〉改編的，這兩首歌恰好是台灣與中國的歷史造像，王津平就如此解說這兩首歌：這兩首歌合在一起，很明確的指出雙澤一生的關懷，他不能忘懷台灣的土地和人民的養育之恩，他也不能忘懷祖國大陸的一切（註一七七）。「愚公移山」作詞者為楊逵，敘述勞

動、挖地的理想終會實現，「我知道」教導小朋友瞭解生活中的農漁工社會階層關係，「老鼓手」是李雙澤做的詩，紀念逝世的吳濁流，「基本上這些歌詞都有著明朗、樂觀、與希望的基調」（註一七八）。

在李雙澤開始創作「自己的歌」前，夏潮系統透過王津平的居中串連，在一九七七年三月淡江舉辦一場「中國民俗歌謠演唱會」，演唱者有吳楚楚、楊祖珺、淡江的合唱團，以及校外人士蔣勳、梁景峰、陳揚山、鄭泰安、陳映真等夏潮系統成員。這場音樂會長達四個小時，吸引三千名學生、群眾，演唱過程並不緊湊、有些雜亂，缺乏組織（註一七九），但卻與群眾一塊合唱，「席地而坐」、「起立而唱」，歌者與群眾之間的平等、互動，除去了以往演唱會台上、台下的嚴肅隔離氣氛，帶領著群眾一起唱的效果，「走出個人，走入人群」（註一八〇）。

這場演唱會奠定了日後《夏潮》推展民歌運動的一貫模式，先教導群眾唱歌，接著要求群眾跟著唱，最後主客易位「聽眾的熱情高過演唱表演」。這場音樂會後，可惜的是李雙澤於一九七七年九月在碧潭為救人而溺斃，一九七七年十月六日淡江舉辦「紀念李雙澤民歌演唱會」，「演唱會開始前一個鐘頭，同學就大排長龍、蜿蜒約百公尺，此種現象，淡江罕見」（註一八一），由淡江學生鄭盈湧的描述，李雙澤「唱自己的歌」運動已經感染到大學生族群。十一月雲門舞集舉辦李雙澤紀念演唱會，於國立藝術館舉行，演唱內容與淡江紀念演唱會一樣，曲目為「美麗島」、「少年中國」、「愚公移山」等。張釗維認為「就空間而言，這意味了

「淡江—夏潮路線」的民歌正要從邊緣的淡江校園跨向社會。」（註一八二）也在透過淡江中國民謠之夜演唱會與李雙澤紀念音樂會的嘗試，《夏潮》開始具體推動民歌運動。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下午《夏潮》與耕莘文學院舉辦民歌座談會，這場座談會有意無意間安排了學院派與非學院的夏潮系統對話，參與的主講人有許常惠、沈錦堂、游昌發、馬水龍、鄧志鴻、楊祖珺、蔣勳。接者由學院派學者先對民歌定義。許常惠說：第一、民歌不是個人，而為大眾一起創造的；第二、民歌因不同的地方與時間，而其演唱方式與歌詞會有改變；第三、它的傳授方式是口頭的；第四、它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考驗（註一八三）。大抵其餘學院派學者圍繞著此定義討論。學院派的學者發言後，鄧志鴻首先發言就具現了學院與非學院的對立，他要求學院給予非學院一條明路，「坐在這裡的專家們，我也不曉得他們一年要寫多少歌，是不是可以有一首歌給我們好好來唱？」（註一八四）

輪到蔣勳發言就開始採取強硬的立場，對學院的民歌定義作修正，「民歌是長時間從一個有共同生活經驗與情感表達的團體中產生出來的音樂」，「民歌的產生與生產經驗密不可分的」，爭議定義權的同時，蔣勳也為當時的民歌作名詞上的修正，正名為「校園民歌」，因為「歌曲內容所傳達的情感也比較上是很『學生的』」。對民歌名詞的確立也可說是幾個月來到大學推動「唱自己的歌」的運動累積。蔣勳話鋒一轉又指向了學院派，「因為三十幾年來，學院派的音樂家幾乎沒有

為大眾貢獻一條歌」。當台上的對話結束後，夏潮系統成員展開了以台下對抗台上的模式。徐愼恕以迂迴的方式諷刺著學院派：「你們有什麼樣的困難請盡量的提出來，讓我們大家看看有什麼方法，能夠大家互相幫助。」接著重量級的陳映真先向學院派打躬作揖，稍後馬上向學院派開了大炮，「如果他們還覺得這些歌（校園民歌）不屑一顧，或者是沒有功夫寫這種歌曲，那也沒關係。讓我們大家，這些喜歡音樂的朋友自己來做。」陳映真的發言獲得了台下一致「熱烈的掌聲」的認同。此座談會某種程度是《夏潮》以「民歌運動」向主流社會進軍的暖身運動，既向學院派展開了挑戰，也區隔了楊弦、余光中的「中國現代民歌」的媚俗、商業化。

《夏潮》接在這場座談會後，開始在歌曲與歌詞上推動大眾文化最易能接受的「唱自己的歌」活動，同期雜誌立即設立「時代歌謠獎」的徵稿活動廣告，《夏潮》「時代歌謠獎」總共收到作品一百二十件，刊登了二十件作品，之後並徵求作曲。徵求創作後的一場座談會裡，由蘇慶黎、黃春明、李哲洋與鄭泰安出席，《夏潮》自承這種創作已經抽離了群眾，蘇慶黎認為「所以我們的歌如果要流行起來，一定要跟老百姓的生活有關，我很懷疑大多數的知識份子能否做出這樣的歌來。」（註一八五）對自己的知識份子不能進入大眾內部的生活，黃春明給了嚴苛的批評「知識份子……如對老百姓生活的瞭解都是從一些社會調查報告或者看人家的某一篇文章得來的，他連看都沒看過，更別說瞭解了。」在這場座談會裡《夏潮》體認到推動民歌最現實的殘酷的一面，傳播資訊的掌握，是在資本家的一方，電視、電

台，即使要讓歌曲能朗朗上口，必須讓群眾常常聽到、常常能唱。

在沒有資本、沒有傳播機構管道下，又無法仰仗學院作曲者的奧援，逼使得《夏潮》內部的兩條路線必須面對現實的殘酷因素，運用最原始的演唱會模式，到各地一遍一遍的「唱自己的歌」，演唱會成了民歌運動的原初模式。

《夏潮》徵求歌曲創作的同時，蘇慶黎、李元貞與楊祖珺為「廣慈博愛院」婦女職業訓練所裡頭的雛妓，舉辦「青草地慈善演唱會」，據楊祖珺回憶「「青草地慈善演唱會」是台灣第一次露天的大規模演唱會」，聽眾達五千多人，「台灣第一次由知識青年結合社會大眾所做的社會服務活動」〔註一八六〕，這種結合了有社會意識的服務活動，開始往工廠、地方鄉鎮推廣民歌。並且常在最後的歌曲「美麗島」、「老鼓手」等曲目下，有意識的帶動全場的群眾一起跟著唱。此一有系統、有意識的演唱會，成為民歌運動的向社會文化霸權進軍的模式，型塑《夏潮》向社會運動嘗試進軍的模式。〔註一八七〕

《夏潮》的民歌運動走向了偏重工廠、鄉村城鎮、雛妓、大學校園的推動，然而仍抵不過「金韻獎」一年一度的甄選誘惑，抵擋不住唱片工業公司網羅一起與楊祖珺推動民歌的歌手〔註一八八〕，在無力面對龐大的資本運作機制下，也在《夏潮》於一九七九年被停刊後，民歌運動失去了機關刊物，以及據點，加上緊接而來的政治緊繃過程迅速蔓延，楊祖珺自己也進入了政治運動裡頭，國民黨開始全力的封殺具社會意識色彩的民歌運動，所有邀請楊祖珺的電視節目、演唱會、大學校園

活動，均被情治單位徹底封殺〔註一八九〕。

從民歌運動的路線可以發覺，新馬克思主義與古典馬克思主意兩條路線上的辯論，在遇到必須行動，必須面對資本機制爭奪霸權的時候，然而很現實的是無後備資源的困苦情況，鬥爭策略路線上必須是一致的。最能代表夏潮系統向文化場域爭奪發言權的民歌運動，最後無法有效的捲起改革音樂的浪潮，一方面唱片工業的興起，一方面在於無法進一步的掌握台灣現有的在民間唱的歌曲；例如黃春明提到「孤女的願望」，曲雖是日本調，但歌詞確是台灣的情景「歌詞所描寫的正是農村開始移向都市的寫照」〔註一九〇〕，這場座談，反省到知識份子並沒有進入民間做調查、採集的工作，將許常惠的民謠採集，錯覺的認知這種採集的工作已經完成，「所謂的『民間』，我們已經不是民間了。」李哲洋的警告，恰如黃春明對《夏潮》知識份子自我批判，「我們常說要作歌給一般人唱，這種想法是不是太過於高高在上？」〔註一九一〕《夏潮》舉辦的「時代歌謠創作獎」正是抽離了生產關係行列的作品，也正是唐文標認為應該重新認識的「台北的中產階級文化」的生產關係，此種文化並不深刻，也不普及於當時農業仍佔主要部份的台灣。《夏潮》雖然看到了資本消費文化的滲透力，可是沒有進一步的挖到台灣社會盤根錯節的主要的生產關係，民歌的努力推廣，正缺乏了蔣勳強調的「共同語言」與「共同生活經驗」的本質，雖然楊祖珺不斷的到各個工廠、學校辦演唱會，參加過演唱會的人，卻沒有人願意繼續唱這些歌曲〔註一九二〕。也就在沒有掌握歌曲本身的社會

生產關係與生產機制，民歌運動轉入了另一類的形態，如日後自行創作歌曲的羅大佑、陳明章等等。

文化路線上的兩條路線爭論，是有起伏，卻無定論，如果沒有一致的組織路線形態時，永遠只是理論上的辯論。然而這卻預伏了日後夏潮系統集團分殊化的因素，也使得夏潮系統成員在八〇年代各自分飛後，各自在主觀認知的領域上，進行各種不同左翼理論，甚至是多元化的文化工作。

〔註一四三〕唐文標〈快樂就是文化——草論台灣的大眾文明〉，《夏潮》一卷五期，頁二五。

〔註一四四〕同〔註一四三〕，頁二七。

〔註一四五〕同〔註一四三〕，頁二九。

〔註一四六〕參考胡途松〈也談大眾文化〉，《夏潮》一卷六期，頁三四—三五。

〔註一四七〕夏傳書〈有人的所在就有藝術〉，《夏潮》二卷六期，頁六八。

〔註一四八〕馬國明〈馬克思及後馬克思主義文藝批判理論〉，頁七六。

〔註一四九〕徐莊男〈唐文標〉〈沒有子彈的槍——談計程車司機〉，《夏潮》三卷二期，頁三六。

〔註一五〇〕參考王墨林〈中國電影意識發展史〉，《夏潮》三卷二期，頁三二。

〔註一五一〕王墨林〈中國電影意識發展史(二)〉，《夏潮》三卷三期，頁六〇。

〔註一五二〕同〔註一五一〕。

〔註一五三〕王墨林〈製造中產階級之夢的文化——中國電影意識發展史(五)〉，《夏潮》四卷一期，頁四〇。

〔註一五四〕傅心名〈從「拒看國片」談電影與知識份子〉，《夏潮》四卷一期，頁四四。

〔註一五五〕蔣勳〈塑造中國人的造型〉，《雄獅美術》九十三期，頁九〇。

〔註一五六〕王墨林〈李翰祥的歷史意識〉，《雄獅美術》九十三期，頁九三。

〔註一五七〕同〔註一五六〕。

〔註一五八〕本社〈作者實為蔣勳〉〈鹿港民俗才藝競賽專訪〉，《雄獅美術》八十九期，頁一九。

〔註一五九〕同〔註一五八〕，頁一六。

〔註一六〇〕洪雨〈大膽地跳起來吧！雲門〉，《夏潮》三卷四期，頁七。

〔註一六一〕吳滔〈雲門舞集何去何從〉，《雄獅美術》九十一期，頁一一五。

〔註一六二〕蔣勳〈起來接受更大的挑戰——從文化學院地方戲劇社子弟戲演出談起〉，《藝術手記》，頁一八六。

〔註一六三〕同〔註一六二〕。

〔註一六四〕同〔註一六二〕，頁一九〇。

〔註一六五〕美崧〈新店溪畔的合唱——記雲門「薪傳」排舞〉，《雄獅美術》九十五期。

〔註一六六〕夏傳〈不知台灣生作什麼樣？林懷民舞薪傳觀後〉，《夏潮》六卷一期。

〔註一六七〕同〔註一六六〕。

〔註一六八〕同〔註一六六〕。

〔註一六九〕劉竹音〈耕莘影劇社走了現實的一大步——評「望你早歸」的演出〉，《夏潮》三卷一期，頁七七。

〔註一七〇〕李元貞〈「彩鳳的心願」演出後記〉，《夏潮》五卷一期，頁五七。

〔註一七一〕江漢〈齊益壽〉〈不是一小步，而是一大步！——評李元貞編導「彩鳳的心願」觀後〉，《夏潮》五卷一期，頁五八。

〔註一七二〕同〔註一七一〕。

〔註一七三〕王拓〈期待一批現代的陳達〉，《街巷鼓聲》，頁一六〇。關於最後一句張劍維〈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論文寫的是「你一個中國人唱洋歌，什麼滋味？」張劍維參考了陶曉清及馬國光的敘述，但這句話的問話語意不明顯，反而王拓記錄的較為清晰，比較合乎李雙澤跳上台去，理直氣壯的質問歌手與陶曉清的問話，以及李雙澤本身的意識型態。

〔註一七四〕參考張劍維〈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頁七八。

〔註一七五〕同〔註一七三〕，頁八〇。

〔註一七六〕楊祖瑑〈玫瑰盛開，楊祖瑑十五年來時路〉，台北，時報，一九九二，頁一四。其實楊祖瑑為淡江英文系學生，與王津平為師生關係。

〔註一七七〕王津平〈他不是個英雄〉，梁景峰、李元貞編《美麗島與少年中國——李雙澤紀念文集》，台北，李雙澤紀念會，一九八七，頁一一。

〔註一七八〕同〔註一七三〕，頁八八。

〔註一七九〕明立國〈從「中國民俗歌謠之夜」談起〉，《夏潮》二卷五期，頁七七。陳映真〈弄個歌兒大家唱吧，伙計！〉，《雄獅美術》七十五期，頁一四一。楊祖瑑（同〔註一七六〕）皆如此表示。

〔註一八〇〕明立國，《夏潮》二卷五期，頁七七。

〔註一八一〕鄭盈湧〈我們的歌，我們的根〉，《夏潮》四卷四期，頁三九。

〔註一八二〕同〔註一七三〕。

〔註一八三〕夏潮本社〈民歌座談會記實〉，四卷四期，頁五一。

〔註一八四〕以下發言皆為此座談會記錄。

〔註一八五〕夏潮編輯部記錄〈歌從哪裡來？〉，《夏潮》五卷五期，頁六四。

〔註一八六〕同〔註一七六〕。

〔註一八七〕同〔註一七六〕，甚至毛錡倫幽默的對楊祖瑑說「情治單位認為你在搞學運及工運！」。

〔註一八八〕同〔註一七六〕，頁三四。楊祖瑑辦的上百場演唱會，均由其設計主持，而歌手「捧過場的」有潘麗莉、吳楚楚、王夢麟、鄧志浩、鄧志鴻、邵肇政、施碧梧等，且為義務幫忙。但其實主要固定成員為溫金龍、韓正浩、鍾紹蘭、王永

等。

〔註一八九〕同〔註一七六〕，頁三六一四〇。

〔註一九〇〕歌詞裡有「農村的播田期，日頭曬鬢邊，田底的阿伯仔，繁華的台北都市，要從哪裡去？……」，同〔註一八五〕，頁六二。

〔註一九一〕黃春明與李哲洋的對話，參考〔註一八五〕，頁六七。

〔註一九二〕同〔註一八五〕。蘇慶黎在座談會表示：在廣慈博愛院演唱後，她在一個月後碰到博愛院的少女，問她會不會唱「美麗島」，她說會，當蘇慶黎邀她再唱一次時，博愛院少女不肯唱了，就喜歡唱「負心的人」歌曲。

第三章·階級建構與民族意識 ——鄉土文學論戰與現代化論戰的本質

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是一場擴延至不同知識文化詮釋系統的政治鬥爭，此外，牽引出更為廣泛的知識文化系統的重新定位，一九七八年的現代化論戰成爲台灣知識文化各系統佔位大風吹的重要時刻，傅大爲認爲「一九七八年，鄉土文學論戰深化，配合了當年的極度激烈的政治選戰，以及年底的中美斷交，在這一連串的大環境中，許多文化知識團體都逐漸要調整、甚至重新定位他們在生態圈中彼此的相關地位。」〔註一〕知識文化圈在七〇年代末期的兩次論戰風暴中，各知識文化詮釋系統紛紛提出了不同的思想策略，及攻擊位置。本章將對自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的兩次大型的意識型態思考論戰，對其引爆的議題進行分解，探討夏潮系統在論戰中對階級概念的建構與掌握，以及在論戰中「階級」與「民族」結盟的策略意義。

第一節·鄉土文學論戰的社會基礎

研究回顧

第一節及第二節將對環繞鄉土文學論戰綱發出來的議題，稍做釐清；首先回顧過去對鄉土文學論戰較有系統研究的論文。最早對鄉土文學論戰有全貌性的研究，是陳正醒於一九八一年一月發表在日本《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三號的《台灣における鄉土文學論戰，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後由署名路人翻譯成《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轉載在一九八二年八、九月的《暖流》（黨外雜誌）。陳正醒企圖對鄉土文學論戰裡迸發出的問題理出一個論戰的派別主軸。陳正醒認為一九七七年四月份的仙人掌雜誌上，王拓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銀正雄的《墳地裡哪裡的鐘聲？》及朱西甯《回歸何處？如何回歸？》三篇文章為論戰開端及典型。王拓文章否定了「鄉土文學」的形式，而擷取「鄉土文學」所擁有的普遍而深具發展性且有意義的內容的議論（註二）。朱西甯對鄉土文學採取著懷疑及批判的態度：即使是所謂的鄉土文藝可以一時風行，只怕終將會流於地方主義，規模不大，難望成其氣候（註三）。朱西甯把持著「中原」中心與「台灣」邊陲的概念，「台灣之被日本佔據，……儘管台灣省的鄉賢們如何為保衛民族文化而盡力，

甚至流血犧牲，仍不能免的這其間要與繼續生新的民族文化主的有所脫節。」（註四）銀正雄則是藉批判王拓的墳地鐘聲，指出「反映社會內部矛盾」的現實主義文學是「鄉土文學的變質」，如果是變質的話，本質是什麼？陳正醒引張系國的觀點替代銀正雄的問題：鄉土文學有兩個特色，尋根與反抗。亦即南亭（王杏慶）指出的五〇、六〇年代「以台灣鄉村事務為對象，而以素樸的寫實主義去創作的文學」（註五），這種素樸的寫實主義文學才為銀正雄認同的原來的鄉土文學，銀正雄攻擊王拓的鄉土文學是「赫然有仇恨、憤怒的皺紋，我們也才領悟到當年被人提倡的『鄉土文學』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恨等意識的工具的危機」（註六），具破壞的仇恨心態。

一般認為開始攻擊鄉土文學是從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彭歌在《聯合報》連載《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一文，指出一九七六年初以來的文學評論中有「不正確，甚至有害的」（註七）論旨，指名道姓的批判了王拓、陳映真、尉天驄三人的文學評論文章。接著八月二十日余光中發表《狼來了》，劈頭就說「工農兵的文藝，台灣已經有人在提倡了！」（註八）陳正醒認為彭歌及余光中文章為整個論戰的導火線，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全國第二次文藝會談召開，緊接著九、十月間攻擊鄉土文學的文章大量出現在報紙雜誌上。但是在這些攻擊裡，「鄉土文學」本身並沒有被當作重要的問題。」（註九）「反論」的一方包括了「立法委員胡秋原為首的侯立朝、王曉波、曾祥鐸等民族主義者」，亦即這些民族主義者的加

入，鄉土文學轉向了民族文學的提倡，「即以『現實主義』及把『民族性』當作重要支柱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學」的延長線上。」〔註一〇〕正因爲轉向了民族文學，同時論戰又含括了台灣經濟觀的不同，王拓與孫震對台灣經濟爭執的焦點，「一是經濟發展與經濟平等的調整問題，另一是依存外資以資發展經濟，與經濟爲主而反帝國主義之間的調整問題。」〔註一一〕並且也以民族主義否決了朱西甯，陳映真更批評其爲「一種中原沙文主義思想的偏見」。

陳正醒最後總結「其所以對『鄉土文學』矚目，正是對土地與人民的關懷普遍提高的結果。……或多或少包含著的社會正義與社會改革意識。」〔註一二〕基本上陳正醒的研究放在論戰的過程，釐清論戰的幾條主軸線，並且觀點是放在「文學」身上，所以他認爲《仙人掌》第二期的王拓、銀正雄、朱西甯三篇文章是後來論戰文章的原型。陳正醒從文學來觀看論爭，的確深入到核心，但從運動戰的觀點看，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五日《中國論壇》舉辦的「當前的中國文學問題」座談會，才是導火線之因，各種派系論述在當時均紛紛亮相，各種詰難與論辯語詞早已爆發出火花，從運動攻守的策略位置來看，雙方所構置的炮壘陣地，早已蘊藏在一九七六年末及七七年初期，雙方所佔領的政治位置。

一九八六年，李祖琛曾以陳正醒這篇文章來作爲其新聞研究的碩士論文切入點〔註一三〕，其副標題「傳播結構的觀察」，想藉由文學論述查探台灣言論訊息的散播網絡，並借此分析鄉土文學論戰的言論影響力，而且他繼續觀察了八〇年代陳

映真提出的第三世界文學與李喬、宋冬陽（陳芳明）提出的台灣本土論文學的對壘，但是李祖琛只是把S-M-C-R-E (Source, Message, Channel, Receive, Effect) 拉斯威爾 (H. D. Lasswell) 的傳播方法論，套入陳正醒的鄉土文學論戰的文學意義傳播過程，沒有進一步分析訊息傳播的運動意義。但至少李祖琛在論文最後，提供了另一個檢視的方法論，即葛蘭西的「霸權論」(hegemony)，李祖琛認爲霸權論有其觀察法的具體貢獻，「優勢文化團體藉著官定的意識型態，挾著壟斷性的各式教育媒體不斷進行政治社會化，使系統內的份子服膺其統治理念，使社會趨於安定，那些試圖打破統治神話的分歧份子自會被視爲異端，而爲社會上多數人所拒斥排除。」〔註一四〕其實李祖琛對葛蘭西的理論僅止於介紹，並未運用葛蘭西的理論架構觀察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殊爲可惜。

接著在一九八七年七月的《南方》雜誌以「集團製作」的模式，製作了一個「鄉土文學論戰十年」的專題，共五篇文章，分別以政治、文化工業、傳播結構、文學理論、文化霸權的角度審察及批判了當時的鄉土文學論戰，以及論戰後的路線分歧。〔註一五〕其中較爲注意的是江迅的文章，江迅以文化霸權的革命內涵來理解這場運動，他指出「鄉土文學論戰，名爲『文學』論戰，其實，卻是不同文化霸權競逐優勢的迂迴革命；內涵於商品化邏輯庸俗無根的滲透力量，則進一步扭曲了各組詮釋體系的實質內容，混淆了敵對的聲稱。……」〔註一六〕既然它是一項「迂迴的革命」，誰來革命？革誰的命？江迅區分了三組文化詮釋體系，一爲黨國

教化詮釋體系，一為商品化詮釋體系，最後為論戰的主體——反教化詮釋體系，也正是這三組文化詮釋體系展開了「不同文化霸權競逐優勢的全面鬥爭。」

一九九一年一月《中國時報》製作了「回顧鄉土文學論戰」專輯，刊出了蔡源煌、葉石濤、陳映真、黃春明、張大春的作品（註一七），陳映真與黃春明有著同樣沈澱式的反省，亦即必須再深入的思考、理解整個社會的實體，也只有以創作代替文學的論戰。蔡源煌則認為「論戰」是文學的「典範更替」，「對峙的兩造，一方是中國現代詩和「現代派」作家——尤其是歐陽子、白先勇、王文興；另一方是文季季刊的兩位主力人物尉天驄及陳映真。」（註一八）亦即從現代文學邁向現實主義文學兩造之間的對抗，就文學觀點蔡源煌認為反對西化文學的一方，缺乏文學進化史觀和世界觀（註一九），並且鄉土文學論戰造成四個後遺症：一、學院裡文學系的沒落；二、外國文學介紹銳減；三、文學閱讀品味的「逆轉」（指轉向張拓蕪、三毛、席慕蓉的消費休閒作品）；四、分離意識與統一意識的爭辯。蔡源煌基本上跳脫了鄉土文學論戰的歷史基礎，他所談論的是從論戰後延續至八〇年代文學界的現象，後設立場過於明顯，因此引來楊照的反駁。

楊照在一九九一年四月份發表〈惡化的歷史失憶症〉，楊照認為《中國時報》舉辦的「回顧鄉土文學論戰」專輯，這些討論並沒有進入到當時的歷史情境，「這一波對鄉土文學論戰的注意，很普遍將「鄉論」照其字面所指，放在「文學」的範疇來理解，並進而用八〇年代後期縮小解釋的「文學」意圖來概括「鄉

土文學論戰的歷史地位」。（註二〇）以歷史回溯的角度來看，他認為「鄉土文學 v.s. 現代主義」不是實情，「官方意識型態」才是真正的對手，論戰的核心是「產生文學的社會、經濟基礎，而不是文學本身。」也因此必須以歷史方法來同情理解，「官方意識型態背後夾帶的集體暴力威脅，注定了這不是一場公平的理論競爭。」所以夏潮系統採取迂迴式的社會經濟分析，「這樣一個左派式的圖像卻不得不自覺或非自覺地躲在一些修詞的策略後方，才不至於立即招來無情的打殺。『三民主義』、『蔣院長』、『育樂兩篇』等之所以出現在論戰中，離開了這個脈絡、背景便無法理解。」（註二一）官方意識型態力量的強大，可以藉由座談會興起一場論戰（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全國第二次文藝會談），也可以由主導另一場的座談會（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八日國軍六十七年度文藝大會）消弭論戰的進一步的擴大與政治化。楊照提供了一個研究的核心問題，正因為黨國政權力量的強大，相對的內部的社會、經濟的基礎是什麼，對這些基礎的認識與分析，才是夏潮系統面對論戰的立場基礎。

一九九二年藍博堂也以鄉土文學論戰做為其歷史研究的論文，《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及其餘波——一九七一—一九八七》（註二二），藍博堂仍以陳正靛的文章為其研究的藍本，加上松永正義的〈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探討族群認同的歷史形構論文，由於其論文延伸到一九八〇年代的統獨論戰，以松永正義的五論式分法（正統中國意識、台灣獨立論、現代化論、民族主義論、台灣本土化論）把握了他在政

治意識上的派別區分，以松永正義的分析觀點，擴大陳正醒的論文的內容。所要注意的是藍博堂原本不是以「族群」作為分析基礎，他企圖以「文學」作為基本分析架構，構築一套鄉土文學史，然而爲了將七〇年代與八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聯繫起來，藍博堂反客爲主以「族群」作爲「文學」的分析焦點，因此他認爲葉石濤、陳映真與朱西甯三個的文章「是另一個意義深遠的三角習題」（註二三），接著他討論八〇年代的鄉土文學陣營的分化，即以陳映真與葉石濤、李喬的「中國結與台灣結」辯論作爲其分析的主軸，八〇年代的鄉土文學歷史變成族群意識論戰的詮釋模式。但藍博堂最後又以蔡源煌的四點後遺症，爲其結論的重心，鄉土文學又成爲現實與現代主義之辯。藍博堂忽略掉李祖琛的傳播結構檢視方法，也沒有採取《南方》「集團製作」的批判性文化霸權的論述，也似乎並不同意楊照的說法。其論文頭尾的分析模式不相統屬，成了相當怪誕而矛盾的現象。

然而以族群認同來分析鄉土文學論戰的意識型態，七〇年代持台灣意識論者並沒有參與論戰，不論是不敢抑或不願參戰，至少沒有勇於作戰，台灣本土意識論未凝聚成一股政治、社會抗爭意識；也顯示了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陣營不是單一的同質性團體，是以《夏潮》爲中心陣營的結盟性同質團體，但在整體做戰陣營中，有著相同的立場基礎。在藍博堂結論中還提出，因爲《夏潮》與《中華雜誌》的結合，《夏潮》「社會主義性格被收斂了，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的立場至少勉強保住了」（註二四），此論點站不住腳，鄉土文學論戰後夏潮系統開始推動文

化造型運動、民歌運動、參與政治選舉以及走向工農漁礦社會階級調查的《春風》雜誌，夏潮系統似乎走出文學論戰的陰影，反而開大門更明目張膽的進行左翼實踐行動，爲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分析出入呢？藍博堂覺得鄉土文學論戰最後以民族主義收場的兩點關鍵：一、就公開文字很難區分馬克思與三民主義的思想歸屬；二、當時文化界的反應政治力量的直接介入會引起巨大的反感（註二五）。是誰很難區分思想歸屬？爲什麼要區分呢？文化界反感的力量大於政治力的介入嗎？鄉土文學論戰談論的只是文學上的族群歸屬嗎？對於這些論點的質疑藍博堂把握得過於簡略，並且未仔細觀察夏潮系統在七〇年代末期的實踐行動，僅僅觀察靜態的歷史文獻，而不查察歷史的實踐活動，使其分析結論走樣了。

必須說明族群認同的意識型態所懸繫的是朝向政治部門的提法，正陷入楊照提的「縮小的文學觀點」，文學論戰局限在政治意識光譜裡的族群、國家認同框框內，族群、國家認同僅是政治目的之一，但不是意識型態鬥爭的全部，亦不是文化霸權競逐的全部。夏潮系統的民族主義在八〇年代式微，台灣本土化論也就是台灣人意識卻開始「大聲喊出來」，但仍然是另一種民族主義論的政治化而已！族群認同的政治化已非本文研究的重點，暫待後者研究了。

一、社會背景

葉石濤在《台灣文學史綱》給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概括性的說法：

「鄉土文學論爭已經不只是文學路線的爭執，它關係到戰後整個台灣的經濟、政治、文學、教育各個層面，代表了人民在日趨孤立的環境下企求創新的突破，民主與自由的革新思想。」（註二六）鄉土文學論戰會擴及到經濟、政治、文學、教育等層面不僅僅在議題上涵蓋了各層面，主要在於參戰者也涵蓋了各個層面。使得所有談論七〇年代的文章，不得不以最醒目的方式注視到論戰的過程及影響。

夏潮系統等於以文學來叛變六、七〇年代資本主義與國民黨官方架構起來的思考模式，爭奪文化霸權的全面性挑戰。然而為什麼是文學？七〇年代初現代詩論戰開啓了社會意識論戰的戰場以及空間，「唐文標事件」所提示的文學寫誰？為誰寫？怎麼寫的問題，同時拉高到文學與社會關係的層次來討論，在這條路線上開展出來的文學路線，成了批判的現實主義的文學路線。是故夏潮系統抓到了這個方向，給予其自身對文學更大的期許，也有著更大的使命，「鄉土文學論戰只不過是現代詩論戰的延長，它試圖理論化。」陳映真回憶整個論戰路線的理論脈絡：

「左翼的陣營裡面，常常透過文學的論爭來發展它的思想，幾乎沒有例外，因為左翼文學理論有一個重要的東西，就是會問：文學是什麼？文學為誰服務？文學寫什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任務是什麼？都是這些嘛！那他主要目標是什麼？就是要推翻政府嘛！推翻現在的生產關係嘛！比如說，鄉土文學說我們要寫大眾，大眾是誰？這還要進一步的階級分析啊！那就得分析當時鄉土文學論戰時，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是什麼？在經濟上，支配階級是誰？最底層的是誰？在文學上說

proletaire 民衆這個字，在當前階段指的是工人或什麼階級。所以這個本身就是左派運動的大綱大領，為什麼寫它？人民是誰？街上哪些人是人民？那這就涉及階級分析；為什麼是他們？那就涉及社會分析；為什麼要寫這些人？因為他是改變當前歷史社會主要動力；你改變誰呢？那他的分析結果也不像台獨那樣泛泛外省人的國民黨，他可能分析出在國民黨這種獨特的 state 下面，所養育的財團資本。」（《訪問錄》，頁四六九）

但是問題仍在，為什麼這個推翻政府、生產關係的戰場，要以文學的領域範疇進行階級分析、社會分析、經濟分析？

「……從社會分析的部份、經濟的部份，比方說外銷加工出口產業資本比例，看起來這跟文學有什麼關係？是有這一面，可是恰恰因為它的關係比任何文學都密切，它要解決文學寫誰，寫什麼，就是要說明這些鬥爭的性質是什麼，你就要寫什麼，那當前社會階級鬥爭的情況，首先就要瞭解階級矛盾是什麼？瞭解階級矛盾、鬥爭的本質，那麼瞭解整個變革運動的總方向。」（《訪問錄》，頁四七〇）

如果陳映真說法是正確的話，鄉土文學論戰裡頭具有一定程度運動方向的指導立場，這就無法解釋具有一樣立場的夏潮系統成員以及當時的鄉土文學作家，為什麼無法形成一個組織而僅僅是系統集團？王曉波認為「這裡面大概只有陳映真是比較自覺的，其他的只能是一種自發性的，工農兵文學必須是一種自覺的，用共產黨的話來講，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必須是武裝過的放在裡面，那他

們完全沒有哇！」（《訪問錄》，頁四三一）即使是沒有階級武裝的自覺，鄉土文學論戰中夏潮系統成員卻又是一致性的與官方立場論戰、對話，為何沒有階級武裝的作者，參與論戰時卻有一致性立場？因此本文想討論的是夏潮集團做戰立場的共識基礎在哪裡？進一步要問的是夏潮系統在論戰中試圖達成的理論目的是什麼？借用葉石濤說法就是「人民在日趨孤立的環境下企求」什麼樣的「創新的突破」？

一九六〇年台灣政府公布《獎勵投資條例》，一九六一年開始實施第三次經濟建設計畫，但此時台灣人口遽增，就業壓力強大，爲了穩定就業與產業邁向工業化，一九六六年在高雄市設立第一個加工出口區，之後又設立楠梓、台中加工出口區，台灣在擁有《獎勵投資條例》與加工出口區的廉價勞力兩大誘因下，六〇年代後半台灣的外國資本投資大幅增漲，美、日資本開始將需要勞力密集型的產業向台灣投資設廠。

台灣進入了國際資本主義分工體系的一環。日本資本因爲日本國內經濟高速增長，工資上漲、勞動力不足，加之環境保護概念升起，限制公害等因素，日本資本開始向南韓及台灣等東南亞資本邊陲國家，進行大量資本投資，從中可以看到日本在一九六六年至七〇年中，資本大量進駐台灣的熾熱狀況。進入一九七〇年代雖然有政治事件、外交孤立的危機不斷出現，七〇年代除一九七四年石油危機經濟增長爲零外，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九年，台灣年平均增長率達百分之十。

從而台灣原以農業爲生的人口，在低米價的政策實施下，農業勞動人口被大量

擠壓轉向工業部門，可以瞭解農業勞動人口移往工業的狀況。一九五五年專業農戶數佔百分之四十，兼業農戶佔百分之六十，一九四九至五三年土地改革後，自耕農增加。一九六〇年專業農家增長爲百分之四十八，第一種兼業農指仍以農業爲主的農家戶有百分之三十，第二種兼業農以兼業爲主有百分之二十二，兩種兼業農共百分之五十五。一九六五年專業農爲百分之三十二，第一種兼業農增多爲百分之四十一，第二種兼業農百分之二十七。一九七〇年專業農百分之三十，第一種兼業農移動的過程中仍有百分之四十一，第二種兼業農爲百分之二十九。進入一九七五年專業農家只爲百分之十八，第一種兼業農增加爲百分之四十八，第二種兼業農也升爲百分之三十四。一九八〇年代專業農劇降百分之九，第一種兼業農上升爲百分之五十六。

七〇年代正是勞動力從農業轉向工業的過渡，第一種兼業農的戶數比率急遽增加，代表了台灣人在脫離農業社會的臍帶中，爲求生存而移往新興工廠工作，卻又無法忘懷傳統農地耕作生活的痛苦現象，產生了兼業農在一九八〇年達到百分之九十一的歷史高點。面對社會急遽大轉型的人民，在政治力沒有解放的威權性政權支配下，社會階層流動的唯一出口即爲透過考試升學，出國留學往上階層爬升。因此所謂「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升學教育觀念，主宰著整體的教育文化體系。

這也顯示黨國教化詮釋體系全面控制的「反共抗俄」、「光復大陸」等，神聖

使命的支配體系，隨著進入國際分工體系，經濟現代化的轉換，權威的控制系統出現了漏洞。由於國民黨長久忽視台灣歷史的內部情感，以及面臨轉型的現實生活矛盾，人民開始在漏洞中尋找出路：一為政治的遁逃，隨著教育普及，藉著留學到國外機會，成了逃避高度政治馴化的管道。另一為無法忍受長期的政治控制與經濟擠壓下，繙發出底層的社會問題。

二、世界圖像

《夏潮》創刊到鄉土文學論戰結束，大約有兩年的時間，《夏潮》對外國資本引進台灣具有的極大的反感，這反感集中表現在它的世界觀裡頭。最主要因蘇慶黎受到越南戰爭思潮的衝擊，她在台大旁的馬麗諾修道院看到越戰的恐怖真相，與美國國內反越戰氣氛的升高（註二七），促使她對美國這個「自由民主天堂」的反省，「當越戰使整個美國的社會有陷入整體崩潰的危機時，美國國內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批判和反省，才形成一股潮流，而這股潮流最後也影響到台灣」，她企圖對美國、日本的進一步認識，蘇慶黎延續《台灣政論》的「放眼看世界」專欄，於《夏潮》開闢「世界之窗」。

陳鼓應將這個專欄裡討論美國的部份，分為三類文章：一、介紹美國金權政治與美國式民主：如〈誰掌握美國權力〉（一卷五期）、〈美國的真正民意〉（一卷九期）等。二、報導美國國內的社會問題：如〈種族歧視〉（二卷二期）、〈美國

各機構對種族歧視的影響〉（二卷三期）、〈富裕中的貧窮和絕望——美國低階層社會面貌〉（三卷五期）、〈電視節目暴力與美國社會〉（三卷六期）、〈疏離感和美國文化〉等文章。三、披露美國軍政及經濟的對外活動：如〈軍火貿易與中東和平〉（一卷五期）、〈中央情報局與黑手黨的關係〉（一卷六期）、〈美國參與越戰的四大錯誤〉（二卷二期）、〈跨越國界的電子工業生產〉（三卷六期）等文章。（註二八）

如同陳鼓應所說的，「僅從上述文章標題所顯示的意義，就可以構繪一個美國形象的新素描」，但是這些文章多數是翻譯外國雜誌上的報導，比較清楚的《夏潮》式的資本國圖像是最後的兩篇文章，署名林仲容〈美國參與越戰的「四大錯誤」〉一文，以美國國務卿范錫在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發表承認美國在越戰中所犯的四點錯誤的新聞資料（註二九），林仲容藉著范錫的話說明美國式民主是：「政府是執行大資本家意願的機構；議會是『百萬富翁的俱樂部』……大資本家成爲人民之主，他們控制著美國的新聞、出版、電視、電台，壟斷民意，操縱美國政策的意向。」以及美國式自由：「在美國誰的經濟力量大，誰的自由量就多，這就是美國式的自由。」（註三〇）他結論是「亞洲人民不需要西方民主」，標顯出反帝國主義的基本態度，這篇對資產階級的民主方式提出的反駁話語，運用馬克思主義語言的轉化，說明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本質作用。

另一篇葉文祥的〈跨越國界的電子工業生產〉（三卷六期）進一步說明了爲什

麼台灣加工區的外國投資工廠，以電子零件加工居多。電子工業是個高度技術的工業，但是其設置起碼的資本額不用很多，可是爲了競爭以及日新月異的技術革新，不得不壓低生產的勞力工資，降低高成本的自動化裝配，改採高度勞力密集的低級技術低工資。此篇文章分析了電子跨國公司在設廠時的考慮，以低工資作爲第一考慮墨西哥、新加坡、台灣等，即使在美國也設在沒有工會組織的東北方，並且雇用女工、同樣的工資還比男工少一半。並且電子跨國公司最大的特點：「對電子公司而言，若不幸工廠所在地不能保持低水準的工資，而又同時有源源不斷的勞工供給，則它會移到其他工資更低的地方。」（註三一）對資產階級民主與跨國公司在第三世界國家運作的理解，對世界資本的霸權構築，《夏潮》在這兩篇文章中已經提出拆解的批判論述，同時期，批判的力道，逐漸的脫離道德層次的訴求，運動位階拉抬到經濟政治層次。

對美國跨國公司基本構造分析下，同時母國做爲資本輸出的來源國，第三世界就成了美國資本壓榨勞力的地區，《夏潮》展開了介紹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的軍事以及經濟活動，《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商業活動》（一卷五期），《中東石油，是資本主義所能掠奪的最後一塊肥肉》（四卷三期）。但同時接續著美國反越戰的反省，藉由王津平在淡江的教學方便，帶動淡江的學生，開始翻譯有關黑人運動的文章、詩及小說，如黃朝洲寫《黑色的怒吼——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簡史》（二卷六期），翻譯Chester Himes的《美國黑人小說家的困境》（一卷五期）。

另外對日本資本擴張的介紹，以蔡仲章爲主，翻譯了大量關於日本經濟向外延伸的擴張活動，《日本與東南亞的經濟關係》（二卷六期、三卷一、二期，分三期刊登）、《日韓經濟合作真面目》（三卷三期），《日本帝國主義的大本營》（四卷一期），《美國大力推動下的日本資本主義》（二卷一期）等等，從二次戰後日本國力在麥克阿瑟刻意的扶植下，逐步的恢復經濟力，甚至進一步向東南亞各國擴張，新加坡、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印度等。有趣的現象是日本對東南亞各國家進行大量的資本投資，以及干預到東南亞國家的政治運作，在蔡仲章介紹的文章裡交代得相當詳細，唯獨日本對台灣經濟入侵的狀況，一字不提，也可以看到《夏潮》對政治壓迫的敏感度，「來自某一方面的壓力一直沒有斷過，而且這種負擔是一天比一天沈重。」作爲總編輯的蘇慶黎感受到來自官方態度的政治暴力似乎源源不斷，「我最艱鉅的工作便是要不斷地戒慎戒懼地揣摩官方所容許的言論尺度——那就是毫無客觀標準可言的言論尺度。」（註三二）由此可解釋當時的言論自由箝制的脅迫性。然則，以美國作爲其批判的對象，隱然將台灣擺置在邊陲國家的第三世界國家群裡。

三、台灣政經圖像

對台灣本身經濟結構的理解，在一九七七年中期鄉土文學論戰前，在《夏潮》裡看不到具有系統性分析的文章，此時討論的焦點在現代化論用以當經濟指標的G

NP。例如呂理輝（李慶榮）〈知識份子與廢物〉（一卷六期）、江帆〈無用之大用——也談平均每人所得〉（二卷一期）、李慶榮〈雞啼鬼走〉（二卷三期）、唐文標〈人的幸福才是指標〉（二卷六期）、許國偉〈誰在埋葬民主——和信興案顯示企業醜聞愈演愈烈〉（二卷五期）。夏潮系統反映出對國民所得作為經濟發展的指標，無法認同「平均」的定義是在數目字上的定義。李慶榮在批評高希均的文章裡頭說到：「平均所得，一方面遮掩了資本家的極高所得，也就遮掩了資本家的罪行，一方面又遮掩了窮苦人家的痛苦。在平均所得這塊遮羞布的掩蓋下，使別人不知道社會上的情形是：只有極少數人賺大錢，過窮奢極侈的生活，及多數人卻在擺地攤，……在平均所得的數字愚弄下，人民受了麻醉，忘了痛苦，以為平均所得是逐年提高，因此，不知道起來要改造社會。」（註三三）

其間甚至以想當然爾的道德觀點指責整個經濟發展的社會矛盾。例如李慶榮批評《中國時報》對勞工問題的社論：「《中國時報》說：『西方名哲之士早就預言統治一個民主自由國家的主要力量有三：政府、資本家、與勞工。事實上，西方民主國家現在情況正是如此。』其實，這種話完全狗屁。因為真實的情況是：統治西方國家的是政府，而政府又由資本家控制。至於勞工，那是由工會控制，工會又由工會的頭子控制，工會的頭子則由資本家收買。」（註三四）這種道德性的粗暴批駁，將整個「西方」視為整體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對於「西方」沒有進入較為細緻的階級分析，從而成為相當機械式的反資本主義道德指涉。

唐文標較為細緻的以其數學教授的觀點，寫了一篇老師與學生對談GNP的數學分析，唐文標先同意GNP是個統計測度，但他不同意把利潤和消費放第一位的經濟學，「GNP不外計算了民衆在市場花錢了的消費貨物，這些貨品是否必須？是否令民衆更健康和更快樂？」「無目的的經濟成長和利潤至上的結果，世界已被污染到不可人居！」（註三五）對現代經濟學唐文標首先提出「這是一種令人『憂鬱的科學』！」夏潮系統拆解了資本主義進行經濟不平等發展下的煙幕彈——GNP，透過唐文標一問一答抽絲剝繭的分析，誠然此時沒有一個整體的經濟分析研究，但已經抓到現代化經濟學的矛盾核心，數目字的成長不是實質的發展。而且王拓後來與孫震辯論台灣經濟是否為殖民經濟時（一九七七、十），王拓引用的資料三宅武雄著《台灣經濟動向探討》，透過徐代德的書評〈讀「台灣經濟動向探討」——談發揮「國際感覺」〉（二卷四期，一九七七、四），可瞭解夏潮系統成員已透過初步的政治經濟學經驗，藉這本書對台灣經濟進行全貌的觀察。

在政治控制與經濟急速發展的狀況下，社會問題就逐漸的浮現了。例如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科威特籍油輪「布拉哥」號自波斯灣駛往基隆時，在台灣北海岸觸礁擱淺，社會輿論注重的是石油污染海面造成沿海的污染問題，以及油料損失。但是《夏潮》出動大批人馬前往採訪、調查（註三六），甚至蔣勳在《雄獅美術》還做了環境造型專輯，關注的是漁民遭受到石油污染海面後，漁船受到油污而無法發動出海捕魚，石油污染海岸，造成住家、農地被污染狀況，《夏潮》的焦點注意到

「人」受困苦的情況，漁民一天不出門打魚，生活立即遭受威脅，當時政府要求漁民協助撈油，撈得一桶油可以換錢，但最後沒有任何單位收購撈起來的廢油，其時的國民黨對社會救助與社會福利是沒有概念的，受災漁民只能自生自滅，自認倒楣，《夏潮》特地凸顯當時國民黨愚民的撈油補救錯失。以人道主義關懷社會的態度除了社會災害報導外，《夏潮》特別關注教育與醫療的個別問題上。如唐建國〈照顧國中就業學生的工作福利〉（三卷一期）、金靖仁〈與國中生談就業輔導〉（三卷一期）、勤夫〈國中教育之我思〉（三卷三期）、陳志雄〈台灣公共衛生制度的探討與展望〉（三卷五期）、陳永興〈山地醫療衛生概況〉（三卷六期）等。

四、階級圖像

在「階級」跟「人民」的關係方面，《夏潮》對勞動階級的報導比起社會新聞的報導更加廣泛。王杏慶在一九七六年九月提出〈台灣地區的勞工權利問題——一種嘗試性分析〉，所謂嘗試性分析，在於以社會學的行爲互動觀點分析權力的掌握。重要的是王杏慶並不是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台灣勞工，而是藉著權力的行爲互動，分析台灣勞工，開啓以社會科學方法分析台灣的先例。他認為台灣勞工欠缺強烈的「同類意識」，用馬克思的語言應該是階級意識，他不用階級意識的原因在於台灣的勞工是「準都市無產者」的身份，「此一『準都市無產者』的勞工並未割離其與鄉村母體的臍帶。逐年來農家所得中非農業所得的急劇增加至接近百分之五

十，顯示出台灣地區由農轉工，成爲勞工最大來源的農家，其所外流的勞工，本質上是兼業的，他們的作爲勞工，主要的目的是在減輕原來家庭的沉重生活負擔，而不是離開農村，企圖藉勞工工資作爲終身立命的依靠……」（註三七）亦即勞工對自己的權力是不在乎的，生存爲工作的唯一目的，但也可能無法在乎有沒有權力，並且他還有農村作爲退路。可是王杏慶對於資本主以及國家的權力並沒有界說得明白，或許是局限在互動論觀點，或許是威權體制時空條件上的限制，結論不是勞工要有權力抗爭意識，而是「總之，資本主與勞工間的『職業溝通』（occupational communication），是非常必要的。」

接在這種「嘗試性分析」後，《夏潮》開始報導工人、農人的生活問題。吳福成發表〈鐵路工人的悲歌〉（一卷六期）、楊青矗發表〈公工人員與公務人員〉（一卷七期）。一九七七年六月《夏潮》轉載楊青矗〈國內工人現狀分析〉，楊青矗以其當過十幾年工人經驗以及訪問、觀察工人的生活情況，訴說工人身爲下等階級勞動者身份的自卑感受，最主要楊青矗提出「工人有其廠」概念，「我們追求的目標是工人有其廠，建立工人分紅入股的制度，人人是工人，也是老闆；資本大眾化，使目前閉塞的家族工廠成爲開放工廠，建立良好的福利制度……」（註三八）構造一套勞資平等的工廠概念，產生在寫工人小說的作家楊青矗身上，可見他對階級不平等的觀察有相當深入的反省。《夏潮》後來刊載楊青矗關於工人生活報導以及階級平等主張的文章則越來越多。

一九七七年下半年亦即鄉土文學論戰正熾熱時候，《夏潮》卻有大量的關於工人權益、礦工、農人、童工的文章，八月王拓以柯以書的筆名發表〈三合礦工無家可歸〉、〈請聽礦工的呼聲〉、〈陳阿煌，炭礦夫！〉（三卷三期），基隆三合煤礦由於資方賺不到合理利潤，口頭聲明停止採礦，但也沒有發給礦工遣散費，又暗中將四十餘戶的礦工家庭的宿舍土地賣斷，引起兩百多人成了「身無恆產的勞動者」，王拓這三篇文章，除了報導礦工的生活無著外，還有礦工的口頭俚語，及為陳阿煌礦工的生活側寫。展現的意義是不僅僅在理論上的陳述，並且親自深入勞動現場觀察，體驗階級衝突的直接矛盾。王拓本身具有的小說語言敏感度，記錄了礦工台語口頭俚語，王拓用國語，知識份子能懂得意思翻出來，卻也凸顯了語言在階級上的差異。

署名劉阿旺發表〈請吃米飯的人，聽聽農民的心聲〉（三卷四期），陳述當時由於「農業培養工業」政策下，造成低糧價的現象。當時每公頃稻作四千八百公斤，政府收購每公頃九百七十，餘糧三千八百公斤，「市場滯銷，農民爲了要支付各種生產費用，不得不削價求售，致現時市價降落在每公斤七元左右，遠低於收購價格。」「草屯鎮有位農民，從梨山運出三千多公斤甘藍菜到草屯市場拍賣，僅得到四百九十多元，一斤約一角五分七厘，普通看一場電影約需四百斤甘藍菜。」（註三九）另外又以每農戶有一公頃農田的收入計算其每年的淨收入，約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六元，平均每月九百六十八元，當時工廠工資每月是兩千五百元左右。

羅業勤〈正視童工問題〉（三卷六期）開始檢視工廠法的結構矛盾，工廠法對於童工的保護都是概括性用語，沒有一套相應的童工保護法或青少年福利法，正當加工出口區的設立，國中生畢業就業開始增多，羅業勤討論到立一套保護童工的法律思考，其實討論的焦點已放在勞動基準法再生的探討。

透過這種深入的報導方式，有關勞資糾紛的投訴個案逐漸增多，例如署名小女工的投訴〈從電光企業公司事件談起〉，羅業勤〈從光華衛生毛巾洗染場童工事件——再談童工問題〉，張麗玉〈一個女工的抗訴〉，小農夫〈水利費已失人心〉等等，《夏潮》似乎變成勞資糾紛、經濟剝削下，勞動階級訴苦、抱怨的媒體管道，從一九七八年開始《夏潮》在下層階級生活、報導的文章內容上，棄置了人道主義式社會新聞報導，轉向深度的工農階級社會矛盾的討論。一九七八年五月《夏潮》相關於勞工問題的討論越來越多，爲了擴大談論勞工議題的正當性，《夏潮》邀請了柴松林、丁幼泉、謝深山、謝中誠來發表對勞工權益保障、勞基法的催生、勞保的給付條例等等議題，擴大由學院知識份子、國民黨立委、醫師等，藉著躲藏在專家學者的背後，確立其勞動階級立場代言的位置。在此我們必須將鄉土文學論戰的時間合併觀察，鄉土文學論戰從一九七七年中期開戰，到一九七八年二、三月接近尾聲，在論戰中，夏潮系統作家被質疑爲「工農兵文學」，但最後「頂住」（王津平語），國民黨政治力並無直接干預，而使得鄉土文學某種程度被默認、確立，也使得夏潮系統的言論具有正當性的確立了。有趣的是《夏潮》有關工農階級的文章

篇數，似乎並沒有因為論戰的指控而稍有落差，反而是討論的方向越來越明確，以及深刻，隨著鄉土文學論戰的結束，《夏潮》似乎自承了勞動階級的代言人。

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夏潮》談論工農問題不僅止於問題的揭發，轉向對國民黨公共政策正面的挑戰，以往這種挑戰夏潮藉由轉載國民黨立委的質詢稿，有著借麥克風喊話的側擊作用，如立委華愛的〈漁閩、漁霸、漁船〉（二卷二期）、冷彭〈為民喉舌——立法應對農民多加照顧〉（二卷三期）、黃澤青〈為改善漁船保險結構向行政院提出質詢〉（三卷六期）。從七月份署名小農夫的〈水利費已失人心〉開始，質疑國民黨政權下的行政機關對於民衆權利的漠視，水利會只知收費，卻沒有給水。八月署名一新發表〈請保護籌組工會的勞工〉，因台新染織場工人陳由美發起籌組工會而被資方資遣，質疑政府在面臨勞資糾紛中，立場到底站在資方或勞方？「表面上看是政府堅持扶植勞工政策；事實上，資方只是虛應故事，真正是考倒了政府的勞工政策。」（註四〇）同一期《夏潮》接著討論勞工如何面對工會的籌組，張紹達〈檢討我國當前工會功能〉（五卷二期），指明當前能夠立即處理勞資糾紛的單位：「一是由公司國民黨籍的員工所組成的黨部，另一是安全單位。」觸及到國民黨黨部權力無所不在的恐怖地步，連私人機構都能夠組成黨部，也透露國民黨與資本家的結盟，只為資方說話的態度，黨務人員「反而站在資方立場要工人們以『黨國為重』，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呼籲勞工對自己本身工作權的重視，以及階級意識的認同，「『勞工神聖』絕對不該只是一句響亮的口號

而已，而是應該要深根在每一個勞工的內心身處。工人們貢獻勞力，換取所得，分享利潤，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又有什麼好羞恥的？」（註四一）

為護衛農民利益同樣的攻擊了農會對農民剝削的控訴，蕭國和〈農會如何剝削農民的血汗〉（五卷三期）揭露官方對農會的系統控制，反而與農民形成對抗的狀態。一九七八年底夏潮系統陳鼓應與王拓參與立委與國大的選舉，在政治激烈化的參選過程中，王杏慶發表〈讓我們向農會和工會選舉進軍！——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並行論〉（五卷六期，一九七八、十二），這篇文章幾乎是《夏潮》進行階級運動的先聲。黨外政治運動經過中壢事件逐漸的整合成一股力量後，一九七八年底的選舉更組成「黨外選舉助選團」，儼然以黨派力量與國民黨對抗。而王杏慶的文章在此時出現，也顯示了夏潮系統對政治路線的看法，並非是奪取政權為唯一目的。「在台灣為了政治民主而日漸蓬勃的選舉運動，進入農會、水利會、工會，並且讓社會良知未泯滅的中小企業家，將選舉帶進公會與商會。」（註四二）（下引同）王杏慶提出從經濟基礎開始撼動整個的黨國資本體系的控制，他的論點閃過經濟決定論的階級鬥爭，提出的前提是「『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是兩組相輔相成的政治和社會概念」。不過此時他要警告的是政治由上而下發展的危機，「這樣的過程緩慢而遲滯，於社會整體利益的維護，功效不彰，被壓迫者常因持久無效的等待，而焦躁難耐，它成了社會動盪的根源。」唯政治發展的效果下，經濟發展也是與資本案妥協，而有權力單一化的傾向，造成「資本封建主義」，「在保守的行政

權力下，代表外資集團的外資商會，全然毫無對抗的權力擴張，亦受到引進外資政策的保護，外資雇傭下的勞工，遂亦無法獲得滿意程度的保障」，這種批判同時將矛頭對向國民黨：「台灣由於政黨的一元，已經造成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一元化，一元化等於僵化，政治民主變成政治分贓，經濟民主則成爲經濟利益的私相授受。」

王杏慶的正面攻擊，已經擺除了以往躲藏在各種主義、外國說法底下的隱喻批判，即使他在引用三民主義也改掉了「偉大的」字眼，變成「『也是一種社會主義』的三民主義」說法。爲聯繫經濟民主的歷史傳承，更引用了《夏潮》長期經營的台灣日據時期抗爭史，「農工等黑手及都市下白領工人們的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參與隨之提高，民國十五年的台灣農民組合成立，民國十七年台灣工友總聯盟的成立，開始了以『農工階級爲本位的運動』（蔣渭水語）」，在前面第二章一節提及《夏潮》論述台灣史時，《夏潮》到了一九七八年下半年陳烈「台灣史料選讀」的專欄所企圖解讀的是，台灣左翼力量在日據時期是整個反帝勢力的領導中心。因此在面對國民黨內與黨外的政治鬥爭，王杏慶可以說各有批判；「在向經濟民主邁進的世代裡，經濟民主的勇士們面對的最大敵人不是『對手』，反而是那些只主張政治民主而不主張經濟民主的朋友。」王杏慶企圖提出一套左翼在政治鬥爭光譜上的領導路線，以經濟民主的提法收攏在選舉政治鬥爭中繃現出來的工農階級群衆。

以鄉土文學論戰的時間脈絡來區分，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中《夏潮》對工

農階級的社會經濟問題，處於自我摸索與市場試探的階段。一九七七年後半也就是鄉土文學論戰熾熱時期，《夏潮》透過王拓、楊青矗等人進行實踐式的調查、尋訪、報導，並揭露階級矛盾，這種實踐經驗的粗糙的調查、訪問，正好成了王拓、陳映真與尉天驄在文學評論文章裡的社會經濟分析基礎，但是這種社會經濟分析已經帶有前述上下階級分裂下的既有看法，過於粗糙的社會理論夾帶著民族主義，形成了民族情緒與情感的社會道德批判，以致到論戰後期成了與胡秋原的「中國人主義」的結合基礎，構成了表面以「民族主義」收場的結果。透過鄉土文學論戰「頂住」後的民族、階級論述正當性，一九七八年春《夏潮》儼然成爲階級矛盾的代言人，並進行談論農工社會問題的擴大結盟，進一步膨脹了左翼知識份子言說對社會的影響力，一九七八年後半在愈接近選舉時，以階級觀點展開正面攻擊的火力就越來越強了。由此時間脈絡來看，鄉土文學論戰的社會共識基礎，在於階級意識立場愈來愈清晰鮮明的構造過程。

〔註一〕傅大爲〈歷史建構、邊陲策略、與「中國化」〉，《島嶼邊緣》第一期，頁一〇

五。傅大爲認爲這段歷史時空是台灣文化知識圈「知識／權力」的鬥爭關係，是一九四九年至七〇年代末期，幾次論戰中最大且最複雜的一次，也是整個左翼與左統思想路數同時亮相、積極介入的時刻，不過他並沒有說明當時的「知識系譜史」的

派系脈絡。但本文重點也不是要將整個知識系譜史，各個派系的歷史過程建構起來，這更待有能力的人做更仔細的探究。

〔註二〕陳正醒著，路人譯〈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暖流》二卷二—三期，台北，一九八二，八—九，頁六一。

〔註三〕同〔註二〕。

〔註四〕朱西甯〈回歸何處？如何回歸？〉，《仙人掌》二期，收於《鄉土文學討論集》，頁二二〇。

〔註五〕南亭〈到處都是鐘聲〉，《中國時報》，一九七七，八，十八，《鄉土文學討論集》，頁三一〇。

〔註六〕銀正雄〈墳地地理哪來的鐘聲？〉，《仙人掌》二期，《鄉土文學討論集》，頁二〇〇。

〔註七〕彭歌〈不談入性，何有文學？〉聯合副刊，一九七七，八，十七—十九，《鄉土文學討論集》，頁二四五。

〔註八〕余光中〈狼來了〉聯合副刊，一九七七，八，二十，《鄉土文學討論集》，頁二六四。

〔註九〕陳正醒〈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頁六五。

〔註一〇〕同〔註九〕，頁六八。

〔註一一〕同〔註九〕，頁六七。

〔註一二〕同〔註九〕，頁七一。

〔註一三〕李祖琛，〈七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運動析論——傳播結構的觀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八六，一。

〔註一四〕同〔註一三〕。

〔註一五〕《南方》對「鄉土文學論戰十年」做了一個專輯，共五篇文章。依序為：銅碗豆，〈從「批評的道德」到「道德化的批評」〉；譚石，〈一場轟轟烈烈的宗教儀式〉；辛築，〈論戰的舞台：一隻看不見的手〉；楊樾，〈「現實」與「寫實」：一個解不開的結〉；江迅，〈鄉土文學論戰：一場迂迴的革命？〉，《南方》第九期，台北，一九八七，七。

〔註一六〕江迅，〈鄉土文學論戰：一場迂迴的革命？〉，《南方》第九期，台北，一九八七，七，頁三四。

〔註一七〕五個人的文章分別是：蔡源煌〈評議鄉土文學論戰〉（一月四日），葉石濤〈隔海唱和乎？〉（一月四日），陳映真〈新的閱讀與論述之必要〉（一月六日），黃春明〈回到墾荒的原點上〉（一月六日），張大春〈丟帽子砸招牌——言論箝制時局的意識型態論爭〉（一月六日）。

〔註一八〕蔡源煌，引前文。

〔註一九〕同〔註一八〕。

〔註二〇〕楊照〈惡化的歷史失憶症〉，收於《流離觀點》，台北，《自立晚報》，一九九

一，十一，頁一三四。

〔註二一〕同〔註二〇〕，頁一三七—一三八。

〔註二二〕藍博堂，《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及其餘波，一九七一—一九八七》，台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二，六。

〔註二三〕同〔註二二〕，頁一九一。

〔註二四〕同〔註二二〕，頁一九一。

〔註二五〕同〔註二二〕，頁一八六。

〔註二六〕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出版社，一九九一，頁一五〇。

〔註二七〕訪蘇慶黎，《訪問錄》，頁四八九。

〔註二八〕陳鼓應《七十年代以來——台灣新一代的改革運動》，頁二七。

〔註二九〕林仲容《美國參與越戰的「四大錯誤」》，《夏潮》二卷二期，頁五七。范錫所指出的四點錯誤是：第一項錯誤是支持缺乏民衆擁護的政府。第二項是試圖在亞洲文化背景下設立西方政權。第三項是我們未獲得盟邦的支持就一意孤行。第四項是我們不瞭解以正規軍對付游擊隊時，正規軍力量的有限。

〔註三〇〕同〔註二九〕，頁五八—五九。

〔註三一〕葉文祥《跨越國界的電子工業生產》，《夏潮》三卷六期，頁七七。

〔註三二〕宋國誠、黃宗文合著《新生代的吶喊》，《訪蘇逸凡》，頁一五八。

〔註三三〕呂理輝《知識份子與廢物》，《夏潮》一卷六期。

〔註三四〕李慶榮《雞啼鬼走》，《夏潮》二卷三期，頁三四。

〔註三五〕唐文標《人的幸福才是指標》，《夏潮》二卷六期，頁四五。

〔註三六〕《夏潮》於一九七七年四月刊載了三篇文章，胡晴羽《油污下的呻吟——北海漁民向政府及社會大眾呼救》，李正松《「布拉哥」輪油災記實》，王武雄《油災搶救過程所發現的問題》。

〔註三七〕王杏慶《台灣地區的勞工權利問題——一種嘗試性分析》，《夏潮》一卷五期，頁三九。

〔註三八〕楊青蟲《國內工人現狀分析》，《夏潮》二卷六期，頁四三。

〔註三九〕劉阿旺《請吃米飯的人，聽聽農民的心聲》，《夏潮》三卷四期，頁三六。

〔註四〇〕一新《請保護籌組工會的勞工》，《夏潮》五卷二期，頁七。

〔註四一〕張紹達《檢討我國當前工會功能》，《夏潮》五卷二期，頁三六。

〔註四二〕王杏慶《讓我們向農會和工會選舉進軍！——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並行論》，《夏潮》五卷六期，頁四九。

第二節·鄉土文學論戰之聯盟作戰與集體動員

陳正醒以文學的觀點進行切分鄉土文學論戰的雙方，認為王拓、銀正雄及朱西甯的文章為後來論戰的原型，找尋原型的源頭時，自然就從新詩論戰的現代主義 v. s. 現實主義著手，其文學觀點認為鄉土文學論戰是兩造雙方的延長作戰。但即使從文學觀點，陳正醒認為論戰最後確立了「人民與土地」的正當概念，但仔細索檢夏潮系統在論戰中的論調特色，更建構了階級意涵的社會性。

現實主義本身具有的立場性與批判性，賦予其反叛與運動的性格，也就形成了爭奪文化霸權裡的道德與哲學思考的詮釋權，因此論戰過程及結果並不僅僅因為文學態度的不同，還有著不同道德與哲學體系的思考。江迅因此分析論戰的過程不僅僅是文學與社會思想的態度，是不同文化霸權詮釋模式的競逐。基本上在江迅的分析裡，黨國教化詮釋體系在七〇年代已經僵化，因為「並不深入人民的歷史情感或社會現實尋求具體的掙解，反而發明出『道統』和『法統』企圖界定黨國矛盾處境的正當性，……這種純屬『精神勝利』式的歷史連結，久而久之，便由於生活世界中具體矛盾的不斷累積與顛覆，造成教化詮釋體系『意符』與『意旨』之間的斷裂……。」（註四三）（下引同）接著竄起的是商品化詮釋體系，藉由進入國際分工體系的一環，台灣成為依賴發展的經濟形態，「這是第一個衍自日常生活世界的詮

釋體系，對個人或經濟領域，都有其具體而確鑿的意義指涉。因此商品化詮釋體系便具有不斷吸納、滲透其他詮釋符號的潛在力量。」

商品化詮釋體系本身擁有的商品化個人主義、庸俗無根的幸福意識，與黨國教化體系進行接合，同時吸納了無根本質的現代主義，以及鄉土文學，「依循享樂原則的個體化幸福意識，迅速滲透並軟化本土意識原有的顛覆抗爭意涵。」（註四四）導致八〇年代大眾消費社會的商品文學的來臨。相對於反教化詮釋體系的現實主義而言，江迅認為由於論戰焦點在藉著驅逐現代主義，忙於與日趨僵化的黨國教化詮釋體系作戰，「忽視並且不瞭解商品化邏輯無與倫比的扭曲力量」，最後導致了「不自覺淪入崩解分裂的命運」（註四五），但從前一章的文化造型運動得知，夏潮系統其實正對文化各面向進行挑戰與詮釋爭奪，例如推展民歌運動就具現了對流行歌曲的對抗，可以說夏潮系統沒有組織力量對「商品化邏輯無與倫比的扭曲力量」進行相對性的抗戰，以致民歌運動並不成功，也就說明七〇年代正是台灣商品資本重組的時期，應該說夏潮系統在政治浪潮中，未能注意到商品力量的迅速重組，以致無力對抗。

但至少他提到了商品化詮釋體系收編了現代主義與鄉土文學，而與黨國統治系統進行接合，產生「緊張共生關係」，反教化的現實主義作戰的對象本質上是僵化的黨國系統，忽略了商品化社會具有巨大的「吸星大法」收編力量。本節將以江迅的分析架構作為基礎，並結合《夏潮》發展的時間脈絡，來討論鄉土文學論戰中陣

地攻防戰的本質意義。

鄉土文學論戰後期，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六日思兼在《聯合報》副刊將鄉土文學論戰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階段是四、五月間（一九七七年），王拓文章引起的爭論，與銀正雄為鄉土文學的把脈。

第二階段是八、九月間，第二次全國文藝會談前後，各報刊發表了許多駁斥鄉土文學流弊與文學觀念偏差的文章，以彭歌與余光中為代表。

第三階段是十一月，青溪新文藝學會編印《當代文學問題批判》一書，收入七十多篇文章，對少數鄉土文學的偏差，大加抨擊。

第四階段是十一、十二月以後，《夏潮》與《中華雜誌》刊出多篇對余光中、彭歌、孫伯東、痲弦……以及《聯合報》的攻擊文章，以陳鼓應（這樣的詩人余光中）為代表。（註四六）

思兼站在官方意識型態的一方企圖對鄉土文學論戰作總結，暫不論其論點的立場，由於官方意識型態是發動攻擊的一方，從官方意識型態給予的時間分段來看論戰的過程脈絡有另一層意義。

遭遇戰——文學界短兵相接

《仙人掌》雜誌第二期刊出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

王拓首先分析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二年的政治經濟狀況，台灣陷入殖民經濟與買辦經濟之中，接著批判舊有的現代主義，提出具社會意識與民族形式的文學道路，之後認為鄉土文學一詞不足以指稱文學與社會的關連，因此要改稱為現實主義，因為：一、使人想到都市與鄉村的對立，無法負擔反抗西化文學和建設民族文學的重任。二、鄉土文學太過強調方言的話，容易陷入偏狹、分裂的地方主義。三、易成為鄉愁文學，忽略歷史和社會發展的客觀事實，陷入懷舊感傷的情緒（註四七）。銀正雄與朱西甯對鄉土文學採取著懷疑及批判的態度：「赫然有仇恨、憤怒的皺紋」、「鄉土文學的變質」、「終將會流於地方主義，難望成其氣候」。

《仙人掌》雜誌似乎是有意挑起論戰，為了開發剛剛創辦的市場，《仙人掌》第一期即策畫了政治文學專輯，有胡晴羽、朱西甯、王津平、羅青的文章，只有王津平〈打破文學中立的神話〉一文，延續新詩論戰對現代主義文學的批評，但顯然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第二期除王、銀、朱的文章，還有蔣勳（起來接受更大的挑戰）、石家駒〈瓦器中的寶貝〉、唐文標〈寄台東人〉、尉天驄〈什麼人唱什麼歌〉、王津平〈從歸國學人的公害談幾篇文學作品〉，以及持「鄉愁感傷」論的江漢〈鄉土呢？還是迷舊？〉，《仙人掌》作為一個開放園地時，卻較傾向夏潮系統，也因為夏潮系統對「立場」及「批判」的堅持，論戰不得不在《仙人掌》的文字場域展開。

《仙人掌》第二期成功的打開捉對廝殺的論戰局面後，緊接著五、六、七月的

雜誌刊物上不斷有回應文章，後來成爲《仙人掌》編輯的李利國在第三期爲鄉土文學辯論，〈從民族的苦難談起——爲鄉土文學辯白〉，他認爲銀正雄以「動機論」批評鄉土文學，失去了民族主義的立場原則，李利國覺得動機只有一個：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緊接著六、七月有吳思慧、司馬中原、許平等等的文章，但這些文章的特點是將兩邊各打五十大板，但最後結論鄉土文學的確有變質現象，但一定能順利化解：「儘管我們在文學創作的發展上，有這些病態存在，但卻不足爲憂，……寄望於安樂和諧的合理生存之境，也許該是我們共同的理想。」（註四八）等等，至少顯示鄉愿性的幸福意識，也被激盪出對意識型態的表態。鄉土文學第一場遭遇戰是在《仙人掌》展開，然而仍局限在文學界內的風暴中。

但是對這些攻擊或是貌似客觀中立的評論，《夏潮》並沒有積極回應，從王拓〈是現實主義〉的文章發表後，夏潮系統全力建構批判的現實主義理論說法，王拓在五月十日《中國論壇》發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方向〉，將現實主義綱領化：一、正確地反映社會內部的矛盾；二、文學必須能發展爲一種社會運動，或與社會運動相結合，文學才能更有效地發揮他改良社會的熱情和功能。陳映真在《仙人掌》第五期發表〈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跟王拓的政經分析一樣，但更進一步理解了「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兩分」的世界冷戰結構的資本體系地理位置，以及對資本體系政經文化的依賴。稍早在一月的《夏潮》，訪問王拓一文裡，王拓對經濟不平等有明顯批判，「工商社會的唯一動力是利潤。利潤在現實生活中講法就是金

錢。人與人的關係卑下化到單純的金錢的關係。」（註四九）夏潮系統作家群已初具政治經濟分析的瞭解，同時批判性的台灣圖像描繪逐漸在展露。

而王拓之文等於對馬克思主義的商品拜物教理論生吞活剝，從他寫〈當代小說所反應的台灣工人〉一文就可以發現，夏潮系統對生產關係製造出來的階級矛盾有很深的痛悟。王拓說明工人被壓在資本社會的底層所受到的冷漠，因爲一、由於輕視，二、由於無知，三、由於恐懼，描寫工人的事物，似乎就成爲共產黨，「爲匪宣傳」。透過不斷肯定楊青矗《工廠人》的小說，更加赤裸及粗糙的呈現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矛盾。「一切的生產設備與原料都是老闆所有，利潤所得也絕大部份歸屬於老闆，老闆爲了追求更多的利潤，便要盡量擴充、更新設備，以擴大再生產，提高生產率；而設備的更新使工人的操作簡單化，因此原來需要一百個人的工廠，因爲機器進步可能變成只要十個人即可；而機器的操作比手工技術更爲簡易省力，因此老闆爲了降低成本，又改雇工資低廉的童工、女工，結果便造成大量工人的失業，而替工商社會的老闆準備了任意支配工人的有利的剝削條件。」「大老闆的投資利潤是員工的勞動力替他創造的，如果大老闆把這些利潤獨佔了，員工是應該可以抗議，應該可以要求一種更合理的分配方式，這是他們的權利。」（註五〇）王拓已經清楚的將「生產工具私有」「階級關係」說了出來，資方實現剩餘價值是積累資本的必要條件，爲了取得更多的利潤，機器革新與利用工資低的勞工獲取更多的剩餘，而且也道出了生產工具與工人相分離，工人一旦失業，就失去了生存能

力，成了道地的無產者，甚至隱諱的提示工人要有階級意識的抗議行動。

這種赤裸的左翼理論皆在評論鄉土小說的文章裡呈現，例如陳映真爲王拓《金水孀》小說序文：「金錢是依乎『商品—貨幣—商品』的規律，而不斷循環、擴大的工商業生產行程中一個連鎖的部份。在這樣的社會中，人獲取金錢的能力，以及已經獲取金錢的量，成爲衡量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價值的强有力的標準。」馬克思主義的「C—M—C」（commer-money-commerce）商品交換定律在文學評論裡出現，人的「價值」變成用「價格」來衡量，「價格」成爲決定人的社會位階，改變文學本於「人」的價值觀的概念，陳映真的文學觀點正帶動著對商品消費觀念的反省，提出對「階級」、「利潤」、「交換」、「生產關係」在台灣發展的左翼政治經濟學的思考模式。

自然讀者開始疑惑，討論這些下層社會人民的小說，牽涉到階級、反資、反帝，跟中共的「工農兵」是不是一樣？尉天驄在五月五日淡江舉行的一場座談會中，順口說了出來：「有些人說鄉土文學最後的結果就是『工農兵文學』；但工農兵文學並沒有什麼不好，我們之中許多人都是農人出身，農人唱唱歌，工人寫寫東西，當兵的提倡軍中文學，又有什麼不對呢？」（註五一）尉天驄脫口而出的工農兵文學沒有什麼不好，引來許多官方意識型態作家的詰問：鄉土文學等同於工農兵文學？等同於共產主義文學？

在黨國教育體系全面馴化下，透過三十年來的學校思想教化與主流媒體教化，

反共、恐共的心裡態度，已經內化成爲法西斯的道德態度，再配合著國民黨長期訓練的道統與法統，以及對中共「漢賊不兩立」的敵對意識下，既不掩飾又原始呈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現實主義文學文藝評論隱現，已逐漸激化官方意識型態的文學作家。曾爲官方色彩的《中央日報》總編輯，長期在《聯合報》副刊寫「三三草」專欄的彭歌，於七月十五日至八月六日連續在《聯合報》寫了七篇短文，從〈「卡爾說」之類〉、〈溫柔敦厚〉、〈堡壘內部〉、〈傅斯年論懶〉、〈對偏向的警覺〉、〈統戰的主與從〉、〈勿爲親痛仇快〉等，一篇比一篇明確的指控鄉土文學進入了「偏差」的現實文學；「原來「卡爾」是馬克思的名字」（註五二），「毛澤東曾指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註五三），「近時有一些作品，以『社會意識』和『關心大眾』爲名，刻意『反映社會內部矛盾』；無論如何辯解與解釋，其主要的效果是在挖牆角。」（註五四）「中共對台灣的統戰功夫，……：一是利用地方意識，……：一是攻擊我們的經濟建設。」（註五五）彭歌有意識的透露、暗示鄉土文學開始質變、偏向共產主義。這種沒有指名道姓的警告，使得長期反共法西斯的道德心態，極化到了臨界點，全身漲滿，箭在弦上，只差引爆點。

對峙——擴大聯盟 v. s. 集體動員

顯然夏潮系統也聞到了來自反共法西斯道德態度的指責，夏潮系統決定正面迎擊作戰，蘇慶黎認爲與其平白無故被抓，或被停刊《夏潮》，不如轟轟烈烈大幹一

場（註五六）。八月份的《夏潮》刊出「當前台灣文學問題專訪」專輯，訪問了任卓宣、楊青矗、王拓、趙天儀、鍾肇政、劉心皇、黃春明，另外刊出三篇專論任卓宣的〈三民主義與文學〉、趙光漢〈鄉土文學就是國民文學〉、何欣〈鄉土文學如何「鄉土」〉，尤其在訪問專欄裡，訪問對三民主義文學理論有相當研究的任卓宣，訪問者問曰據時代與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是否與三民主義的文學相吻合？任卓宣斬釘截鐵的回答：「是的，兩者在實質上有相同之處，甚至是一樣的。」（註五七）任卓宣護衛鄉土文學的心態相當明顯，另外雖然訪問劉心皇的問題是「漢奸文學」，似乎不相關鄉土，但是劉心皇為《中華雜誌》之一員，對三〇年代文學論戰長期不斷的研究，這兩位的訪問讓《夏潮》堅持的鄉土文學正式披上三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政治道德色彩。同時趙光漢的文章第一次回應了朱西甯與銀正雄的詰難，以三民主義裡頭國民文學的概念，引伸等同鄉土文學注重的現實主義，「分析、反省、批判、進取的積極精神」。這份專輯的策畫，目的是在擴大聯盟的策略，任卓宣為《政治評論》發行人，劉心皇屬於《中華雜誌》，鍾肇政是《台灣文藝》的主編，趙天儀為《笠》詩刊主編，何欣為政大中文系教授，把社會代言者的角色拉入《夏潮》雜誌，延長鄉土文學討論的廣度，以及納入了關心鄉土文學的小眾媒體的同志，企圖形成統一聯盟戰線。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五日夕照落日時分，《中國論壇》舉辦「當前的中國文學問題」座談會，參與者正好是長期來相互忌恨的兩派人馬（註五八），在雙方持有著

堅定的立場、道德批判下，座談會一開始每個人都先澄清立場，敏感議題一觸即發，火爆氣味濃厚，座談會流彈四射，所有關於日後鄉土文學論戰焦點的情緒性或理念式討論，皆來自此引爆點。尉天驄首先確立「當前在台灣地區的中國文學的問題」為一、士大夫的貴族觀念；二、文學作品的商業化」。尉天驄以主席的身份發表立場堅定的開場白，這種指向使得顏元叔不得不談新詩論戰的論調來表示不滿：「知識份子好像是很臭的名詞，但我以為做知識份子仍是很驕傲的事。」

接著彭歌以極具挑釁的語氣，說明他對文學的理解，「文學是自由的，……偉大的作品，沒有一本是在某個主義理論下寫出的東西。」話鋒一轉搬出國家的處境憂慮，「不必多說大家都瞭解」，但是「我們文壇上往往因愛國太過熱切而有了偏差。」矛頭馬上指明在座的王拓、陳映真與尉天驄的文學觀點「是非常不對的」。對於王拓認為台灣是殖民經濟、買辦經濟，「在文學上狂熱誇張是可以的」，但用到社會科學上，彭歌認為「先要考慮的是國家生死存亡的第一大問題」，並反駁王拓的兩個論點：一、反帝、反資非文學工作者的問題，而是要「追問善惡是非」；二、「文學運動和社會運動結合。不是文學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對於尉天驄及陳映真，則以知識份子在自然科學的進步裡仍對社會有所貢獻來詰問。最後引索忍尼辛話語作為意義延伸的結論：「反「共」是無意義的，因為共產黨並沒有確立的善惡觀念。反共就是主張人性。」共產黨一詞的出現，引來全場的騷動。

何欣與姚一葦企圖緩和座談會的火爆場面，何欣要求鄉土文學「要將其描述的

用意的來龍去脈交代得非常詳細」以免有誤解。姚一葦舉出清朝某書生晒書時做的打油詩：「清風不識字，無故亂翻書」，來比喻所招致的政治文字獄，要求攻擊的一方彭歌冷靜下來，並提出三點意見：一、積極的提倡創作來取代消極的理論。二、用鼓勵的態度以代替指責。三、用團結來代替分化。

搞不清楚狀況的楊選堂，由於尉天驄要求他從經濟討論文學問題。楊選堂採取了古典經濟學的上下層生產關係分法：「現實文學、鄉土文學所反應都是經濟的上層建築。有什麼樣社會經濟的性質，就有什麼樣的文學哲學。……世界上經濟，不外乎兩種：一種自由主義，另一為共產主義的經濟制度。若不實行自由經濟，就是共產主義的經濟制度。」楊選堂斷言台灣走的是自由經濟路線，所以對於鄉土小說中描寫工人、女工、漁民、鹽民的困苦生活，是「必然的」、「進步性」的「摩擦」，「低工資是不可避免的現象」。而楊選堂弄不清楚雙方所持的意識型態對壘，此番話意涵資本主義入侵的理所當然論，立即引來王曉波、陳鼓應的批駁。〔註五九〕

黃春明立即將他所感受到的壓力，化為三個論點來澄清：一、我們要愛護這土生土長的文學。二、「鄉土文學」這土生土長的文學，是採用現實人生的題材。三、土生土長的鄉土文學，這種對語言文字的運用並不是地域性的。黃春明不斷提點他的小說裡頭具有的相關社會議題，以及人民生活描述，都是他這種與土地具直接脈動的「土生土長」的經驗。

接著發言的陳映真與王拓卻都用相當謹慎的詞語，以及很隱諱的例子來說明他們的立場，並呼籲「團結」。最後陳映真還很浪漫的表達鄉土文學作為民族文學的一環，「這剎那間，我們會忘掉一切的成見、隔閡、界線，這是國內外一致關切深愛的文學。在這基礎下，緊緊的團結才是我們所需要的。」「團結」的意涵則很廣泛的涵蓋各派的範疇，企圖以「民族」模糊尖銳的對話。王拓則借了姚一葦的三點主張當擋箭牌，表達了他「非常讚賞」的態度，並再重複宣告一遍予現場群眾，在隱藏的意思下點出派性的不同。

最後發言的卻是按耐不住的外省籍教授朱炎，他對於黃春明「一口一個『土生土長的文學』」顯然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寫的。剛才他說到山胞魯凱族面臨種族滅亡之危機的情形，說得非常可憐，我雖然努力地想去跟他那樣激動地去同情他們，但是沒有做到，因為我馬上也聯想到印度、非洲飢荒，一下子就餓死成千上萬的人，還有我們被奴役的八億同胞，過著牛馬一般的生活。「朱炎的態度是認為，他的關懷是以受難者的多寡與程度來作決定的，因為這裡是「自由中國地區」，政府對台灣人一直有照顧，而對大陸八億同胞則無（註六一）。同時他糾正主席尉天驄對題目的定義，「今晚的座談會話題是整個中國的文學，就應該考慮全中國的問題，而不是某處問題。」批判的矛頭指向了主持人後，可想像當時座談會的火爆氣氛。

這場座談會宣告了鄉土文學全面開戰，顯然彭歌並不認為陳映真等的「團結」

說法能說服他，彭歌將他座談會的意見整理之後，在《聯合報》八月十七日起連續三天，連載〈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一文，同樣點名批判王拓、陳映真與尉天驄，把他沒講的話更細緻的表達，對王拓的批評：「我們反共，首先是反赤色帝國主義，如果說『反帝』而不談『反共』，這是沒有掌握到世局的重點。『反帝』如只是反對以美、日爲主的外來資本，是否是一種極不高明的『轉移目標』？」認爲王拓反對資本經濟體制，是「以『收入』、而不以『善惡』爲標準的說法」，「不以『人』而以『物』爲標準，這種論調很容易陷入『階級對立』、『一分爲二』的錯誤。」（註六二）對於陳映真，彭歌似乎更能掌握到陳映真的理論基礎，直指陳映真是「循著某種公式來寫作，使文學作品淪爲『器用化』」，對「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說法，挑明了講「其實只存在於共產黨的階級理論中」，「陳先生心目中如此卑鄙、病態『遇見其必將頹壞』的舊世界，究竟何所指？而他那樣嚮往而又不能去『認同』的新世界，又指的是什麼？」（註六三）這同時說明了彭歌爲什麼在座談會上要挑釁陳映真的知識份子論，由此向讀者指出一條似乎明亮又有疑問的路徑，「新大陸」是不是「中國大陸」呢？對尉天驄的指責，指其散佈知識份子的「原罪感」，以偏概全，論據缺乏。最後重述了索忍尼辛的話來證明他討伐對象的正當性，「我全心贊成自由，也正是爲了自由，我認爲階級論調是有害的，應該加以駁正。這還不只是由於反共的國策，同時也是爲了文學的自由。」（註六四）

在彭歌義正嚴詞之後的隔天，八月二十日聯合副刊余光中接著發表了〈狼來了〉，指出工農兵文藝開始存在，並引毛澤東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會議中的講話」，指出有關工農兵以及知識份子的文學作戰「正是配合階級鬥爭的一種文藝：政治才是目的，文藝云云不過是一種手段。」（註六五）余光文中「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一詞用了四次，不斷的運用這種戴帽子的手法指涉鄉土文學作家，並理直氣壯的說「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註六六）余光中的〈狼來了〉本來是有所指涉的，即尉天驄在五月五日座談會的話，以及高準主編的《詩潮》雜誌中有「『工人之詩』」、「稻穗之歌」及「號角的召喚」等標題（註六七），但是在時間上以及固定副刊版面的配置，接連四天對鄉土文學等同工農兵文學的暗示與明示，讓讀者自然結合成一體想像，在七〇年代副刊主導著一般人的文藝生活時，不難想像此文字指控的渲染效力有多大。

夏潮系統或許爲了補白五月十五日《中國論壇》的座談會對鄉土文學的說明不足，以及由於鄉土文學的意旨與意符產生分離，即使王拓不斷強調「是現實不是鄉土」，鄉土文學已經被做了過度而極端的詮釋，王杏慶乾脆發表〈到處都是鐘聲——「鄉土文學」業已宣告死亡〉，他認爲若不將這種膨脹了的語言釐清，人便會成了「語言的奴隸」。王杏慶爲更加確立鄉土文學的本質意義，宣稱其死亡，「它卻是死亡在另一個更大的、綜合的文學潮流中。」這種文學意義在形式上與內容上，「不論省籍，其所一致強調的是，以發揚民族尊嚴對抗帝國主義，以民生主義

原則對抗資本主義，以三民主義民主原則對抗資產階層民主。」（註六八）摒棄銀正雄所要求的六〇年代所謂有泥土芬芳和樂氣息的鄉村文學，七〇年代的文學潮流，王杏慶輸入更新版本的本質意義：反帝、反資，以及新的功能變數——反資產階層民主。

對時的火藥味更加濃烈了，官方意識型態作家進行個體聯盟與動員的動作頻頻。預定的第二次全國文藝座談會在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於劍潭舉行，丁懋時（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李元簇（教育部長）、蔣經國的左右手王昇、李煥，以及余光中、尹雪曼、侯健等組成主席團，共有二百七十位文藝工作者參加，分為四組討論四項議題：一、對「當前文藝政策」的修訂；二、發揮文藝功能，加強心理建設；三、動員文藝力量；加強對匪文藝作戰；四、加強國際文藝交流。（註六九）而彭歌為第四組小組長。無法得知在會議討論時有無對鄉土文學論戰有過具體政治決議，但是會中曾有過五十六人針對鄉土文學共同提案，只是後來被「大老闆」否定（註七〇）。並且參與會議者既無鄉土文學作家，中性的學院知識份子也很少（顏元叔、何欣等學院作家皆未參與），反而政治界與攻擊鄉土文學的一方的結合，控制著會議的進行，自然會給予閱聽者許多猜想和疑慮。

彭品光所編《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一書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出版，共收集七十六篇文章，並且一致的都是攻擊性的態度，侯立朝曾將此書具有攻擊性的文章分類統計，千字小品有二十篇，專論達三十篇，社論也有八篇。

表一、侯立朝對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文章的分類統計

類別	數量					
	聯經報刊	中央日報	中華日報	青年戰士報	新生報	中國時報
社論	1	2	1	2	1	1
專論	10	10	7	2		1
方塊	11	7	1		1	
小計	22	19	9	4	2	2
合計	58	20	30	8		

資料引自侯立朝〈論買辦主義對鄉土文學的勞刺〉，《鄉土吾愛》，台北，博學，一九七七，十二，頁六九。

光在第二次文藝座談會前後從五月二十日至九月二十日一個月的文章量，達四十一篇之多，平均每天以一點三篇的文字轟炸，這些僅限於動員攻擊方面文章，尚不包括文藝刊物上較屬於文學性的詰難文章，並還有許多各類小眾刊物文章沒有收到「總批判」一書裡，這些攻擊戰鬥意味厚重的文章，加上軍中莒光教學、電台對文藝會談的討論（註七一），這種短時間內大量而集體的動員，幾乎所有黨部刊物、主流媒體均被動員參戰，讓人感到戰鬥意味再度來臨，被動員出來的各類形、各單位作家，均拔筆而起，提筆上陣，形成遍地烽火的陣地殺伐。但是必須要檢視

官方意識型態是如何的理解這場論戰，以及為何會形成一片戰雲密佈的局面。

以王集叢為例，他於八月二十二日《青年戰士報》發表〈粉碎共匪文藝邪說的要務〉一文代表官方意識型態，在「反共」的立基點上，對左翼理論具有清晰的理解：「馬列主義者說：『藝術的發展歸根到底是受社會物質基礎的發展、社會制度、階級關係、社會鬥爭的性質和內容所制定的。』於是構成一套『理論體系』，以之探索中外文藝的奧旨」，「爲此他們特別攻擊『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文藝、文化，指其全在財神控制下，毫無價值。」（註七二）王集叢代表著能從理論結構去理解夏潮系統所表達的本質意涵，在於「階級」概念的提出以及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但是王集叢無力進一步回應邏輯性緊密的「唯物史觀」。

趙滋蕃則表現了隨喊殺聲而舞劍的姿態：「我們的敵人對我們施展陰謀詭計，挑撥離間，製造輿論，佔領文藝陣地，是從來沒有禮拜六的。……於是採取因勢利導，分進合擊，盡量運用迂迴曲折的鬥爭策略，拼湊而成變相的工農兵文學。」（註七三）類如此種不論是非對錯，只要工農兵就錯的心態，充斥在《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一書裡面。軍中文人更加看中這場論戰的意義，尼洛、尹雪曼等皆如此看待論戰：「這是一場防範敵人分化滲透的政治鬥爭，這是一次反擊敵人統戰陰謀的文化戰爭。」（註七四）殺伐之聲越來越響，這場戰爭實際上打出來的已經是自認爲正義的道德化身，指控對方爲「混亂視聽，腐蝕人心，禍國殃民」的政治戰爭。既然將這場論戰看成一場戰爭，愈到後期，戰鬥的聲調愈加高昂，〈提倡戰鬥

文藝〉、〈民族文學的戰鬥性〉、〈讓生活與戰鬥相結合〉、〈發揮文藝戰鬥功能〉，從文章篇名幾乎就讓閱聽者以爲進入戰爭整備狀態。也在戰鬥聲浪進入最高分貝時，傳言官方即將抓人的名單已經出爐，謠傳正指向了夏潮系統成員。

官方意識型態必須配合著官方政策轉移，然而七〇年代政治經濟大轉型中，反共意識固然已經內化，但國民黨經濟策略採取進入國際分工的依賴體系，是故三民主義裡頭具備的社會主義思考，在官方意識型態某種程度上已被揚棄，現實經濟面必須仰賴美、日資本的輸入，所以即使是軍中文人、長期以來的反共理論家，對美國尤其是日本國家民族，已不再是敵對、警覺狀態，如江迅所言，資本主義引進來的商品詮釋體系，開始細膩的滲透入黨國教化體系裡個體份子的政治文化思考模式，美國、日本的政治文化成爲到達「自由民主世界」彼岸的標準，民族的對待情緒轉向了崇拜、嚮往的心理結構。所以彭歌會說反「帝」主要在反「赤帝」，至於美、日「帝」是否要反對，則是次要的甚至不相關的對待問題。並且現代化派在九月加入戰局，張忠棟、孫震以及楊選堂爲主的《中國論壇》自由主義份子，紛紛護衛黨國教化系統，朝向美、日資本的依賴關係，對夏潮系統以殖民經濟、買辦經濟批評唯經濟發展論的商品化觀點予以批駁。因此官方意識型態論者一方面因「戰鬥文藝」的整備狀態被激發、動員出來，另一方面加入反共產主義的現代化派學者與行政人員，更刺激了對戰殺伐的情緒。

當教化詮釋體系吸納資本主義的商品化詮釋，堅持固有的三民主義社會意識理

念的國民黨左翼，在不願被整編到「黨國—資本」的聯盟局勢中，必然得選擇新的結盟對象，以進行黨內鬥爭。另外當夏潮系統在戰局進入砲火隆隆的政治火花中，其積極的尋求盟友的急迫心理是可以想像的，一九七七年八月的「台灣文學問題專訪」專輯，是擴大做戰的聯盟方式，一九七七年九月《夏潮》再一次推出「夏潮讀者談文學問題」專輯，可以視作《夏潮》企圖穩固群眾基礎。然而《夏潮》所欲結盟的對象，《台灣文藝》、《笠》詩刊，都是勢單力孤的小眾甚至是同仁刊物，甚至開戰後具台灣意識的本土作家紛紛退出戰局。而所謂「夏潮讀者」群亦是學院的少數份子。整個聯盟作戰策略是個粗糙設計的企圖，沒有政治鬥爭力，沒有能夠動員的群眾，所能夠懸繫的緊緊是意識型態的信任關係。當彭歌及余光中兩篇文章出現後，官方意識型態的攻勢，連連不斷，到「二次全國文藝會談」後，反共法西斯的戰鬥音調愈加高昂，夏潮系統已面臨四面楚歌境遇，人人自危（註七五），甚至面對質疑時，搬引蔣經國的言語作為辯護，如文藝會談期間，《自立晚報》記者訪問王拓，要求王拓解釋「文學要反映社會內部矛盾」、「文學運動應該與社會運動結合」，王拓引蔣經國的政策領導來解釋：「我認為類似「十大建設」這種偉大的事業以及蔣院長所指示的「消除特權和剝削」的工作，都應該設法發展成一種社會運動。」（註七六）王拓急切的防護心態，可想像當時鬥爭的慘烈。

於是尋求聯盟、尋求庇護成了最緊急的事情。王曉波藉昔日與胡秋原關係，找了會詳鐸向胡秋原求援，胡秋原要求看看陳映真等的文章（註七七），對於在三十年代，「也曾以社會主義者自命」（註七八）的胡秋原自然知道左翼理論、工農兵文學為何！胡秋原並進一步的與陳映真見面，他覺得陳映真等鄉土作家人很誠實，作品文筆很好，具發展潛力（註七九），之後徐復觀從香港來台，《中華雜誌》成員經過聚會討論，基於「深怕文化決策當局又會像「三十年代」那樣再打一次糊塗仗」（註八〇），《中華雜誌》開始進行為夏潮系統辯護。

一九七七年九月份《中華雜誌》刊出胡秋原〈談「人性」與「鄉土」之類〉、侯立朝〈論高希均與孫震等經濟觀念之不通〉，侯立朝站在王拓的殖民經濟觀點詰難高希均與孫震的自由經濟說。胡秋原將彭歌的文章與王拓、陳映真與尉天驄的說法劃分上下對比表格，對照之下，胡秋原提示彭歌有意的羅織鄉土文學為主張階級鬥爭或為毛澤東的工農兵文學的目的揭然而出；「而就是階級對立，它是否存在為一事，應不應對立或鬥爭又為一事，不能說指出階級之事實就是錯誤或反人性。」曾左傾過的胡秋原並不把夏潮系統這一丁點的左翼（陳映真語）視為主要打擊對象，反而指責「黨國—資本」的結盟現象產生了六大病因：一、許多人放棄或反對民族主義；二、崇洋媚外和親日；三、經濟主義（殖民地、買辦經濟）；四、兩個中國打算；五、青年才俊階級形成；六、歌功頌德之表演（註八一）。最後胡秋原本著文藝自由的原則，向國民黨政府呼籲，「本於我的經驗，知其還可能發展，所以願對有關方面有所警告。」「只有貨比貨，學問比學問，才是解決論爭之道。政治力量之後援，是沒有什麼用的。」（註八二）胡秋原顯然以黨國大老、理論大師

的姿態向反共法西斯心態的作家訓誡，並敬告國民黨的上層單位，切勿介入論戰以致引發政治事件。

由於余光中「二次文藝會談」後便返回香港，徐復觀便在香港發表評台北有關「鄉土文學」之爭，後轉載於十月《中華雜誌》，針對余光中〈狼來了〉一文所給予的帽子：「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拋到頭上，便會人頭落地。……難道毛澤東要一切為人民，我們便要一切反人民，才算反共嗎？」（註八三）徐復觀與胡秋原皆站在文藝自由政策方面向政府進言，並由鄭學稼輾轉向王昇、蔣經國疏通，層峰最後被說動，不「處理」《夏潮》（註八四）。的確政治暴力沒有直接介入，然而官方意識型態仍舊砲火隆隆。

「華—夏聯盟」

胡秋原本身曾在中西文化論戰時期，提出「超越前進論」，即「超越傳統派西化派與俄化派而前進」，原本超越前進論是為消弭與全盤西化派的門戶論戰，可是在創辦《中華雜誌》後即逐漸發展為其思想的中心信仰。胡秋原的超越前進論，將三民主義社會思想做了民族性的轉化，將「民族」提高到綱領的信條，同時壓低革命做為人民權利奪取的策略，而與早期國民黨理想相一致，然而胡秋原仍包容著「階級」的事實存在現象，對於「西化」具有著極度的反感，也因此《中華雜誌》系統進入七〇年代，愈被「黨國—資本」思考體系排除至邊陲地位。

《中華雜誌》系統的意識型態是國民黨早期的理想色彩延伸，反帝、反資、民族主義優先論，以及反共等。重新崛起於七〇年代的左翼夏潮系統在許多方向性上與《中華》頗多一致，當墜落入海，而同在洪流中有及時救援的獨木舟划過，伸與援手，勢必會成為親密朋友，民族主義包容社會階級意識的《中華雜誌》放下了救難繩索，解救圍困中的《夏潮》；一九七七年十月陳鼓應與陳映真在《中華雜誌》上兩篇文章表達了與《中華雜誌》相同的意識型態，陳鼓應發表反費正清的言論，陳映真發表文學主要形式是民族的。陳鼓應與陳映真的文章恰好反應「反分離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重申與宣告，不論是否巧合，符膺了《中華雜誌》的基礎意識型態，至少說明兩者已經建立在同質性的有機作戰線上，《中華雜誌》與《夏潮》組成有機的結盟作戰模式，形成「華—夏聯盟」。當兩者建立聯盟作戰的擴大戰線後，兩個系統的成員開始在雙方的雜誌上投稿，形成了互滲現象（見表二），夏潮系統大批的在《中華雜誌》上投稿，而侯立朝、嚴靈峰、胡秋原及曾祥鐸等都投稿予《夏潮》，雙方作者成員的互滲模式，企圖以雜誌本身的立場，模糊掉作者的意識型態立場，讓夏潮系統成員具有了《中華雜誌》的民族主義正當性理想色彩，讓《中華雜誌》成員也有《夏潮》的鄉土氣息。然而有趣的是夏潮系統成員在《中華雜誌》上頭發表的文章，都是切重現實主義的基礎論點回應官方意識型態，從文學上談社會及經濟的階級本質分析，屬於正面反擊式的文章，而《中華雜誌》系統在《夏潮》上的言論，絕多數不是在回應彭歌、余光中等官方意識型態作家的

「人性」、「工農兵文學」的論點上，而是挑戰自由主義的唯經濟發展論，經濟發展模式的辯論，使論戰的本質意義益愈明顯。

一九七七年後半鄉土文學論戰在「華—夏聯盟」擴大作戰後，從守勢轉向攻方，然而措辭嚴厲的均集中在《中華雜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華雜誌》社論是〈論瑣屑、虛矯、崇洋媚外與地方選舉〉告誡執政黨莫因小失大，「所謂虛矯，就是在報紙、廣播、電視還有官方雜誌宣傳上所表現的態度。」「也有狡猾的知識份子利用執政黨的虛矯宣傳，來打擊異己，向執政黨討好。」而這些「狡猾的知識份子」是誰？同期侯立朝的文章〈聯經集團三報一刊的七大政綱〉為此指明為聯經集團底下的知識份子，正是七〇年代初大學集團分裂出來的學院派自由主義，蔣經國刻意「革新保台」培植出來的「青年才俊」。而整個七〇年代推動對外貿易的正是這股新興中產階級的力量，向商品化靠攏，並成為支持者，如張忠棟、孫震等人對夏潮系統所提殖民經濟而有所不滿。侯立朝指責聯經集團已成為報閥，本身自然就是資產階級，進一步帶進來的就是「買辦主義」，買辦主義就是反民族主義的（註八五），侯立朝以相當粗糙的邏輯指責自由主義學院派與商品化的結合。其實以文學觀看整個作戰時間而言，當彭歌集結戰鬥性論戰文章，由國民黨軍事系統的青溪文藝協會出版的《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一書，已經宣示著總的鬥爭路線接近尾聲，彭歌要的效果——指出敵人，已經完成，只剩下如何收場的問題，是以暴力鎮壓？或平和收場？端賴國民黨高層的決定。而侯立朝指涉的自由主義學院派與商

品化的結合，論戰的本質意義才開始顯現出來，這也就是為什麼侯立朝會在《夏潮》上面發表諸多相關經濟學論文，企圖抗衡以市場為導向的自由主義新興中產階級，以及《夏潮》雜誌在鄉土文學論戰接近尾聲時，大量的談論階級、工農問題的文章，以及積極報導第三世界國家如何面對資本國等等，真正深層的意義連結，在於如何以「階級」的立場爭奪鄉土文學的文化與歷史詮釋權。

表十三《中華雜誌》與《夏潮》作者互涉對照表

年·月	《中華雜誌》	《夏潮》雜誌
1977 · 10	陳鼓應〈對費正清「中國問題」觀點的 我評〉 陳映真〈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	侯立朝〈大鈔與大禍〉 嚴靈峰〈白居易「思舊」詩與崔述〉 嚴靈峰〈公是公非，必須判明〉
1977 · 11	王曉波〈中國文學的大傳統〉 陳鼓應〈評余光中的頹廢意識與色情主 義〉 尉天驄〈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詩歌求 諷刺！〉	嚴靈峰〈應闡揚三民主義不可推銷韓愈 的「君權」思想〉 任卓宣〈評孫震委員底民主主義研究〉 編輯部〈訪胡秋原先生談民族主義〉
1977 · 12	王拓〈「殖民地意願」還是「自主意 願」〉 陳鼓應〈評余光中的流亡心態與自潰意 識〉	葉青〈評孫運璿部長底經濟政策〉 侯立朝〈財經政策大辯論的歷史經驗〉 嚴靈峰〈「韓氏宗譜研究」的研究〉

1978 · 1	王曉波〈上帝主張分裂中國嗎？〉 齊益壽〈鄉土文學之我見〉 李慶榮〈張忠棟的文章值得嚴重注意〉	曾祥鐸〈談文學的民族性格〉 侯立朝〈論鄉土經濟與鄉土文學〉 編輯部〈訪嚴靈峰先生談青年思想問題〉
1978 · 2	林俊義〈從生態學看世界〉 高準〈為《詩潮》答辯流言〉	侯立朝〈現代經濟學的眞面目〉 曾祥鐸〈談西方對中國的輕蔑與誤解〉 侯立朝〈現代經濟學的再整合〉 蘇青記〈記胡秋原先生論：「王文興的 Nonsense 之 Sense」〉
1978 · 3	王曉波〈再論長老會事件及其他〉 陳映真〈大英百科全書論民族主義〉 江漢〈評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	侯立朝〈鄭著《第三國際史》之評介〉 胡秋原〈中國人立場之復歸——為尉天驄先生《鄉土文學討論集》而作〉
1978 · 4	徐代德〈譯日本帝國主義者操縱中國的自供〉 黃順興〈日帝犯台罪史縮寫〉 陳鼓應〈評余光中詩作的觀念與藝術〉	侯立朝〈台灣經濟的造型問題〉
1978 · 5	黃師樵〈五十年滄桑懷舊談〉 徐代德〈日商在台進行的是什麼貿易？〉 陳鼓應〈評余光中詩作的觀念與藝術〉	嚴靈峰〈道家「有」、「無」的問題〉 侯立朝〈瓜分中國的新危機與反共抗俄的再肯定——七七抗戰會〉
1978 · 6		
1978 · 7		

- 〔註四三〕江迅，〈鄉土文學論戰：一場迂迴的革命？〉，《南方》第九期，頁三一。
- 〔註四四〕同〔註四三〕，頁三四。
- 〔註四五〕同〔註四三〕，頁三三。
- 〔註四六〕思兼〈從批判原理論鄉土文學問題〉，《聯合報》副刊，一九七八，二，十六。
- 〔註四七〕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仙人掌》二期，《鄉土文學討論集》，頁一一七。
- 〔註四八〕司馬中原〈我們的文學往何處去？〉，《仙人掌》第五期，頁二四二。
- 〔註四九〕鐘言新〈訪問王拓〉，《夏潮》二卷一期，頁二九。
- 〔註五〇〕王拓〈當代小說所反應的台灣工人〉，《街巷鼓聲》，台北，遠景，一九七七，九，頁三七—三九。
- 〔註五一〕中西文藝思潮座談會明鳳英筆錄〈中國文學往何處去？〉，《仙人掌》第四期。
- 〔註五二〕彭歌〈「卡爾說」之類〉，《聯合報》，一九七七，七，十五。

- 〔註五三〕彭歌〈堡壘內部〉，《聯合報》，一九七七，七，二十二。
- 〔註五四〕彭歌〈對偏向的警覺〉，《聯合報》，一九七七，七，二十七。
- 〔註五五〕彭歌〈統戰的主與從〉，《聯合報》，一九七七，八，五。
- 〔註五六〕訪蘇慶黎，「從我第一期、第二期他們就說要抓我，但鄉土文學時期已經走了，我是想說這種撲滅也是遲早的，反不反抗都要被抓，倒不如反抗，就給他大戰一場。」《訪問錄》，頁五〇〇。
- 〔註五七〕任卓宣〈三民主義與文學〉，《夏潮》三卷二期，頁六。
- 〔註五八〕〈當前中國文學的問題座談會〉，《中國論壇》五卷一期。當天參與者主席楊選堂、主持人尉天驄、主講人有顏元叔、彭歌、姚一葦、何欣，在座有朱炎、陳映真、王拓。據蔣勳回憶還有王曉波、陳鼓應、唐文標、蔣勳及楊選堂（訪蔣勳）。以下引言皆為此座談會記錄。據尉天驄說此《中國論壇》座談會的記錄被刪改很多，不是整個座談會的全貌。（見尉天驄〈鄉土文學論戰的餘話〉，收於氏著《民族與鄉土》）
- 〔註五九〕訪蔣勳：「因為楊子是《中國論壇》的社長，他是糊里糊塗不曉得我們在搞什麼，他就聽聽聽，聽了覺得不對，就說：我們今天不是要討論文學嗎？那天地毯好像是橘紅色，他說：你看，這橘紅色的地毯好像晚霞一樣，文學應該是愛好這個東西的。所以開始就被王曉波跟陳鼓應大批，王拓、陳映真都發言了。」
- 〔註六〇〕朱炎〈我對鄉土文學的看法〉，中央副刊，一九七七，九，八。朱炎後來發表此

文表達他當晚發言的態度，他反對鄉土文學，他覺得該關懷的是整個大的中國的問題，而非某處的問題。收於彭品光編《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台北青溪新文藝學會，一九七八，三，五版，頁九二。

- 〔註六一〕同〔註六〇〕。
- 〔註六二〕彭歌〈不談人性，何有文學〉，《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頁七。
- 〔註六三〕同〔註六二〕，頁一二。
- 〔註六四〕同〔註六二〕，頁二二。
- 〔註六五〕余光中〈狼來了〉，《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頁二五。
- 〔註六六〕同〔註六五〕，頁二七。
- 〔註六七〕高準〈詩潮與詩壇風雲〉，《夏潮》四卷二期。
- 〔註六八〕南亭〈到處都是鐘聲〉，《中國時報》，一九七七，八，十八，《鄉土文學討論集》，頁三〇六。
- 〔註六九〕《中央日報》，一九七七，八，二十九，第一版新聞。
- 〔註七〇〕魏子雲〈正視這股邪惡煙幕〉，《青年戰士報》，一九七七，六，十。《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頁三一。並無指明五十六人的提案為何，這提案魏子雲認為是「正義之潮」，但是「這些稿件全是老闆交下來的，……又有何權柄去否定大老闆呢？」顯然高層並無意即刻鎮壓鄉土文學。
- 〔註七一〕訪蘇慶黎，頁五〇三。蘇慶黎回憶當時除《中國時報》外，全部所有的報紙，軍

中的莒光教學，電台，等於是陸海空，三軍總動員，然後政戰的、所有軍方、情治系統的刊物均有刊出。

〔註七二〕王集叢〈粉碎共匪文藝邪說的要務〉，《青年戰士報》，一九七七，八，二十二—二十四。《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頁四七—五九。

〔註七三〕趙滋蕃〈我讀狼來了〉，中央副刊，一九七七，八，三十。《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頁三九。

〔註七四〕尼洛〈值得重視的文化論戰〉，《青年戰士報》，九，二十四。《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頁四〇。

〔註七五〕在訪問中當事人不斷透露國民黨要抓人的訊息，誠然不知道到底有否「黑名單」，當時狀況，例如陳映真開始打包左翼藏書，情治單位不斷警告王拓，甚至許多人躲入中南部，政治迫害一觸即發的恐懼心理，顯示白色恐怖的陰影，是不斷存在於當時的社會氣氛。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底戴華光、劉國基、賴明烈自組的「台灣人民解放陣線」被情治系統破獲，並被誣陷為中共在台組織，白色恐怖其實對左翼的《夏潮》而言仍是極大的威脅。

〔註七六〕《自立晚報》記者〈第二次文藝大會場外的回聲〉，收於《鄉土文學討論集》，頁四三〇。

〔註七七〕二訪王曉波，《訪問錄》，頁四三六。

〔註七八〕胡秋原〈中國人立場之復歸〉，收於《鄉土文學討論集》，頁二七。

〔註七九〕胡秋原〈覆某女士論風車之戰與右派心理〉，《中華雜誌》一百七十五期，收於

《鄉土文學討論集》，頁六八八。

〔註八〇〕侯立朝〈鄉土文學論戰的起因與焦點〉，《鄉土吾愛》，頁六二。

〔註八一〕胡秋原〈談「人性」與「鄉土」之類〉，《中華雜誌》一百七十期，《鄉土文學討論集》，頁三二七。

〔註八二〕同〔註八一〕，頁三三〇。

〔註八三〕徐復觀〈評台北有關「鄉土文學」之爭〉，《中華雜誌》一百七十一期，一九七

七，十。

〔註八四〕訪蘇慶黎，《訪問錄》，頁五〇一。

〔註八五〕參考侯立朝〈聯經集團三報一刊的七大政綱〉，《中華雜誌》一百七十三期，頁。

第三節：第三世界理論的引進

彭歌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一文的立基點，認為王拓「經濟與社會的分析不正確、不完全」，正是社會經濟分析的觀點不同而與王拓不同，王拓於九月十一日《聯合報》發表〈擁抱健康的大地〉回應：堅持台灣的經濟繁榮，是以低米價發展起來的，低米價是低工資的前提，米價低才有廉價與穩定的勞動力，適足以發展勞力密集的初級工業；但因為限制農產品價格，相對的其他物價的升高猛漲，使得農工收入相對減低（註八六）。這也就是農工階級的矛盾問題，不斷在七〇年代浮現的因素。

夏潮系統左翼的政治經濟發展分析，立即引來學院自由派（現代化派）（註八七）的反駁，張忠棟與孫震分別在十月十日的《中國論壇》回應，張忠棟發表〈鄉土、民族、自立自強〉認為這三個說法必須有範圍，不能無限延伸，而他的範圍恰好是在王杏慶所要對抗的「資產階層民主」上；在政治上承認每一個人的政治權利，在經濟上繼續推行自由企業制度，社會上不鼓勵階級對立和集團衝突。認為民族必須是與各國有各種正常的合作關係（註八八）。這種規範卻恰好站在七〇年代官方意識型態立場上，而與在野的夏潮系統展開明確的立場對壘。

另外在經濟面有實際操作經驗的孫震，更加無法贊同王拓的殖民經濟與買辦經

濟的說法，並且站在官方立場，認為這種描述，「本身已經構成一種對社會向心力和團結的破壞」（註八九），孫震並不認為低工資是項罪惡，而是經濟發展的必然，因為「貨幣工資的提高如果超過了勞動生產力的增加，不是引起物價上漲，使真實工資依然如故，就是引起失業」，在低工資方面必須看看跟誰比較，孫震所持的態度當然不是上下層的階級結構分析，是橫向式的國家與國家的工資比較，且是立足點齊頭式的比較，因此孫震認為若台灣跟印度比，台灣是高工資，跟「先進國」比當然是低工資，所以「在更根本的層次上，我們的弱點就是經濟落後，所以我們要發奮圖強，對工業先進迎頭趕上。」（註九〇）現代化派著重在數量上的提高，而不是生產關係的改變，所以能夠提高量的生產的，在於技術層次的更新，因此經濟若要發展，「光靠我們健康的鄉土英雄是不夠的。……我們尚需有人研究科學、發展技術、累積資本、從事創新。」（註九一）亦即台灣經濟能夠快速的資本積累，在於新興的中產階級吸納與引進的商品化與市場經濟，並有意識的向夏潮系統的文學作家挑釁其經濟知識的詮釋。

「華—夏聯盟」則分別展開向孫震反擊，以成員交換、互滲的方式進行交叉攻擊；任卓宣在《夏潮》發表〈評孫震委員底民生主義研究〉，《夏潮》編輯部〈訪胡秋原談民族主義〉（三卷五期），王拓反而是在《中華雜誌》發表〈「殖民地意願」還是「自主意願」〉反駁孫震。王拓重申所謂殖民經濟因為台灣資本多由美、日所控制，技術亦由資本家控制，台灣的資本只是替外國加工，一味壓低工資「只

會成爲資本家繼續以低工資壓榨勞工的有力藉口。」（註九二）王拓的反擊仍然儼守著「階級」關係在資本運作裡的矛盾立場，他強調無論數據是否顯示了工資的上漲，但是當工人的真實工資也無法生活時，矛盾自然產生，將工人與資本家的生活水準相比，「人比人會氣死人的！」

不過孫震表達的態度正是「黨國—資本」聯盟態度，顯現官方意識型態的正統態度，已經轉向黨國領導與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接合，不再是「平均地權、節制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的意識型態。正由於孫震辯論的觀點提出，具國民黨邊陲位置的《中華雜誌》開始進行反駁，企圖扳回傳統國民黨裡早期理想社會主義意識型態，在「華—夏聯盟」時期，胡秋原、侯立朝紛紛對張忠棟、孫震等人的中國（指台灣本土）資本化及民族情感立場質疑，侯立朝並進一步企圖建立一套經濟發展理論，以與現代化派的商品市場導向的經濟學相抗衡。侯立朝建立起來的經濟批判模式，其實並非自創，而是沿襲早期國民黨的社會主義意識型態，但其雜揉了二次戰後各種趨向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融合經濟學，因此他對於現代化派的官方正統立場的批判，是以各種各派的經濟學說加以解析，企圖以民間學術的豐富知識壓倒官方。侯立朝首先批判現代經濟學的本質，〈現代經濟學的真面目〉（四卷二期）點出凱因斯經濟學的經濟循環流程：現代經濟學的特性就是「所得」、「消費」、「投資」的連鎖性，以所得刺激消費，以消費刺激投資，以投資擴張所得，以所得擴張消費，以消費擴張投資，……把國家政府、企業廠商、家庭個人都

納入這個反覆循環的流程中」（註九三），企圖點出官方的現代化論，其經濟學理論基礎來自凱因斯的理論，而凱因斯的理論則是資本主義的消費形態，在此理論的整編下，國家、企業及個人都被納入資本主義的反覆循環中。

一九七八年三月侯立朝再發表〈現代經濟學的再整合〉，展現他對世界各經濟學派豐富的知識，他認爲從亞當斯密後有四大經濟學論戰：第一次是一八二〇年代馬爾薩斯與西蒙地（Sismondi）對李嘉圖經濟理論的檢討，另外一邊則爲古典社會主義的聖西門、傅利葉，最後導出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二次是一八七〇年代奧國「邊際效用學派」與德國「歷史學派」與「馬克思派」的批評，這個辯論擴展到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出現，古典馬克思主義最後因「列寧主義」而死亡；第三次是第一次大戰後凱因斯的「一般理論」與海耶克等古典自由主義的辯論，凱因斯理論被美國所重用，並開始推廣到各國，最後造成古典經濟學被冷藏；第四次則是一九七〇年代，因兩次的石油危機造成的世界經濟不景氣引起的，海耶克、米爾德與蓋爾布來斯（Galbraith）對凱因斯理論的批判（註九四）。侯立朝一再以強大的經濟學知識證明凱因斯的經濟發展理論，已經不是經濟學的主要學術潮流，幾次的經濟恐慌證明，台灣現代化派的宗師理論不再適於台灣，現在是一個經濟整合時期，是古典經濟學裡頭自由與社會主義兩派別的新重整台。

侯立朝以學術派別作爲經濟結構發展分析的時候，並沒有能夠建立起新的經濟學架構，反而是去尋找一個可供解釋，可供融合各門各派的經濟學說，這種尋找馬

上指明了可以包山包海的三民主義，從而要再度證明《中華雜誌》堅持的國民黨早期理想主義是正確的。

《中華雜誌》的挑戰，不僅僅針對新興中產階級與現代化派，更對國民黨的執政，予以相當大的批判，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任卓宣即在《夏潮》發表〈評孫運璿部長底經濟政策〉，對實際執政的國民黨官員的經濟政策給予批判，認為孫運璿的自由經濟政策是一種對外依賴漸深的政策，根本不符合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的計畫經濟原則。一九七八年五月侯立朝批判李國鼎的台灣經濟成長經驗，〈台灣經濟發展的量變與質變〉一文，認為李國鼎出任過「美援會」、「經和會」、「經建會」、經濟部長、財政部長，卻將台灣經濟推向資本主義，導致了國民黨早期理想的嚴重喪失，就因為經濟決策出現了重大錯誤，侯立朝提出經濟決策的過程應該必備幾點：文化思想的綜合運用、悲憫的心懷、顯示經濟主體的個性、必然和人民有直接的關係、本於基本國策精神等等（註九五）。侯立朝甚至表達李國鼎的經濟政策所出現的錯誤，是無意疏失或刻意疏失了國民黨早期的理想，「從『經合會』到『經建會』，則以成群不通的『經濟學者』來代替各類專家的功能，以為經濟史觀去支配一切，果真我們便成為乖離的經濟人物嗎——成長而不穩定！」（註九六）其實疑國民黨的官僚在執行邁向資本現代化的專業機能，是稟著唯資本經濟發展的技术官僚，而非以人民的生活物質條件來進行經濟改革的考量。

同時侯立朝體檢歷來的國民黨的經濟政策的體質變化，並間接否定「經濟奇蹟」的提法，他認為一九五三至一九六四年所謂「尹仲容時代」，僅僅只是足供餬口的經濟政策而已，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二年李國鼎主政時，適當美援結束，然而卻是日本資本的切入，以及「裝配工業」引進，而且經濟方面開始與美日資本有深切的關聯，是從屬經濟時期，是故在此種「唯商業主義的結果，一定要壓迫農業，一定造成壟斷資本的集團。」然而從一九七三年蔣經國開始執政後，他認為這是基礎經濟時期，十項建設的政策是轉變經濟體質的主要手段，「目標在於把『從屬經濟』的體質，轉變為『自主經濟』的體質」（註九七），侯立朝認為官僚的政策執行者不瞭解整個政策的轉變，還在以「從屬經濟」的方法，進行買辦主義的工作，是一種「盲忠」的有害現象。既批判官方又向國民黨輸誠的態度，表達了對政治文化霸權的爭奪的曖昧扭曲，企圖藉向蔣經國的建言，一方面打擊資本主義理論提供者及執行者，一方面扭轉《中華雜誌》的黨內邊緣位置。從而暴露了曖昧的矛盾性，既批判黨內新興現代化論者，並對付「黨國—資本」技術官僚，然而卻又必須鞏固既有政體，以及既有的統治體制，使其對於主導整個政策轉型的高層，沒有任何強烈的批判能力。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八、十九日「國軍文藝大會」於台北木柵舉行，出席者有軍中作家及被邀請的社會人士四百餘人，比起一九七七年八月的全國二次文藝會談多出了一倍，國民黨高層似有決定整合論戰的紛擾現象，《中華雜誌》的曾祥鐸也在邀請之列，他卻記載了媒體所漏網的重要話題，即王昇最後的致詞，王昇的致詞代

表了官方對鄉土文學論戰的態度：「愛鄉土是人類的自然情感，鄉土之愛，擴大了就是國家之愛，民族之愛，這是高貴的情感，不應該反對的。就算是有些年輕的鄉土作家們偶爾或偏激了一點，他們要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過去流傳下來的某些不合時代的東西，反對社會上某些黑暗與不公平這也可能出自年輕人一種天生的正義感，只要是動機純正的，我們就應該聽聽，應該諒解，應該善意的交換意見，應該團結這些人，不要把他們都打成左派，總統給戴上紅帽子。事實上我也知道有些鄉土作家並非如此的……。」（註九八）王昇的官方說法強調了「團結」，「不要把他們都打成左派」，顯然高層並不贊同鎮壓手法，而採取和解的態度，官方意識型態在文學論戰時集結出書的《當前文學總批判》，儼然可說彭歌給了整體論戰的「總批判」，在「國軍文藝大會」上官方又表示了「團結」的態度，文學論戰顯然進入最後的尾聲，但是另一場論戰才正在展開。

一九七八年《夏潮》開始進行鄉土文學論戰的整編工作。署名李復中於一月發表《憤怒之愛》，他認為二十世紀文學的特色是「憤怒」，不論舊俄、美國南方黑人文學都是「帶著某種原始型式的生命律動的怒吼」，他結論現實主義文學的「憤怒」，是基於現實人生中不能抑制的生命的呼喊。對階級矛盾的問題，是否會擴大的矛盾，這是社會內部結構問題，作者應該是「站在正義、公理的層面上，就他所知的範圍，寫人的生活底的全部。」（註九九）再一次強調現實主義文學成了主流。然而現代主義派似乎並不認為這場戰爭已經「團結」了起來，一九七八年一月

一日王文興於耕莘文學院演講「鄉土文學的功與過」，其演講在論點上與《總批判》、余光中等人相同，也企圖總結鄉土文學論戰。然而這場演講，夏潮系統人馬大批趕到，並且與其當場辯論，令王文興相當狼狽，《夏潮》也在二月將整個演講內容分兩篇整理，一篇關於文學，一篇關於經濟觀與文化觀，在演講文後，附了三篇演講側記，以及一篇漫畫，以強硬的語氣諷刺王文興的演講僅僅是個論戰餘波的大雜燴。三月號的《夏潮》接著攻擊王文興的文章有六篇，四月號則有四篇文章，甚至最後集結成書為《這樣的教授王文興》。

但是這一整波的攻擊行動迥異於夏潮系統零散性的攻擊，轉向集體而主動的發動攻勢。由於王文興的演講正如同會心儀的演講側記所說：「說穿了就是幾個月來，抨擊鄉土文學剪報的大拼盤。」（註一〇〇）然而最主要在於王文興說了一個泥水工人月入上萬；計程車司機一個月一萬多；一個木匠、水電工一個月起碼在一萬五左右。「一個木工一個月賺三萬」，而農家種田的都剩下老一輩，「所以種田是退休的人在種田，……他們是靠種田賺零用錢。」這種隨口說說，憑經驗概念的說詞，出自一個現代主義文學派的台大英文系教授的演講會中，已經圖現了其與台灣現實脫節的荒謬概念，《夏潮》抓準了機會，利用王文興演講裡的矛盾說詞，大肆攻擊。然而這次《夏潮》攻擊最大的不同點，是動員了最基層的群眾，包括由潘榮禮動員木工工會在地方報紙發表不滿的言論，蕭國和與蕭順水以農民身份質疑王文興「真的沒有人剝削農民？沒有人苛虐農民？」（註一〇一），認為王文

與對農民的苦難視爲兒戲；蘇慶黎動員農會會員反應省議員黃玉嬌，讓黃玉嬌在省議會上質詢省府官員造成新聞（註一〇二），以及動用立法委員胡秋原、黃順興、蔡友土等發表談話或文章，均認爲王文興個人演講 sense 是一種 nonsense 的表現。

其中署名石恆則對王文興的演講透露出的意識型態做出總結，他認爲王文興有兩個主要原則：在文學及一般文化上主張的快樂主義，與對社會問題採取的商業交易觀念（註一〇三）。這樣的意識型態代表著七〇年代新興的「商業階層」，「他們所懷抱的世界觀與生活觀，無非是賺錢牟利，發財致富的利己主義。」而這個階層能夠興起的條件「主要地需要能生產交換商品的生產隊伍，並且要有一安定的生產環境；而這兩項條件是社會大眾所提供的。爲了開展國際貿易、增進大功商業的發展，社會上賠進去的還有生態的破壞、農村的變化、貧富的差距拉大……」（註一〇四），石恆認爲王文興正代表這樣的階層心態，「把社會現實當作天然的秩序」，甚至對美、日資本的依賴，不排斥反而歡迎。石恆引用「不以正統的、美國中心論的教科書爲滿足的拉丁美洲的研究者」的結論爲例：國際廠商在拉丁美洲的投資緊密時，嚴重地影響到該地區的正常發展。百年來，在該地區與國際廠商聯繫鬆弛些的時候，也是它經濟上比較復甦些的時候。正是國際資本迫使拉丁美洲生產它自己所不需要的物品。並且他舉出三點原因說明外資對經濟自主發展的限制：一、美日廠商在台投資，絕不是做什麼慈善事業，它們是以牟利爲目的。二、國際性美日投資廠商，有自己一套投資計畫、生產方式，投資地是無法參與的。三、接

受了外資的地區，就被帶進了國際經濟的洪流裡。由於獨立性小，沒有自主性，國際經濟稍有變化，投資地區便遭到嚴重打擊。」（註一〇五）石恆帶入的批判觀念已不再是赤裸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而是第三世界的依賴理論分析，進而提出「商業階層」具有的「把社會現實當作天然的秩序」概念，此處對階級概念的掌握，已經進一步容納了世界體系的思考。

這場「王文興風波」其實是《夏潮》對鄉土文學論戰的結束禮炮，從動員農民、木工，以及省議員、立法委員，加上既有系統成員的文字攻擊，在報紙新聞版（不是副刊）形成憤怒訊息，最後並集結出書，只是說明，鄉土文學論戰所「頂住」的成果，已經轉向了另一場「階級與民族」論戰的開戰號角。在說明另一場論戰過程之前，必須先說明石恆的第三世界理論提出的時空轉換脈絡。

《夏潮》不同於《中華雜誌》必須與國民黨內部爭奪詮釋系統，所要做的是對「黨國—資本」的結盟詮釋體系，提出階級分析以及鬥爭策略，因此《夏潮》不同於《中華雜誌》從學術思想談社會結構，它從較爲現實的工農問題尋找出社會結構的演變脈絡，並且必須從左翼陣營演繹出一套適應於台灣現實社會的理論策略，這方面的努力可以從王拓回應孫震的文章，掌握的仍是現實面的「階級」問題看出來。然而日據時期台共以及五〇年代的省工委並沒有能夠留下一絲一毫的組織傳承與理論建構，夏潮系統是自己獨立建構起台灣左翼的本土觀點，然而本土歷史（local history）要與轉變巨大的社會連結，需要相當成熟的理論分析，但《夏

潮》正處於起步階段，並且世界各國在六〇年代社會運動狂潮後，已經不斷的有相映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現，夏潮系統面對龐大而不斷浮現的本土社會矛盾，站在現實面的基礎上，尋求相似的理論經驗，就必須從同樣被資本國宰制的「低度發展國家」找尋共同的經驗。

本章第一節曾描述《夏潮》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認識，一方面這是基於保釣後民族主義的高昂，一方面是重新認識世界、重新理解冷戰結構。對資本國美、日的大量報導中，同時一方面體認台灣的經濟發展是以世界市場為導向的經濟結構，以及深受美、日指引，是「附庸的初級加工經濟體系」，同時開始理解其他受資本國家宰制的地區，他們在同處於世界市場體系裡頭，國家與人民的反應與抵抗。

《夏潮》初期對第三世界的認識仍環繞在對美國的認識上，一九七六年連續兩篇坦尚尼亞總統及墨西哥總統對美國總統卡特上任的獻詞，已經注意到了第三世界國家對美國的憤怒，「就像我們坦桑尼亞這種貧窮的國家在努力爭取整個世界經濟制度中結構的改變時，我們發現美國的經濟力量確是站在我們敵對的一方，也就是說，站在繼續剝削我們的那一方。」「美國這種道德衰微的造成乃是由於軍備競爭，公開或秘密的干預他國內政，支持不得民心的權力主義政府，以及其他強國建立一種不公平的國際組織。」（註一〇六）第三世界國家元首在給美國總統獻詞中公開的對美國的指控，指出美國是剝削的一方、支持權力政府，不僅加深《夏潮》對美國資本批判的正當性，也開啓《夏潮》逐漸注視到第三世界的發展理論問

題。

一九七七年四月署名陸文俊（林俊義）發表《第三世界經濟發展理論的再檢討》，對「發展」一詞重新檢討，「一九五〇年以來，『發展』的意義均被狹義的定義為科技與經濟的活動，而忽略政治、社會和科技、經濟的相聯性。」「因此落後的國家工業化的過程被稱為現代化的過程，而不一定是『發展』的過程。」（註一〇七）林俊義並且簡介了經濟發展的理論：一、個人行為學派；二、個人心理動態學派；三、經濟發展階段學派；四、二元論或滲透理論學派。然而這四個學派，仍從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演繹出來，仍不是左翼的革命策略，林俊義最後在「感想」裡才表達第三世界左翼學者對這些理論的非議，「以Bacon和Habshawn·G. Frank, Bodenheimer, Savenhagen, Gurley 等為最，這些人的研究指出發展的地區、現代的地區，工業的部門與都市其實阻礙了落後的地區、傳統的地區，農村的部門和農村的進步。」（註一〇八）林俊義此篇可以說是台灣第一次以中文介紹第三世界依賴理論的文章，Bacon, Habshawn 和 G. Frank 都是第三世界發展理論學者，反對「現代\傳統」的二分結構，其理論主張進一步切斷第三世界國家的跨國公司與資本國的關係。同時也可以知道《夏潮》內部具有不同的世界視野，從低度發展國家去看資本剝削問題，而非從民族本位去看資本帝國的剝削，兩者出發點的不同，在《夏潮》內部有著一定程度的拉距關係。探討第三世界發展理論以及其革命策略，顯現與《中國論壇》的學院現代化論有著相當深刻的矛盾，《中國論

壇》致力於將現代化論正當化，《夏潮》努力的往依賴理論的靠攏，雙方形成一定的知識緊張關係，並且由於《中國論壇》與官方意識型態上的接近，夏潮系統投到《中國論壇》的文章都相當的謹慎，用字遣詞甚至經過包裝修飾（註一〇九）。《中國論壇》從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都仍有夏潮系統大量人馬的投稿，但兩方人馬其實於《中國論壇》存在著極度的知識緊張關係，一方努力提供、要求黨國向資本主義現代化轉向，一方努力的尋找不同詮釋論述的反叛元素，藉著鄉土文學論戰雙方緊張關係爆裂，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五日的「當前中國文學問題」座談後，尉天驄、蔣勳等人退出《中國論壇》，也正標示雙方知識體系的對立明確化。

由此，《夏潮》開始不斷報導第三世界的消息，包括一九七六年三月七日有六十個國家非洲阿拉伯高層會議，發表宣言「非洲和阿拉伯國家再一次宣布不跟大國結成軍事同盟的政策。」（註一一〇）第三世界聯合起來對付資本國，《夏潮》表達的欣喜態度，構成對現代化論的強大壓力，並且這種新聞的報導，加上結合孫中山的論點作成的結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第三世界理論在三民主義裡頭開始具有了正當性的政治位置，變成由外向內側擊的作用。

相同的文章包括李雙澤帶來菲律賓的歷史、社會素描，李雙澤共發表了四篇文章（菲律賓站起來！）（二卷四期）、《喪失民族精神的菲律賓教育》（二卷五期）、《啊！菲律賓歷史！》（三卷三期）、《麥哲倫之死》（三卷四期），李雙澤以其居住在菲律賓的生活經驗，敘說菲律賓人在抵抗從麥哲倫到美國的西方勢

力，從菲律賓的觀點看待美國勢力，改變了既定的對西方觀點一切的文化認同，包括教育、語言、政治體制皆被改制成適用美國的體制，「美國所介紹進來的教育制度，是用來適應於被美國征服的經濟與政治領地。」（註一一一）李雙澤企圖點出在這種教育制度的新一代菲律賓人，行動與思想已經完全的美國化，而這種粗暴的斬斷菲律賓傳統的母體文化手段，使得新一代的菲律賓人在文化認同上，產生了向資本國無抵抗力的崇拜：「『友誼』和『特殊關係』的神話，至今還繼續被利用著，以求掩飾我們和友邦持續中的不平等關係。在此種心態教育下，菲人的思想，將數世紀來的殖民地地位，視為天上掉下來的『恩寵』而不是災禍了。」（註一一二）李雙澤認為一八九八年菲律賓人民展開民族獨立鬥爭，向西班牙爭奪殖民地獨立，經過激烈的戰火，換來卻是美、西在巴黎的合約，美國成了菲律賓群島的新主人，交接的當天經過戰火洗禮的菲律賓人民，「眼巴巴的在仙範河北岸，看著黃紅旗下降，又看著星條旗上升，……」（註一一三）李雙澤對第三世界歷史的理解，使《夏潮》跟著從新翻轉了歐美的世界史觀，再閱讀了世界歷史的結構，從弱小的、被強國壓榨的殖民角度看待世界歷史。

這種重新閱讀世界的歷史重構，《夏潮》一開始就進行了對資本強國「神話」的解毒工作，包括《打破科學中立的神話》、《一卷六期》、《世界性的糧食與人口問題》（三卷三期）、《注意：世界大飢荒》、《打破「世界性飢荒」的神話》、《尼羅河大壩成巨災》（四卷一期）等文章，然而這樣的第三世界歷史重構

在鄉土文學論戰之前，並沒有與台灣的歷史與現實連結，除了林俊義介紹第三世界發展理論一文外，《夏潮》運用的方法是以世界新聞報導的方式，來包裝處理非資本國家的訊息。「第三世界」名詞一直到鄉土文學論戰後才開始大量出現，也在鄉土文學論戰後，《夏潮》較為清楚的標示台灣與第三世界的聯繫關係。第三章第二節曾將《夏潮》的反帝國主義文章作了統計分析（參見圖六），一九七七年後《夏潮》報導美日資本國家與報導第三世界的文章恰好成相互消長狀況，直至一九七八年《夏潮》在鄉土文學論戰後開始將台灣與世界同等地位的國家，與台灣的被殖民歷史連結了起來。

一九七八年四月唐猗〈「第三世界」究竟是什麼？〉（四卷四期）一文，標示台灣與第三世界被殖民國家的歷史處境，開始連結起來，唐猗說：「不管人們喜不喜歡、不注意所謂的『第三世界』，我們實際上早已活在『第三世界』裡。我們不同意嗎？我們要辯證嗎？有沒有這個必要？其實這是一個歷史殘留下來的東西，讀這篇文章的朋友，也許一半以上生來就是第三世界的人了。」也在此期之後《夏潮》開闢了「第三世界論壇」，直到一九七九年二月被停刊為止。把台灣納入第三世界的歷史體系，開出另一條歷史文化的詮釋模式：「如何處理日漸短缺的資源，日漸嚴重的糧荒，如何改正日漸分歧的國際關係，日益差異的國際貧富分配，如何反對極權，增進民主，爭取自由平等，這才是今日知識份子的課題。」（註一四）在第三世界論逐漸確立後，《夏潮》對第三世界的文章，已不再是新聞包裝手

法，而是將台灣與世界體系的歷史情境連結，世界體系的「中心—邊陲」分析架構突顯在往後的第三世界的報導文章中。包括〈第三世界——跨國公司輸出污染的樂園〉（四卷六期）、〈第三世界人權經濟、政治基礎——以韓國為例〉、〈印度貧窮問題的本質〉（五卷四期）、〈中東和平的出路——巴勒斯坦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五卷四期）、〈越南為何淪陷？〉（五卷五期）、〈苟延殘喘的羅德西雅白人政府〉（五卷五期）等等。

將台灣納入第三世界，也就是將台灣納入邊陲國家強調對中心資本國的依賴關係，它重新理解跨國公司並非單純式的資本侵入，是對第三世界生產體系的全面瓦解，GNP成爲第三世界經濟「發展」指數，主要爲了迎合跨國公司帶進來的就業機會，「第三世界國家遂大事更改法律，給予長期免稅，更不惜打擊國內工業，付出任何代價，以創造出一個投資樂園。」（註一一五）台灣在納入這樣的邊陲系統裡，理解同時也是「跨國公司的投資樂園」的世界史觀點。而第三世界論同時擺脫以文學評論作爲分析台灣政治經濟的掩飾手法，可以說文學評論僅是提供與輸入不同的意識型態，無法直接對抗政權盤根錯節的官方意識型態，而第三世界論則由世界史的觀察，藉由報導中心資本國對邊陲國家的剝削模式，納入台灣的「黨國—資本」的政治經濟體系結盟關係來思考，對中心資本國入侵的談話，無意間弱化了民族主義論「國家族群」之間對抗關係的強調，因此它直接對政權高層的統治提出了較爲細緻的分析基礎：「就霸權中心而言，經濟的貸款和援助就伴隨著警察訓練、

文化的侵略和武裝的部隊等方式進入邊陲國家。這些作法不僅爲了邊陲國家的一小群統治者，同時也爲了多國公司。統治者和多國公司的利益是勾結在一起的。「註一一六」對中心資本國與邊陲國關係的描述，比起「文學要反映社會內部矛盾」說法拉高了政治經濟分析的層次，並更進一步取代赤裸裸的馬克思主義「商品拜物教」理論的說法，直接面對的是「黨國—資本」的結盟體系，「問題要得到根本的解決，不僅要取消國內的獨裁政權，同時也要打倒國際資本帝國與邊陲國家間的不平等關係。」（註一一七）直接挑戰的對象指向國民黨的「獨裁政權」，以及現代化論所不願論及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不平等關係。

第三世界論同時弱化「民族」作爲「階級鬥爭」的談法，顯露了隱藏在「華—夏聯盟」中的緊張關係。鄉土文學論戰最後能夠以「民族文學」旗幟的團結收場，與《中華雜誌》以民族主義颯高到綱領的位置關係密切，「華—夏聯盟」間的有機聯盟關係，反抗外來資本、反對現代主義，是基於外資等同於帝國主義的情況下進行，因此民族主義的共識是有機聯盟的最大基礎。然而面對政權統治的同時，卻產生了彼此間的矛盾，《中華雜誌》面對的是黨內奪權與改革，它又要同時維護國民黨本身的「反共」體制，以及維護統治當局的法統政體，才能確保在國民黨內的發言位置。面對《夏潮》以本土「階級」出發，連結世界體系觀察的意識型態，《中華雜誌》與《夏潮》欲以左翼「階級」意識型態策略推翻「黨國—資本」的威權統治體制，之間有著深層的緊張共生關係，從而潛伏了夏潮系統成員內部日後分殊化的因素之一，認同於「民族」的強調？還是「階級」鬥爭戰線的拉長？

的因素之一，認同於「民族」的強調？還是「階級」鬥爭戰線的拉長？

〔註八六〕王拓〈擁抱健康的大地〉，《聯合報》，一九七七，九，十一—十二。收於《鄉土文學討論集》，頁三四八。

〔註八七〕以《中國論壇》爲主的幾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張忠棟、楊國樞、金神保等，陳鼓應在（七〇年代以來，台灣新生一帶的改革運動）文中將其劃分爲「學院式的自由派」，但爲了更精確的點出此派在知識系譜上的位置，以及與下一節的現代化論戰有一致性的派系名稱，將其稱之爲現代化論。

〔註八八〕參考張忠棟〈鄉土、民族、自立自強〉，《中國論壇》五卷二期，頁八—九。

〔註八九〕孫伯東（孫震）〈台灣是殖民經濟嗎？〉，《中國論壇》五卷二期，頁九。

〔註九〇〕同（註八七），頁一一。

〔註九一〕同（註八七），頁一一。

〔註九二〕王拓〈「殖民地意願」還是「自主意願」〉，《鄉土文學討論集》，頁五八五。

〔註九三〕侯立朝〈現代經濟學的真面目〉，《夏潮》四卷二期，頁二六。

〔註九四〕侯立朝〈現代經濟學的真面目〉，《夏潮》四卷三期，頁五七。

〔註九五〕侯立朝〈台灣經濟發展的量變與質變〉，《夏潮》四卷五期，頁四二。

〔註九六〕同（註九五），頁四六。

- 〔註九七〕同〔註九五〕，頁五三。
- 〔註九八〕曾祥鐸〈參加國軍文藝大會的感想〉，《中華雜誌》一七五期，《鄉土文學討論集》，頁八四六。
- 〔註九九〕李復中〈憤怒之愛——論二十世紀的文學特色〉，《夏潮》四卷一期，頁四八。
- 〔註一〇〇〕曾心儀〈這樣的「文學講座」！〉，《夏潮》四卷二期，頁五七。
- 〔註一〇一〕蕭國和〈評王文典的農業經濟觀〉，蕭水順〈請不要輕薄農民〉，《夏潮》四卷三期。
- 〔註一〇二〕訪蘇慶黎。
- 〔註一〇三〕石恆〈思想與社會現實〉，《夏潮》四卷四期，頁一六。
- 〔註一〇四〕同〔註一〇三〕，頁一七。
- 〔註一〇五〕同〔註一〇三〕，頁一八。
- 〔註一〇六〕Jueliek Nyarel / 海芬節譯〈祝福美國的未來——坦桑尼亞總統尼爾雷雷先生的獻詞〉，《夏潮》一卷六期，頁三八。
- 〔註一〇七〕陸文俊〈林俊義〉〈第三世界經濟發展理論的再檢討〉，《夏潮》二卷四期，頁七七。
- 〔註一〇八〕同〔註一〇七〕，頁八〇。
- 〔註一〇九〕《訪問錄》林俊義。林俊義回憶在《夏潮》與《中國論壇》兩邊投的稿，在表達上有不同層次的限制：「寫在《夏潮》上的文章，假如盡情來寫的話，是會

有問題的，會被點名做記號，但是寫在《中國論壇》上的文章，就保守多啦，下筆時小心謹慎多了，我在《夏潮》裡的文章雖是用筆名，但就是盡情寫了。」

- 〔註一一〇〕張正文〈欣聞非阿高階會議成功〉，《夏潮》二卷五期，頁六〇。
- 〔註一一一〕李雙澤〈喪失民族精神的菲律賓教育〉，《夏潮》二卷五期，頁六三。
- 〔註一一二〕同〔註一一一〕。
- 〔註一一三〕李雙澤〈啊！菲律賓歷史！〉，《夏潮》三卷三期，頁三一。
- 〔註一一四〕唐狷〈「第三世界」究竟是什麼？〉，《夏潮》四卷四期，頁四〇。
- 〔註一一五〕陳俊強〈第三世界——跨國公司輸出污染的樂園〉，《夏潮》四卷六期，頁三八。
- 〔註一一六〕胡晴羽〈第三世界人權經濟、政治基礎——以韓國為例〉，《夏潮》五卷三期，頁四九。
- 〔註一一七〕同〔註一一六〕，頁五二。

第四節·現代化論戰的思想路數

現代化論戰緊跟在鄉土文學論戰之後進行，現代化論戰的出現乃延續著文學論戰的社會經濟議題的擴大化，深入到最底層的意識型態本質基礎觀點的辯論。現代化論派主要以集結在《中國論壇》的學院內自由主義者為主軸，傅大為認為其是當時台灣的社會科學的三大主流，心裡、人類、社會學者所形成的「鐵三角組合」、並旁及了政治學者形成的（註一一八）。然而鐵三角的發言位置，更確切的說是以教育高層機構（大學）、學術高層機構（中研院民族所）、主流媒體（《中國論壇》）形塑成「鐵三角」的攻防陣地。而左翼路數僅以「華—夏聯盟」作為對戰基地，以在野的身份但卻具文學論戰後的政治正當性，與現代化派積極的對壘。

「華—夏聯盟」的合作形式在於反帝、反資及民族主義，但是建立合作的基礎卻是因一時的對外做戰需要，因此在鄉土文學論戰後，「華—夏聯盟」則隨之逐漸分化，從雙方雜誌上作者的互滲狀況來看，彼此間的合作，從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僅剩下侯立朝擁護索忍尼辛的言論（註一一九），《中華雜誌》上也逐漸僅有王曉波與陳映真的文章。從而顯現夏潮內部對於「華—夏聯盟」有不同的路線看法。在面對共同敵人——國民黨的威權性統治，《夏潮》面臨到結盟對象的選擇，是《中華雜誌》，抑或黨外？另外儘管合作的形式在於民族主義，「曾以社會主義者自命」，

三〇年代曾經獨立單挑左翼作家聯盟的胡秋原，不可能不知道夏潮系統強調的現實主義內含著強烈的「階級」論點，堅決「反共」的胡秋原為何願意包庇強調階級論的夏潮系統作家？

胡秋原與馬克思主義

民族主義對於夏潮系統成員浪漫情感大於理性的認知，「其實談民族主義，要有一套民族主義的內涵，理論，本質意義的東西，但是我們沒有，相當大的情形下是情緒性的，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民族主義是相當虛弱的。」（《訪問錄》尉天驄）當時持著民族主義最強勢的尉天驄，並不認為對民族主義的認識有理論化的過程，但是民族主義對胡秋原而言卻是一套經過四十幾年來形塑而成的史學、哲學理論。社會主義「階級」概念，對夏潮系統反而是經過保釣後，自覺到必須對抗現代主義文化，對抗資本主義式的帝國主義，所運用的理論武器，此對於胡秋原而言，是「纏鬥」過數年而已揚棄的思考理論，因此兩者的聯盟有著矛盾又辯證的親密關係。

胡秋原年輕時至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留學，主要研究普列漢諾夫，其時正值日本共產黨鼎盛時期，胡秋原比較馬克思與自由主義後，覺得馬克思主義較有所長，但是又覺得自由論的價值不可偏廢，因此其學問中心乃以：馬克思主義為方法論；自由主義為其價值論。之後他到英國遊歷，發覺西方社會文化最重要的是

基督教與民族國家，當時正是第一次大戰之後，民族主義最盛時，他不斷的思索民族在馬克思裡的定義，以及中國的問題要擺在馬克思主義裡的哪一部份解決。後中共駐俄代表團邀請他至莫斯科研究反日本問題，至蘇聯住了一年半，利用瓦爾加「世界政治經濟研究所」的資料研究日本問題，後發表於巴黎左派刊物《救國時報》與《全民月刊》。也因為胡秋原在蘇聯住了一年半，為史達林恐怖統治時期，他認定蘇聯實行社會主義，運用暴力及恐怖手段，有違馬克思主張，「證明馬克思所說沒有高度資本主義基礎不能實行社會主義理論之正確。」（註一二〇）仍未放棄馬克思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的理想典型，乃是對理論的區域局限觀念起了強大的質疑。

一九三〇年胡秋原回到中國，抗日運動正逐漸展開，國民黨首次有效性的動員力量，以民族情感動員中國人民對日作戰，成為當時的政治社會氣氛，因此胡秋原斷言，民族先於階級而成立，他認為世界各國之強弱不同在於文化解放力之遲緩，才造成有階級差別，「必須人人自由，國自由，使為真正文化之開始。歷史之目的是解放人類文化之創造力，不僅馬氏所謂生產力而已。」（註一二一）他看到當時的歷史情境，認為民族集體動員力量的強大，以及其一致性，「中國人自己站起來」的政治號召力，使民族中心論成了他後來的中心思想。

胡秋原本身受到馬克思的影響相當深刻，但是由於三〇年與左聯的論戰，自此與中共翻臉，而依附於國民黨政權下。但是胡秋原的思考體系與馬克思主義有強烈的類似性，且反對資本主義下的自由派學說，可是又要反對史達林與毛澤東的一國社會主義制度，所以在肯定馬克思思想的同時，以「反共」向國民黨作忠心的輸誠，使其在思考體系裡出現兩極的矛盾，是故他提出所謂的「超越傳統派西化派與俄化派而前進」。原本超越前進論是為消弭與全盤西化派的門戶論戰，可是在創辦《中華雜誌》後即逐漸發展為其思想的中心信仰，成為他自認克服馬克思的重要關鍵。但是究其實，胡秋原仍不斷的與馬克思主義進行對話，以辯解他本身的唯物史觀的方法論。

要指出的是胡秋原的超越論有理論上可自圓其說之處，但也有現實上不可能實踐之處。可以明確看出來「民族」成了胡秋原的中心思想。馬克思以「階級」為概念中心，考察西歐的資本主義，企圖以《資本論》解析資本主義必然崩潰說；而胡秋原則考察了民族的思想——並且出了一本書類似《資本論》的民族思想總論：《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企圖以思想發展涵蓋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脈絡。一九七〇年胡秋原對馬克思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論批判，發表《史學方法與歷史哲學之要點》（《中華雜誌》八十期），一九七五年胡秋原則提出了「中國人主義」，尋求中國民族的統一和平革命理論。所以胡秋原發起並參與保釣運動，反對日本的經濟侵略台灣，「嚇退」美國的「中國專家」費正清等，主要想藉由民族鬥爭，替代階級鬥爭的概念基礎。

從《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史學方法與歷史哲學之要點》以及「中

國人主義」，不論胡秋原超越了馬克思主義多少，在方法論的形式上，胡秋原仍脫不了馬克思的陰影，所以整套的「超越論」論述雖可比擬於馬克思主義的嚴謹度，在理論形式上則仍與馬克思主義纏鬥當中。但就現實實踐層面，馬克思立基於歐洲，所以談的是無產階級的聯盟與鬥爭，可以就地的從無產階級的階級結構及資本剝削狀況進行考察。可是胡秋原生活在台灣，由於政治上的「漢賊不兩立」政策，胡秋原不能回到大陸去考察民族的意向，或者說考察民族的思想與觀念的轉向，而思想必需要宣傳、說明、教育等等才能影響轉向，在不能進入他所涵涉的「中國人主義」地區下的大陸，不能進入中國人的民族解放區域內的情況下，又要宣導思想革命、反毛澤東的共產思想，為其理論實踐上的矛盾；理論推行不可能與政治現況的矛盾下，導致實踐力的薄弱。

加入戰局的現代化論派

由於「華—夏聯盟」在鄉土文學論戰中將聯經集團的知識學人直指為官方意識型態的打手，《中國論壇》的自由主義者承受來自在野集團的攻擊下，在夏潮系統撤出《中國論壇》後，開始轉向現代化論的知識學術陣營，原本側身於論戰的旁觀者，開始提出一套官方意識型態向資本主義轉向的合理化說法，以從屬於科學實證論在七〇年代台灣發展的正當性。現代化論派雖與五〇年代的胡適及六〇年代的殷海光，在思想上的傳承並不相統屬，但由於胡適及殷海光相當的注重自由主義及科

學實證，尤其殷海光在六〇年代為實證論述所打開的「論述空間」，以及在七〇年代初期自由主義逐漸搶佔教育及學術的知識高層權力機構，七〇年代的現代化論者正從所謂「從壟斷政經體系的挑戰者到霸權政經體系的妥協支持者」（註一二二）的空間中，尋求「知識／權力」位階上的穩固。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國論壇》分別登出彭懷恩的〈談中國現代化與文化造型問題〉、林嘉誠〈人民需求與政策形成〉及楊國樞〈一個行為科學者的感想〉（註一二三）。彭懷恩首先將派森斯（T. Parsons）的結構功能論運用到台灣的現代化過程，將「中學」及「西學」作為其問卷的兩極座標，逐漸向中間發展，兩者中間的結合在於「現代化」的發展期望，因此其結論是「從統計顯示主張『以理性和客觀的立場，民主的態度對中西文化作有計畫的選擇與採行來促進中國的現代化』的大學生所佔比例最多」（註一二四）並且不斷強調實證科學研究的技術客觀及價值中立。並認為由於西方文化的衝擊產生兩種偏差：一種是義和團的排外，一種是喪失民族意識洋買辦式的媚外。能夠提出解決方法的是主張現代化論的「有理性的中國知識份子」。彭懷恩此文一方面是一九七二年台大「民族主義座談會」事件對民族主義派的王曉波挑戰的時空錯置，一方面因鄉土文學論戰後期對於崇洋媚外批判的接納與修正，呈現了現代化論在重新尋找知識權力定位與靠山的矛盾觀點。同時林嘉誠的文章也正在一九七七年的中壢事件後，將「民主性權力取向」的「民主」概念提法拉進到現代化論的陣營主軸之一（註一二五）。

當時為社會心理學導師的楊國樞所發表的〈一個行為科學者的感想〉，企圖以其學術位階來定位行為科學，以駁斥許多對行為科學的「誤解」與「令人啼笑皆非」的說法，將社會科學定義作一項相當具有方法、步驟、實驗的學科，而且特地将社會科學所有學科等同了行為科學（註一二六）。主要在提出「行為科學」的價值中立及其客觀立場的現實性，因此楊國樞先提出行為科學注重理性，但「行為科學價值並不中立」的說法，將科學研究分為五個階段，在學術研究的五個階段裡會有「內價值」與「外價值」的不同作用價值，對於「收集資料」、「分析資料」的科學研究關鍵過程，只能有內價值的標準，這兩個階段必須有絕對的內價值判斷才能「瞭解客觀的真像」，其餘科學學術以外的包括宗教、政治、喜好等影響稱之為外價值（註一二七）。由於楊國樞在文章的前提將行為科學視為一理性的科學，其內外價值說企圖為科學實證論，定位在具有理性的價值判斷上。

緊接著《中國論壇》在十一月又推出三篇討論現代化的文章，包括劉述先〈從哲學的觀點看中國的現代化〉、胡佛〈論現代化與政治現代化〉、葉啟政〈知識份子與中國的現代化〉，此三篇的基礎論點是相當的不同甚至是矛盾互斥的，但是在《中國論壇》上呈現的意涵，《中國論壇》逐漸形塑成現代化論派正當論述的領導基地。劉述先之文目的在劃分自由中國與共產中國的區分，亦即利用台灣朝向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就與共產中國「落後」的對比，證明現代化論及邏輯實證論是當代哲學思想的統一「線索」。而胡佛之文〈論現代化與政治現代化〉更企圖為七〇年代

政治大轉型定位，提出「現代化完全是一種生活價值的實現過程」，是價值的追求與滿足的過程。認同當時的政治體制所具有的政治權威，因此胡佛極力的談論統治當局權力運作，要能滿足人民需求及權力分配論，「如力的關係安排得當，政治體系的決策就會受到社會成員的尊重與信服，而帶來Max Weber所說的權威，終能導致政治體系的穩定，否則就會產生緊張，……甚至發生崩潰。」（註一二八）並且主張議會選舉的逐步開放，胡佛認同當時的國民黨體制由「強硬型強人」向「柔性強人」的轉化，提出較為進一步的要求，執政者應「盡量容許」政黨議會選舉的開放，這種開放其稱之為「政治現代化」。但是在行文當中，胡佛不斷舉例阻礙政治現代化的是民族主義的激烈情感，包括民族自尊塑造出來的激進黨等（註一二九）。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國論壇》再度推出現代化專輯，包括謝高橋〈台灣的現代化及其問題〉、黃默〈談政治現代化與人權保障〉、彭懷恩〈從中國現代化看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三篇，除了黃默主要在於對國民黨政府的言論自由箝制予以詰難外，謝高橋及彭懷恩幾乎硬套現代化理論在台灣的实施狀況，並且盛讚國民黨政府在現代化推動上的努力成果，以及推崇台灣人民現代化性格的提高，從而也就為國民黨極力宣稱的「台灣奇蹟」，給予其理論正當化的註腳。現代化論派不斷的服膺國民黨政府對中共「四個現代化」的抹黑動作，並且頻頻向蔣經國獻媚的舉措，更使得其由於在教育、學術、主流媒體的「鐵三角」位階益形鞏固，亦可見

其向官方靠攏的顯性定位（註一三〇）。

現代化論在鄉土文學論戰後期逐漸的在標定其「知識／政治」的權力空間時，「華—夏聯盟」有分屬不同的做戰模式，《中華雜誌》在一九七八年二月號刊出侯立朝及李慶榮的文章（註一三一），雖然觸及到自由主義知識學人維護傳統官方意識型態關鍵，但批判的主軸放在資本主義的「非道德」問題。倒是《夏潮》從二月開始連載五期的南方朔的文章〈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有了捉對喊話的火藥味，南方朔此文刻意提點自由主義企圖在邏輯實證論後提出現代化論的名詞轉換，將《大學雜誌》視為自由主義從五四運動以迄《自由中國》、《文星》後的最後階段，企圖為自由主義提出一總結性看法，不斷宣告中國自由主義份子的本質，是「菁英份子」、「可以被收買」、「極高的妥協度」、「反民族主義」、「買辦意識」，並且其實踐之路往往「都走向失敗」，對於自由主義作為西化的推動者，予以強硬的批判。然而南方朔將「土」「洋」分裂後的洋派，一律劃歸為在朝派，而視之依附於政權體系，忽略掉現代化論派是一分散的團體，在政治權力的空間分佈上從在野向政權靠攏的過渡性質，而且忽略現代化論雖然在《大學雜誌》大分裂後，重新在教育及學術機構集結起來的「知識神聖」的權力光圈。由此可知在現代化論戰的初期，「華—夏聯盟」基本上將現代化論派與官方意識型態混淆而等同起來。亦可理解，所謂現代化論戰為鄉土文學論戰的深化，是左翼路線對現代化論派靠向資方與官方的批判，並且論戰的主軸開始從「華—夏

聯盟」分散出去，《中華雜誌》以胡秋原為中心所發動的攻勢，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混雜在知識的龐雜與專業的角度鬥爭中。

《夏潮》在面對現代化派的戰局上，除了南方朔文章間接的對戰外，在論戰初期及進入熾熱的關頭，《夏潮》雜誌上卻儼然從主戰場退出，而側身於外的旁觀者，究其實是在作較紮實的群眾調查工作，就思想路數而言，前幾節論及《夏潮》在進入鄉土文學論戰後期，逐漸致力成為工農階級問題的代言人，在左翼思想呈現的努力是往第三世界理論方向邁步，並且一九七八年開始夏潮系統逐漸的政治化，與在野的黨外政治勢力進行聯盟，此時正為前美麗島時期的在野勢力大聯盟的時刻，夏潮系統與現代化派的決裂於是更為徹底，相較現代化派對當局的從屬獻媚，表現的較為基進與反抗，兩者具體的是在「政治／權力」的兩極位階進行定位。相對於《夏潮》的思想路數朝向第三世界理論進行，《中華雜誌》面對《夏潮》及現代化論卻採取「知識／權力」的正面性應戰，胡秋原對第三世界理論的理解不如《夏潮》將其視為世界史觀的策略轉向，而是納入其「中國人主義」中的一項。

胡秋原直到鄉土文學論戰後期才對第三世界的觀點提出看法，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夏潮》訪問胡秋原關於民族主義在經濟、文化、政治上的觀點，此時胡秋原對第三世界的認識是經濟力的劃分，「現在世界上有三種國家，以開發、開發中（我們台灣在開發中之列）和未開發」（註一三二），雖然他注意到中南美國家在聯合國報告，其著重的是在國族兼新帝國及新殖民的問題，「殖民地經濟就是依附人

的經濟，也就是不能獨立的經濟」，其最後重點注重在民族自立的焦點。到了一九七八年六月胡秋原親自節譯英國華萊斯的《第三世界：國際事務中一大新力》（Peter Worsely, *The Third World, A vital new forc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2），並導讀其所理解的第三世界，但是他將非洲的第三世界理論視為「民眾主義或平民主義」（註一三三），認為是拒絕資本主義也非蘇聯共產主義的發展模式，甚至將東歐共產國家對蘇聯的反叛稱之為「共產主義民族化」，拉丁美洲、非洲及東歐國家有共通的哲學，即「積極的中立主義」，胡秋原進一步解釋第三世界是「既不向左，亦不向右，只是前進！」遂證明了其超越前進論與第三世界理論相符合的談法。從而胡秋原將第三世界理論理解為「民族主義的民眾主義」，並非如《夏潮》改變了思想的戰鬥路數，而是認為第三世界理論只是證明了其主張的正確，再一次拉高其民族意識的理論正確。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華雜誌》向現代化派展開挑戰，胡秋原發表〈論現代西化派之墮落與危險與改革大學史學教育之必要〉、陳映真譯〈新版大英百科全書論民族主義〉及許良雄的〈由語意學論崇洋媚外〉，此次的挑戰，《中華雜誌》展開相當明確的知識／權力上的挑戰，由大英百科全書及語意學的學術觀點提醒民間學術的碩博並不比學院來得落伍，刻意挑戰現代化學院的學術位階。胡秋原更露骨點出現代化派只不過是第三、四代的西化派，指其「一代不如一代」、「徹底的自虐狂與墮落」（註一三四），五月號的《中華雜誌》是挑戰現代化派的典型。六月十日

葉啓政於《中國論壇》發表〈現代社會的風貌〉，仍然在將現代化論視為「一全球性的趨勢」，並點出台灣在邁向資本化社會的六種特徵，即為所謂的現代化社會的風貌。但是葉啓政已經有了較為平衡的說法，認為「傳統與現代可以並存、銜接，甚至相互滋長」（註一三五），應該將既有的歷史條件的改變納入討論才有其時代意義。由一九七七年初至年中，民族主義與現代化論在「知識／權力」的論戰是逐漸的加溫中，七〇年代流行的大型討論會，彼此對立的議題也都在討論會上爆發出來。

現代化論 v. s. 民族主義

七月二十一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舉辦「中國歷史傳統與現代化」討論會，由金耀基主持，參與討論者有余英時、張系國、李亦園、何懷碩、胡佛、成中英，而此座談會雖有訂定四個主題（註一三六），卻以漫談的形式進行，另外有成中英、文崇一、郭正昭、漢寶德的書面，使此現代化論題目自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大幅刊載座談會的內容，加上四篇書面報告，連續在《中國時報》連載六日至八月二日，頓時現代化論議題在一九七八年夏天熱鬧起來。這一大型討論會本欲整合各方關於現代化論的不同看法及內涵，但從座談會中個人發言對現代化論的定義及提法，卻各自南轅北轍，甚至互相矛盾的談法，從而失去整合功效。但此次座談會中卻不斷浮現與過去「中學西學」、「全盤西化」論戰的陰影，各派都企圖詮釋現代

化與西化的不同觀點及內涵，可是另一方面又將鄉土文學論戰以來由「華—夏聯盟」拉高的民族主義，作為與現代化對立的假想敵。例如金耀基說：「有人拒絕現代化，可能有高尚動機，也可能是為了維護他既得的或他認為可有的利益。」，余英時則附和「這個觀念很好」，並認為「任何時代若有變動發生時，總會有人持敵對態度。」張系國則更明確點出現代化論集團對在野集團的權力憂慮：「尤其是近一年來有一種特殊的思想傾向：現代化好像非常不鄉土，而且非常接近崇洋媚外，其實這是大誤解，……。」幾篇書面的報告中，同時顯現「現代化」潮流之不可擋，而科際整合、經濟發展、傳統文化等均指向「變遷」到資本國際體系的價值系統的共同認知。

這一大型的討論會在八月底開始受到來自《中華雜誌》所屬的民族主義堅定立場的質疑，《中國時報》於八月二十九日刊出曾祥鐸〈對「傳統與現代化座談會」的一些意見〉，八月三十日蕭勤的〈中國繪畫的傳統與現代化〉，及八月三十一日王曉波的〈「現代化」與民族主義〉，王曉波一開頭將 modernization 戲謔的譯成「媽的奶最腥」提出，並解釋「亦即在外國月亮最圓的前提下，而嫌棄自己祖國的歷史文化，此譯對某些人士或最為傳神。」（註一三七），並強硬的質疑現代化論在反對社會主義及民族主義時所做的標準，是否即為西方的標準！九月號的《中華雜誌》，王曉波再度發表對〈「現代化」問題的質疑〉進一步將《中國時報》座談會裡頭各人言談之間相互矛盾的地方一一羅列、相互排比，不斷質疑現代化論的對

「現代」及「傳統」的價值判斷標準。

《中華雜誌》也開始展現其強大的民間學術知識，同期有編輯部的兩篇文章〈關於「現代化」〉及〈關於政治學上的行為主義 (behavioralism)〉對此二名詞的學術脈絡介紹及知識階級的批判，解釋現代化為韋伯的合理主義 (rationalism) 及美國化的現代及傳統二分法的結合，並引列斯納 (Lesner) 所編《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對現代化的名詞定義，其中並凸顯列斯納引馬克思所說：「在工業上更開發的國家只是對低度開發國家顯示他自己將來的形象。」（註一三八）該篇詮釋其所謂現代化即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化的演變，帝國主義時代在各殖民地是帝國主義化（英吉利化、高盧化、歐化），二次展後歐洲開始美國化，美國則將其改為現代化所云。舉出七條簡評，「現代化不過高度工業化之意」、「西方之優勢，……是在殖民主義過程中強制殖民地貧困而富起來」，並稍微簡介社會學新左派別馬庫色、孟福 (Mumford)、佛羅姆 (Fromm)，對現代化的批評。對行為主義的批評更為尖銳，直指胡佛及楊國樞的「知識／權力」位階為「偽科學」：「行為科學含有保守的意識型態，行為研究不免迴避現實」、「行為派的政治學之錯誤，不在區別其事實與價值，……，在其以此為名，掩飾其價值觀與目的，即維護現狀。」「不研究歷史，不研究思想與社會之關係，僅就當前投票之類的現象來研究政治理論與行動，則所謂訪問、計畫，都是科學方法之誤用、濫用。」、「行為學派是美國一時一地政治現象的，……我國行為派將美國這一套拿到中國來應用，也根本不

是行爲主義」等等（註一三九）。

九月的《中國時報》上，也行、胡菊人、彭懷恩及林嘉誠不時在中時的小方塊上抨擊王曉波所轉譯的「媽的奶最腥」，認爲此譯爲「奇怪的比喻」及「可笑」，激烈的否定傳統在現代化中的價值作用，也質疑民族主義的激烈的情緒性與中共當時在國際提倡的民族主義有否勾連。彭懷恩不斷提點台灣經濟發展的「舉世奇蹟」，是現代化的結果，維護現代化的成果才是「愛國主義者」。而林嘉誠則說：「現代化絕非全盤西化，但一般研究現代化學者，通常依據歐美先進國家的發展模式而來界定開發中國家現代化指標。」（註一四〇）

《中國論壇》於十月十日刊出由楊國樞主持的「現代化與民族主義」座談，此一座談會其實爲《中國時報》「中國歷史傳統與現代化」討論會的延續，於一九七八年八月九日舉行，與《中國時報》採取相同的漫談模式，時間長達七小時，與會除了現代化論者胡佛、楊國樞、孫震、李亦園、張忠棟，加上有師生裙帶關係的年輕學生輩，林嘉誠、彭懷恩、陳弱水、龐建國、朱雲漢、周陽山在座談會中互相聲援，但是加上了民族主義者及親左民族主義者，唐光華、黃年、金惟純、毛鑄倫、胡晴羽、李利國等，使此座談會數度出現火花，也使《中華雜誌》於十一月立即製作「民族主義及現代化」專輯。

《中國論壇》的座談會由於已經有了《中國時報》討論會浮現出來的「知識／權力」挑戰的傾向，楊國樞刻意擬定三個主題：現代化的涵意、民族主義與現代化是否衝突？台灣現代化的經濟問題。把問題拉到意識型態的正面辯論，將傳統等同民族主義而與民族主義對立起來，並且再度將鄉土文學論戰的殖民經濟問題掀起，質疑被現代化論視爲「過氣」的殖民經濟的左翼意識。會中楊國樞不斷對民族主義者挑釁，包括《綜合月刊》的編者黃年質疑楊國樞的〈現代化的解析〉一文，對現代化論中的幾項劃分傳統與現代的分析原則與規限，楊將其視爲典範的「自由、平等、幸福、進步」成爲一種崇拜的符號，「所謂現代化只是西方國家爲了適應工業革命後的新文明的一種生存嘗試，未必是什麼不可疑的典範。」（註一四一）（以下所引文爲座談會紀錄），楊國樞則提出黃年是以道德來批評現代化論，而不若其就「現實著手」要好。接著林嘉誠、朱雲漢、彭懷恩，紛紛護衛楊國樞對現代化的定義。但胡晴羽則反駁「現代化愈強的國家，其侵略性愈強。在這種國際壓迫下……提出民族主義有其必然的作用。」在此情況下，胡晴羽給予民族主義感情與思想上雙重層面對抗帝國主義積極的作用。黃年則針對民族主義進行定義，是一種「自覺」以及「反省」，並再一次界定鄉土文學論戰對資本經濟的批判意義，而質疑高希均的高學費說法是非常「淺薄可笑」。然而楊國樞則不斷詰難民族主義的情緒性問題，「他們只允許別人肯定它，不能批評它、醜化它。是不是一直如此？」黃年則淡淡回應「我想這是一個信念問題。」

李亦園及胡佛趕緊發表較爲平衡性的說法，以其人類學及政治學專業企圖化解兩造間的火花。胡佛提出韋伯的理性論來化解，認爲民族主義「最要緊的是理性部

份的發揮」，並不斷詮釋「理性的民族自覺更是與現代化的建設連在一起的」，企圖將民族主義理性化，而納入「建設現代化的國家」的主流隊伍之一。李亦園亦將「建設一個富強的國家」的大頭套拿來籠罩民族主義對貧富不均的批判，從而窄化可能被提出來的階級不平等問題，甚至也忽略民族不平等的帝國侵略本質。由於談話拉高到國家的層次，身為政府科層官僚的孫震則發言「主張對現狀加以改革，都可以算是現代化的活動。」並且更媚俗的將「愛國」提為其正統意識型態的地位：「你主張的現代化可能與我的不同，你主張的民族主義也可能與我的不同，主張儘管可能不同，相信愛國一念，則是共同。」會中的民族主義者對於國家機器態度是不批判的，當「愛國」一被提出後，好像出現了巨碩的共識框架（註一四二）。會中更提到關於台灣資本主義的問題，毛鑄倫認為台灣正邁向工業與資本化過程，在中共統治下的八億人，反對走資的傾向，對於未來的統一則是一矛盾問題。張忠棟則進行對資本主義辯護，甚至證明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有肯定私人資本一項，因此孫中山是贊成資本主義的，並且批判夏潮系統一直援引孫中山的言行批判資本主義。「我們不能斷章取義，套國父早期說的一、兩句話，就完全否定資本主義的價值。」周陽山緊接著附和：「另外還有人口口聲聲喊著『團結第三世界弱小國家，打倒歐美資本主義侵略』，我實在不知運用『第三世界』這樣含糊曖昧的字眼到底用意何在？」

楊國樞於是請孫震說明台灣經濟的發展，孫震則開始以其國民黨資本主義轉化後的正統態度，長篇大論政府既定的經濟策略，並曖昧的解釋台灣的經濟「均富的差距」，是涉及到「往往因每個人的主觀判斷不同而異。」甚至批評「『為富不仁』的社會心態」是錯誤的。由於座談會長達七個小時，楊國樞在最後做出五點結論，但都針對民族主義的方向試圖給予「導正」到現代化的「理性」及「正當」的提法底下：(一)民族主義應該與人為善，理性的肯定自己；(二)民族主義必須落實到現實層面；(三)三民主義要均衡發展；(四)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結合，民族主義是現代化的一部份，甚至是動力；(五)關於毛鑄倫的問題，則認為應朝向現階段的政策，自由、民主、法治、均富的形態，來作為推廣統一的實驗。從《中國時報》的「中國歷史傳統與現代化」討論會到《中國論壇》的「現代化與民族主義」座談會，現代話論派各派別各說法均出現，從最極端的傳統與現代二分的結構功能論，到官方「黨國—資本結盟」的正統態度，以迄韋伯式強調「理性價值」的現代化與民族調和理想型等，其內部的思考邏輯諸多互斥及矛盾，在現代化論者間均刻意不被提及，甚至以相互能夠「容忍」、「與人為善」、「不尖銳批評」為標榜，而將現代化論視為阻礙資本化進步的「傳統」與民族等同，刻意的挑釁民族主義面對現實時的情緒性反應。

《中華雜誌》於十一月立即推出「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專輯回應，以及十二月接續有「民族主義與反民族」專題（註一四三）。十一月包括胡秋原的《由馬克思與章伯論現代化之理論與實際》，由編輯部翻譯《大英百科全書》對「工業化與現

代化」的解釋，劉源俊（也談「現代化」與民族主義），王曉波（評「現代化」的殖民主義），另有詹茂士對《中華》九月號的質疑及胡秋原的回答，在「通訊」專欄還有兩篇對現代化的攻擊（註一四四）。整個民族主義陣營對現代化論的批評態度亦全部亮相。

劉源俊的批評態度認為現代化論缺乏對「倫理」「道德」的討論，認為現代化的談論的民主精神在「人權」與「法治」，然而不講道德的話只會成為「專制暴政」、「趨炎附勢」，亦即以民族精神為最高綱領，來批判現代化的無法解決的社會正義及公道問題。胡秋原之文則以其強大的學問能力解剖現代化的理論來源，認為現代化論理論來源來自摩爾干、斯賓塞、馬克思及韋伯，而百分之八十為韋伯。胡秋原指出現代化論「拼湊」馬克思及韋伯的理論，但丟棄掉馬克思最為重要的外化（Alienation，即異化）觀點，使得現代化論根本不重視人性的、人格本質以及人道的感情連帶，使人進入一個人際疏離「外化」的世界。胡秋原大致考察了馬克思的外化論，從《一八四四年經濟學與哲學手稿》、《前資本主義經濟構成之綱要》、論及《費爾巴哈論綱》與《共產主義宣言》，認為青年馬克思的外化論提出的人與自然、生活工作、他人、社會分離而成為資產社會的生產機器，是一個可以檢驗資本主義「非人性」的真理。另外對韋伯的合理主義、世俗化亦做了介紹，並引恩格斯對理性之語批判「今日所謂理性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王國之理想化。」胡秋原這篇大作由於在批判美國現代化論的「傳統/現代」二分結構的不合理性，雖

然大量介紹社會學兩大家之間的辯論，重點在於引證現代化論是美國帝國主義作為其侵略第三世界，一種世俗化、理性化的提法罷了，對於較為精緻的左翼學派間的辯論並未精細的推演，但是在最後結論很坦承的提為何要談民族主義的理由：「就是要克服外化的苦痛與危機，返於中國人的立場。」顯示其民族主義左傾的「知識/政治」立場。

而王曉波之文卻以孫中山之三民主義為基點，批判現代化論對於傳統的及民族的質疑，即使到了一九七九年二月，王曉波在《中華》的〈論現代化破後之立的問題〉仍以孫中山及早期國民黨的李建芳之文詰難現代化論。雖然王曉波在此二文中均提到帝國主義以工業資本入侵問題，並點出現代國際以迄中國分裂問題在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冷戰的結果」（註一四五），很明顯的早期《夏潮》的孫中山左翼色彩在此地再度出現，不如胡秋原清楚的勾勒左翼理論作為其工具的知識來源。十二月《中華》出現了較為平衡性的談法，艾箴（陳映真）的〈談民族主義與現代化〉，一方面主動為民族主義者詮釋當時的民族主義已經不是民國初年的民族主義，而是已經經過反省及演化成「思想形態——經濟的民族主義」（註一四六），並且提出新的問題：現代化的變遷是擴張與取代的現象，「問題是誰擴張誰？誰取代誰？」當民族主義成為現代化動力時，民族主義無法防範「現代化」所擴及的制度、行為、思想層面問題；更本質的是「為什麼發展與平等不能同時獲致？這不是唯一的、西方式的發展方式有其本質上克制分配的因素？是否有其他發展的模式

可與分配同時進行，相輔相成，而仍未被人類所察覺？」（註一四七）陳映真擺脫民族主義與現代化論戰中的情緒非難，而凸顯了第三世界理論的重要議題，他在文中最後建議應該再開一個座談會，但會中不能僅有留美學學者，應加入留歐的經濟學者及研究中國的經濟制度學者。

小結

現代化論戰進入尾聲後，王曉波接連三個月在《中華雜誌》發表三篇關於現代化論戰後的問題，其中王曉波的發言，主要針對「民主」在當時政治空間上的定位，王不斷舉證統計數字說美國的民主僅是「少數人的民主」，現代化論的民主僅是「少數人支配多數人」的「才俊」式民主。並強化民主應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民主，才構成「民主」的要求。王曉波的三篇文章，乃在一九七八年底的《夏潮》與黨外大結盟的國大、立委選戰時空出現，夏潮系統在取得反叛體制的政治位階後，「民主」的號召成爲「反對運動」陣營的正當概念，因此王曉波在現代化論戰後期，企圖與現代化論搶奪左翼的民族主義者在「民主」號召的正當性，從而進一步戳穿，現代化論者在「政治現代化」中「民主」概念的空洞化與實踐力的虛弱，並揭發其所謂的「民主」陣營是「爲少數人而設的民主」（註一四八），是與國民黨當局獻媚與妥協後的「知識／權力」立場談法。

鄉土文學論戰是以夏潮系統爲中心的一場意識型態的論戰，在論戰中，《夏潮》迂迴的閃避扣帽子的政治恐怖，閃爍及滲透「階級」的概念，企圖將「階級」談法納入政經結構的分析中，並拉抬到各平面媒體。到了一九七八年《夏潮》逐漸介入到政治鬥爭時，「華—夏聯盟」之間的矛盾益愈明顯，其時王曉波及陳映真則較附著在《中華》陣營，當現代化論戰開始後，王曉波不若《夏潮》往第三世界理論方向發展那樣的明確，但亦不若胡秋原顯現的民族主義左傾的樣貌，仍閃躲在孫中山背影之後對現代化論予以攻擊。僅有陳映真及李慶榮以新問題的提法（註一四九），顯露第三世界理論在台灣爭取定位的「知識／政治／權力」的位階。從反對運動陣營的立場來看，王曉波由於當時已爲《中華雜誌》編輯之一，他又試圖將「華—夏聯盟」共同定位於反對陣營中的一員。此作用一方面藉由反國民黨威權體制，所獲得的「民主運動」正當性號召，從而凸顯反叛的「知識／權力」空間時，似乎左翼知識體系（左傾者及左傾民族主義者）想藉由反現代化論的民族主義陣營進行全力的反撲動作；但其動作並不明顯，或許是準備動作不夠充分。

另外藉由胡秋原本身的碩博知識，對左翼（不論老馬或新馬）知識的引介（註一五〇），逐漸滲入台灣的知識圈，左翼的知識系統也開始被民間反對陣營接納。現代化論戰可說是學術知識的政治角力，其複雜性在於現代化論者間的光譜，分散極爲廣闊；從結構功能論，以迄較爲中立性的韋伯論談法都摻雜在裡面；彼此間相互標榜，卻共同將民族主義視爲假想敵，攻擊「情緒性」的民族主義，以向國民黨威權體制獻納統治的立論基礎。其實現代化論者所指的情緒性民族主義者亦未必爲

《中華雜誌》集團，只是刻意想要挑釁傳統的「反全盤西化」與「中體西用」者，但卻使得將民族主義定義為上綱的《中華雜誌》集團對立成論戰的另一方，其中更包含了傳統民族主義者、親左民族主義，以及如胡秋原的民族主義左傾者，其相互間的理論內含差距甚大。相對於夏潮系統而言，較為清楚的「階級性」提法，卻沒有清楚的顯露在論戰中，但是夏潮系統在政治位階上卻與中華系統鉤連起來，整個「民族主義」陣營鉤連的聯盟基礎，是在「反帝國主義」這樣的歷史模糊概念下進行，是以帶有著民族意識的「反帝國」與「反殖民」的定位下結盟在一起的，但由於沒有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內含做到內部分析及釐清的工作，各有不同的視野及詮釋下，也就更使得整個論戰錯綜而複雜。在論戰的本質及形態上，由於民族主義陣營的掩護，使台灣左翼在階級概念的建構中，出現理論相當豐富、繽紛及奔放的力道，且具批判性強的實踐樣貌。

〔註一一八〕傅大為〈歷史建構、邊陲策略、與「中國化」——對台灣「行為及社會科學中國化」提法的思想史研究〉，《島嶼邊緣》第一期，頁一〇四。

〔註一一九〕侯立朝〈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為索忍尼辛哈佛演說作註解〉，《夏潮》五卷二期。

〔註一二〇〕參考《中華雜誌》編輯部〈胡秋原先生之學問思想及其意義〉，《中華雜誌》

一八五期，頁二四—二五。

〔註一二一〕同〔註一二〇〕，頁二八。

〔註一二二〕參考傅大為〈科學實證論述歷史的辯證——從近代西方啓蒙到台灣的殷海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一卷四期，一九八八，冬。傅大為認為科學實證論述從弱勢的抗爭到強勢的專橫，從挑戰者到妥協支持者，正是其「歷史的辯證」的結果。而此時開打的現代化論戰，無疑可說是科學實證論述的「強勢」的奠基工程。

〔註一二三〕彭懷恩〈談中國現代化與文化造型問題〉、林嘉誠〈人民需求與政策形成〉，《中國論壇》五卷二期，一九七七，十，二五；楊國樞的〈一個行為科學者的感想〉則分為上下兩次於五卷二、三期發表。

〔註一二四〕彭懷恩〈談中國現代化與文化造型問題〉，《中國論壇》五卷二期，頁三六。

〔註一二五〕林嘉誠〈人民需求與政策形成〉，《中國論壇》五卷二期，頁四〇。林嘉誠的民主性權力取向採自韋伯的科層官僚體制論述的提法，然而林嘉誠的「民主」概念提法仍相當空洞，因此他在其文章後加註說明此一概念以胡佛的創見「最具啓發性」。

〔註一二六〕楊國樞將科學區分為三類，物理科學、生物科學及社會科學，他認為由於社會科學會讓人聯想到社會主義，而資助研究的基金會的後台老闆，是想到社會主義就會敏感的資本家，因此以「行為科學」來取代「社會科學」的說詞。參考

氏著〈一個行為科學者的感想〉，《中國論壇》五卷二期，頁四二。

〔註一二七〕傅大為認為楊國樞的內外價值區分並沒有回答古典知識社會學所問的「知識有效性」的問題，而只是介於「客觀中立」與行為科學在八〇年代「中國化」二提法的中途論點，但此處我並不打算觸及行為科學在七、八〇年代的演化過程，寧認為楊國樞的內外價值說是在為其現代化論具有「理性」此一說法下，辯護其在文化界的正當性。參考傅大為〈歷史建構、邊陸策略、與「中國化」〉一文。

〔註一二八〕胡佛〈論現代化與政治現代化〉，《中國論壇》五卷四期，一九七七，十一，二五，頁一五。

〔註一二九〕胡佛認為「這類型的激進黨，雖對民族自尊的恢復，民族不平等的取消，有相當的貢獻，達到某種程度與意義的現代化，但本身卻屬集權」，有意識的暗示國民黨的革命性格，以及鄉土文學論戰當時高喊的民族主義傾向是現代化發展的阻礙，但是為了避免有這樣的質疑，胡佛特別在其文後附註此文「在三年前已經形成」，並與楊國樞討論多時，但即使此文在一九七五年形成，置放在一九七七年論戰後期的時空下，也顯示現代化派已經準備躍入知識權力的論戰中。參考〔註一二八〕。

〔註一三〇〕從《中國論壇》的幾篇社論及文章中即可看出現代化論向官方靠攏的動作：五卷二期社論〈總統蔣公與我們長相左右〉，五卷八期社論〈擁護蔣經國先生競

選總統〉，耿榮水〈欣聞蔣經國先生競選總統〉，五卷十期社論〈國民黨提名蔣主席出任總統〉，五卷十二期社論〈蔣經國先生當選總統〉。

〔註一三一〕侯立朝〈吳望堯的檢舉與董保中的「道德」〉、李慶榮〈張忠棟的文章值得國人嚴重注意〉，《中華雜誌》，一九七八，二。

〔註一三二〕《夏潮》編輯部訪〈胡秋原先生談民族主義〉，《夏潮》三卷五期，頁四九。

〔註一三三〕胡秋原節譯〈第三世界與第四世界大戰〉，《中華雜誌》一七九期，一九七八，六。但是此篇翻譯加導讀文章並未刊完，因現代化論戰進入熾熱期而停頓。

〔註一三四〕胡秋原西化派的第一代為陳獨秀及胡適，第二代為胡適在台灣子弟，掌台灣戰後的教育者，引入了邏輯實證論、存在哲學、現代化、行為科學、凱因斯等，而第三代為許倬雲、第四代為張忠棟、王文興等，參考胡秋原〈論現代西化派之墮落與危險與改革大學史學教育之必要〉，《中華雜誌》一七八期，一九七八，五。

〔註一三五〕葉啓政〈現代社會的風貌〉，《中國論壇》六卷五期，一九七八，六，十，頁三七。雖然傅大為認為葉啓政在回國於政大客座時已批評「現代化論」（參考〔註一〕，頁一二〇），但從此文及其前面的文章〈知識份子與中國的現代化〉，未見其較為犀利的批判性，但至少葉啓政未如《中國論壇》集團向政治權力靠攏的觀點，僅僅在提點現代化（或者說是西化）在中國及台灣的形塑過

程，同時點出台灣在邁向現代化六大特徵時的現象，具有歷史性的討論意義。

〔註一三六〕四個主題是：現代化的觀念、對當前現狀的考察、傳統在現代中國的角色、未來的展望。《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一九七八，七，頁二八—九。

〔註一三七〕王曉波〈「現代化」與民族主義〉，《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一九七八，八，三一。

〔註一三八〕編輯部〈關於「現代化」(Modernization)〉，《中華雜誌》一八二期，頁四七。

〔註一三九〕編輯部〈政治學上的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中華雜誌》一八二期，頁五〇。

〔註一四〇〕彭懷恩及林嘉誠之文在《中國時報》找不到，此處引用之原句為王曉波所引。參考王曉波〈評「現代化」的殖民主義〉，《中華雜誌》一八四期，一九七八，十一。

〔註一四一〕〈現代化與民族主義〉座談會，《中國論壇》七卷一期，一九七八，十，十。

〔註一四二〕由於在座談會中沒有人對孫震用來鎮壓的「愛國」提法質疑，引發李慶榮於十一月《夏潮》發表〈孫震與眾不同的現代化和民族主義〉，李慶榮質疑孫震只是在為資本家遮掩的真實。

〔註一四三〕十二月《中華雜誌》有石明〈胡秋原〉、〈不問蒼生問洋官〉、陳映真譯〈論現代化理論之可能性及可欲性問題〉、艾蕙〈陳映真〉〈談民族主義與現代化〉

及嚴廷棟〈評易君博的反民族心態〉，另外中華編輯部整理三篇有關於胡秋原思想的強大及碩博，以強調其學術位階比較起現代化論派的客觀中立，更為站得住腳，包括〈胡秋原先生之學問思想及其意義〉、〈胡秋原先生與當代十六種思潮〉、〈對於胡秋原先生的一些批評〉。

〔註一四四〕兩篇短文通訊是葉頌壽〈「現代化問題」質疑〉，吳孝信〈胡佛的「現代化武器」〉，《中華雜誌》一八四期，一九七八，十一。

〔註一四五〕王曉波〈論「現代化」破後之立的問題〉，《中華雜誌》一八七期，一九七九，二。

〔註一四六〕艾蕙〈陳映真〉〈談民族主義與現代化〉，《中華雜誌》一八五期，一九七八，十二，頁二二。

〔註一四七〕同〔註一四六〕，頁二三。

〔註一四八〕引句為《中華雜誌》之篇名范民仁翻譯Michael Parenti〈為少數人而設的民主〉(Democracy for the Few)，此篇亦為王曉波之文的註腳，《中華雜誌》一八九期，一九七九，三。

〔註一四九〕李慶榮在十一月《夏潮》發表〈孫震與眾不同的現代化和民族主義〉，批判孫震在《中國論壇》座談會中關於官方正統的發言態度，但現代化論戰時期《夏潮》僅此一篇孤立出現，並且未有任何人為文應和。另外王杏慶及陳忠信、吳乃德於《美麗島》雜誌上聯合以吳忠慶為筆名所寫的〈讓我們來打破各種神話

——和金耀基討論政治文化和經濟發展——一文，亦為以新左的觀點批評金耀基談大眾文化政治但確是菁英領導的提法，在《美麗島》雜誌上連載三期，由於牽涉到更為廣泛的學術思想派別的辯證，已為八〇年代反對運動陣營理論辯論的議題了。

〔註一五〇〕例如從一九七九年九月起，胡秋原開始介紹及翻譯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直到一九八〇年一月止。

第四章·政治實踐路線

第一節·反分離主義

《夏潮》從改版後的第四期，就公開表現其反分離主義的態度，說明改版的〈致讀者書〉裡就提到：「如果說我們有什麼思想觀念上的執著，那只有一個：我們的文化是不可能分割的，每一個中國人都背負著五千年文化的重舉，我們不可能拋棄他們而存在，更不可能為了褊狹的政治利益，而妄想分離一個悠久而深厚的文化，讓我們在沈痛的自我反省當中，拋除一切狹窄自私的島國居民性格，……〔註一〕」反對的態度除了文化上的理由，更重要的為政治族群上的認同，視分裂台灣跟中國的政治瓜分，是來自帝國主義的「陰謀」，從日據時代以迄美國阻礙中國統一的第七艦隊的保護，美蘇帝國間的冷戰而製造了台灣與中國在意識型態上的極端對壘，較為明確的政治意識態度是由於反對帝國主義對於台灣的經濟剝削與文化移

植，因此反分離主義是在這樣的政治族群認同上，進行了與階級對抗上的連結。

雖然在政治上與國民黨政府有著不同內含的中國統一基調，卻有著相同實質效果的「反分離主義」出現，甚至《夏潮》進入到台灣史的研究裡頭，由於牽涉到日據台共在兩次的綱領上，都提到台灣要獨立建國的字樣，更使得《夏潮》進行反分離主義時，不斷的釐清及進行再解讀台灣獨立論的歷史模態（註二），並且爲了建立台灣史具有國際性及第三世界論的歷史情境，《夏潮》將台灣受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歷史與中國受列強帝國壓迫的歷史，相互的等同，而有共同的歷史命運。《夏潮》在述說其反分離主義基調時，不時地浮現一種中國式的受迫害情懷，一方面台灣與大陸間的阻絕，又是在反帝以至於反資的意識型態基調上，但是又不能直接甚至隱諱的暗示要重新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烏托邦中國時，民族主義成了反分離主義的述說形式，因此，在同樣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基調上，夏潮系統與以民族主義爲上綱的《中華雜誌》集團結盟起來。

《中華雜誌》政治實踐力的薄弱卻又不願背叛、離開國民黨的法統體制，讓胡秋原在黨內的位置愈趨邊緣。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成了《中華雜誌》重新連結本土力量再出發的時候。「華—夏聯盟」表面上是胡秋原以其政治上的權力階，與三〇年代左聯單挑的經驗保證，運用其在黨內學問上的位階及立委的政治地位，向國民黨保證鄉土文學就是民族文學（註三），而護衛了夏潮系統的編者及作者群。既然在政治上予以庇護，進一步就有政治上的聯盟。一九七七年王曉波以

《夏潮》的身份參與《中華雜誌》長期以來每年都舉辦的「七七抗戰紀念會」；一九七七年九月鄉土文學論戰中官方意識型態正值砲火隆隆之際，夏潮系統王曉波、陳鼓應、尉天驄及鄭漢民參與《中華雜誌》發起的「喝退費正清行動」，陳鼓應並於九月十六日「反對費正清出賣自由中國座談會」席上發表〈對費正清「中國問題」觀點的我評〉，大受胡秋原讚賞。（註四）

一九七八年夏天的「七七抗戰紀念會」更是擴大舉行，參與主辦的除《中華雜誌》社外，尚包括：《政治評論》、《夏潮》、《仙人掌》、《讀書人》、《笠詩》刊與《詩潮》等雜誌社共同舉辦，並請到了左翼抗日元老巫永福與楊達參加，「華—夏聯盟」辯證性的親密關係在一九七八年夏天達到最高潮。這同時顯現在「反長老教會新而獨立的國家」議題上面。這次的辯論進一步的展開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辯證性親密關係，也進一步擴大了社會主義在政治鬥爭上聯盟對象的矛盾。

一九七二年美國與中共簽署《上海公報》，美國表示「美國認知到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堅決主張只有一個中國，而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對此一立場不予挑戰。」一九七三年後美國與中共互設聯絡辦事處，彼此間的往來活動愈加熱絡。一九七六年卡特上任美國總統，美國與中共建交有越來越明確的趨勢，並且進一步關係正常化。一九七七年八月《聯合報》發起「一人一信運動」寄給卡特，要求不要放棄台灣。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六日長老教會發表〈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人權

宣言——致美國卡特總統、有關國家及全世界教會），長老教會認為美國逐漸往跟中共建交的步驟前進，於是發出此份宣言，要求卡特不要將台灣歸予中共，其中文字有：「面臨中共企圖併吞台灣之際，基於我們的信仰及聯合國人權宣言，我們堅決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一千七百萬住民決定。』我們向有關國家，特別向美國國民及政府，並全世界教會緊急呼籲，採取最有效的步驟，支持我們的呼聲。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願望，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情勢危急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爲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註五）

長老教會此宣言一發表，《夏潮》於十月署名北屋發表（從致美國總統卡特的一封信說起）用強烈的措辭攻擊長老教會的宣言，北屋從台灣史的立場認為台灣長期受到帝國主義的迫害，而帝國主義更是不斷以宗教作爲干涉政治的主要力量。從荷蘭以迄日據時代，基督教長老教會都與統治者充分的合作，由這樣的歷史分析北屋導論出：「但由長老教會不斷的發展過程所顯示出來的本質，在台灣緊要關頭出賣台灣，應是不會使人驚訝的，畢竟主張台灣獨立與嚮導日軍攻台，只不過表象不同，本質一樣的行爲而已。」（註六）因此北屋斷言長老教會的中產階級性格，本身就潛在一種危機，「拋棄民族尊嚴、歷史責任、與帝國主義陰謀者同流合污的潛能所在。」長老教會的「新而獨立的國家」「宣言」遭受到《夏潮》嚴厲的攻擊，然而長老教會可以說是台灣政治系譜裡屬於黨外中的一股力量，《夏潮》這一篇文章面臨與黨外聯盟關係的緊張，十一月署名施根本立即以教友的立場來爲北屋

這一篇傷害到政治聯盟的文章解釋，施根本首先對長老教會的宣言表示是對國家「不當的言論」，繼而述說教會在中國及台灣大部份是沒有貢獻，因此沒有受到知識份子的認同，但長老教會「算是比較懷有社會關心的教會。」（註七）話題轉向了教會內部的矛盾問題，長老教會的體制排除外人接近上帝的愛，繼之認爲「台灣教會過分地受到西方之影響，相對地失去了中國的屬性。」接著施根本運用神學理論批判傳統教會沒有「主內的、屬靈的交通」，最後以相當溫和的語氣要求教會要有誠心的檢討此事件，「在主耶穌愛中的，使教會有一個新的面貌。」施根本的文章似乎註解北屋的文章爲「擦槍走火」，然而事已發生，長老教會的確白紙黑字寫了「使台灣成爲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施根本採取轉向縮小至教會內部矛盾來討論問題焦點（註八）。

然而北屋的「擦槍走火」卻沒有因施根本的縮小討論範圍而結束，十二月的《綜合月刊》以四篇文章報導事件，以及三位編輯掩飾身份，以研究生的名義訪問高俊明牧師，訪問過程預設了問題的答案，如：「據說，你們在決定發出這項宣言時，少數人把『後事』都料理好了，這不是說明你們自己覺得那樣做不太對？或與國策不符？」，「在信徒大增的情況下，是否有台獨份子滲入長老教會？」「長老教會是否時常使用『台灣獨立』這個字眼？」（註九）預設並且情緒性的攻擊式問話，且以更加粗暴的文字評論長老教會的宣言，如「這種人應該槍斃一百次」（註一〇）等等，《綜合月刊》的預設立場顯露了卑劣的陷阱式問題，但由於其攻擊到

當時仍爲禁忌的「台獨」言論主張，除《夏潮》給予其詰難外，一般輿論竟認同《綜合月刊》的作法。

長老教會在承受到各大報章及《夏潮》、《綜合月刊》，甚至來自教會內部的異議聲音，高俊明於十二月十八日澄清宣言的內容：「發表人權宣言純粹出於愛國、愛同胞、愛上帝的動機，毫無政治野心。……不幸有少數教會外雜誌及敏感的人士故意曲解本宣言的動機，甚至做不實的報導與惡意批評，令我們深感惋惜。……『獨立』是指『德國模式』，台灣的前途不由他們（美國）決定和安排，我們的政府是自主的政府，我們自有主權決定自己的命運。」（註一一），高俊明的態度並沒有軟化，只是將「新而獨立的國家」，轉化成「自有主權決定自己的命運」的「自決論」，並且長老教會接納宣言爲總會的立場，總幹事高俊明的態度更趨堅硬。高俊明態度的強硬，使得施根本想要縮小「新而獨立的國家」討論範圍的用心更加不可能。

一九七八年一月北屋再度投稿至《夏潮》，批判長老教會「犯錯誤是難免的，重要的是不肯悔改，尤其是假借了神的旨意所犯的錯誤。」（註一二）緊接著王曉波在《中華雜誌》發表〈上帝主張分裂中國嗎？〉也針對高俊明的言論予以反擊，「高俊明等人有權以個人身份提出政治意見，不必淡泊，但不能假上帝之名。……希望高俊明等人不要再使教會墮落成帝國主義的工具。若彼等執迷不悟，一切長老教會的教友，爲拯救教會的墮落，有權起來抵制他們。」（註一三）王曉波與北屋

意見構成一組批判帝國主義的態度，對於長老教會的「分離主義」予以嚴重的批判。但是不同於主流報紙與《綜合月刊》站在官方意識型態的政治道德態度，王曉波更指明了他的目的在維護這種政治主張的自由，而不在政治上的構陷，並要求能與高俊明公開的辯論，王曉波的態度說明其基本信念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台的可能的代言人。

接著長老教會於三月十四、十五日於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行長老教會第三十一屆北部大會，在會議中陳溪圳等人提臨時動議，傾向反駁〈人權宣言〉，且順應既存體制。然而北大的決議表決中，以十三票比六十七票否決臨時動議（註一四）。到了三月二十八日長老教會第二十五屆全國年會於台南神學院舉行，共有三百二十六名代表參加，高俊明不但連任總會總幹事，並且〈人權宣言〉雖遭李東輝提議刪除，林清泉長老則改議爲接納，經過票決，贊成提議刪除者四十九票，贊成改議接納者二二五票，十票廢票（註一五），以壓倒性多數接納並承認〈人權宣言〉，會後長老教會對外發表了〈人權宣言之動機與精神〉：「……主張國家的前途應由我們人民自己決定。少數人指責我教會不顧及大陸同胞之人權，違反國策，並加戴『台獨』、『匪諜』之罪名，完全是惡意中傷，根本不瞭解發表『宣言』之背景與動機。本『宣言』所提『新而獨立之國家』完全與台獨無關。」（註一六）長老教會開始澄清「與台獨無關」的政治帽子，但卻拉高了「自決論」的愛國聲調，是出於「誠心愛國、愛同胞的心情」，而且會中的壓倒性票決，表現了被激化的長老教

會對外的政治團結性。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的確引來政府的密切的注意，但長老教會卻向美國國務院求援，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德立安（P. M. DeRian）以書信向長老教會表示：「雖至今還沒有該宣言起稿人被官方逮捕或居留，你們仍被保證在台北的美國大使館將繼續密切觀看事情。」（註一七）也因此長老教會在美國國務院的保證下，態度趨向更加強硬，在澄清〈人權宣言〉中表示：政府若無視上帝所託付的責任濫用權力作少數權力階層的工具時，教會應站在人民的立場，發出人民的心聲，敬告政府。同時王憲治牧師也發表所謂後進國家教會的基進角色，後進國的「基進神學」進行詮釋：後進國家人民……受壓迫、受剝削及歧視。且由於政治權力的鬥爭，……往往淪為專制統治、個人統治。後進社會中教會的角色，應參與同胞受壓制的現實，站在受壓制者的立場發言。」（註一八）長老教會在態度上的轉向強硬，與從一九七七年中壢事件以來，黨外勢力越趨增大有關，至一九七八年初鄉土文學論戰沒有抓人後，黨外擴大結盟態勢愈加明顯，一九七八年的言論自由界線逐漸擴張有很大關係。

但是夏潮系統對長老教會〈人權宣言〉事件卻有兩種立場。先發言的是王曉波再度於五月份的〈中華雜誌〉重申他的立場，他認為高俊明未必有何台獨政治主張，但「任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還有什麼『德國模式』都是分裂中國的思想，實際上也就是『台獨』思想。」（註一九）這樣的強硬的劃分性格除了是對帝國主義的反感，更重要的王曉波認同憲法裡頭有關國土變更、外交權力等等的

政治思考，以此詰難長老教會，甚至有不應該提「我國一千七百萬同胞」，而應該是八億同胞的談法。王曉波認為這種看法是一種危機，「要清除這種危機，只有恪守憲法的立國原則」，對分離主義的絕對性批判，正顯示王曉波與〈中華雜誌〉民族主義立場堅持的一致性。但這種對分離主義的絕對性批判，確是對一九七八年夏潮集團與黨外進行大聯合的矛盾。

署名張春新在〈夏潮〉發表〈台灣長老教會的歧路〉（四卷六期），張春新認為〈人權宣言〉展現了「背後長老教會少壯、革新派核心在領導上的力量。」（註二〇）並且他也感到不能單純的看待長老教會介入政治、社會運動的力量。〈長老教會的歧路〉一文，在立場上與王曉波一樣，稟持著反帝國主義立場，但在語氣上已經緩和。張春新認為即使如王憲治牧師已經體認到台灣是一後進國家，但是王憲治並沒有講明後進國最大敵人在哪裡？張春新指出帝國主義出手支持後進國家的民主運動，並非有所厚愛於那個國家的民主派，而是爲了，一、警惕現代當權的專制政府，促其做一定的民主化，安定政權，從而安定市場；二、萬一民主派在「政治權力的鬥爭」中取得勝利，則因他們勝利前的支持，而繼續密切的關係，以維持大國在那個國家中的政治經濟上的利益。直到張春新這一篇才點出反對長老教會的最大意義，在於長老教會所支持的民主運動，其本質上有著爲資本主義的資產民主鋪路的危險性。但是張春新在最後結尾，述說著〈夏潮〉的批判不能與國民黨或官方意識型態的知識份子等同看待。因爲這些「後進國家」的知識份子有些是無神論

者，是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立場在反帝、反封建，並且長老教會在過去歷史上的表現適合帝國主義者相結托，張春新希望長老教會要進一步的行動，「以實踐基督的大愛來否定『宗教是貧窮人民的鴉片』這句話。」（註二一）這段用意已經區分出在野左翼對於統獨的觀點。

最後張春新以和緩的語氣，「反對以任何政治敏感性的指控，加諸於對方，俾使這個討論對於教會和教會外關切同一問題的民衆，同得深刻的造就。」（註二二）「這樣的結尾意味著反分離主義戰火息止。但是這同時顯現著《夏潮》內部的緊張關係，雖然施根本、張春新與北屋以及王曉波的立場上是一致的，並且施根本與張春新有著更細緻的階級反對立場，然而王曉波對分離主義的絕對性批判卻與《中華雜誌》有著某一程度的相合，亦即在對付現行政治體制上，並沒有絕對的挑戰態度。胡秋原在法統上的態度傾向於支持國民黨的既有體制，對於憲法的修改，胡秋原覺得在台灣本土是無權修改的，「只有回到大陸才能談修改」（註二三），「這憲法之法統及由其所產生的中央民意機關和政府，是台灣與大陸之基本的政治聯繫，法統在台灣也使台灣成爲大陸與海外的一個精神中心。」（註二四）而正因為對法統的維護，胡秋原在政治實踐力上呈現的薄弱，失去了與在野勢力及群眾的結合，其預定的民族思想實踐的地區「中國人主義」主要在大陸而非台灣，同時弱化胡秋原對國民黨正統的法統體制的挑戰，並且其擅長的學術、思想、文化之解放也與群眾失去了聯繫。

這對於夏潮系統而言確是一項矛盾，在愈接近一九七八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黨外勢力的氣勢愈加龐大，大聯合的潮流亦愈來愈明顯，在政治上直接訴諸群眾運動的形式，正是夏潮系統檢驗兩年來的經營成果的最好形勢。從一九七七年中壠事件後《夏潮》的政治化亦愈鮮明，且鄉土文學論戰所帶來的反叛性效果，使《夏潮》更加努力接收黨外在文化界所沒有的正當代表性；以及在論戰中釋放的「階級」概念，透過不斷的報導台灣社會內部的工農階級矛盾問題，及將台灣定位爲第三世界的世界體系下的世界史觀，都是逼迫《夏潮》檢驗論述本身的社會接受力，並且透過政治動員，也是檢驗不同於黨外的夏潮系統能擁有多少群眾基礎！在不得不捲進政治化的過程中，夏潮系統加入政治選舉，同時也加入黨外，意味著加入對抗國民黨法統體制的大聯合中。而這對於「華—夏聯盟」而言，產生了微妙的緊張關係，雖然一九七八年夏天七個雜誌社同時舉辦「七七抗戰紀念會」，是「華—夏聯盟」的擴大表現，可是也成了急速擴大後的分裂前兆，一九七八年下半年，雖是整個現代化論戰的焦點時期，《夏潮》並未直接介入論戰的風暴中，夏潮系統成員也多數逐漸抽離《中華雜誌》，僅剩原本與胡秋原較親近的王曉波，以及後來受胡秋原、徐復觀賞識的陳映真。夏潮系統出現了路線上的細縫，關於反長老教會的「新而獨立的國家」（人權宣言）的辯論，所出現的絕對性批判與和緩性討論兩種態度，正是這種細縫裂痕的表徵，只是在黨外大聯合底下，並沒有擴大罷了。

「華—夏聯盟」辯證性的親密關係，在反分離主義的政治主張形式下，開始有

了分裂的細縫，只是這細縫在七〇年代末，終未爆發，亦未成為枱面議題。對於反國民黨陣營的前景，直到美麗島事件之前，都抱持著烈士的樂觀情境，在整個美麗島大結盟中，黨外與夏潮系統兩派人馬有著微妙的統一戰線，雖然雙方政治運動目的不一；一在社會階級形態的解放，一在政黨政治的改造，但共同敵人具有絕對強大力量，威權體制的突破成爲雙方的一種共識，以及目標。政治族群的心理情感認同，在「台灣」都不能大聲喊出來的時代，僅僅在最隱私的部份進行。政治民主成了唯一結盟做戰的統一口號。

〔註一〕夏潮本社〈致讀者書〉，《夏潮》一卷四期，封面裡。

〔註二〕在反分離主義方面南方朔當時由四季出版了《帝國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一書，內容批判台獨運動在台灣的發展歷程，並且收錄陳映真與王曉波的兩篇批駁台獨文章，原本我手中無此書，後來無意間購買到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翻印的原書，原書在上市一年後，國防部立即將此書列爲軍中政治作戰的必讀刊物，亦可見《夏潮》在反分離主義上的效果成就，比起國民黨軍方更爲尖銳及堅定。

〔註三〕胡秋原〈覆某女士論風車之戰與右派心理〉，《中華雜誌》一七五期。

〔註四〕同〔註三〕。陳鼓應於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民族主義座談會」事件，曾遭受《中華

雜誌》（一九七四，二）的讀者梅香山投書批評，認爲陳鼓應與香港左派刊物《七十年代》有掛勾，並且在「民族主義座談會」上有台獨及左傾的言論。胡秋原當時亦認爲陳鼓應有左傾跡象，彼此間界線明顯。但鄉土文學論戰時期的「反費正清」活動裡，陳鼓應的現身說法，讓胡秋原表示了他對夏潮系統態度的轉變：「他們的民族主義立場確無可疑。」「此處特別說到陳鼓應，……表示民族主義態度，這不能有的。我們應該歡迎他的『回歸』，不應整得一個人不見天日。」

〔註五〕全文見《台灣教會公報》，NO.1392，一九七七，八，二一，一版。

〔註六〕北屋〈從致美國總統卡特的一封信說起〉，《夏潮》三卷四期，頁一九。

〔註七〕施根本〈台灣教會需要改革〉，《夏潮》三卷五期，頁三七。

〔註八〕依蘇慶黎回憶最先向長老教會開刀的是王杏慶，而陳映真還爲此事罵了蘇慶黎一頓，認爲此時不宜發動攻擊。並且陳映真本身爲基督教宗教家庭出身，施根本一文的宗教性筆調可推測爲陳映真所寫。

〔註九〕陳嘉宗〈評析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事件〉，《夏潮》四卷二期，頁八。

〔註一〇〕同〔註九〕。

〔註一一〕《台灣教會公報》，NO.1346，一九七七，十二，十八。

〔註一二〕北屋〈不要假借神的旨意犯錯〉，《夏潮》四卷一期，頁二。

〔註一三〕王曉波〈上帝主張分裂中國嗎？〉，《中華雜誌》一七五期。

〔註一四〕〈人權宣言〉發表後，長老教會北部大會有一十七人連署臨時動議，稱宣言爲政治

性聲明，是少數人的意見，危害國家安全，與北部大會議無關，但臨時動議被否決。《台灣教會公報》，NO.1359，一九七八，三，十九。

〔註一五〕《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第二十五屆總會通常年會長年會議事錄》，一九七八，頁一七一—一八。

〔註一六〕《台灣教會公報》，NO.1361，一九七八，四，二。

〔註一七〕《台灣教會公報》，NO.1355，一九七八，二，十三。

〔註一八〕同〔註一七〕。

〔註一九〕王曉波〈再論長老會事件及其他〉，《中華雜誌》一七八期，頁二三。

〔註二〇〕張春新〈台灣長老教會的歧路〉，《夏潮》四卷六期，頁三二。

〔註二一〕同〔註二〇〕，頁三五。

〔註二二〕同〔註二〇〕，頁四一。

〔註二三〕胡秋原〈政治幼稚病之兩種表演〉，《中華雜誌》一九七五，九，頁九。

〔註二四〕同〔註二三〕。

第二節·參與政治選舉

一九七〇年代的政治運動注目的焦點轉向了黨外的選舉運動上。同為《大學雜誌》成員的張俊宏與許信良，本身曾都是李煥文工會底下的大將。張俊宏因一九七二年選舉爭取國民黨提名未果，憤而退出國民黨，與當選立委的黨外地方勢力康寧祥及黃信介，於一九七五年八月創辦《台灣政論》，張俊宏任總編輯。許信良則於一九七二年投入省議員選舉，高票當選桃園縣省議員，後出版《風雨之聲》批評國民黨省議員的作風，及其問政質詢過程；一九七七年地方縣市長選舉許信良違紀競選桃園縣長，為國民黨開除，卻當選桃園縣長。

一九七五年《台灣政論》創辦時，短暫的將地方派系以及台大的民族主義社會實踐派，與黨外連結在一起，因《台灣政論》試圖「包容各種黨派的意見」（發行人的話），民族主義社會實踐派陳玉璽、陳鼓應、王拓、蘇慶黎都參與撰稿，創刊號上「放眼看天下」專欄為陳玉璽與蘇慶黎的專欄，另外王拓發表兩篇大作〈論《水滸傳》的「官逼民反」並評宋江的領導路線〉和〈八斗子所見所聞所思〉兩篇文章，最受矚目。《台灣政論》自認為是「民間的發言台」，主觀願望上希望繼《自由中國》、《大學雜誌》之後為言論爭取自由的空間，「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徑上，在閉鎖的環境中所造成諸種不合理的現象，發揮「掃除髒亂」的功能。」

〔註二五〕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舉行立法委員選舉，《台灣政論》成了典型的以政治選舉為基地的刊物，國民黨警覺到黨外集結於《台灣政論》的凝聚力正逐漸的膨脹，而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第五期，即接近選舉時刻將《台灣政論》停刊，陳鼓應認為第五期因刊載著澳洲教書的邱垂亮的文章〈兩種心向〉報導鋼琴家傅聰對他說的話：「他相信台灣人民想要『當家作主』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是在台灣本土人民武裝起義推翻國民黨的獨裁政權，第二是台灣人民團結起來奮鬥爭取早日和祖國和平統一。」最後一段文字被當局認為「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情節嚴重」，下令停刊。〔註二六〕

《台灣政論》最大的時代意義在於將雜誌作為政治選舉的發言基地，以及結合知識份子的在野政治中心，康寧祥就說：「……藉著《台灣政論》這個橋樑，在從民國五十八年以來的幾次選舉以來，已經形成的新生在野政治人物，與從《大學雜誌》時期政治改革運動分化出來的知識份子，才得以結合，這個結合使黨外的力量，素質提高了。」〔註二七〕這種結合模式持續的連結到一九七七年的地方選舉。在一九七五年的立委選舉中，宜蘭縣原本呼聲甚高的無黨籍郭雨新，因國民黨多方的掣肘下，以大量廢票落選，開票當晚群眾跟著郭雨新謝票而示威遊行，表達對「作票」不公平的不信任行動。一九七五年的事件升高了往後的政治選舉溫度，一九七七年選舉無黨籍候選人大量出擊，當選率提高，縣市長四名、省議員二十一名、台北市議員八名，十三名屬於「黨外」的省議員更串連出黨團的運作形式。無

黨籍的在野政治勢力正式串連出「黨外」的民主運動力量。

一九七七年許信良出版《風雨之聲》，書名乃採用清朝兩江總督沈葆楨傳頌一時的奏摺：「陳朝奉雷霆之詔，下詔嚴責；然夜聞風雨之聲，難安席枕。」許信良將他在省議會的質詢紀錄予以公布，原本未引起大眾注意，但經《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等在全國社會通版上加以引介，並演繹其內容，以作為評鑑第五屆省議員之藍本後，才聲名大噪〔註二八〕。最引人注目的是將省議會的議員指名道姓劃分為四類：世家、財閥、公教人員以及職業政客。此舉引來國民黨省議員的譏伐；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以議長蔡鴻文為主導的圍剿戰開打，省議會的七個委員會的面前通過，但「沒想到新聞失控，各報記者皆以看熱鬧的筆調，放手大寫這場省議會的圍牆之鬥，一夜之間使得許信良知名度暴漲」〔註二九〕，如《中國時報》報導評論省議會之舉：「……前日省議會所做的處理是最壞的處理。至於，有議員竟欲為此動武，則更遺人笑柄。」《聯合報》標題則為「風評好壞憑表現，譏伐未必得好評」〔註三〇〕來抨擊省議會國民黨的集體譏伐，許信良的勇於直言成了新生代知識份子的政治典範，而受到在野勢力的讚賞。由於許信良本身為農家子弟出身，並且仍為國民黨員的「青年才俊」，《夏潮》特別介紹許信良的《風雨之聲》：「許信良議員是這一群黨員的好典型。他確實把三民主義、黨、和民間連結起來，作為新一代的政治起點。」〔註三一〕並且評介許信良的書評中，特地讚揚許信良

「要求政府大幅度降低田賦，利用合理的價格收購穀類」的農村福利政策，後來揚青臺更進一步將許信良議員分類標準再細分為十五類，而將許信良列為「超然於黨派之外，一切為老百姓的利益為依歸的議員」〔註三二〕，由於許信良的《風雨之聲》所受到的注目，《夏潮》開始將政治焦點置放在省議員的身上。一九七五年宜蘭選舉的群眾示威險些造成的風暴，讓即將到來的鄉、鎮、縣市長的選舉氣氛更為緊張。許信良《風雨之聲》明顯的是為選舉桃園縣長的試探風向球，這顆風向球試探成功後，接著出版《當仁不讓》，其他以「黨外」身份競選的候選人紛紛跟隨著書立說：林義雄與姚嘉文合著《虎落平陽？》，敘述郭雨新參與立委選舉的經過與訴訟；蘇南成為選台南市長著《民主宏論》、《理性的呼喚》；張俊宏於南投縣選省議員著《我的沈思與奮鬥》；趙秀娃著《我的奮鬥》；莊文樺著《競選密笈》等，面對長久壟斷政治資源的國民黨，這些著書立說的黨外，成了一股政治的清流，政治張力的拉開，夏潮系統開始向政治面的反抗性串連。一九七七年十月及十一月《夏潮》開始報導省議會的質詢狀況〔註三三〕。

政治張力的拉大，導致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的選舉更為沸騰，尤其所有黨外的注目焦點在被開除國民黨籍的許信良身上，大批的知識份子；林正杰、張富忠及陳國祥等新生代研究生都集中至許信良的競選總部幫忙助選，後來且成為黨外選舉典範的選戰，整個選戰表現出：年輕的幕僚團、大量的海報、文宣、宣傳車，集會演講等。許信良也在競選期間呼籲選民，注意國民黨的作票與買票行為，文宣密集式的

政治動員，強化了知識份子對政治的注目。許信良也在選戰中特別強調，「教育普及所產生大量的青年知識份子、工業發展所帶來大批的勞工大眾、農村破產所造成埋怨的農民；……他們已經表現出強烈政治參與的要求，他們強烈要求現狀的改變，為使社會繼續維持安定和進步，必須認真地注視這個被忽視的階層。」〔註三四〕許信良很確實的掌握到新興的中產階級與被經濟剝削下的農民，為其選票的所在。桃園縣長的選舉由於「外力」集結的特別多，加上許信良不斷訴諸選民主動監票，監視國民黨的做票及買票行為，選舉的熱烈及緊繃度更強。為許信良助選的林正杰及張富忠共同合著《選舉萬歲》一書，描寫整個的選舉過程：「從投票日一大早開始，就不斷地發生民衆、許信良、監票員、選務人員、擁護憲法民衆間的爭執與鬥毆，加上選務人員廣泛而無忌憚地做票消息，使得民衆感到無力保護自己的政治權利。民衆憤怒、挫折和躁悞的情緒達到了沸點，終於引發了『中壢事件』。」〔註三五〕

中壢事件就在這樣的政治緊繃度下發生，《這一代》雜誌描寫事件的經過：十一月十九日開票當天牙醫師邱奕彬發現中壢國小投票所選務人員國小校長范姜新林，在兩位老人投票時涉嫌妨礙投票及作弊，將范姜新林送至中壢分局，然中壢分局檢察官做了邱奕彬及兩位老人筆錄，未做范姜新林口供。後范姜新林又回到投票所工作，卻又被四位選民發現作弊，群眾要求法辦，警察則保護范姜新林進入中壢分局，民衆群集至中壢分局門口，要求檢察官出面，檢察官遲不出來，民衆越聚越

多，約有一萬多名，雙方爭執劇烈，民衆扔擲石塊，警方也投下煙幕彈，混亂中中央大學學生江文國受槍擊貫穿腦部當場死亡，另一名張文治受扁鑽刺傷，群眾詳情激憤而將十九輛大小警車燒毀，此爲轟動台灣的「中壢事件」。(註三六)

事件當時國民黨並未用憲兵或軍隊鎮壓，而是要求警員解除武裝採不抵抗政策，由國民黨當下的低調處理，以及事後的迅速善後，皆表示這是場意外的暴動，國民黨並沒有擴大逮捕的跡象，而許信良也沒有事後極力的追究，以其當選縣長的政治呼聲，應有能力擴大中壢事件的調查範圍。然而許信良面對媒體的訪問時說：「現在與其做不實的報導，或過度的深究，倒不如讓大家漸漸淡忘它，因爲那天因情緒激動做錯了事的群眾，事後都會冷靜地自問良心，如果再予深究，或做了不實的深究，反而將大家的情緒更爲加深。」(註三七)雙方極力的淡化，顯露雙方都在反省突發的群眾暴動的政治意義，以及深究如何控制群眾暴動的現場。

一九七七年的選舉由於黨外勢力的大舉當選，與中壢事件的群眾激情，加深了黨外的聯合勢力。《夏潮》也由此逐漸政治化。《夏潮》在二週年社論裡〈我們的宗旨與主張〉談到：「本刊很少談政治，但也並非沒有政治主張。我們的政治主張甚簡單，就是要肅清貪污和公平選舉。……於選舉前發表了兩篇有關選舉的訪問，並於選後又發表評論與「中壢事件」的檢討，且關心選舉中青年的動向。」(註三八)這種對政治面逐步的關心，亦即對政治體制批判的深刻化，展開了與官方政治體制對立的態度，同時其對政治的關心是伴隨著與黨外政治勢力聯繫上的密切，

《夏潮》對三民主義、孫中山思想的介紹逐漸降低，代之以台灣歷史意識的正統化開始升高，同時鄉土文學論戰「頂住」的效果，「土地與人民」旨向的「本土意識」成爲朝向政治的發酵劑。

王心建與王紘久(王拓)兩篇文章代表《夏潮》向政治體制挑戰的邁步。王心建〈民智與無知〉批評老立委戰慶輝向行政院質詢認爲政府應嚴懲「中壢事件」的暴徒，因暴徒早有預謀，並指責「台灣人民不知感恩圖報，反倒製造暴亂」(註三九)，王心建指出戰慶輝三大錯誤：一、對台灣歷史的無知；二、不解台灣與中國的共同命運；三、對本省人和外省人同胞感情的分化。將台灣抗日歷史拉高到與中國政治歷史的同等地位，批判戰立委的中國正統論立場。而王紘久文章更是觸及到國民黨法統的正統論，王拓〈黨員不可自私自利——評黨籍立委延任的要求〉一文雖然要求的是增額立委不可提出任期的延長，卻也迂迴的對「萬年國會」提出批判：「如果要消除這種不合理的現象，照理應該主張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才對，何以竟主張使自己成爲終身職民意代表呢？這種主張對做這種要求的民意代表固然勉強也是一種公平，但對全國民衆卻不公平，因全國民意絕大多數長久以來就已經主張全面改選，……」(註四〇)的確國會全面改選呼聲在《大學雜誌》時代即被提出，但是「國會全面改選」卻是「華—夏聯盟」之間的對立矛盾，縱然王拓最後並不是主張立即「國會全面改選」，但此迂迴的提法，顯示《夏潮》在政治化的過程中，逐漸與黨外勢力的結盟，與《中華雜誌》的政治主張之間有著必然性的矛

盾。

選舉的代議民主制度，勢必帶來政治英雄主義的產生，必然的，民主化過程的焦點也集中在政治人物身上，夏潮集團與黨外集體性的連結就開展在政治人物的報導上。《夏潮》從一九七八年三月以王拓為中心，展開一系列對政治人物的報導，這些報導包括了：康寧祥、蘇南成、康水木、林義雄、黃順興、周滄淵、余登發等政治人物，其中較為重視的是立委黃順興與高雄黑派余登發。黃順興表示他在日據時代感受到的壓迫，並不完全是民族上的問題，「更大的原因是由於階層的不同」〔註四一〕，黃順興認為黨外應減少個人的英雄主義，並且要利用「選舉」與「突破新聞封鎖」來提高民衆的政治意識。而《夏潮》拉高余登發的政治位置，主因不只因爲余登發在高雄縣穩固的政治勢力，認爲余登發能獲得民衆支持：一、有傳統中國社會「家長」的心態；二、傳統中國農民勤勞，平易近人的作風；三、與國民黨對立。最重要的是王拓問到余登發對台獨的態度：「我們都是中國人，中國應該統一才對。如果有人主張台灣獨立，我認爲是得不到國際承認的，同時又要在國際上留下背祖的臭名，這有什麼好處呢？」〔註四二〕余登發很傳統的反分離主義基調恰好與《夏潮》的意識型態相彷彿，余家與《夏潮》的結盟關係直到八〇年代都相當密切。

黃順興與余登發的意識型態與夏潮系統有著類似的傾向，對於夏潮系統政治化過程給予其較強的政治位置；夏潮與黨外聯合當中，爲了刻意有著明顯的政治區分時，例如《夏潮》並沒有訪問黃信介以及許信良、張俊宏等人，反而將與黃信介同爲立法委員的黃順興拉高到同等政治地位，以及抬出重量級的黨外元老余登發作爲其反對運動陣營的在野招牌，除了作爲夏潮系統邁向政治的正當化之外，與黨外有著互別苗頭的意味。在正式選戰開戰時，《夏潮》請余登發寫了一份類似選戰出征的徵言〈有理走天下——喜見民主鬥士奮起〉（五卷五期），余登發就批判唯選舉活動的政治運動：「有人認爲民主政治就等於選舉。這種看法是不夠的，……我就當選過高雄州楠梓莊協議會員，這也叫民主嗎？因爲有人認爲民主就是選舉，怪不得國民黨說台灣現在很民主。民主的實質必須是人民以當主人的權力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如果老百姓處處都吃虧，正當利益被剝削，再選也沒有用，也沒民主起來。」〔註四三〕余登發對政治選舉運動的批判，恰好對映了《夏潮》批駁資產階層民主的論調，而強調要求經濟民主能夠相互並行，《夏潮》極力的拉高余登發的黨外民主運動地位，使得後來《夏潮》也因余登發案被停刊。

夏潮系統政治化的另一個特點，除了對政治人物的訪問，特別能掌握新生代的政治傾向，不斷報導新生代知識份子的政治行爲與政治態度。曾爲許信良助選的陳國祥，就報導在許信良選舉時前後有一千多個年輕人幫忙助選，而且這是一群「深切期求政治與社會加速革新的青年」〔註四四〕。陳國祥呼籲青年要從事「政治服務」，因爲新生代參與選舉的意義在於「推動政治革新」，且義務助選的青年能平衡候選人的貧富差距，阻止「金權政治」的出現〔註四五〕。

在掌握新生代的政治態度中，夏潮系統注意到由政治運動風潮所引發的學生運動轉向，積極讓大學生躍入《夏潮》刊物，使得《夏潮》成爲新生代與政治社會對話的橋樑。當時爲政大學生的胡晴羽就企圖將民主政治概念帶入校園討論，胡晴羽認爲應該發展「學園自治」與大學的民主運動（註四六）。胡晴羽的「學園自治」是一個實驗性提法，只是要把民主的思想轉化成可以實踐的民主運動，他的「學園自治」仍置放在「學校行政當局輔導下」，但是胡晴羽已經有了進步性的提法，「發展大學的民主運動」，主要在推翻審稿制度、演講和座談、大學報紙、大學社區服務及學生選舉權。

「大學的民主運動」很明顯的，是因爲政治選舉的帶動下促成的，一九七八年五月台大研究生協會的主席選舉，就變成了一對一的類似黨內與黨外的選戰。被謠傳爲黨外的研究生候選人「即採取上次地方選舉時，某些黨外候選人使用的策略，把有關他的謠言印成海報散發，攤開來談。」（註四七）結果他當選了台大研協主席。一般綜合性刊物對於校園報導多是學術或娛樂性新聞報導，而《夏潮》報導大學校園具有爭議性的議題時，同時拉高了《夏潮》在大學校園的可讀性，以及吸收更多的學生讀者群。藉著校園作爲民主運動實踐場域的提倡後，《夏潮》開始逐漸掌握更多與大學校園對話的機會。例如在淡江舉辦的幾場民歌演唱會（註四八），台大哲學研究所韓國學生吳二煥在課堂上發問，卻被黃振華教授斥爲對師長不公而記大過，《夏潮》則全面性的報導此事件爲吳二煥爭取權利（註四九），展現其對

學生人權的重視。與《夏潮》較爲密切的研究生，爲《夏潮》跑腿親自訪問政治或新聞人物，例如宋國誠與黃宗文的「新生代的吶喊」專欄，訪問了五位新生代：陳婉真、金惟純、黃年（當時爲《綜合月刊》主編）、陳國祥、蘇慶黎等，後來集結十幾篇的訪問稿出版《新生代的吶喊》一書。另外《夏潮》並報導大學生的社會服務工作，各大學的社會服務團與山地服務團的社會服務經驗。而這些報導及以學生本身撰寫的經驗文章，將《夏潮》與大學生的行動與思考概念接連起來，雜誌——思想——行動，成爲互動的連結體系，使《夏潮》比起黨外有更多的知識青年讀者群。

這成爲《夏潮》政治化經營的特點，由於在政治面的報導文章愈來愈多，相對的當時黨外只有張俊宏主編的《這一代》雜誌，出版狀況並不好，內容僅限政治人物與法律問題的探討，《夏潮》內容表現出來的多樣性，以及刻意親近校園知識份子與下層階級的態度，使《夏潮》有相當多的潛在的讀者群及支持群，並且愈到選舉，《夏潮》的銷售量愈多，達到每期三、四萬份（訪蘇慶黎，頁四九三），成爲當時銷售量最好的雜誌。同時由於報導政治問題與人物的文章份量越來越重，也可以推測《夏潮》與黨外的合作關係愈來愈密切，介入民主運動的路線也亦愈明顯，同時爲強化民主運動路線的陣容，夏潮系統也開始吸納對國民黨政權不滿的國民黨黨員新生代，如吳哲朗、陳婉貞等。

面對年底立委與國大選舉的日期越來越近時，黨外與夏潮系統大聯合的趨勢越

來越不可擋。議會民主在左翼陣營裡一直是有著爭議的，進入議會選舉，亦即進入資產階級式的民主鬥爭遊戲，這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政治突破，在夏潮系統內部有著深刻的矛盾，王杏慶在一九七八年底的「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並行論」裡就指明，「……經濟民主的最大敵人不是『對手』，反而是那些只主張政治民主而不主張經濟民主的朋友，……」（註五〇）王杏慶特地將「對手」兩個字括號起來，清楚說明《夏潮》的目標未必是國民黨，真正的對手在於「不主張經濟民主的朋友」，對象指明是自由派的朋友，透露這場政治鬥爭中的諸多玄機。然而在面對議會政治選舉時《夏潮》內部的務實派蘇慶黎認為台灣社會，「它既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你就必須有資本主義的社會的一個初步的民主，不能讓它變成一個資產階級，或者說國家專政，在這個地方要打破，然後給我們一個活動的空間。我覺得當時介入反國民黨的民主運動是必要的，當時不可能組織工會，唯一能和人民取得接觸的是透過『選舉』，那我覺得王拓跟陳鼓應是比較接近我這樣的思考」（《訪問錄》，頁五〇四）夏潮系統同時意識到反對勢力政治大聯合的必然性，因此必須要有人進入政治選舉風暴裡頭，然而人選是誰？

從文學裡面表達為下層社會改造的企圖，經過鄉土文學論戰後的鄉土作家王拓與楊青矗，對於文學作為「反映」或「改造」社會的工具，都覺得太慢，文學改造過程的緩慢，相對於許信良等黨外人士在縣長或省議會裡的政治突破力量，王拓與楊青矗同時覺得必須躍入政治的突破才有用。楊青矗決定參選後在《夏潮》的訪問

中就說：「……而我自己也認為我是一個工人，幾年來寫了一些工人的東西，對這一方面有深刻的瞭解；我一直認為改變一種事情最大的力量，還是政策的改變，政治的力量大於一切的力量。……不過，文學這個東西雖然有其用處，但對要求這樣的改變是太慢了，它沒有政治來得快而且有效。」（註五一）楊青矗急於實踐的焦躁，是促使他投入工人職業團體立委選舉的最大因素。王拓同樣在「走投無路」（《訪問錄》王拓）情況下投入基隆國代選舉。比較受人矚目的是陳鼓應，陳鼓應本身是個研究哲學的教授，並且一直是夏潮系統相當核心的成員，曾有謠傳王曉波反對陳鼓應選舉，然而王曉波反對的原因卻是：「第一是陳鼓應的省籍是外省，沒有人可以幫忙，第二是沒有錢，第三他身體又很壞。」（《訪問錄》，頁四三四）其實陳鼓應在《夏潮》的訪問裡也回答了王曉波的考慮：「我的健康、我的個性和生活習慣，都不適合於從事實際政治活動，但經過這幾年的思考，我感覺到一個知識份子，如果理想不能跟現實結合，就很容易成為空想。」（註五二）陳鼓應後來與陳婉真搭檔競選，成了台北市政治選舉的矚目焦點，二陳以國民黨員報備競選的方式參選，並發表一份〈告中國國民黨宣言〉，其中一段文字鏗鏘有力：

「……吾黨來台，始終當家。惜乎黨官不肖，坐令民有、民治、民享之理想淪為河漢，愧對全國國民莫此為甚！吾等辱為黨員，甘以清流罹黨禍，不為亡國做忠臣。乃藉此選舉，報備競選中央民意代表，此心此意，端在面對全體同胞，痛悔吾黨之失，矢志恢復國格，提高國位；勵行憲政，還政於民；實現民生，平均地權。」

……

《夏潮》從十一月開始報導各區的選情狀況，十二月份的《夏潮》雜誌策畫了選舉專輯共有五十頁，與前一年報導選舉情況大不相同，可見夏潮系統全力動員投入這場選戰。一九七八年黨外的選舉已經開始朝向政團化的趨勢，以公職人員為主助選團展開了串連候選人的工作，立委黃信介、桃園縣長許信良、以及十三位黨外連線的省議員，其中又以具備法政學歷的張俊宏與林義雄為助選團的主導人物。十月六日黃信介在集會群眾最多的王拓的「民主餐會」上宣布全省黨外助選團成立，十一月二十四日助選團總部成立，全部經費由黃信介負擔。整個組織由黃信介當總聯絡人、施明德當總幹事及發言人，陳菊為總部秘書，助選團採集體領導制，共有兩組，一組由黃信介任召集人，一組由張俊宏任召集人，助選委員有：何春木、周滄淵、林義雄、邱連輝、蔡介雄、康水木、南北雙嬌黃玉嬌、蘇洪月嬌等。其宗旨：「共同為此次選舉通力合作，在公平、公正、公開的前提下，以推動人權為中心，以促進黨外大團結，和早日形成制衡力量，俾革新政治、造福民衆。」〔註五三〕黨外助選團有統一的政見，「十二大政治建設政見」〔註五四〕，與統一的標誌，即以手握拳頭為中心，旁邊圍繞著橄欖枝葉「象徵以和平的方式爭取人權」，共同的政見及標誌出現了在野政治黨團的集體運作策略。

此次選戰的最大不同點，除了運用許信良選戰的宣傳策略，《夏潮》透過與大學校園的對話中，在不斷的鼓吹青年參與選舉下，大批的學生、研究生投入助選行列。還有首次運用的「民主餐會」〔註五五〕，民主餐會以餐券募款的方式進行，每一份餐券一千元，並進行「民主廣場」接力式演講，每一次演講都會有特定主題，例如第一位舉辦「民主餐會」的是呂秀蓮，她以「台灣史中台灣人的地位問題以及未來台灣的命運問題作演講主題」〔註五六〕；黃信介在王拓的餐會上宣布台灣有五個黨：第一個是中國國民黨，其次是民社黨，再次是青年黨，第四是黨外黨，第五是假黨外。真正的黨外黨是「日曬不彎、浸水不縮」的黨外人士。施明德與艾琳達的結婚典禮成了黨外聯盟的大聚會，上台發表致詞演說的除了既有的候選人與公職人員外，陳映真也上台演講，在面對國民黨的高壓統治下，夏潮系統已經全力介入民主運動的大聯合裡面。黃煌雄的餐會則以「蔣渭水先生紀念歌發表會」為名，會中還邀請日據時期參與文化協會與台灣民衆黨的二十位前輩參加。另外楊青矗因競選的是工人職業團體立委，必須全省性的拜票，「全省黨外助選團」便以楊青矗的選務工作為連絡站。連夏潮系統的精神領袖楊達亦被動員參加楊青矗在台中辦的餐會。

施明德在陳鼓應的餐會上宣布這次助選的主題為「人權」，「助選團」強調人權包括政治人權、經濟人權和社會人權」〔註五七〕，《夏潮》特別詮釋提出「人權」的時代意義：由於一連串政治事件的發生，再加上商業社會所形成的貧富懸殊問題，工業化所帶來的工人權益得不到保障、工業污染普遍危害民衆、公營事業虧空所帶給全民在經濟上的損失等，以成為民衆普遍關心的問題〔註五八〕。在

透過民主餐會及民主廣場的集會，黨外逐漸捲起強勢的動員力量，此次被認定為黨外黨的候選人，競選立委者有十七位，國大代表有十三位，匯集了一九七七年中壢事件以來的政治動員基礎，以及政團化的形式給予國民黨的壓力愈來愈大，國民黨則採取守勢，宣布「明誠三號計畫」，動員所有主流媒體封鎖黨外訊息。

國民黨根據「明誠三號計畫」頒佈「六十七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新聞報導實施綱要」，並依此綱要制訂三大「要點」、三大「方向」、十點規定「處理新聞注意事項」，文件最後「依據選舉日程進度，參照輔選宣傳重點，分階段推展輔選新聞宣傳工作」，把選舉新聞劃分為三個階段，《夏潮》署名韓心分析此三階段的用意：「一、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皆提示「宣導施政政績及本黨對國家之貢獻」的任務，難怪一到選舉季節，歌功頌德的氣氛更加濃厚。二、第一與第二階段提示「推介本黨提名同志優良事蹟貢獻」。三、第三階段提示了「闡揚選舉之成果，強調選舉是在「公正」、「公開」、「公平」、「團結」、「和諧」下圓滿進行」的任務。還沒選，就先下結論，先提示歌頌的頌詞，真有先見之明！四、第三階段中提示「確定一切成就歸諸政府、全民、本黨」的任務。黨外政治人物無論如何是沒有功的？」（註五九）整個選舉過程主流新聞並非全面的封鎖，而是全力的圍剿，施明德記述當時媒體的「三段推論法」：「人權運動者（民主人士）即台獨份子；台獨份子即共產黨徒或共黨同路人；共產黨徒或共黨同路人是壞人。而「壞人」便該關、該殺！」（註六〇）媒體封鎖的效果卻使《夏潮》這小眾媒體更賣座。

夏潮系統藉著選舉，不斷進行階級意識及平等的政治教育，「楊青矗的一份傳單上，提出工有、工治、工享的主張。『工有』是指『分紅入股，工者有其廠』，『工治』是指『勞資平等，革新工會組織』，『工享』是指提高工資，分享經濟成果」。王拓的一份傳單上說：「今天我們主要的社會財富主要是由廣大的農民、勞工、漁民、一切受僱傭的人，和中小商人、中小企業者以及所有中下及軍公教人員所共同創造出來的。但是，這些龐大的社會財富大部份卻由極少數的資本家和決策層的官僚集團所壟斷！……這樣的社會怎麼會算是合理公平的社會？」黃順興散發一份《還我民權》的小冊子，裡面逐條列舉事實，說明憲法所賦予人民的各種權利，均被國民黨所「蓄意剝奪」。（註六一）也就只在選舉時期，政治高壓鬆綁、戒嚴空檔，黨外勢力享受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夏潮》也在這空檔期釋放階級改革概念。

新聞媒體的扭曲與封殺真相之下，陳鼓應與陳婉真的競選，有別出心裁的選舉方式。陳鼓應的競選總部設在新生南路三段台大門口對面的台大書局，門口擺著兩片木板看板，原先貼著陳鼓應與陳婉真的政見，陳鼓應將其命名為「民主牆」，而後國民黨籍的葉潛昭在台大書局的隔壁的隔壁，豪華書局，成立競選總部，推出「愛國牆」與陳鼓應打對台，兩片「牆」由於正處台北市中心，過往人潮越聚越多，看板逐漸拉長，「民主牆」最後增至二十幾板，「愛國牆」亦跟著分庭抗禮。

隨著選舉的高漲，「民主牆」與「愛國牆」前人潮洶湧，每天從早晨到夕陽西

下，讀者絡繹不絕，入夜之後仍有人藉著昏黃的路燈，在那裡細讀。台大學生則另外放置兩版「評議牆」，以第三著觀戰的立場，評析民主與愛國二牆上的言論，還有一堵悄悄豎立的「自由牆」，加入這闕「民主假期」大合唱（註六二）。「民主牆」主要論點有「一、戒嚴問題。二、違警罰法問題。三、言論自由與輿論壟斷問題。四、越南淪亡問題。次要者有司法獨立、選舉法規、政治與社會風氣、中央民代改選、農工生活、高官巨賈在國外置產設籍問題。」（註六三）「愛國牆」上的議論相當多無理性的對話，例如：「放屁是生理現象，人人都可以放屁，陳鼓應與陳婉真也會放屁。可是因為他們今天吃了太多毒素，所以放出來的屁都是又臭又毒的！爲了維護芳香國土環境衛生，爲了全國同胞身體的健康，鄭重警告：若要再放毒屁，請到有毒的國家去，他們會歡迎你們的！」（註六四）「民主牆」與「愛國牆」打對台，拉高了選戰對峙的激烈化，也提高了雙方候選人的知名度，陳鼓應與陳婉真到後來當選的機率相當大。另外王拓於基隆的選戰，由於王拓本爲小說家，又在鄉土文學論戰裡頭聲名大噪，並且在一九七八年一整年不斷報導採訪黨外的政治人物新聞，王拓可以說是夏潮系統擁有最強的群眾魅力的候選人。

然而就在選舉如火如荼的進行情況下，十二月十六日美國與中共發表建交公報，蔣經國依「臨時條款」所附予的總統權限，發佈緊急處分命令，終止選舉活動。若林正文認爲，美國與中共實在是幫了國民黨一個大忙（註六五），這場選舉的熱度若加高，黨外在一九七七年五項公職選舉大勝的基礎下，中央民代的選舉，

勢必跟著乘勝追擊，美中建交促使選舉停止，也是台灣選舉有史以來的一次。然而黨外在這種突如其來的終止選舉政治命令下，卻出奇的冷靜與配合國民黨的宣布，王拓貼出快報：「冷靜、團結、救中國」。康寧祥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表示：「希望國民黨當局，在此時此刻，應爲全體人民的利益著想，不要採取違背民主的魯莽舉動，……事到如今，我們不能再分黨內黨外，本省人外省人，大家應該在這一條同舟一命的船上，開誠布公，團結在一起。」陳鼓應與陳婉真的「民主牆」也貼出：「爲了民族大團結，爲了全國大團結，我們支持選舉暫停。」新竹施性忠與施性平貼出「在政治上我們願意站在黨外立場制衡國民黨；在救國之道上，我們願意團結一致效忠領袖。」《民衆日報》記者問到黃信介時，黃信介則比較不甘願：「美國與中共建交，社會人士同感憤怒，但這個發展也是我們早就預料的，不值得大驚小怪，全國人民應莊敬自強，處變不驚。」（註六六）十二月十六日中午，黨外共同簽署巡迴助選團所擬的「社會人士對延期選舉的聲明」，要求應當從速恢復選舉（註六七），國民黨依然未恢復選舉。

一九七八年底的黨外黨使得台灣民主運動逐漸推向了政黨與政黨對決的形式，黨外彼此間串連運作的政治活動，越來越成熟，爲了延續這股捲起來的政團化運作，巡迴助選團改稱爲黨外候選人聯誼會，《美麗島》雜誌的出現成爲歷史的必然，也達到夏潮系統與黨外聯盟的高峰。

- 〔註二五〕黃信介〈發刊詞——我們想做的〉，《台灣政論》第一期，黃信介發行，一九七五，八，頁一。
- 〔註二六〕陳鼓應〈七十年代以來台灣新生一帶的改革運動〉，《中報月刊》一九八二，五，二八，頁三四。
- 〔註二七〕座談會紀錄〈中國民主運動發展史(二)——台灣部份〉，《八十年代》四卷一期，台北，一九八二，八。
- 〔註二八〕鄭梓〈台灣議會政治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一九八七年，頁一九四。
- 〔註二九〕同〔註二八〕，頁一九六。
- 〔註三〇〕楊青矗編〈許信良風暴〉，台北，敦理，一九八九，十，頁一三九—一四四。
- 〔註三一〕莊俊清〈一個黨員和民選議員的真心話——許信良〈風雨之聲〉書介〉，《夏潮》二卷四期，頁五九。
- 〔註三二〕楊青矗〈為許信良歸類〉，《夏潮》三卷一期，頁三四。楊青矗分爲一、背文稿議員、二、不必答覆議員、三、冷飯議員、四、不諳議事規則議員、五、串通議員、六、外行議員、七、討好議員、八、護航議員、九、全部通過議員、十、跑腳皮議員、十一、喜喪事議員、十二、有苦難言議員、十三、不聽黨員約束議員、十四、當仁不讓議員、十五、省府官員最敬畏議員。
- 〔註三三〕編輯部〈訪蔡洪嬌娥議員談選舉〉、〈訪洪木村省議員談省議員的職責〉，《夏潮》三卷四期。潘榮禮〈議員生涯淚兩行〉，三卷五期，頁二六。
- 〔註三四〕許信良〈二十五年台灣的選舉〉，《當仁不讓》。引自新版《風雨之聲》，台北文星書店，一九八九，頁三二二。
- 〔註三五〕林正杰、張富忠合著〈選舉萬歲〉。轉引鄭梓〈台灣議會政治四十年〉，頁一九七。
- 〔註三六〕參考楊青矗編〈許信良風暴〉，「中壢事件專輯」。
- 〔註三七〕陳一新〈中壢事件檢討〉，《夏潮》三卷六期，頁一四。
- 〔註三八〕夏潮本社〈我們的宗旨與主張〉，《夏潮》四卷三期，頁五。
- 〔註三九〕王心建〈民智與無知〉，《夏潮》四卷二期，頁一五。
- 〔註四〇〕王紘久〈黨員不可自私自利——評黨籍立委延任的要求〉，《夏潮》四卷二期，頁二〇。
- 〔註四一〕王拓〈我是一個拿鋤頭的人，訪立委黃順興〉，《夏潮》五卷一期，頁一五。
- 〔註四二〕王拓〈我們絕不向「無理」屈服——訪前高雄縣長余登發〉，《夏潮》五卷三期，頁一八。
- 〔註四三〕余登發〈有理走天下——喜見民主鬥士奮起〉，《夏潮》五卷五期，頁一七。
- 〔註四四〕陳國祥〈選戰新兵——助選員的心聲〉，《夏潮》四卷二期，頁一〇。
- 〔註四五〕陳國祥〈青年參與選舉〉，《夏潮》四卷六期，頁八。
- 〔註四六〕胡晴羽〈民主政治與大學校園〉，《夏潮》四卷二期，頁一三。

- 〔註四七〕司馬文武〈校園選舉的實驗〉，《夏潮》四卷六期，頁二六。
- 〔註四八〕鄭盈湧〈我們的歌，我們的根〉，《夏潮》四卷二期，頁三九。鄭盈湧描述紀念李雙澤民歌演唱會。
- 〔註四九〕曾心儀〈學生可不可以發問——談台大哲學系吳二煥事件〉，《夏潮》四卷四期，頁二二。
- 〔註五〇〕李行之〈王杏慶〉〈讓我們向農會和工會選舉進軍——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並行論〉，《夏潮》五卷六期，頁五一。
- 〔註五一〕袁宏昇〈我們需要真正的勞工代表——訪工人作家楊青矗〉，《夏潮》五卷六期，頁五五。
- 〔註五二〕蘇念秋〈走向十字街頭的知識份子——訪陳鼓應教授〉，《夏潮》五卷六期，頁五二。
- 〔註五三〕劉銘德〈本屆中央民意代表選情綜合報導〉，《夏潮》五卷六期，頁二三。
- 〔註五四〕十二項政見包括：國會全面改選、省主席、北高兩市長直接民選、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反對黨工支配校園、解除「黨禁」、「報禁」、自由化、解除戒嚴令、廢止拷問、農民保險、失業保險、實施全民醫療制度、制訂勞工基準法、制訂環境保護法、反對省籍差別及輕視方言、大赦政治犯等。姚嘉文、陳菊編著《黨外文選》，台北，姚嘉文發行，一九七九年，頁一一二。
- 〔註五五〕有關「民主餐會」活動內容，參考吳哲朗〈民主選舉中的「民主餐會」〉，《夏潮》五卷六期，頁三六。

- 潮》五卷六期，頁三六。
- 〔註五六〕同〔註五五〕。
- 〔註五七〕同〔註五五〕，頁三九。
- 〔註五八〕同〔註五二〕，頁二四。
- 〔註五九〕韓心〈揭發「明誠三號計畫」的陰謀〉，《夏潮》五卷六期，頁二七。
- 〔註六〇〕施明德〈台灣民主運動劃時代的一天〉，《美麗島》第四期，發行人黃信介，一九七九，十一，頁八二。
- 〔註六一〕陳鼓應〈七十年代以來台灣新一代的改革運動〉，《中報月刊》一九八二，七，三十，頁三三。
- 〔註六二〕唐太宗〈「民主牆」與「愛國牆」〉，《鼓聲》第一期，陳鼓應發行，一九七九，九。
- 〔註六三〕同〔註六二〕。
- 〔註六四〕同〔註六二〕。
- 〔註六五〕若林正丈〈政治體制的轉捩點〉，《中日會診台灣——轉型期的政治》，頁五九。
- 〔註六六〕各候選人引語摘自王曉波〈台灣民主運動的兩條路線〉，《台灣的前途——從民主到統一》，台北，四季，一九八一，六，頁二四四—二四六。
- 〔註六七〕美麗島編輯部〈中美斷交後黨外大事記〉，《美麗島》第一期，一九七九，八。

頁七七。

第三節·鼓聲·春風·美麗島

美麗島事件

一九七八年底選舉被迫停止後，黨外人士開始籌組常設機構，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爆發吳泰安匪諜案，余登發及余瑞言被以「涉嫌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罪名逮捕，消息傳來第二天黨外人士迅速至高雄余家，舉行台灣戒嚴下第一次抗議政治迫害的示威遊行，參與遊行者有許信良、林義雄、張俊宏、邱連輝、黃順興、王拓、陳鼓應、張春男、施明德、楊青矗、姚嘉文、周平德、郭一成、邱茂男、何春木、艾琳達、陳婉真、陳菊、曾心儀，每人身披紅布條並沿途散發傳單，蘇慶黎及黃信介於台北居中策應。

爆發余登發案的時間背景顯示，國民黨面對中共運用國際環境宣傳「和平統一」的包圍作法，在美國與中共建交的外在壓力下，激發國民黨鷹派勢力的陡漲。一九七七年李煥因「中壢事件」卸下中央組織工作委員會主任，王昇卻因台美斷交時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國民黨四中全會升任中央常務委員，後又出任「復國小組」即後來的「劉少康辦公室」，影響力日益擴大。余登發案引發黨外對國民黨的統治措施感到政治鎮壓的急劇到來，許信良就認為：「選舉停止後，國民黨一切反乎民主

的舉動，我們可以視為是他們的自保行為；但是，捉余氏父子已是一種攻擊行為！像余登發這樣在高雄地區擁有勢力的人物都抓，還有什麼人不敢捉？我們不能再坐待別人宰割！……」（註六八），高雄橋頭的示威遊行，是台灣第一次示威抗議遊行，沒有申請，議題單一，卻展開了一九七九年一整年黨外與國民黨的政治對峙，雙方的緊張度愈升愈高，終至美麗島事件爆發。

面對黨外大聯合在一九七八年迅速壯大下，一九七九年國民黨對待黨外的所有活動展開強硬的態度。余登發案後，將《這一代》及《夏潮》停刊，接著許信良因參加余登發案的遊行，未向縣政府請假，被監察院以「擅離職守，違法助選及叛亂言行」送交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以休職兩年處分，等同於彈劾許信良的縣長職位。對余登發案最後判決雖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定罪，仍處八年有期徒刑。這兩件政治迫害案件，使白色恐怖的陰影再度襲及整個民主運動，激化黨外一致對抗國民黨的決心。

省議會成爲黨外發揮力量的政治空間，十三位黨外省議員的聯合質詢，不斷突破以往的言論限制，而「築起議會言論的新長城」（註六九）。但省議會內部的砲轟，由於新聞言論的限制，許多的黨外與省府的正面質詢對話，皆被封鎖。退出《中國時報》的陳婉真與《台灣時報》的吳哲朗便聯合起來，辦《潮流》（TIME）地下報紙。《潮流》第一期在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出刊，陳婉真與吳哲朗出身於報界，因此報導省府新聞得心應手。「《潮流》是一張八開大的小型

手抄油印報紙，在省議會開會期間每天出刊一張兩面，休會期間不定期出刊。」

〔註七〇〕《潮流》創刊號張俊宏爲其寫發刊詞，並敘述其源流：「……幾位不願坐待社會窒息危殆而不救的文化人——婉真小姐和哲朗先生，他們眼看多數現代設備的傳播工具不能傳達現代民意，只有分別走出最具規模的現代排字房，以最原始的筆耕、用最簡單的紙張，來表達最純真、最原始的民意。」〔註七一〕由於《潮流》仍採取專業新聞記者事件報導方式，各黨派議員的議論舉措均納入《潮流》言論文字報導中，遭到國民黨籍省議員的譴伐，五月三十一日蘇順國遂質詢新聞處長趙守博取締《潮流》不力。在禁絕聲浪的壓力下，《潮流》逐漸轉向報導黨外的新聞〔註七二〕，填補了黨外刊物在《美麗島》、《八十年代》、《鼓聲》起來之前此一段時間的真空。《潮流》這份地下刊物以手寫、油印方式出刊，一方面對現代印刷報紙在資金豐富下訊息壟斷的抗議，一方面也呈現亟欲突破言論封鎖的桎梏，刻意的凸顯精緻／粗糙、假象／真相、阿諛／批判的主流傳播媒體的壟斷與虛假性，塑造黨外的艱苦、弱勢、受難卻勇敢的形象。《潮流》發刊至四十五期遭警總查獲，查獲當天卻將攝影的陳博文及印刷廠老闆楊欲榮一併逮捕，八月九日陳婉真至紐約台灣北美協調會辦事處絕食靜坐十二天，成爲國際新聞。

接踵而來的黨外雜誌承續《潮流》塑造的這種弱勢、勇者形象，以溫和穩健著稱的康寧祥於一九七九年六月創辦《八十年代》，然而康寧祥的試探，第一期就被國民黨查禁，但似乎真的擋不住潮流；主要由李慶榮、張富忠、林正杰及陳菊負

責，原為洪誌良發行農漁專業新聞刊物的《富堡之聲》，突然於七月改成政論刊物，發行全國，但也在革新號第一期遭查禁，李慶榮因發表有關兩岸和談的文章〈善意、度量、接觸、通商、插秧〉被捕判刑五年（註七三）。黨外人士大聯合的《美麗島》雜誌於八月創刊，《鼓聲》接著於九月創刊，以及強調中道思想的國民黨新生代陳陽德的《大時代》也於此時創刊。

《美麗島》的創刊延續著「黨外候選人聯誼會」的規模，企圖邁向「成立一個沒有黨名的黨」（註七四），發行人為黃信介，法律顧問林義雄、姚嘉文，社長許信良，總經理施明德，總編輯為張俊宏，下設十五位編輯委員，王拓及蘇慶黎皆參與其中（註七五），另有八十一位社務委員，楊逵、陳鼓應、黃順興及康寧祥皆包括在裡頭，凸顯左右各派別聯盟陣線的意義，美麗島政團是黨外空前的大聯合，《美麗島》首期即再版好幾次，超過四萬冊，至第三期總印刷量超過十萬冊，此發行量之大日後的雜誌無一能破。但活動主導權為施明德及張俊宏等「自決派」所主導。美麗島開始以推銷雜誌、服務讀者為名，在各地成立服務處，由北到南總共成立十一個服務處，在各服務處成立之際，舉辦各種活動「成立茶會」、「開幕茶會」、「『美麗島』之夜」等以聚集黨外人氣，這些活動目的在施明德接受軍法大審中也（註七六）承認：「成立一個沒有黨名的黨，主張全面改選，主張全面開放選舉，不是非法奪取政權。」在戒嚴法下刻意藉各種名義進行政黨集會的活動，催促黨外政團的理念在主流媒體封殺及圍剿的情況下，向外推行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

政治理念。

九月八日美麗島於中泰賓館舉行成立茶會，卻遭受沈光秀、勞政武創辦的保守主義雜誌《疾風》的抗議，勞政武、沈光秀等人為反共義士，並率領一大群「愛國人士」於中泰賓館外面向美麗島黨外人士抗議，對在中泰賓館內的黨外人士扔擲石頭、銅板等，且堵住出口，當美麗島茶會散會時，由於警察未驅散「愛國人士」，造成兩邊的對峙，引發暴力衝突。也從中泰賓館事件之後，每次《美麗島》的活動都有《疾風》與「愛國人士」的阻擾攻擊。

十一月二十日美麗島雜誌社為吳哲朗舉行坐監惜別會，當天晚上於太平國小禮堂擠進兩千名群眾，但「有關單位公布消防演習，並在一些地區實施戒嚴與宵禁，切斷該條街的供電」（註七七），警政單位實際將國小團團包圍，此「美麗島之夜」在十一點半結束時，黨外人士開始點燃火把，高唱「美麗島」，企圖從禮堂走出大門口，但至校門口與警備總部發生對峙，最後雖無釀成災禍，但是高舉火把以及順利走出校門的舉措，卻讓黨外人士面對政治衝突場面，深具信心，士氣大受鼓舞，「火把」成了黨外集會必備的工具。因此十二月十日的國際人權日，再度策畫高雄市的人權紀念日演講會，爆發「高雄事件」。

十二月十日《美麗島》於高雄圓環舉行國際人權日演講活動，但整個活動申請的過程一直被耽擱，警總不准通過，但黨外人士強力進行。「當演講會尚未開始，鎮暴警察開始逐漸封鎖現場，鎮暴部隊部署四周，便衣人員散置四方、錄音機、紅

外線照相機，各種收集「罪證」的東西，可謂「一應俱全」。（註七八）等到演講會開始時，演講會聚集著上萬的民衆，陳鼓應描述當晚遊行時左右兩派合流的現象：「當晚六時半以後，黨外人士開始遊行、演講的活動。他們舉的標語有：『還我言論自由』、『廢除戒嚴令』、『反對一黨專制』、『人人經濟平等』、『保護工人權利』、『反對壓榨勞工』、『停止剝削農民』等。集會演講時高呼的口號有：『人權萬歲』、『反對一黨專制』、『反對特務統治』、『反對暴力刑求』、『打倒暴力集團』、『民主萬歲』、『人民萬歲』等。從這些口號和標語上，可以明顯看出這個內涵。它確實是『反國民黨的左右兩派意見』大匯合，……」（註七九），當演講及遊行進行時，卻被鎮暴警察、消防車團圍住，警方採取的一網打盡的鎮暴模式，緊密的封鎖情況下，被包圍的群衆自然被激怒，以棍棒、火把、石塊、磚頭、路標擲向警察，警方也以催淚瓦斯彈、水柱相向。

高雄事件恐怖的地方不在於當天的鎮暴，而在於國民黨藉此事件全面逮捕黨外人士，以及送交軍法大審，一種政治壓迫的不寬容氣氛，透過主流媒體報紙、電視、電台的不斷型塑與臆測其圖謀不軌的暴徒心態，為高雄事件佈置下了場景，也成就國民黨最後的預期情景，不斷傳導黨外人士的恐怖、暴徒形象，藉此打壓民主運動反叛的正當性。美麗島事件後，主流媒體每天都有警方及軍方聯合拂曉攻擊，擒獲暴徒某某的報導，致治安當局依叛亂罪嫌向軍法庭控告八位美麗島的核心人物，司法法庭起訴楊青矗等三十二人，以及幫助藏匿施明德而獲罪的高俊明、張溫

鷹等十人，美麗島事件不斷被塗抹成對國家不忠的叛亂暴動。事件後國民黨新聞局表示：「（美麗島政團）高估了自己，低估了政府。」（註八〇）但是「美麗島事件」連續而來的審判，由於受到來自美國的壓力，法庭審判過程全面攤在媒體上，此效果讓人民能夠比較正視黨外的思考及言論：包括：「台灣已經獨立了三十年」、「解除黨禁、報禁、戒嚴令及萬年國會。」（註八一）等等言論，有著正負面交雜的政治教育意義。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林義雄宜蘭家宅，遭受暴徒入侵，林義雄八十歲老母被刺十二刀斃命，雙胞胎女兒林亮均、林亭均被刺六刀死亡，林奐均則受重傷，此一事件扭轉國民黨處理「美麗島事件」政治宣傳上的威權鎮壓正當性，黨外受迫害形象重新扭轉，並且造成了黨外在民主運動政治抗爭上的正義犧牲形象，對國民黨不民主的反叛的正當性亦被確立，此後政團抗爭已為台灣反對政治的潮流。

美麗島大聯合陣營的兩條路線

一九七九年這股黨外大團結的景象，夏潮系統其實並不僅僅作為黨外運動中的一員，仍然堅持與黨外不同的左翼民主路線。王曉波即在一九七八年底選舉後發表〈台灣民主運動中的兩條路線〉（註八二），將夏潮系統與黨外人士路線上的不同，清楚劃了出來。「這兩條路線的代表刊物，關心台灣民主動向的人大致都可以知道，一條是由張俊宏主編的〈這一代〉，一條是由蘇慶黎主編的〈夏潮〉。在平

時，前者的內容偏向於政治性，而後者的內容偏向於知識性。這兩份雜誌雖都以批評精神標榜，但經常針鋒相對。」（註八三）（下引言同）王曉波在介紹這兩條路線的同時，倒不如說是批判張俊宏的路線。這一代「其社會基礎厥為中小企業，參與者亦多『青商會』會員，基本其實是『青商會』的意識型態。……張俊宏將此概念化為『中智階級』。……他把一切台灣經濟政治的進步都歸功於『中智階級』」，「他以『中智階級』為其政治思想的社會基礎，而以『海洋中國』為其國家觀念。」（頁二二七—二二八）而王曉波時已任《中華雜誌》的編輯委員（陳映真也是），費正清的「海洋中國與大陸中國」說在一九七七年就曾受到《夏潮》及《中華雜誌》的聯手批判，對於此點王曉波判定張俊宏的路線「他們崇尚以『美國化』為內含的『現代化』，擁護現有的經濟方向，傾向於『海洋中國』，自命『菁英份子』，漠視勞工者及中下層民衆生活。」蘇慶黎與中智派的不同，在「統一」問題上是能夠撇開黨派的立場，並且在鄉土文學論戰這個議題上，「而中智派的人物和張俊宏主編的《這一代》未置一辭」（頁二三四），另一個不同是《夏潮》研究台灣史，有系統性的史觀考察，而中智派沒有，彼時自由派或獨派文人尚不敢踏入政治風暴中。同時在「台獨」的面向上，王曉波就提出余登發與黃順興兩位黨外前輩，說明「黨外人士愛國而反『台獨』，絕不是孤立的。」從而在這種黨外政治資歷與資源的爭奪上，王曉波更露骨的講：「或者是余、黃二人居於中南部，非台灣政治文化重心的台北；或許是由於余、黃二人的民族思想不為外國人欣賞。所以

一般外國人只知道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而鮮知余、黃二人。從保釣運動之後，余、黃二人也才在島內被普遍的認識，而隱然成為『鄉土派』黨外人士的首腦人物。」（頁二三七）顯然「中智派」以台北城市為中心的政治運動，忽略非都市的下層群衆，而夏潮系統有著地方鄉土的力量，從地方、鄉土發展的基礎韌性較強。

也因為許信良與張俊宏贊成「現代化」與外資的引進，王曉波的劃分法，就將鄉土文學論戰裡的敵我兩分法置放在黨外陣營的架構裡：「鄉土派」與「中智派」的兩條路線上。因此即使在「反國民黨」的論題上是相同的，但卻各有不同的批判立場與角度，「『中智派』認為國民黨不夠『現代化』，政治不能照顧『中智階級』，對經濟政策則表滿意。『鄉土派』則認為國民黨內有人崇洋媚外，政治不能照顧中下階層，經濟淪入『殖民經濟』，必須自主自立才行。」（頁二四四）有趣的是這篇文章的最後，王曉波預測如果台灣民主運動能繼續下去，「黨內外的形勢勢必發展下去，直到成立反對黨為止。」而兩派的消長，王曉波則將發展的軸線放在與美國的關係上，「台灣與美國斷交的事件，將會更促使『鄉土派』的發展。因為『中智派』所標榜的對外依賴——『海洋中國』已徹底幻滅。」（頁二四六）顯然的在當時王曉波的眼中，統獨與左右的劃分是兩極化的，而沒有較為細緻的區分出中間未表明統獨立場的人士，包括自決論、不統不獨論、只談階級不談民族論等等。同時亦可見當時稟持著「左」與「統」不分的夏潮系統，面對不持此念的黨外

人士，是不加精緻區分的，使其在政治上進行既聯合又鬥爭的策略，變得相當粗糙，甚至逼使得同陣營的人在美麗島事件後逐漸退出。

民主運動的兩條路線其實對國民黨而言，未必不清楚這樣的分野。激進保守主義《疾風》雜誌，乃由沈光秀為發行人，於一九七九年七月創刊，社務委員包括李勝峰、郁慕明、勞政武、丁介民等人，以「疾惡如仇、除黑務盡；風雲際會、再滌神州」為其刊名，將美麗島黨外人士視為「台獨黑拳幫」，雜誌內容全部針對「反國民黨」的《美麗島》、《八十年代》及夏潮系統。曾在第三期分析〈誰是真正的敵人〉，對於《疾風》而言反正「反國民黨」的黨外人士都不愛國，但這一篇署名齊森茂（似為調查局的孫起明）文章卻精細的分析黨外人士裡頭的派系分別。「按其政治觀點的分歧，「黨外人士」可分為左派、右派。左派者，傾向社會主義，（他們強調：國父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好一個擋箭牌。）期望中國統一，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餘孽。其解釋事務的方法是唯經濟的，且辯證的；在他們的工作檯樁上的支點是「民族主義」；代理力量是中國人愛鄉愛土的情懷；他們的刊物過去是《夏潮》，現在是《富堡之聲》，偶而或必要時也利用《中華雜誌》作後援；……右派者，嚮往美式自由民主，據有「亞細亞孤兒」意識；他們工作檯樁的支點是「民主、自由」，代理力量是民衆參與的熱情；他們的刊物過去是《台灣政論》、《這一代》、現代是《八十年代》、《美麗島》，有時利用《長橋》、《清雲》代打。」（註八四）激進保守主義的《疾風》除了在面對黨外活動時，給

予鬧場效果外，此篇〈誰是真正的敵人〉，則有計畫的企圖分化民主運動大聯合的陣營，徹底的將夏潮系統的意識型態立場，予以政治謀略化，並建構起夏潮系統組織策略化的「長遠的計畫」：「他們清楚的知道：（一）百姓們需要和平安寧的生活環境，於是他們採取「巧取」放棄「豪奪」。採取「蠶食」放棄「鯨吞」；（二）他們從「經典著作」裡及外國左派的實踐裡學習到，資本主義化（工業化）的社會必有勞資糾紛，工人農人要爭取，他們奉行「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語錄，於是他們在調查工、農、漁人的生活時，專挑他們有興趣的去寫，去拍照；（三）他們更瞭解黨外右派的成員中，沒有真正有學問的人。右派的「學者」張俊宏，亦不過拾人「海洋中國」牙錄的文丐。在漏視之餘，左派便明鬆暗緊的在文教界、出版界、美術界、歌唱舞蹈界，大用功夫、培養力量；（四）他們知道由農業社會步入工業社會，因經濟結構的變遷，生活水平的提高、民智的進步，中產階級在人口的比例中，一日比一日高，誰能掌握這股穩定社會的力量，誰就操勝券佔上風。左派有一致的理論基礎，有迂迴隱晦的作法，比右派近視地張牙舞爪的作法高明太多。」（註八五）

兩派式的分法，〈誰是真正的敵人〉進一步進行挑撥離間的策略：「你們右派與國民黨的競爭，是一種『人民內部矛盾』，你們與左派的鬥爭，才是真正『敵我之間的矛盾』。左派心中的同志，恐怕沒有你們右派『小資產階級』的份罷！」在最後的結論齊森茂指明誰是真正的敵人：「我公正的說：左派比右派會運用，左派比較有步驟有計畫。左派針對那些肯定現狀的人，採取有計畫、有日程地，按照進

度地分進合擊，在圍剿之下，依序把對象個個擊破，從打新詩開始，到鄉土論戰，在整體的攻勢中，左派有心人在國內、國外裡外呼應，筆調一致，論點相同，聲勢壓人。」（註八六）《疾風》過度將夏潮系統給予政治組織化，從而將夏潮系統在文化霸權及階級認同上予以戰鬥化及策略化，進一步將王曉波的「兩條路線」說賦予「深謀遠慮的長遠計畫」，企圖激化民主運動陣營的路線分裂。《疾風》的此篇文章由於涉及到《中華雜誌》，引來胡秋原的筆伐，最後甚至對簿公堂，告其毀謗。以「民族主義」、「正派」著稱的胡秋原打擊激進保守主義的《疾風》，突讓《疾風》對民主運動的攻勢減弱，連續三期（胡秋公別火！），《疾風》攻擊火力轉弱，從而失去「民族主義」、「愛國」的正當性。然而不得不指出，若激進保守主義有這樣極端且尖銳的認知，國民黨高層勢必比《疾風》更加注重這股左翼力量的發展。

即使在這種兩條路線的發展下，對國民黨而言，《夏潮》仍是黨外的一環，一九七九年二月將《夏潮》停刊，同時運用壓力讓蔣勳去職《雄獅美術》總編輯位置，失去了雜誌如同失去堡壘陣地，夏潮系統同時在政治及文化上失去了發言陣地，夏潮系統與黨外最大的不同點在於黨外以政治選舉起家，以政治人物為維繫運動的核心基地，《美麗島》雜誌是用來整合各地各派的黨外山頭與派系，以及夏潮系統。刊物對夏潮系統而言卻是相當重要，維繫人脈、意識型態立場以及文化霸權的爭奪等，不同於黨外的政治集中。因此當黃信介、張俊宏、施明德等開始籌備

《美麗島》，並成功整合各地從事民主運動的政治或文化人時，若要堅持兩條路線存在的話，勢必要有與《美麗島》相抗衡的雜誌，所以《鼓聲》緊接著《美麗島》的誕生，匆促出刊。

《美麗島》其實是在雙方合縱連橫下促成，長期來文化人以及較具社會意識及批判力的人都在夏潮系統這一邊，因此當《美麗島》成立時為了不在民主運動中缺席，蘇慶黎、王拓及陳鼓應、黃順興同時進入《美麗島》的運作中，並且長期與王杏慶及唐文標交好的陳忠信，進入《美麗島》編輯行列，有相當多的稿源從夏潮系統內部討論之後再交由張俊宏得知（註八七）；例如連續刊登三期的〈讓我們來打破神話——和金耀基討論法治和合法性〉一文，署名為吳忠慶，即為吳乃德、陳忠信及王杏慶三人合寫；王津平也談到，《夏潮》正從事著一種雙軌進行的策略：「所以在當時像施明德，他是《美麗島》的總經理，不斷地跟我談加入《美麗島》的經銷裡面，一直想把我那個書店納入《美麗島》的體系，我深深瞭解民主運動雖然是一條路，……，除非他們改變，我們不會改變，他不改變之前，我們不能夠冒然全部投入，所以我們基本對於台灣的民主運動，一開始就有雙軌策略，既投入民主運動，又要保住自己的清醒，……，在這裡我們是一貫的，我們既堅持一個中國，又堅持一個社會的公平，這是社會主義最基本最起碼的，我們不能夠打折扣。」（《訪問錄》王津平）夏潮系統對於黨外非如《疾風》所言「既聯合又鬥爭」的深沈，照王津平的說法，是在民主運動之下，有著社會主義運動的階級民主

意涵。

《鼓聲》的成立，不論是否真有這樣的雙軌策略，代表著夏潮系統路線上的堅持，並且也代表著《夏潮》在民主運動的前進路線上，是同樣的進行著政治民主的鬥爭，《鼓聲》的發行人為陳鼓應，榮譽社長為黃順興，社長為張春男，大概在政治擴大聯盟的考量下，法律顧問是黨外的林義雄、姚嘉文與張德銘。陳鼓應在發刊詞上的副標題是「植根鄉土、心懷中國、放眼世界」，綜合了夏潮系統的意識型態路線，《鼓聲》的內容是《夏潮》編輯風格的翻版，既有反資本主義的（聽咱們的資本家怎麼說），又有宋澤萊對台灣農村的現實報導（該是農民說話的時候了！），並翻譯各國反資本主義的文章（可怕的日本資本）、（要求人權和民主），許達然的台灣社會史觀（從諺語看台灣史），以及承繼現實主義文學的蔣勳、施善繼、葉香的詩，《中華雜誌》系統之侯立朝的反共文章（悲愴的「拉貝大之歌」！），鄭學稼反自由主義政治虛矯的文章（好人政府）。在內容上《鼓聲》等於是對《夏潮》雜誌三年來在立場上的總結，包含了「統一」與「左翼」的共同一致性，並且第一次代表著左翼的文化人與政治人物的實際操作演練，意識型態上總結並表達夏潮系統在路線上的一致性，仍舊擁有著與《中華雜誌》的聯盟與互動，然而《鼓聲》第一期就被警總查禁，接著被停刊一年。

《鼓聲》的停刊與《春風》雜誌的誕生，演變成夏潮系統內部矛盾的擴大化，從而進入八〇年代夏潮系統分殊化的前奏；代表著夏潮系統內部長久在文化上的兩條路線，「民族」與「階級」辯證的矛盾關係的爭論結果。擔任《春風》社長的王拓就說：「《春風》是我當社長，《春風》基本的調子是繼承了《夏潮》比較具有的社會主義，民族主義那一部份是不在裡頭的……」（《訪問錄》王拓）《春風》雜誌在內容上顯然不同於《鼓聲》包容了夏潮系統的所有意識型態，而專注於中下層農民、勞工的階級矛盾問題，並且有意的在民主運動中所衝撞出來的政治空間，凸顯左翼的政治路線，在於階級問題，而不僅僅是威權政治體制的衝破，但是仍維持著屬於整體民主運動一環的路線之一。王津平就敘述著夏潮系統對於《春風》出現時的內部爭論：「所以在這中間，我們在《夏潮》裡面不是沒有爭議，有很大的爭議，有人認為我們應該長期的，不保留的，不旁鶩的往前走，我們就是作思想的、文化的工作，這是最基本的工作。也有人，包括我本人就投入現實政治，因為現實政治會帶動社會改變，我們就在本身上應做一個選擇，或作為政治人，或者全部都是文化人，我們沒有錢或沒有任何的地方政治勢力支持等等，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整個黨外的戰略上出理論，讓我們當時與美麗島的台灣民主運動有一定的關連，代表人物就是蘇慶黎跟王拓，那黃順興與陳鼓應雖然在現實上也是，但是必須有人在重返聯合國議題上，必須要有表現出一個堅決的態度。」（《訪問錄》王津平）也就是說在七〇年代末尾的民主運動潮流中，夏潮系統對於黨外其實尚未能到達「既聯合又鬥爭」的政治位置，它仍然想要標定左翼路線在民主運動中有著一定的歷史位置，以及開發出以理論建構的策略，建構出「階級民主」的概念，

《鼓聲》時期雖維持著共同的多頭路線，然而在面對國民黨這個強大的威權政體，並且在急速的壓縮政治空間之時，夏潮系統至《春風》時期就面臨了是否直接進入政治鬥爭的選擇。

在《春風》創刊的前一個月陳映真發生了「十、三事件」，十月三日情治人員突然持搜查令及拘捕令，分別逮捕陳映真與李慶榮，理由是「涉嫌叛亂」，兩個人被關了兩天，各自寫了自白書後才放了出來，這場突然的虛驚讓黨外以為國民黨又開始展開抓人行動，因此《美麗島》編輯陳忠信希望陳映真寫下過程，陳映真寫下〈關於「十、三事件」〉敘述情治單位抓人的過程，以及被抓時的惶恐經過，並敘述思想傾向轉換的過程，但是關於陳映真的思想卻被刪除了二千三百字，所有人都相當好奇，以敢衝敢突破現狀的《美麗島》而言，為何要刪掉陳映真的文字，陳映真後來於十一月份的《中華雜誌》寫了〈答友人問〉，原來是陳映真的左傾過程以及回復到民族主義的思想經過：

「六〇年代初葉，我因讀到一般讀不到的書，思想『左』傾了。」

「於那時，我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殘破的中國，並且對共產黨寄予很大的期望。閱讀和思想的循環發酵終於產生所謂『行動的飢渴感』的地步。……」

「……不錯，民族主義者中有少數一些人，例如我自己及當年和我同案的朋友，曾經對中共寄予很大的期望。但是據我所知，這些人在最近一段時間中也和我同樣修正了想法。我們有思想苦悶。但是我們在以『中國人民為認同主體』這個新

的發現中，重新肯定了我們民族主義的立場。這樣我們也取得了基於求全而以同樣的熱情批評國共雙方的自由。……」（註八八）

陳映真這段既「左」又「統」的文字，被《美麗島》所刪除，可以想見黨外內部「統獨」路線上的爭執之激烈情況，並且「民主運動中的兩條路線」紛爭，焦點集中至「統獨」而非「階級」，陳映真的「政治人權」被捕過程刊登在《美麗島》，他的「左傾」與「認同中國人民」思想刊登在《中華雜誌》，八〇年代的「統獨爭論」在此引爆了火花。蘇慶黎、王拓於此同時意識到必須要有鮮明的立場與旗幟，以及進行即刻的組織化，才能與《美麗島》集團並行而趨。然而陳映真被逮捕的行動，也可以說明以「民族」或「階級」為政治鬥爭優先的選擇，已將夏潮系統長期與黨外合作的工作者，逼迫到了臨界點。王拓便說明了不得不進一步策畫《春風》創刊的過程：「當我投入選舉後，我開始有左跟右的看法，我發現支持我的都是黑手嘛！生意人不敢靠近我，知識份子也不敢靠近，不然就是很隱藏的，所以靠近的都是黑手的兄弟，再加上我寫的東西也是為黑手說話的，所以選舉後，我四處去演講，那時也讀了一些書了，也才知道要透過運動去散佈一些思想，透過運動才能集結人馬！那時就很清楚的知道我跟一些人的思想不一樣，因為我眼睛看到的是基層，他們看到的是要拿到政治上的權力，可能他們也有往上看，可是沒有溝通，所以我就覺得我跟他們是不一樣的，所以我決定辦一份《春風》雜誌。」（《訪問錄》王拓）黑手、勞動階級、環境保護構成了《春風》的總體基調。

《春風》雜誌十一月創刊，至十二月因《美麗島》「高雄事件」，所有黨外雜誌皆被禁掉，僅僅兩期的《春風》，卻是七〇年代最「左」的刊物。《春風》內容討論了工、農、漁的經濟生活困苦，並第一次正面討論北投「女侍應生」的粉紅色罷工，首次關於女性與階級的議題被揭露出來。比起《夏潮》零散式的調查訪問，《春風》執行了系列而有計畫的調查、採訪勞工問題，包括第一期《勞工永遠不能是輸家》、《肩不起的生活重擔——挑挽工人的辛酸》、《穩定物價的犧牲者——談台灣工資現況》、《勞資糾紛何時了？》，第二期《在黑暗中討生活》、《美麗島勞工座談會側記》、《工會應該是工人的！》、《工會組織縱橫談》、《從勞資糾紛個案談工會功能》、《坑人的「全勤獎金」》等，並積極討論公害、核能電廠危害的問題，包括《土地是我們的，沒有泥土哪有花？》、《核能發電有前途嗎？》、《菲律賓核能電廠風波》幾篇環保的文章。

對第三世界的國際憂慮已經進入世界體系的依賴及不平衡發展的討論：「總而言之，出口導向的經濟結構只能助長亞非及拉丁美洲開發國家經濟的依賴性，使本身的工業發展侷限於紊亂、支離破碎的運作方式，導致一種極端不平衡的生產結構。」（註八九）文學方面也承續著鄉土文學論戰所得到的成果：現實主義與土地的結合，刊登宋澤萊的農村小說及蔣勳、葉香等人的詩。當然，要具有黨外反叛的正當性，不自外於黨外的民主運動，《春風》也報導黨外的政治抗爭訊息。

幾乎八〇年代社會運動的議題，都可以在《春風》找到發源的影子。對於勞工

問題，夏潮系統很明顯瞭解現階段在政治沒有突破下，要求階級運動是不可能的，以汪立峽、江長嘯、蘇慶黎為主，以具體的案例，對勞工的組織、法令進行探討，以及積極的與具有工人意識的工會幹部座談、討論，企圖藉由政治人權座談會議帶動階級意識的擴散。相較於黨外爭取的「人權」抽象的政治概念時，《春風》已經下降到工會法的修改問題，以及從勞動基準法與工會法，進行工人的權力分析：「一般說來，勞工有三大基本權利：工會組織權、集體爭議權、以及團體協商權。這三大權利是勞工維護自己權益和爭取合理待遇的三大法寶。沒有工會組織權也就沒有勞工與雇主間勢均力敵的態勢，沒有均衡的態勢，也就談不上兩個社會團體（指工會與資方團體）間在契約關係上的平等和自我約束。」（註九〇）可以這麼說，《春風》比起《夏潮》，較為具有實體性的、個案性的分析社會矛盾，也較為精緻的探討，資本剝削底層的權力運用。反核能電廠議題的出現，比起《夏潮》討論科學中立、公害等問題，《春風》提出了核能電廠的問題不在於技術，而是「人的因素」，「不同的社會制度或全世界能夠保持核能發電所需求的那種長期穩定的和平嗎？」（註九一）

形式上《春風》與《美麗島》有較量及依附的意味，《春風》發行人為詹朝立，榮譽發行人黃順興，榮譽社長張春男，總編輯為蘇慶黎，編輯委員為王津平、王拓、蔡仲章及蔣勳，同樣《春風》也設社務委員三十八位，其中包括康寧祥、許信良、黃信介及余陳月瑛等人，加上較具文化氣息的李南衡、梁景峰、孟祥軒、楊

祖珺、李日章，以及楊逵。另外兩者在進行與群眾接觸的同時，相互為用，《美麗島》舉辦勞工座談會時，其實都是夏潮系統的人馬主持會議，並控制會議程序，如十月三十一日於《美麗島》高雄服務處舉辦的「勞工座談會」，主席為蘇慶黎及楊青矗，參加的公職是黃順興及當過計程車司機的台北市議員康水木以及代表《春風》的王拓，聽眾有五百位勞工群眾；然而舉辦「中小企業座談會」時，主導會議的是黃信介、張俊宏、黃天福，並且對象以七位中小企業的總經理為主。誠如王曉波所說的，這種座談會參加人物的分野，並不僅是個人專長的分別，更重要的是長期來「中智派」與「鄉土派」，在意識型態立場不同，產生的狀況。

《春風》如果作為夏潮系統邁向政治鬥爭的號角，《春風》已經與《夏潮》的文化性格有了極大的分野，不再以奪取文化霸權及歷史解釋權為主要對象，主要在進入階級矛盾關係，拉攏它所認定的被資本主義壓得喘不過氣的下層民衆，包括工人、農人、漁民、妓女、飯店小弟……，企圖將其社會意識轉向階級運動，從而區分了美麗島黨外人士將群眾泛政治化的政治鬥爭。但是短短兩個月的《春風》，是不可能達到組織政治化的地步的。「美麗島事件」的發生，不僅將企圖掙脫戒嚴桎梏的政治抗爭，予以無情的鎮壓、逮捕，並且鎮壓了夏潮系統在階級運動上的鬥爭性格，王拓及楊青矗被關，蘇慶黎也被審訓兩個月，政治暴力鎮壓之下，爆裂了夏潮系統內部的矛盾，為七〇年代「統」、「左」以及「文化」、「政治」不分的左翼運動劃下了句點，進入了八〇年代的分殊化。

〔註六八〕施明德〈台灣民主運動劃時代的一天〉，《美麗島》第一期，頁八二。

〔註六九〕鄭梓〈台灣議會政治四十年〉，頁二一七。

〔註七〇〕吳哲朗〈時代「潮流」擋不住！〉，《美麗島》第一期，頁八一。

〔註七一〕軒轅平〈折筆傳奇——陳婉真的心路歷程〉，《美麗島》第四期，頁二五。

〔註七二〕同〔註七一〕，頁二七。

〔註七三〕陳鼓應〈七十年代以來台灣新一代的改革運動〉，《中報月刊》一九八二，七，三十，頁三五。

〔註七四〕施明德〈美麗島軍法大審審訊紀錄〉，《美麗島十年風雲》，《新新聞週刊》編輯部發行，一九八九，頁一九七。

〔註七五〕美麗島編輯委員有：王拓、呂秀蓮、吳哲朗、林義雄、施明德、姚嘉文、許信良、陳忠信、陳博文、黃天福、黃煌雄、楊青矗、謝三生、謝秀雄、魏廷朝、蘇慶黎等十五人。

〔註七六〕同〔註七三〕。

〔註七七〕魏良柯〈動人心弦的「美麗島之夜」〉，《美麗島》第四期，頁八一。

〔註七八〕同〔註七三〕，頁三五。

〔註七九〕同〔註七三〕。

〔註八〇〕江南《蔣經國傳》，美國論壇社出版，一九八四年，頁三五七。

〔註八一〕同〔註七三〕。

〔註八二〕王曉波《台灣民主運動中的兩條路線》，《中國人》雜誌，一九七九，一。收於《台灣的前途——從民主到統一》。

〔註八三〕同〔註八二〕，頁二二六。

〔註八四〕齊森茂《誰是真正的敵人》，《疾風》第三期，台北沈光秀發行，一九七九，十，頁六五。

〔註八五〕同〔註八四〕，頁六六。

〔註八六〕同〔註八四〕，頁七〇。

〔註八七〕王津平認為陳忠信是夏潮系統這邊的人，有策略性的進入美麗島編輯行列：「那時候陳忠信在編《美麗島》雜誌，我們是互通有無的。都是張俊宏看不到的稿子，我們可以得到。」（訪王津平，《訪問錄》）陳映真也覺得陳忠信由於在意識型態上認知的相同，夏潮系統的言論才能夠進入美麗島陣營：「……不是很有根據，他進入美麗島的編務，就我有限範圍所知，是一種戰略的部署，希望能夠影響或者掌握整個刊物，所以《美麗島》刊物與以前的黨外刊物有一點不同，把《夏潮》的 concerta，像對世界的看法，以前只有《夏潮》一家，後來就有一部份帶入美麗島……」（訪陳映真，《訪問錄》頁四六二）蘇慶黎就較為清晰的說：「杭之他不是我們《夏潮》的人，他是跟唐文標的關係很好。王杏慶沒有，

他只是寫稿。我的印象，我不覺得這是什麼策略……」（訪蘇慶黎，《訪問錄》頁五一〇—五一一）

〔註八八〕陳映真《答友人問》，《中華雜誌》一九七期，頁三二—三四。

〔註八九〕李東來《是禍非福——論外資對第三世界的影響》，《春風》第二期，王拓發行，台北，一九七九，十二，頁六六。

〔註九〇〕江長嘯《從勞資糾紛談工會功能》，《春風》第二期，頁四三。

〔註九一〕陳思后《核能發電有前途嗎？》，《春風》第一期，頁七二。

第五章·結 論

夏潮集團的分殊化及其八〇年代後續

夏潮集團的分殊化過程相當的複雜，不僅包括路線上的爭辯，加上現實性的政治空間的壓縮，以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深化，中國四人幫垮台及文革鬥爭內幕揭露，個人生活出路問題，甚至人際上的摩擦關係，都是夏潮集團分殊化的因素。在此撇開人際網絡之間的種種性格差異，試圖釐清幾條分殊的主軸脈絡。

在文化上的分野，從文化造型運動上的兩條路線來看，唐文標的「有人的所在就有藝術」論點，表明其對於每個人都是藝術家、都是知識份子的提法，但如同葛蘭西所說，並不是每個具知識的人都能執行知識份子的職能，唐文標此種具戰鬥性格的知識份子，傾向從大眾文化去分析、檢視大眾文化所標示出來的資本消費性的文化去向。因此極具「本土」及「現實」意義，而這個意義由蔣勳接辦總編輯的《雄獅美術》具體呈現，在蔣勳主編底下的《雄獅美術》標榜「民族的、文藝的、

現實的「三大口號，其實不僅延續《夏潮》在台灣史及現實主義文學上的提倡，也接續唐文標的大眾文化觀點，《雄獅美術》深入到各種關於文化的層面去探討大眾文化，主要放在攝影作品、電影、民俗藝術、以及文學小說、詩等的創作刊登。在美術及舞蹈、音樂等「夏潮—雄獅」路線的努力，仍然停留在較為菁英式的範圍討論，即使在美術方面，刊登杜米埃、柯洛維茲等人的作品，所謂社會性的美術、藝術創作並沒有實際具體的路徑，要到後期甚至蔣動離開後，《雄獅美術》展開對台灣老畫家的台灣畫，進行較為廣泛的訪問、調查、舉辦畫展等，才標示出了一條「現實」與「台灣」的道路。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夏潮—雄獅」路線的文化運動，僅僅在於將具有「現實」及「社會」意識的文化概念下放到知識份子裡面去討論，對於大眾文化並沒有深一層的探討；對於女工為何什麼愛唱流行歌、農村為何仍愛低級的電視劇，《夏潮》未自我下放到最底層的文化認同層次。

此與後來《夏潮》舉辦「時代歌謠創作獎」企圖開展「唱自己的歌」的民歌路線，無法能夠深入到底層有關，一場〈歌從哪裡來？〉（五卷五期）的座談會，黃春明與蘇慶黎、鄭泰安及李哲洋的檢討裡，明顯認為「時代歌謠獎」的失敗，原因在於這些創作的歌曲是知識份子理想上的民歌下放，而不是從大眾文化生活的民間調查中產生，蘇慶黎亦認為「所以我們的歌如果要流行起來，一定要跟老百姓的生活有關，我很懷疑大多數的知識份子是否能做出這樣的歌來？」（註

一）形成通俗 v.s. 菁英的對比。這是一個創作的文化工作者極難予以克服的與拿捏的問題。分殊的主軸在此被劃開，亦即對於「現實」的界線認定，有不同戰鬥方向分歧，署名胡途松批判唐文標的大眾文化提法，認為文化由勞動產生，因此所謂的「現實」文化應進入農村、工廠裡面去挖掘，而甚至他認為具有「民族情感」的文化才是一個更為普羅的文化。這就凸顯出被資本主義深化後的通俗文化，是不是普羅文化，是不是要有無我的民族情感才是普羅文化的爭辯。這裡不僅陷入古典馬克思與新馬克思主義面對工業化的資本社會的解析模式的認知不同，再加上標舉「民族至上」的情感認同，使得文化的再批判陷入難以分解的糾葛中。然而必須指出這種糾葛並非派系上的分野，而是對於台灣社會文化分析重構的過渡，從蔣動的《雄獅美術》開創出來的，對於各個美學領域進行現實批判的討論中，既具糾葛，但比起其他藝文雜誌的批評敘述，更具進步。因此說是重構文化批判的過渡，但是在面對民族情感的感性問題，卻又與政治糾葛夾纏一起；但不能視為所謂「台灣 v.s. 中國」泛泛的簡化二元分野。

在文化與政治之間就形成了知識人的浪漫與實踐的內壓式分殊。夏潮集團經過鄉土文學論戰後，形式上以「在民族的旗幟下團結起來」結束這場論戰，而實質的成果，確立了「人民」與「鄉土」的政治及社會正當性提法，此點詳下再論。最重要的是文學作為改造社會的工具，對於已經瞭解到左翼運動意義的文化人而言，文學的作用在鄉土文學論戰的過程完成了它的任務，及確立「文學反映社會」、「文

學批判社會」的功能，但是文學或者文化能夠改造政治社會的成效有多少，成了文化人在渴求創作與實踐中最大的苦悶與憂愁。王拓與陳映真分別在其文藝評論文章中（註二），稍具規模的已經透露出台灣的社會階級分析基礎，誠然這種基礎構造分析並不精確，且是夾帶在文藝評論裡透露出來，然而階級結構構造的上下層分法，已經很深刻的烙印在夏潮集團的思考分析裡面。即使曾受殷海光自由主義薰陶的王曉波與陳鼓應，都明顯認為社會階級具有普羅與資產的階級結構分法。對於文化人而言，文藝創造的浪漫本質，與為政治鬥爭而服務的文藝創造價值，產生了內壓式的割裂，一方面認為文學改造社會過於遲緩，一方面嫌惡文藝為階級鬥爭的指導性而服務，產生了分殊。明顯的是在《春風》時期當夏潮集團轉向急遽的政治現實鬥爭當中，文藝是要成為政治戰鬥的抑或成為自我意識的社會創作之間，發生了爭執，同時王拓與楊青矗甚至陳鼓應躍入選舉政治鬥爭之中，夏潮集團從文化鬥爭轉向政治鬥爭時就出現了爭議。蔣勳就說：「我覺得文化工作非常重要，我當時就跟王拓講『好，假如你要去選舉，你覺得這一批人都要投入去選舉，那《春風》雜誌要怎麼辦？』他說：『那這個雜誌就要作為一個選戰的雜誌』，那選戰的雜誌就一定不會是客觀的，因為我覺得文化的東西一定要有個客觀的分析，要對一般民衆的教育負責，大陸到文革的時候，我們說文革最早是一個理想，最後政治的主導性這麼強的時候，他已經沒有辦法幫助民衆去思考問題了，這個時候我會去懷疑他，因為我對左翼的定義是，左翼永遠是幫助民衆去思考問題的，而不是去替民衆下決

心的，這個東西應該是很重要的分界，像瞿秋白、魯迅這些人都是我很尊敬的左翼的人，因為他始終沒有奪權，那這個裡面的矛盾是要不要無產階級專政？」（《訪問錄》蔣勳）這種爭議最為容易反映在知識份子身上，如何去進行實踐，參與政治鬥爭抑或去政治指導性？王曉波就深刻的反省，認為知識份子的性格不是那麼的容易進入政治的鬥爭中：「這我想是路線上有問題，沒有走政客選舉的路，譬如像陳映真、我、尉天驄、蔣勳，不可能出來選舉，這樣一群人結合，變成一種純知識份子的結合，在這種情況之下，有它主觀的限制，而且有路線上的問題。」（《訪問錄》，頁四三八—四三九）。

但是王拓及楊青矗發覺其所創作的小說，面對的都是「黑手兄弟」，黑手的意義是下層、勞動階級、受剝削者，文化人在實際接觸到「黑手」後的感動，這種感動或者如蔣勳所說的「人性」，或者是階級情感，一旦發覺在政治上「黑手」願意給予掌聲及支持，代表著其主觀看法上感知在政治上的改造，似乎比起文學來得快，王拓、楊青矗甚至陳鼓應、蘇慶黎，以及日後的林俊義，同樣是在政治實踐上採取毅然絕然的行動。蘇慶黎就認為知識份子不見得不應該介入政治奪權：「當時我是有一個派系想法，所謂的派系是要去接近一個政黨的思想，如果你永遠只會辦雜誌，你永遠就只是一個知識份子、文化人，那如果你逐漸去介入政治，那麼就會從知識份子、文化人的派系，走向一個雛形的政黨，黨外就是這樣。我跟你講，我高中、初中，看了很多舊俄文學，舊俄時代接近革命的時候，知識份子怎麼思考

他如何參與整個文化的，歷史的衝突，這給我一個很大的啓發，我對知識份子的看法是來自舊俄時代革命前夕的知識份子的掙扎，他們也是有西化派、歐化派的問題，俄國本土派、俄化派、民粹派，到農村去，這些問題，我想要說，如果我們想要改變這個社會的話，我們不可能不參與實際的政治活動。……我的觀察，像康寧祥他們是屬於現實性的人物，陳映真屬於理想性的人物、思考型的人物，我在舊俄文學看到太多這種知識份子，講社會關懷講什麼，很多，去實踐啊！你一定要去打破這個體制，如何打破？那種知識份子的軟弱，事實上都看得很清楚」（《訪問錄》，頁五〇五—五〇七）文化實踐與政治實踐的軸線在此很清楚的區分，蘇慶黎欲要擺脫掉僅僅是一個雜誌的知識份子集團，企圖建立具有政治鬥爭性格的知識份子派系集團，恰恰與文藝的浪漫創作理想，有著截然的割離。

另外一條分殊的主軸較為複雜，即「階級」與「民族」的優先論問題。蘇慶黎由於是整個夏潮集團的枱面人物，因此她與黨外的接觸亦較為頻繁，同時她也對政治實踐的實際鬥爭，較現實的考量，蘇慶黎從《台灣政論》以迄中壢事件、余登發案、《美麗島》雜誌，她十分的積極參與民主運動的實踐鬥爭，甚至王曉波的《民主運動的兩條路線》一文，是以蘇慶黎與張俊宏作為對比，在蘇慶黎的左翼運動圖像裡，從政治改革進行階級鬥爭是當時的必要路線。蘇慶黎就說：「即使是在這樣的資產階級社會，我們都要去做，事實上當年都已經處理到萬年國會、解嚴的問題，都已經開始被黨外提出來，覺得一定要解嚴嘛！在戒嚴下我們還能幹多少事

情？另外憲法的修改，王曉波當時就很敏感，覺得憲法一修改可能會走向台獨，沒有錯，現在你看到憲法的修改，是可能往台獨走，當時那樣的憲法是不可能和這個社會並容的。不管怎樣將來大陸和台灣是要解決兩岸的問題，你這樣一個憲法，放在這樣的社會是不通的，修改憲法我跟王拓就覺得，又怎麼樣，反正這個鬥爭就是一定要鬥下去，但對王曉波而言，他們就很敏感，非常敏感，我們內部在當時已經有分歧，但是大家也無法協調出一致的看法，……」（《訪問錄》，頁五〇五—五〇六）蘇慶黎堅持的認為階級的改造必須先透過政治體制的革命運動才有可能，在當時戒嚴法、萬年國會、動員戡亂時期底下，從事任何的文化、政治實踐運動都會馬上受到國家機器的殘暴鎮壓，因此與黨外進行聯合對抗國民黨是一個必然的聯合戰線。

但是王曉波對於民主運動的兩條路線分法裡頭，認為最後的分野會是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的斷裂下，成為最後成功者的關鍵，同時意味著「自為民族」的概念，台灣人與中國人統一在民族主義下的民主運動，是最後成功的道路。這種拉高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作為夏潮集團的最高綱領，成為蘇慶黎等人在民主運動中的矛盾現象。

稍微做一下夏潮集團的階級與民族主義的歷史掃瞄。在鄉土文學論戰之前的文藝評論或著社會階級調查文章，比較凝聚在揭露出階級矛盾的政治經濟現象，甚至在鄉土文學的遭遇戰時，陳映真、王拓、尉天驄等人的文章積極的強調意識型態的

立場問題，或者可以說夏潮系統尚未嗅覺政治鎮壓的氣味，仍與前期的新詩論戰一般，進行文學上的意識型態爭論，然等到論戰開打，政治風暴的氣息席捲文壇，《中華雜誌》介入，形成「華—夏聯盟」後，論戰以民族文學形式收場，同時意味著「階級」做為意識型態論述主軸的實體，以及階級意識所召喚的「人民」，被「民族」所取代，people與nation成為同義詞，一方面混淆國民黨對工農兵文學的殘殺性，一方面利用民族轉換為階級意識的召喚。

以民族作為階級意識的召喚被確立後，夏潮集團對「台獨」進行攻擊，一九七七年八月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後，夏潮集團十月「擦槍走火」開始進行對台獨說法浮出表面的批判，對長老教會「新而獨立的國家」的批判以王杏慶、陳映真及王曉波為主，批判的論點大致放在對於帝國主義利用教會進行分離主義政治控制上，這種批判同時將長老教會劃歸為分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共同指控上，這種分法很快陷入非統即獨，非社會主義即資本主義的二分結構中。此分法，同時王杏慶在《夏潮》分四期發表的〈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一文很清晰的標明，王杏慶將《大學雜誌》的知識份子分為土、洋兩系，而土系裡面還可分為具實利主義與非實利主義的兩派，（實利主義亦即功利主義），實利主義的土系即為中智派的張俊宏一系，具有政治奪權的野心，隱含了其為分離主義與資本主義接合的原始聯盟。這種二分劃歸法，與王曉波的〈民主運動的兩條路線〉是一致的，敵我形態被粗糙的劃清了界線，王杏慶的洋系裡沒有較為精確的劃分，實質上洋系還可分為在朝派與在

野派，即革新保台的被納入黨國政治體系的青年才俊，與現代化論的學院自由主義份子，這種較為細緻的分法，後來在一九八二年陳鼓應的〈七十年代以來台灣新一代的改革運動〉一文才有較為深刻的反省。敵我二分並不僅僅在政治上的批判，甚至後來的現代化與民族主義論戰，亦延續在這樣的軸線進行學術思想上的論爭，即使「華—夏聯盟」在面對現代化論戰的軸線上，是進行著社會科學裡較為基進的與馬克思主義思考的學術思想論戰，但是仍然高舉著民族主義作為最終的「接合劑」。這種分歧就使得「就地革命」的理念被拆解出來。

在政治上《美麗島》大聯合時期，蘇慶黎與王拓等人在政治鬥爭中，極力去爭取組織成黨派力量，甚至在《春風》時期，與黨外別苗頭的對壘態勢，異常明顯，《春風》沒有民族主義作為政治鬥爭的上綱，反而以階級原貌呈現其政治鬥爭上的企圖，而即使對分離主義極力批判的王杏慶，《美麗島》聯合時期亦進入《美麗島》雜誌協助寫作，都說明分歧點在於「民族」與「階級」作為政治實踐鬥爭的優先矛盾中。這種矛盾進入八〇年代後，呈現逐漸擴大的現象，王曉波亦做這樣的檢討：「當時有些人不願意走選舉政客化，有很多的問題就變成這樣：像是《夏潮》的人馬首先成立勞工支援委員會，結果後來整個被台獨拿去，是《夏潮》首先成立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結果是被台獨拿去，為什麼？因為後來能給政治上的支持，都是台獨這些，我們不願意接受台獨，在這種情況下，只好一個一個退出。……另外一個問題，因為《夏潮》人馬主張統一跟社會主義，所以在台灣整個客觀生態上，

就很難，然後在國際宣傳上，也受到排擠，美國人不願意捧我們，能抬舉我們的是北京，北京當時是與我們隔絕的，在這種情形下，有它主客觀的因素。」（《訪問錄》，頁四三九）由此亦可以得知夏潮集團在當時的政治運動浪潮下，有著認知上的分歧。但是這分歧並不因為路線的分殊，導致夏潮內部的分裂，反而卻是透過政治運動浪潮時刻，不得不然的實踐行動，隱漠了這個分殊的裂痕，同時凸顯夏潮集團沒有成為政團、成為組織力量的政治性格上的薄弱。陳映真就一直認為由於夏潮的分歧成為必然；「第一就是說，因為沒有組織形態，沒有實踐綱領的共識，內部就是一種默許，有一種共識，這樣的狀態下去搞政治，我們也不能夠提供人，也不能夠提供金錢，靠的是他們原先的知名度與人脈，……，一直到今天，我覺得左翼運動不能只是看到沒有當上立法委員就沒有有效，這個道理大家都懂，可是不能只看得到這樣，你就要跟人家爭著選，我是一直覺得左派應該從群眾或者從階級裡面去開展，開展到一定程度，它也無不必然一定要選，你有一定的強固、廣泛的群眾支持的話，你可以用這些群眾跟比較進步的政治家交換，那麼組織還是要保持一定的戰鬥力。……話說到源頭就是，從認識社會開始來決定你要不要透過議會鬥爭的道路，還是要透過群眾的道路！這些我們都沒有！……，也沒有組織的綱領、策略，都沒有。」（《訪問錄》，頁四六五—四六六）

在七〇年代夏潮集團的分殊化其實都是隱藏著的，彼此沒有明顯的路線上的分

裂，直到美麗島事件後，夏潮集團的成員份子的分殊正式展開。八〇年代初期夏潮集團成員同時在出現兩份雜誌上，一為《生活與環境》，一為《大地生活》（註三），《生活與環境》較注重環境公害及社會問題，也跟《中華雜誌》成員較為親近，並且並不自認為是黨外的份子之一。而《大地生活》則自視為黨外雜誌之一，並去除了民族主義的濃厚色彩，較專注於農工的社會意識以及文化批判的論述路線，與《春風》有著類似的純粹階級路線，代表《夏潮》培養起來的新世代，對於政治及文化批判的努力。而同時期的黨外雜誌也逐漸復甦、興起，《八十年代》、《亞洲人》、《暖流》、《新生代》、《前進》等刊物，也都有夏潮成員及其培養出來的新世代在其中，各個雜誌所標顯不同的政治理念及路線，益加顯現夏潮成員在經過「美麗島事件」後的政治衝擊，政治的複雜分殊了彼此對台灣前途的重新思考。

一九八三年二月《夏潮》重新出刊，以《夏潮論壇》為名企圖重新結合被分殊以及分散的集團成員，發行人為柯水源、社長黃溪南、總編輯仍為蘇慶黎，執編為鍾喬，在發刊詞《春天的宣言》中說到《夏潮》有不虞之譽：「有人說：《夏潮》培養出許多具有批判能力的、苦幹實幹的新世代，他們目前雖然彼此分散著，但在政論界、文化界中，人們還是可以感受到《夏潮》那種深遠流長的影響力——《夏潮》的影子幾乎無所不在。」並且標示了四個方向：（一）批判資本主義建立的經濟政治制度及其文化；（二）聲援第三世界人民爭取自由的奮鬥；（三）和大陸同胞共同締造祖

國的春天和促進祖國的統一；(四)探討台灣問題，聲援台灣民主運動(註四)。比起七〇年代的《夏潮》雜誌，《夏潮論壇》的路線指向更為明確，並且自詡為整個民主運動中的一支。一九八三年底在台北紫藤廬的一場聚會，陳映真與蘇慶黎之間路線上的爭鬥白熱化，導致蘇慶黎讓與陳映真接下編輯位置，陳映真將《夏潮論壇》改版成菊十六開的橫寫式雜誌，並帶入當時剛自研究所畢業的官鴻志、楊渡、杜濟平等碩士研究生，加入《夏潮論壇》的編輯系統。直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陳映真主導的《夏潮論壇》被禁為止。

一九八五年底《夏潮論壇》再度復刊，這次由王曉波主導雜誌方向，由與陳映真同案繫獄的林華洲主編，但林華洲與王曉波同樣有著「階級」與「民族」間優先與否的矛盾情節，甚至被擴大成「左右分裂」的內部鬥爭的談法，直到一九八六年七月《夏潮論壇》結束，使得夏潮系統在台灣的政治文化的陣地上正式宣告結束。「階級」與「民族」的結盟談法徹底的分道揚鑣。

另外以文學創作為主的文化人，《文季》文學雙月刊再度於一九八三年四月復刊，以李南衡為發行人，編委有何欣、王禎和、林俊義、唐文標、李魁賢、尉天聰、陳映真、黃春明、蔣勳、王曉波等人，而後《文季》的創作方向愈來愈向台灣本土文化方向取用題材。後《文季》直到一九八五年六月停刊。但是當後《文季》一停刊後，陳映真立即於同年十一月創辦《人間雜誌》，《人間雜誌》持續四年，除了結合文學的陣容外，應用到社會調查的報導文學，以及攝影的美學效果，帶給

台灣知識、文化、美術界極大震撼。

一九八六年《夏潮論壇》宣告結束後，夏潮系統正式分殊出路線不同的理論論述形態，以新馬克思主義者姿態興起的《南方》首先於一九八六年十月創刊，發行人林永豐，社長鍾肇政，副社長呂昱，主要編輯群為王杏慶、江迅、黃志祥等人，《南方》的基調在於青年學生的啓蒙工作，並積極帶入文化批判的知識領域，八〇年代後期學生運動的興起，《南方》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接著《前方》於一九八七年二月出刊，發行人為蔡裕榮，顧問王義雄，總編輯為林華洲，《前方》進入到較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分析，並且認為經濟基礎的革命才是整個左翼運動的基本路線，對《南方》的新馬基調批評為「形左實右的民間學者」。另外由白色恐怖坐牢出獄的老同學結合夏潮系統年輕一輩創刊的《遠望》雜誌，於一九八七年六月出版，《遠望》發行人為陳其昌，總主筆為王津平，陳其昌與蔣渭水為共同使民衆黨左傾的主要人物，《遠望》的出現，正式標示著日據時代及五〇年代的左翼運動，與七〇年代以後的左翼運動結合起來。

可以發覺一九八七年同時有《人間》、《南方》、《前方》、《遠望》雜誌等幾份雜誌出現，左翼運動的分殊路線已經成為多元紛雜的面貌。為了整合這股分殊的力量，「夏潮聯誼會」於一九八七年五月成立，陳映真在「夏潮聯誼會」成立大會上報告籌備經過時說：「『夏潮精神』，實際上是繼承一九四九年以來，甚至整個日據時代民族、民主的傳統而來，而不是一種新奇的開創。為了讓這種『夏潮精

神」獲得進一步的實踐，以落實、深入到台灣的社會、民間，便由前《夏潮論壇》的社務委員會發起、籌備夏潮聯誼會，以便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工作能獲得一個統籌的推動。」（註六）夏潮聯誼會主要成員由《夏潮》雜誌的作者、編者及讀者所組成，包括了林書揚等老同學的加入，企圖在黨外運動的路線上，進行另一條左翼的運動軸線，並且統合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界工作的左翼人士。夏潮聯誼會由王拓擔任會長，黃溪南為副會長，另有九人評議委員，及三人候補評議員。並且夏潮聯誼會於一九八七年六月出了其機關刊物《海峽雜誌》，王拓任社長，發行人為年輕一代的盧思岳，總編輯為杜崇仁，並設十九位社務顧問（註七），包括了當時各左翼雜誌的主要編輯者，並加入一九七一年北美保釣健將的林孝信等人。

一九八七年十月王義雄突然宣布組織工黨，夏潮集團成員皆集聚工黨成立大會上，而後因政治路線不同，對社會主義實踐理解的不同，多數夏潮集團成員退出另組勞動黨，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勞動黨成立，成為繼日據台灣共產黨後，為台灣第一個左派政黨，其黨綱揭示：「根據社會主義的理念，勞動黨以改造物質生活活動中的佔有方式與分配方式，實現精神生活中的人性自由解放為終極目標，黨所追求的目標，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實現勞動大眾的正當利益。」勞動黨的成立，標示對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已經在政治上被公開化，而不用再澀縮於三民主義之下。

總體評估

從一九六〇年開始，是世界資本主義急遽擴張的時期，以迄七〇年代結束，國際物價處於安定的狀況，台灣正由於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依賴體系的一環，出現了依賴加工業的勞力密集製造出「經濟奇蹟」的表現，實則為整個資本主義的擴延。然而在盲目追求經濟成長的底下，隨著資本擴張造成的生產關係矛盾，逐漸凸顯，各種高污染、勞動條件惡劣的產業，從都市侵入鄉村，鄉村社會全面性的破產，農村勞力被擠壓至工業部門，勞資糾紛的階級矛盾逐漸浮出社會表面。另外，在國民黨高度壓制的政治社會下，文學思考也盲目的「橫的移植」：邏輯實證論、存在主義、超現實主義、全盤西化論等等，成為象牙塔知識份子消極的抵抗元素，卻自外於自我文化及歷史的追尋，任意政治暴力的壓縮，擠退到過客的心態，現代化詩人及學者等人的游離於香港、美國、台灣為最佳寫照。同時國民黨全面掌控教育機構與傳播體制，扭曲台灣史與中國近代史的真相，僵化而制式的黨國教育，使青年學子紛紛抽離文化、道德的智識思考，也成為無史觀的一代。此外，七〇年代中後期，不論青紅皂白的引入逸樂性消費文化，企圖癱瘓人民追求知識精神的空間，與大眾文化結合，成為庸俗的消費文化工業，進一步腐蝕新生代的文化——政治意識。

必須說在此背景起來的《夏潮》雜誌及其集團，其本身開創出來的議題，諸如

台灣史、現實主義文學、新詩、本土藝術、大眾文化批判、文化造型運動、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觀、第三世界的歷史世界觀、以及階級矛盾的社會調查等等，毋寧是對強制的國家機器的全面性反叛，夏潮集團知識份子從各個陣地向國民黨的威權政體進行文化霸權論述的挑戰，以及對制式及頹廢虛無的文化詮釋體系進行決裂的反叛。我們從《夏潮》雜誌本身的兩個週年的社論，可以逐漸看到挑戰權威的急遽張力。一九七七年四月的《夏潮》有〈用力敲鐘、大聲說話〉一篇社論，標榜《夏潮》要敲的鐘是：

——從歷史的局限性裡提昇到更寬廣的層面，以台灣的進而中國的本質思維，溯源過去的苦痛和未來的遠景。

——從被淡忘的鄉土事務裡汲取歷史的教訓和社會的經驗。

——以文藝為旗手，將藝術從昏昧時代附庸的地位，超拔到實用的寫實本位。

〔註八〕

大聲說話是因為：解剖現實錯誤，釐清意識型態上的迷霧；為誣告者提供生存門徑；確認金字塔底層才是社會力量；使生活更多的平等互惠和更少的欺壓暴凌〔註九〕。從這篇社論也標示《夏潮》對於歷史的挖掘重構與再解讀，爲了彌補歷史失憶症的缺失，並且尚堅持以文藝作爲挖掘社會的工具手段。同時在自覺的意識裡，《夏潮》主觀意願上是站在金字塔底層的下階級群眾的一邊。

到了一九七八年三月《夏潮》二週年的社論〈我們的宗旨與主張〉，對於台灣

歷史的掌握更爲成熟，首先即以中國近代史反殖民主義的民族革命，接上台灣史的反帝、反資的歷史敘述。接著其社論掃描戰後的台灣社會，是外國商品的市場，以消費刺激生產，扼殺台灣自主經濟的發展生機，致使此地成爲日本公密的寶島。並且一九七七年《夏潮》躍入政治鬥爭的三件事（鄉土文學論戰、長老會事件、政治革新）說明其立場在於對抗腐化及洋化的墮落。最後標舉九項類似宣告的信條，其中有發揚民族主義，批判帝國主義、批判置產設籍、批判崇洋媚外、批判壟斷資本幾項〔註一〇〕，及相當積極的表現其對現實階級壓迫的態度，以不斷的「批判」作爲整個戰鬥實踐方向的開展。

對歷史實體的成熟掌握，代表其確立歷史詮釋權的取得，也代表其躍入各陣地的實踐活動已經完成了準備動作，這篇社論說明一九七七年的幾項重大論戰與實踐參與，是在這樣的意識型態歷史掌握下躍入進行的。我們無法調查一份雜誌在思想的標定項目下，影響了多少？或完成了多少？然而其的確以左翼的意識型態加上民族情感的文字論述，在各陣地進行不同程度的實踐鬥爭。七〇年代的左翼運動，相較於八〇年代甚至九〇年代的多元左翼論述而言，雖然摻雜了傳統的知識領域、三民主義以及浪漫的民族主義情感，造成了粗糙、機械的論述形態，然而七〇年代的左翼運動開啓了對人民知識的再啓蒙效果。基本上《夏潮》雜誌及其集團具有幾個重大成果：

一、首先以唯物觀點及非官方立場整理日據時期台灣史及台灣文學。以反帝、

反資的抗爭焦點，重新挖掘台灣人民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體系的豐富歷史及文學文獻，進而連結台灣史與中國國民革命的歷史連結性，並確立台灣歷史在第三世界的國際體系位階，從帝國殖民時期至後殖民歷史體系中，逐漸將台灣史擺置在世界史的角色。《夏潮》翻新了七〇年代的歷史記憶，藉著日據時期人物抗爭者的主動性，加上螺旋動態的歷史觀，讓台灣史與台灣文學走入現實的動態裡頭。並且具函反支配的企圖，企圖敲挖被國民黨箝入的正統歷史文化霸權，拆解文化霸權最底層的歷史堡壘的態勢。

二、藉由三民主義正當性的掩護，成功引入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的左翼思考。三民主義作為官方以及人民最為基礎的哲學思想，夏潮集團將三民主義內含社會主義以及人文思想部份重新解構，並予以轉化及重新解讀，將屬於人民集體認同的部份，藉由民族、民生主義的集體認同意願，接合上屬於社會主義、人民為主體的階級意識，三民主義一方面具有偷渡及保護的作用，甚至後來成為攻擊的利器，在於運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深度理解，孫中山的反帝以及七〇年代的反資，成為字面意義的形式等等的歷史觀點理解。馬克思主義之能與三民主義銜接上的概念，「沒有人剝削人的、沒有人壓迫人的平等、自由的社會，也應該是人類永恆追求的「一種理想」（《訪問錄》，頁四二六），這樣的觀念成為不論階級抑或民族鬥爭的共同理想。也正成為葛蘭西所認為透過對舊有不被重視卻根深柢固的知識、哲學，進行重新結合的工作，而與基進、批判、革命的概念進行接和的工作。

三、藉由鄉土文學論戰，確立「人民」與「鄉土」的政治正當性，藉由政治性質的文學論戰，解放「人民」與「鄉土」的社會意義，使得關於「人民」敘述成為主體內涵，而不再是抽象的同胞、民族，或者被視為被統治者的百姓、庶民等的卑下價值觀念，「人民」具有支配與反支配的階級概念態度；「鄉土」意義的確立，包括對本土文化及政治上的解禁，「鄉土」＝「本土」＝「台灣」，「鄉土」成為更廣闊的文化哲學回應，從歷史、文學、藝術、文化、經濟、政治、社會等等，台灣這塊土地開始廣泛的、重新被重視。在鄉土文學論戰時期，不斷將具有批判性現實主義的台灣文學拉到高標準的位置，以致能夠去凸顯自然成長的階級概念，夏潮系統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家群，發展出一套「完完全全是台灣在五〇年代到六〇年代整個社會發展過程裡面，土生土長的左翼思想」（《訪問錄》王拓），使「台灣」的言說論述，被廣泛的在政治運動裡運用，即使日後的各式各樣本土化論述、「大聲喊出愛台灣」、「台灣獨立論等，皆成為「鄉土」認識意涵上的焦點，而擴散到台灣社會的各個底層。

四、左翼運動所帶進來的人文思考模式，廣泛的影響到各個階層，平衡過去海峽兩岸敵\我兩分、傳統\現代、安定\偏激等等的靜態思考模式。左翼人文思考模式分化成各種不同的系統派別，重新界定台灣的人文世界，台灣歷史進入第三世界的國際觀點，而有了後殖民論述的宏觀；文學的現實主義批判路線，使台灣文學掙脫了現代主義的技巧形式，也得以能向政治禁忌不斷的挑戰；美術的本土造型研

究、唱自己的歌、以及電影的意識研究，開始了屬於在地的（local）自我創造形態；以及在知識學術上社會科學的馬克思學派，逐漸體會另一種的哲學知識體系，而能不諱於傳統的以及資本主義式的知識學術思考，賦予知識學術界更爲基進、多樣、廣泛而活潑的生活與運動思考的模式。

然而就一個運動而言，七〇年代的左翼僅僅起到「啓蒙」的階段，所以陳映真一直認爲七〇年代以迄九〇年代，左翼份子一直沒有對於台灣社會的基礎結構分析，提出一套理論綱領，即使如王拓或者他本身所做的文學社會分析，仍然只是粗糙的分析：「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這條船要開到那裡，我們的社會是什麼？基本的矛盾是什麼？誰是統治者，誰是被統治者？社會的動力在什麼地方？一直到今天，究竟爲什麼《夏潮》的運動，以及後來會在文化運動開花一樣，在鄉土文學論戰裡，《夏潮》系統點燃了這個論戰，發展了這個論戰，即使在理論上也沒有好好的解決這個問題，我一直想要解決的，當前的台灣是個什麼樣的社會？……我個人的看法是，第三波僅僅是停留在思想期的運動，它的形成是有斷層的，……我特別要指出這一點，第三波不是自發性的，就是《夏潮》這運動也是從美國輸入的，它是港台留學生在美國那個環境，而不是在台灣的土地，在美國受到改變，然後再回到台灣，是從外面打進來的，先天上就有它的缺陷。……恰恰是透過美國這樣進來的，台灣才有機會脫離冷戰的思維，去看世界、生活、人，可惜的是，它有幾個缺點，第一個它沒有台灣社會內部的基礎，它是從外面轉了一圈回來，還是知識圈裡

的一種運動，……」（《訪問錄》陳映真，頁四五—四五五）沒有一套綱領，相映的就沒有能成就組織體系的規模，也成爲左翼的《夏潮》在八〇年代陡然散裂、消失於黨外的政治論叢中。

在務實派的蘇慶黎看來，七〇年代的《夏潮》是知識份子介入社會的運動媒介，具有一種開創與啓蒙的功能：「就是在意識上，對台灣的知識份子如何介入社會，在意識上如何去關懷社會，做一個啓蒙的工作，我覺得它是成功的，以當時的條件它是成功的，當時對過去是一片空白。因爲你介入社會以後，沒有歷史，事實上是很荒唐的，對社會的關懷是歷史的延續，過去的、未來的，歷史的經驗，教訓智慧等等，作爲一個社會的群體，對於政治的內容，你不可能把它的歷史切斷，這都會成爲一個社會的政治的東西，一樣重要，它具有這個思想的啓蒙，我覺得是成功的，如果要作爲某一個立場的群體來講，它最終還是沒有發展出一個政團，這一點對台灣的左翼來講，是蠻可惜的，很可惜。整體評價大概是這樣，在意識型態上有一個啓蒙作用，但在現實實踐上它最終沒有走到一個更成型的東西出來。」（《訪問錄》，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至少可以做這樣的斷言，夏潮集團的知識份子，接近成熟的「有機的」知識份子，以其對於知識、歷史上的認知與熱情，企圖進入到階級認同的教育工作，在整個文化霸權的爭奪過程中，攻佔思想啓蒙及創造的灘頭堡，建立不同知識結構的世界觀，而《夏潮》的知識份子相對於現代化論的知識份子，更加接近民衆，及在現實上被壓迫的弱勢階級，而樹立起知識份子實踐

的典型。

但是縱使其仍起到啓蒙的作用，例如王曉波就認為應該在民主運動的歷史上給予其持平的對待：「或許可以這樣說，長期戒嚴之後，台灣知識份子主動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批判及反省，《夏潮》雜誌大概就是做到了這樣子。……環境問題、原住民、台灣史、鄉土文學這些都是《夏潮》開創出來的，唯一不被黨外接受的大概就是反帝國主義，反美、反日，對美日的批判；農民、漁民、勞工、雜妓、弱勢團體的問題，都是《夏潮》開創出來所關心的，以當時與《夏潮》並行的《美麗島》雜誌開創出的議題只有選舉投票，所以歷史是公平的話，台灣的反對運動裡《夏潮》雖然只有播種，沒有收穫，但是《夏潮》的影響還是相當大的。」（《訪問錄》，頁四四〇）在歷史的動態中，《夏潮》代表著台灣轉變過程的運動態度，王杏慶較為樂觀的看待，不論是民主運動或社會運動，台灣仍在一個轉變的過渡中，「台灣的近代歷史，從五〇年代到現代還沒有走到一個相對穩定的地步，到現在還不清楚，在這個過程裡很多都是過渡性的，黨外雜誌是過渡，《夏潮》也是過渡，要等到一些問題都底定下來，像國家問題沒有了，這歷史的棋要玩到那一天才相對穩定下來，這些問題都還在發展中。《夏潮》也是過渡的東西，只是在戰後有一群人，想要連結以前的左翼運動，創造一種新的文化論述、人文關懷，他們在這十年中間，到現在，並不是finish不見掉了，至少它分化出一些新的議題，……以及我們談西方新左的的概念，對後來的黨外有很大的影響。當然《夏潮》它自己也

製造了自己的體制，不能說沒有。我是覺得《夏潮》最大的文化上貢獻在這三者，鄉土文學、民歌、及人間雜誌。」（《訪問錄》王杏慶）

同樣林載爵亦認為《夏潮》增加了更為廣泛的思想的開拓：「在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反資本主義，強調本土文化，完全是一個啓蒙者的角色。這些立場對以後整個台灣思想的發展來講，非常重要，它等於是增加一個新的東西，去考慮台灣的一些問題。」（《訪問錄》林載爵），它啓發了一種反支配體系的意識型態，以及開始以台灣本土作為思想體系參考架構的出發點，具有了一種新的理想主義選項，甚至蔣勳認為夏潮的整體表現是一個左翼的理想主義的高峰：「我想會讓我後來懂蕭伯納講的：如果一個人在二十五歲以前沒有相信過共產黨，大概你這一輩子都不會有什麼希望。我想他講的是一個理想的東西，如果他指的不是一個政權，而是一個理念的話，那個東西是近於宗教的東西，現在想起來當初一群人跑印刷廠、排版、討論真的像一個公社、教會一樣，我後來到其他的報社、雜誌社，都沒有這樣的感覺，當時事情都是搶著去做的，今天假如印刷廠出了什麼事，騎著腳踏車就去了，但以後會是你的職位是做什麼的，領多少薪水做多少東西。我想《夏潮》應該是作為七〇年代理想主義的一個顛峰的代表。」（《訪問錄》蔣勳）

不論《夏潮》以及夏潮集團的成員，是否為代表著一理想主義的顛峰，《夏潮》代表著將左翼的知識理念投注政治、文化、歷史的思考，給予七〇年代的台灣重新建構意識型態的思想實踐意義。《夏潮》為台灣整個七〇年代轉型的過程，打

開一扇較為新鮮、活潑的尋找意義的門窗，可以從人民、土地、階級的立場去看世界、觀察問題；即使到了八〇年代，不斷湧現的各種社會運動，如消費者運動、原住民運動、工運、農運、學運、環保運動、女性主義運動，這些社會運動的論述以及抗議基礎，都可以在《夏潮》裡面找出歷史的脈絡意義，不是說《夏潮》發起了八〇年代的社會運動，而是《夏潮》奠定了八〇年代社會運動的基石，與反叛體制的基礎實踐。同時要指出《夏潮》開創出來的每一個議題，都具有更大的研究與思考範圍，諸如其歷史觀、文學觀、各個面向上的文化運動，以及其與黨外共同締造的民主運動的政治實踐意義，都應該要有更為深入且不同面向的探討，那已經是本論文能力不及之處，有待日後努力。而運動的諸種能量是必須累積的，即使是理想主義的幻滅，仍然是經驗上的可貴資源，《夏潮》雜誌作為整個民主運動的一環、左翼運動的主軸線，都必須賦予其歷史沈澱的意義，讓後繼者在此啟蒙運動的基礎上，反省七〇年代左翼運動的歷史意義，企盼走出另一個顛峰。

〔註一〕夏潮編輯部〈歌從哪裡來？〉座談會記錄，《夏潮》五卷五期，頁六四。

〔註二〕王拓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方向〉，及陳映真〈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試論陳映真〉、〈試評金水燻〉、〈試評打牛桶村〉等文章，都具有對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略作基礎分析。

〔註三〕《生活與環境》由黃順興創辦，黃溪南任發行人，余陳月瑛任社長，台北，一九八二，一。《大地生活》發行人徐璐，執行編輯楊渡、鍾喬，編輯有劉一德、黃勝豐等，台北，一九八一，十一。

〔註四〕《春天的宣言》，《夏潮論壇》第一期，頁一。

〔註五〕《夏潮聯誼會成立大會側記》，《海峽》創刊號，一九八七，六，頁三〇。

〔註六〕夏潮聯誼會九人評議員為：楊祖珺、王津平、王義雄、王曉波、王杏慶、陳映真、張敏生、林宗男，候補評議員為林書揚、宋東文、吳俊宏。

〔註七〕海峽雜誌的社務顧問為：楊祖珺、王津平、王義雄、王杏慶、陳映真、林宗男、李榮武、周合源、林孝信、洪銘水、許登源、許達然、莫宗堅、張曉春、蘇慶黎、寧明杰、黃溪南、蔡仁堅、葉芸芸等，這份社務委員名單反應夏潮集團分殊化後不同路線上的生態系統。

〔註八〕夏潮本社〈用力敲鐘、大聲說話〉，《夏潮》二卷四期，頁二。

〔註九〕同〔註八〕。

〔註一〇〕夏潮本社〈我們的宗旨與主張〉此九大信條是：發揚民族主義，批判帝國主義。發揚愛國精神，批判置產設籍。發揚鄉土精神，批判崇洋媚外。發揚民權主義，批判官僚特權。發揚民主精神，批判歌功頌德。發揚自由精神，批判違法亂紀。發揚民生主義，批判壟斷資本。發揚社會正義，批判嫌貧愛富。發揚人道精神，批判剝削壓榨。《夏潮》四卷三期，頁五。

【參考書目】

◎期刊與資料彙編

- 《八十年代》，月刊，一〇二，一九七九年六月—一九七九年七月。
 《大地生活》，月刊，一〇九期，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九八二年七月。
 《中國時報》，一九七八年七月—一九七八年十月。
 《中國論壇》，半月刊，一〇二一期，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一九八〇年九月。
 《中華雜誌》，月刊，一九七一年—一九八〇年一月。
 《文學季刊》，季刊，一〇三期，一九七三年八月—一九七四年五月。
 《文學季刊》，季刊，一〇十期，一九六六年十月—一九七〇年二月。
 《仙人掌》，月刊，一〇十二期，一九七七年三月—一九七八年八月。
 《台灣文藝》，雙月刊，革新版一〇二十六期，一九七七年三月—一九七八年八月。
 《台灣政論》，月刊，一〇四期，一九七五年八月—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生活與環境》，月刊，一〇八期，一九八二年一月—一九八二年八月。

- 《前方》，月刊，六期，一九八七年七月。
 《南方》，月刊，九期，一九八七年七月。
 《春風》，一〇二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二月。
 《美麗島》，月刊，一〇四期，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月。
 《夏潮》，月刊，一〇三十五期，一九七六年三月—一九七九年一月。
 《夏潮論壇》，月刊，一九八三年二月—一九八六年二月。
 《島嶼邊緣》，季刊，一期，一九九一，十。
 《海峽》，月刊，創刊號，一九八七年六月。
 《疾風》，月刊，一〇六期，一九七九年七月—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雄師美術》，月刊，七十一—一百期，一九七七年三月—一九七九年八月。
 《鼓聲》，一期，一九七九年九月。
 《綜合月刊》，月刊，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九七八年六月。
 《遠望》，月刊，一〇三期，一九八七年四月—一九八七年六月。一九七八，三十
 五版。
 丘爲君、陳連順編《中國現代文學的回顧》，台北，龍田出版社，一九七八。
 丘爲君等編著《台灣學生運動 一九四九—一九七九》（上、中、下），台北，龍
 田，一九七九。
 仙人掌編輯部《民族文學的再出發》，台北，故鄉文化，一九七九，三。

- 民言等著《也是小市民的心聲》，台中，藍燈出版社，一九七二，五，三版。
- 宋國誠、黃宗文合著《新生代的吶喊》，台北，自印，一九七八。
- 孤影《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台北，《中央日報》社，一九七二，四，四版。
- 施敏輝編《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台北，前衛出版社，一九八九。
- 《海峽評論》編輯部編《台灣命運機密檔案》，台北，《海峽評論》雜誌社，一九九一。
- 問學出版社編《揭穿陳鼓應》，台北，問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 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遠景出版社，一九八〇，十，三版。
- 彭品光編《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台北，青溪新文藝學會，一九七七，十一出版，《新新聞》編輯部《美麗島十年風雲》，台北，新新聞文化，一九八九，十一。
- 楊青矗編《許信良風暴》，高雄，敦理出版社，一九八九再版。
- 楊國樞、金神保主編《現代化與民族主義》，台北，《中國論壇》社，一九八〇，十一。
- 楊澤主編《七〇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文化公司，一九九四。
- 趙天儀編著《台大哲學系事件真相——從陳鼓應與「職業學生」事件談起》，台北，女孩兒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七七，九，三版。

◎專書

-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一九七二。
- 文馨瑩《經濟奇蹟的背後——台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一九五一—一九六五）》，台北，自立出版社，一九九〇。
- 王拓《民眾的眼睛》，台北，長橋出版社，一九七八。
- 王拓《街巷鼓聲》，台北，遠景出版社，一九七九，三版。
- 王詩琅《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稻鄉出版社，一九八八。
- 王曉波《時代呼聲》，台中，藍燈文化事業，一九七九，十二。
- 王曉波《台灣史論集》，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一九九二，六。
- 王曉波《台灣的前途——從民主到統一》，台北，四季出版社，一九八一。
- 王曉波《春天與中國》，台北，四季出版社，一九八一。
- 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台北，蓬島文化公司，一九八〇。
- 田弘茂《大轉型——中華民國的政治和社會變遷》，台北，時報，一九九二。
- 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獄中札記》，出版、年月不詳。
- 江南著《蔣經國傳》，台北，《美國論壇》社，日期不詳。
- 吳三連、蔡培火等著《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出版社，一九七一年一版，

一九九〇年一版六刷。

呂正惠《文學的後設思考》，台北，正中書局，一九九一。

李祖琛《七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運動析論——傳播結構的觀察》，台北，國立政治

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八六，一。

李慶榮《知識份子與廢物》，台中，藍燈文化事業，一九七七。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出版社，一九八九，十一，三版。

谷蒲孝雄編著，雷慧英譯《台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台北，人間出版社，一九九二。

杭之《邁向後美麗島的民間社會》（上、下），台北、唐山，一九九〇，四。

林俊義《科技文明的反省》，台北，怕米爾書店，一九八四。

林書揚《從二二八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台北，時報文化公司，一九九二。

波寇克著（Robert Boock），田心諭譯《文化霸權》，台北，遠流出版事業，一九九一。

侯立朝《鄉土吾愛》，台北，博學出版社，一九七七。

侯立朝《帝國主義買辦主義》，台北，博學出版社，一九七七。

南方朔《帝國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台北，四季（黎明文化翻印），一九八一。

南方朔《自由主義的反思批判》，台北，風雲時代，一九九四。

洪三雄《烽火杜鵑城——七〇年代台大學生運動》，台北，自立出版社，一九九

三。

若林正文、松永正義著，廖兆陽譯《中日會診台灣——轉型期的政治》，台北，故

鄉出版社，一九八八。

唐文標《唐文標碎雜》，台北，遠景出版社，一九七六。

唐文標《唐文標散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公司，一九八四。

特理·伊格頓（Terry Eagleton），文寶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台北，南

方出版社，一九八七。

高準《文學與社會改造》，台南，德華出版社，一九七八。

尉天聰《民族與鄉土》，台北，遠景出版社，一九八一。

張文智《當代文學的台灣意識》，台北，自立出版社，一九九三，四。

張系國《昨日之怒》，台北，洪範出版社，一九七八，三。

張良澤《四十五自述——我的文學歷程》，台北，前衛出版社，一九八八。

張劍維，《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一九七〇年代台灣現代民歌發展史——建制、正

當性論述與表現形式的形構》，台北，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一

九九二，六。

許信良《風雨之聲》，台北，文星書店，一九八九，十一重新出版。

郭正亮《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轉化（一九四五——一九八八）》，台大社研所碩士

論文，一九八八。

- 陳玉璽《台灣的依附型發展》，台北，人間，一九九二。
- 陳芳明《探索台灣史觀》，台北，自立出版社，一九九二。
- 陳映真《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台北，遠景出版社，一九八四。
- 陳國祥、祝萍《台灣報業演進四十年》，台北，自立出版社，一九八七。
- 陳國祥《青年呼聲》，台北，四季出版社，一九七九。
- 陳鼓應《言論廣場》，台北，遠景出版社，一九七八。
- 陳鼓應《社會公害》台南，德華出版社，一九七八。
-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出版社，一九九一，三。
- 彭歌《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台北，《聯合報》社，一九七八，九。
- 黃煌雄《蔣渭水傳——台灣的先知先覺者》，台北，前衛出版社，一九九二。
- 黃嘉樹《國民黨在台灣一九四五——一九八八》，台北，大秦出版社，一九九四。
- 楊青矗《筆聲的迴響》，高雄，敦理出版社，一九七八。
- 楊祖珺《玫瑰盛開，楊祖珺十五年來時路》，台北，時報文化公司，一九九二。
-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台北，文學界，一九八七，二。
- 詹·約翰著，黃丘隆譯《葛蘭西，「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台北，結構群，一九八九。
- 趙知悌《現代文學的考察》，台北，遠行出版社，一九七六，七。
- 劉進慶著，王宏仁等譯《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一九九二。

蔣勳《藝術手記》，台北，雄獅美術，一九七九，七初版，一九九二六版。

蔣勳《少年中國》，台北，遠景出版社，一九八〇。

鄭牧心《台灣議會政治四十年》，台北，自立出版社，一九八七。

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一九二八——一九三二》，台北，自由時代，一九九〇。

藍博洲《白色恐怖》，台北，揚智文化，一九九三。

藍博洲《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台北，時報文化公司，一九九四。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公司，一九九一。

藍博堂《鄉土文學論戰及其餘波一九七一——一九八七》，台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二，六。

顏元叔《社會寫實文學及其他》，台北，巨流，一九七八。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公司，一九九三。

蘇新《永遠的望鄉——蘇新文集補遺》，台北，時報文化公司，一九九四。

◎論文與專文

〈保釣人士聚首話當年〉座談會，《夏潮論壇》，一九八六，七。

水秉和〈保釣的歷史回顧〉，《當代》第二期，台北，一九八六，六。

- 王振寰〈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二卷一期，台北，一九八九春季號。
- 何欣〈三十年來台灣文學的論戰〉，收於《當代台灣作家論》，台北，東大圖書，一九八八，十二。
- 吳浩〈文學研究資料初編〉，《台灣文學觀察雜誌》第一期，台北，一九九〇。
- 呂正惠〈盧卡奇的文學批評〉，《小說與社會》，台北，聯經，一九八八，五。
- 呂正惠〈七、八十年代台灣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新地文學》一卷二期，一九九〇，六。
- 呂正惠〈現代主義在台灣〉，《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一卷四期，一九八八冬季號。
- 李旺台〈黨外雜誌發展史略〉，《台灣反對勢力——一九七六—一九八六》，高雄，五十年出版社，一九九三。
- 李綠〈台大學生運動三十年回顧〉，《夏潮論壇》一卷九期，一九八三，十。
- 林載爵〈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遠與鍾理和之比較〉，《中外文學》，二卷七期，一九七三，十二。
- 松永正義著，葉笛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的新階段〉，《新地文學》，一卷三期，一九九〇，四。
- 座談會記錄〈現階段我們的文藝路向〉，《幼獅文藝》四十四卷三期，一九七六，十二。
- 尉天驄〈我的文學生涯〉，中國論壇委員會編《我的探索》，台北，聯經，一九八六，五。
- 陳正醒，〈台灣における郷土文學論戰（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三號，日本東京，龍溪書舍，一九八一，一。
- 陳正醒著、路人譯〈台灣的郷土文學論戰〉，《暖流》二卷二、三期，一九八二，八—九。
- 陳鼓應〈七十年代以來——台灣新生一代的改革運動〉，（上、中、下），香港，《中報》月刊，一九八二，五—七。
- 楊照〈惡化的歷史失憶症〉，《流離觀點》，台北，自立出版社，一九九一。
- 錢永祥〈自由主義與政治秩序——對《自由中國》經驗的反省〉，《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一卷四期，一九八八冬季號。

《夏潮》重要人物訪問錄

訪問側記

研究歷史的人都知道，史料不會說話，說話的是寫歷史的人；但是若歷史都活著呢？著手開始研究《夏潮》時，自己心裡一直忐忑不安，《夏潮》這些人都還活著，不只活著，在各自領域佔據一霸，不僅佔據一霸還各自有著意識型態上的辯論。要將七〇年代的歷史論定，相信許多人會不以為然。並且選擇左翼這樣的題目誠然與自己本身的意識型態符合，卻是面臨更大的歷史辯論與理論分析難題，總覺得《夏潮》這些人都是前輩，對於歷史與理論的省察能力有著深刻的見解，我這樣的後輩角色要為他們的歷史論斷，似乎火候未到。

鄭梓老師鼓勵我用新聞學的研究去做田野調查的訪問，對當事人深度的調查訪問，他深具信心的告訴我，一次不夠，接著兩次、三次都沒關係，這一次讓歷史自

己說話。

基本上訪問的問題大致有幾類：

- 一、左翼思想的來源？啓蒙於何時、何處？經由什麼樣的管道取得社會主義的知識及主張？受到誰的影響或與何人討論？
- 二、如何接觸到夏潮集團？認識到認同以至於集結的過程。
- 三、參與哪些運動及論戰？及其看法？
- 四、對《夏潮》重要內容上的觀點？如台灣史、文化造型、意識型態。
- 五、鄉土文學論戰時期合縱連橫的過程，及與《中華雜誌》的關係。
- 六、《夏潮》內部的矛盾及分殊。
- 七、夏潮集團政治化的過程，議會民主與政治鬥爭的關係。
- 八、對七〇年代的《夏潮》的總評。

當然還針對個人的情況，做不同問題的訪查。

訪問過程有幾點要特別談論的，例如陳映真、王曉波、王津平等，現在都是「中國統一聯盟」的成員，會不會有濃厚的「統派」的情緒滲透其中，這是一定會的，但是仍要區分出來。例如王曉波就較接近於胡秋原的看法，他不認為有何左派右派，他認為自己是正派，這樣的看法隱現了民族是其最大的考量，那麼馬克思的方法論就成為他的學問的工具。比較起陳映真，陳映真用的語言較為古典，甚至精緻，顯得相當直接，尤其他用力描述五〇年代的左翼的發展概況，讓我對左翼歷史

有了全貌的觀察。所以他談論的特色，是有一個他認為的連貫的整體脈絡，從而其社會主義的考慮點是主要的，但是從組織面來看他直接論斷《夏潮》是一歷史斷層後的左翼，是從外國移植進來的左翼，這點就造成了相當大的辯論，也成爲一個疑點，多數成員都認爲七〇年代的左翼是有聯繫的，例如王津平認爲當時有白色恐怖政治犯陳明忠的暗地資助幫忙，它應該是有聯繫的；從蔣勳的觀點認爲知識的聯繫，其實是可以越過時空的，蔣勳在七〇年代讀到魯迅、茅盾、楊逵等人的作品，又挖掘出台灣左派的畫家，在知識文化的層面，它的聯繫靠著時代環節所塑造出理想性格。那麼從運動觀點而言，我認爲陳映真是正確的，由於沒有一組織形態，因此各種進步的思潮，透過不同的縫隙進入七〇年代台灣，只要是比起國民黨正統意識進步的，就被納入反對陣營，使得思想的集結並不是那麼的嚴謹，且含糊籠統的解釋成當下時代所需要的論點。就運動史觀點的考慮，《夏潮》作爲一個各式社會主義左派的集結，它正積極的想要聯繫台灣的反抗運動的歷史，很自然的爲了本身反抗運動的正當，開始挖掘當時的反抗運動的遺老，以及史料文獻，如楊逵即爲一例。借用王杏慶的說法，在那個時期，《夏潮》是個「過渡」，由於是過渡階段，沒有統一的綱領信條，沒有既定的組織形態，而使其得以色彩繽紛、五花八門。

另外對於夏潮集團的分殊化問題，一個政治社會運動團體的內部分裂，其實是相當難以言說的，內部分裂如果公開，不僅因爲社會形象跟著分裂，內部門爭可能更行惡化，這是最壞的考量。但是寫歷史的人士對於分殊化最感興趣，如果此團體

一直是鐵板一塊，內部研究就顯得乏然無味。所以這在研究上是一很難以取捨的地方，還好的是訪問過程，蘇慶黎、王曉波、蔣勳、王津平多少都透露出《夏潮》在分殊過程的主因，當然我略過人際摩擦的部份，僅從思想主張的路線不同出發。其中要提到的是王津平的策略談話，例如談到對於黨外及中華兩個集團，有所謂的雙軌策略，確實有這樣的政治雙軌同步進行的現象存在，但能否構成一戰鬥策略，頗令人懷疑，王津平曾不只一次告訴我，當時有過商量，蘇慶黎、王拓、陳鼓應加入《美麗島》，以及陳忠信以隱匿方式進入《美麗島》編輯，但是蘇慶黎並不覺得有這樣的討論會議，甚至有一次在民進黨中央黨部碰到陳忠信，他亦否認他是《夏潮》成員，這就變成夏潮集團在政治聯盟鬥爭策略上，相當難以解析的一個問題。以及王津平也談到在文化及政治部門間，《夏潮》內部激起很大的辯論。這就必須回到政治鬥爭大聯合的環境中去解決，亦即由《夏潮》抑或黨外都不是一個具組織形態的政治團體，其間個人的際網絡、政治態度、知識理念，都必須個體化來對待，相信除了《夏潮》內部有分歧外，黨外的分歧更大，更加沒有整合性的概念，因此從美麗島時期至八〇年代民進黨成立前，這整個反對運動的生態，是一個更加可以被開發的園地。

訪問的中間有相當多的意外收穫，像陳映真對我講述關於台灣左翼運動的三段，王曉波、王津平以及尉天驄三位更是指點出研究《夏潮》的幾項重要參考資料，並贈與我重要史料作為研究之用。較為驚喜的是蔣勳的部份，他補足了我對文化、美術知識上的不足，訪問之前只知道蔣勳為《夏潮》寫老國民，並不知道他因留學法國而思想轉向，且在七〇年代積極的介入文化藝術的實踐工作，而後對照《藝術手記》，才發覺蔣勳將左翼意識帶入台灣，是相當有技巧的，不留痕跡的。

比較難以詮釋的部份是林俊義及王拓，其兩位都是先後加入民進黨的屬於《夏潮》核心人物之一，並代表民進黨參選公職，因此在對於王拓及林俊義訪問的同時，比較刻意的撇開意識型態的或統獨的爭論。王拓對其政治思想交代得相當親切，其實我刪去了王拓講述他上山下海的經驗，他拜訪了誰，挖掘了什麼問題，也正是這些經驗塑造了他的土生土長的左翼概念，這似乎可說明左翼的階級的及人文的思考，其實會自然的生成，由於王拓講述有點凌亂，被刪掉，但在論文中引用了他的上山下海的實踐經驗，這種自然生成的談法。

另外林俊義老師否認《夏潮》是左翼的刊物，並且台灣沒有左翼的存在，因此在訪問的前面，幾乎在與林俊義老師辯論什麼是左翼的詮釋。林俊義認為這些民主運動裡頭的言論，都是進步的自由言論，沒有一定的意識型態。若站在第三世界依賴理論而言，是可以這麼說，第三世界興起的反資、反帝，並不與蘇聯及中共的共黨組織一般，是以不同的形態對抗美國資本主義的國家，更由於夏潮集團一直不是個組織，沒有一個政治或社會運動的具體實踐形態，所以林俊義的說法是可以確立的。但是他談到即使從日據時代到五〇年代，台灣都沒有什麼左翼運動，這就叫人相當匪夷所思。我並不願意去說林俊義因為加入民進黨政治關係，使得他認為自由

的、進步的才是台灣反對運動的傳統；林俊義跟王曉波有點類似，左翼思想僅成爲其知識上的工具。可以這麼說林俊義的詮釋是另類角度的知識思想的詮釋形態，從生物科學上的確族類認同只是感情的發酵，一般生物沒有非要認同哪一種族生物不可，他的看法，可作爲研究台灣知識思想系譜不同角度的參考。也由於林俊義有不同的看法，在總體評估時，保留了林俊義的談法，相信這是日後要辯論的題目。

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做訪問、錄音、整理的工作，其中令人感佩的是蘇慶黎女士專程從美國回來，讓我對她做interview，讓人萬分感激，而且她非常重視我的訪問，她將其啓蒙過程講得非常細緻，甚至第一次公開，甚至不改其宗，她自認就是一馬克思信仰者，在聯合、鬥爭策略下，打開社會運動的空間應是台灣反對運動的優先考量。也讓我們相信，台灣這塊土地有滋生社會主義的條件，只是誰肯爲台灣土地盡力而已。

比較可惜的是陳鼓應沒有能訪問到，雖然他去年曾回台灣好幾次，但都沒有碰到。囿於能力所致，其實更應該訪問相關《夏潮》周遭的人物，例如引起論戰的余光中、彭歌等，與《夏潮》聯合的胡秋原，以及當年爲黨外的張俊宏、許信良等人，這些只能讓有心人再接再勵了。

訪王曉波（一）

地點：新店 建國路

時間：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王曉波簡介：台大哲學研究所碩士，曾任台大哲學系講師，中國大陸研究中心研究員，世界新聞學院教授，現任台大哲學系教授。王曉波可說是參與整個七〇年代重要的社會、文化運動的人物，一九七一年保釣運動第一位投稿到《中華雜誌》，喚起民族意識者；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參與台大民族主義座談會；一九七三年二月爲警總拘留；一九七四年「台大哲學系事件」被解聘；一九七六年參與《夏潮》工作爲主要核心人員，由於其對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及民生主義較爲注重，專門負責孫中山及國民黨思想的解讀工作；鄉土文學論戰時期，前往胡秋原處請求支援，並進一步將《夏潮》與《中華雜誌》結盟起來；七〇年代出版《象牙塔外》、《有話就說》、《良心的挑戰》、《西潮的回應》、《時代呼聲》。現住台北，以腳踏車往返台大教書，每月並捐出薪水主編《海峽評論》。

問：我想就《夏潮》雜誌作爲論文題目，不過現在整個主軸、題目，並不是相當確定，想先跟王老師談談，您對《夏潮》的看法，以及您的建議。

王：《夏潮》雜誌合訂本你有沒有？共有三十五期，三十四、三十五期為合訂本也為最後一期，也是被查禁的。若要做《夏潮》的話，幾種文獻要參考，因為《夏潮》在當時的社會也不是孤立的出現，與當時的幾份雜誌是互動的，所以必須與當時的黨外雜誌要有互相的比較。第二是，《中華雜誌》也要比較。在這些互動裡，在《夏潮》裡，所挑起的，經歷過的幾個事件：第一個事件是鄉土文學論戰，此論戰是《夏潮》與《中華雜誌》掀起來的，此兩種刊物有很多材料。鄉土文學論戰，我們基本上是取得意識型態上的勝利，沒有抓人等等。當時警總發言人在第二次文藝大會裡講，我們不是不辦，我們馬上就要辦。後來被鄉土文學擋下來。那些《青年戰士報》的寫稿者，感到要提筆上陣，一時殺機騰騰。像陳映真，尉天驄趕快把家裡的書藏起來，搬到別人家藏。還有得找官方的書籍與言論。當時的刊物還有《文季》、《大高雄》、《綜合月刊》，鄉土文學論戰是一場很大的論戰，會是人抓人的。第二是與長老教會的辯論：新而獨立的國家，首先掀起來的是《夏潮》，那篇文章是王杏慶用筆名寫的，我、陳映真都介入論戰，然後《綜合月刊》也介入論戰。第三是現代化論戰，《夏潮》牽涉到一部份，主要在《中華雜誌》，也就是所謂批判新殖民地。

問：所謂現代化可否將其分得更加清楚，就是說是在反資本主義與反帝國主義這兩部份？

王：是以反資本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為主，跟全盤西化論早已經脫離了，因為那時有依賴理論出現。現代化論戰一直打到陳映真與楊成的論戰，在《中國時報》辯論。依賴理論最先在民間流傳成一套說法的，是在《夏潮》出現，現代化論戰變成思想性的論戰。

問：《夏潮》還有什麼樣的議題？

王：《夏潮》辦了三年多，以這三個 issue 為主。此三個爭論外，《夏潮》曾提起過的基調及論調，都是五〇年代以後才出現的。第一個，反帝國主義，以民族語言的形式來反帝國主義，當時反帝國主義來講，還很難反，這個只能說是民族主義。

問：也就是說以民族主義的語言來掩蓋反帝國主義，那時候主要是在反美國及日本，因為當時有所謂反日本的技術指導？

王：對。對《夏潮》這批人而言，是台灣的第三波左翼的出現，與保釣有很大的關係。在白色恐怖之後是沒有人敢講反帝國主義的。像我們這一代來講，我們從小是受美國的洗腦，讀美國《學生英語雜誌》長大的啊，是吃美國的奶長大的，對我們來講，《學生英語雜誌》描繪的美國是個自由、民主、快樂的天堂，這種想像與憧憬，如同自由女神與六四天安門的學生是相同的。在保釣後的台灣留學生到了美國後，才恍然大悟，美國不是想像的美好，仔細的研究美國的制度，是資本主義的制度，會坑人的。所以整個第三波左翼的崛起，是有

過程的，反對資本主義、主張社會主義並不是像孫悟空那樣蹦出來的，也是一個實際的反省過程，早期我們都是西化派的，打破頭都要到美國去，爬也要爬到美國去，坐船去。在此情況，在五〇年代後，反對美國與資本主義，是這樣出現的。另外再批判日本，就跟到台灣來的，這些抗日的這一代，也有結合，釣魚台的問題，是日本軍國主義的高漲。美國還琉球給日本，才有釣魚台的問題，釣魚台離台灣不過三十海哩，若釣魚台有一個砲城的話，那台北很快會被攻陷，砲轟，在此情況下，《夏潮》會跟《中華雜誌》結合的因素，其道理也就在這裡，由新一代保釣的抗日與反日與老一代的抗日與反日，其結合在一起，對日本方面是如此的。若跟反美國來講的話，是與反越戰有關。這種反資本主義與反帝國主義，是五〇年代沈寂下去的話題與思想，然後因為反對美國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又由於台灣的社會問題，反對台灣社會的資本主義的制度，當時學生運動起來，台大學生舉辦社會服務團，要向社會進軍等等，運動起來，關照到社會不公平的問題，也就是對弱勢團體的照顧。這方面要伸展到《大學雜誌》的末期，在《大學雜誌》的末期，我與陳鼓應跟張系國，在《大學雜誌》開了一個「社會之窗」的專欄，延續此保釣後期的關係，《大學雜誌》分成三批人馬，一批往《夏潮》，一批往《台灣政論》，另一為《中國論壇》。《夏潮》在工農婦女原住民是先開始的，我被警備總部抓去關起來時，還因為是因「關心基層民衆」，所以是思想左傾。第四個是台灣歷史與文

學的整理。還有《夏潮》首先關心第三世界的問題。

這些議題都是從《夏潮》裡翻騰起來的，其實如果說要來檢視《夏潮》的影響，要從整個黨外運動來看，如果願意這樣說的話，黨外受到《夏潮》很大的影響，如果不願意這樣說的話，黨外運動也吸收到很多《夏潮》的話題，尤其像新潮流吸收很多《夏潮》的話題，關於台灣歷史解釋問題，關於勞工，原住民等，其實《夏潮》之後的台灣左翼的力量解消，左翼是因為沒有政治上的支援，而其所開創出來的議題，全部被接收過去。

所以三場比較大的爭論就是：鄉土文學，長老會的「新而獨立的國家」，及現代化的爭論。從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的話，為什麼會出現《夏潮》這一批人，外在因素是受到美國的影響：第一，一九六九年美國已經準備與中共恢復關係，在此情況，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也是一個民意的國家，要怎樣的造成民意的轉變，這是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美國政府於是開始炒作媒體，炒作中國熱！把大陸的文化大革命，說得神乎其神，像聯合國醫療代表團的報告，考察赤腳醫生的制度，認為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醫療系統，美國爲了轉變選民投票的傾向，將大陸吹捧得一塌糊塗。當時保釣後，這些到美國的台灣留學生看了美國對中國的介紹，才知道，哇，原來我們還有一個這麼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原來社會主義這麼偉大，我們都不知道，是不是，我們都被國民黨騙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因素，所有的保釣回來的多數都是這樣的代表人物，這

影響相當的大。

第二，反越戰運動掀起美國自己的左翼運動（我辦的《海峽評論》，與美國七〇年代左翼運動人物有往來，黑人運動，印地安人運動，左翼運動）。左翼運動其實是結合反越戰起來，由於左翼運動宣傳，有相當有名的大學者都支持此運動，暴露出美國制度上的問題，反越戰裡左翼運動突出，然後加上美國宣傳的中國熱，很奇妙的結合起來，結合起來成爲美國當年思想的three M，不只美國，從東京、到巴黎、到柏林，都非常瘋狂，哪three M呢，第一個馬克思Marx，第二個毛澤東Maosism，第二個馬庫色Marcuser，寫《單面向的人》，結果馬庫色是CIA的人，當時整個情況，即使當時被《學生英語雜誌》洗腦的人到美國去了之後，被反洗腦回來，覺得美國資本主義不是人類的唯一前途。除了外在的影響外，內部第一，也有因保釣運動起來，辦《夏潮》的蘇慶黎，及我等這一批人，都是因爲保釣運動才起來的，這些人是因看到美國及日本才起來的。那麼在台灣當時統治者控制得那麼嚴的情況下，如何能起得來？起來之後，口號保衛國家領土，政府總不能反對我吧，是不是，我們誓爲政府後盾，保衛國家我們作政府的後盾，但是政府不要我們作政府的後盾，不過也因爲如此，政府爲什麼才不會鎮壓，後來搞政府與民間的橋樑，政府也不要我們作橋樑。

問：爲什麼當時釣魚台運動及學生運動可以起得來？

王：原因是蔣經國要起來，蔣經國起來要幹麼呢？要用這個體制外的、年輕一代的力量，來衝擊老的一代的勢力，蔣經國的力量要起來，要涉及到釣魚台的問題，此話就多了，爲什麼年輕人要起來，主要是蔣經國講的，「年輕人要講話，年輕人對國家沒有希望，就是國家沒有希望」，大家都起來了，他煽動的，包括保釣運動的學生領袖去見蔣經國的表弟宋時選，宋時選講「我到台大看過，學生的海報，好得很，年輕人應該講話，要有愛國熱忱。」結果政大的學生要去外面示威，宋時選說「在外面示威茲事體大，我們要把教官找來開會。」當時是因蔣經國要上台，才形成整個政治上的空隙在那裡，所以在此情況下，政治接班出現權力的空隙。

第三，民主運動的條件，台灣也要搞一點民主政治的選舉，這就要講一點台灣社會的發展，坦白講，民主運動不可能像自由派講的，什麼天生人權等等的，民主運動很簡單，要有一定的經濟條件，才能形成：第一個，國民黨到台，首先發生二二八衝突，之後就是五〇年代大整肅，之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將台灣的士紳階級，做爲當時台灣的有利者階級的社會主幹，給幹掉了、砍掉了，砍掉後國民黨受廣大農民的支持，所以這一些沒落地主，想造反也反不起來，一直到尹仲容的中小企業的發展。慢慢中小企業起來，到七〇年代，中小企業需要有政治上的代言人，所有最支持黨外的是誰？青商會，此東西必須分析其社會基礎及經濟結構。那麼爲什麼中小企業支持黨外運動？爲什麼要有民主運

動起來？民主運動有兩個條件，一個要有運動的需要，為什麼中小企業有這個需要，因為中小企業借錢都不容易借，銀行的貸款壟斷的都是國營大企業，中小企業都借不到錢，而中小企業都是地區性質，或者都是買辦性質，中小企業的買辦性質，也就與後來黨外為什麼會反應出美國的對台政策，台灣的獨立政策，其間有連帶的相關性的，在此情況下，台灣此種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民主運動的需要；並且第二，政府要依賴他們的外貿，這個外匯存底也要依賴他們，然後在說其有能力支持民主運動，也就是說，這些中小企業有能力可以開始反抗，需要反抗，這樣的情況，到了七〇年代下，台灣的民主運動起來，且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體，也就是張俊宏所講的，以中智階級為主，當然知識份子，只能是階級的代言人，而不能是一種階級。張俊宏是不懂階級的人。此中小企業基本上是一個買辦性質，買辦性質之下反映出美國對台政策在政治上的性質，然後再結合戒嚴時期民間誰都沒有組織，誰都不能有組織的情況下，唯一的組織，教會，這一部分長老教會，黨外，青商會是搞在一起的，所以當時《夏潮》在與黨外辯論的時候，《綜合月刊》曾訪問高俊明，問高俊明為什麼台灣要獨立呢，他說台灣要獨立，這是住外國的人都知道的。長老教會從階級定義來講當然是買辦階級的東西。民主運動一起來，任何階級都不會說是為自己階級利益奮鬥，當然是為全體人民而奮鬥，他們的號召一定是如此。還有一個背景，台灣的社會問題，耕者有其田後，台灣農業一片景氣現象，以

農業培養工業，壓低糧價，造成廉價的勞工，將農村農民逼到城市來，第一個受害者為農民，農民要取得土地所有權要償還土地的價值與政府，先由政府給予地主股票，然後農民再將錢還與政府。五、六〇年代農民為了將錢還予政府，拚命工作，土地雖歸給農民，但土地所有權狀仍是押在銀行，到了六〇年代農民高興，權狀從銀行領回。到七〇年代農民開始負債，農民從銀行領回的權狀，回到銀行，變成農民問題。另外還有工人問題。且社會問題也出來，農村人口往都市裡面流，大哥哥也向都市裡流，那麼女的當娼，男的當盜，男盜女娼，在此情況，社會問題也相當多，也是當時背景狀況，要講工人、婦女、農人問題是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所出來的。

在民主運動來講，與《夏潮》一起的，包括《台灣評論》，《這一代》，可以比較的一點，民主運動刊物的傾向，是比較親美的，政治選舉傾向，以《夏潮》來說，是社會取向，不是政治選舉，當然有其政治性，不過在此層的意義而言，除了統獨與階級外，在民主運動的政治層面而言，《夏潮》與其他黨外基本上是統一戰線。對國民黨的問題上是統一戰線的問題。

問：《夏潮》有哪些人？

王：在人物方面有：蘇慶黎，具影響力人物有：陳映真，唐文標，陳鼓應，林俊義，王曉波。編過的人：王杏慶，黃煌雄，林載爵，吳福成，福蜀濤。幫忙的人：王拓、陳妙芬、王津平，從美國回來，帶進淡江幫，李雙澤，尉天聰的政

大幫，有吳福成，陳國祥，吳宏仁，福蜀濤等。還有杭之，張富忠，楊祖珺。在財務上支持的：鄭泰安。《夏潮》是與鄭泰安的診所在一起的，精神病診所。

主要人物應是陳映真，陳映真與陳鼓應是比較radical，而王曉波是比較保守的，到後來，衝進一批戴華光，劉國基，擺地攤賣《夏潮》，此時陳映真與老同學接觸，因為雜誌在市面上流行，老同學看到後，才接觸的，所以《夏潮》停刊大家都鬆一口氣，在最後一期的時候，陳明忠給了蘇慶黎錢後，第二天被警總抓去，然後《夏潮》停刊，大家在經費上鬆一口氣，在政治上也鬆一口氣。與老同學的關係牽起來的，我的判斷是陳映真牽的，然而陳映真也是因讀魯迅的書才左傾的。老同學組織起來是靠陳其昌搞《遠望》雜誌，才結合起來。跟黨外的關係是靠王拓去訪問這些地方政治人物，這些政治人物也因為《夏潮》而成爲全島性的人物，甚至因爲《夏潮》，把這些人抬到國際政治舞台上，像余登發等。

訪王曉波(二)

時間：一九九四，十，七

地點：台北 世新學院

問：這次訪問，想要瞭解的是關於個人，在思考成長過程中，如何形塑出對於整體的左翼觀點，也由於七〇年代左翼形成的自發性質相當的強，所以您個人的啓蒙過程成了一個極具關鍵性的位置。

王：歸納起來大概有幾點，以我個人來講，我不使用左右派的概念，我爲什麼不使用左右派的概念，因爲這不科學，在《夏潮》文章裡，我最喜歡一篇文章，叫「左右之辯」，我不同意用左右這個概念分析問題，分析人的思想，所以當年胡適之把老子當作極左派，把墨子當作極右派，孟子是中間偏左，這種話是胡說的，說了沒有意義，我是不用這種概念的。要用的話大概可以用思想的基進派，像譬如John Rawls的《正義論》對於現狀的改革要求比較急切的思想。以我個人的思想大概要分成幾個階段，首先呢，因爲我的出生背景是在一個政治犯家庭出生，從小母親因政治因素被處決，父親坐牢，然後由外婆帶著，無親無故，在垃圾堆裡面討生活，從小看到很多的人情冷暖，社會不公平及社會的悲慘，而有相當的同情；另外就是小時候讀《水滸傳》給我的印象很深刻，

《水滸傳》裡是被壓迫的人民反抗專制，一個革命的小說，大家認為土匪強盜是壞人，在《水滸傳》裡面是好人，到現在為止還可以記得《水滸傳》裡的一首詩：「夏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苗半枯焦，農夫心激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很強烈的一種階級對照。另外對於中國農民苦難和悲慘的生活，從我外婆口裡，聽到很多的故事，諸如一些佃農抽到壯丁，但兒子生了肺病，然後要拿錢去買壯丁，買不起，兒子上吊，媳婦跑掉，留下一個老頭孤伶伶的。我外婆在抗戰時要流浪，過著孤獨悲慘的生活，那些東西給了我很大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我從小覺得中國人民為什麼那麼悲慘，而希望我自己有能力可以貢獻、努力，所以當時我有很強烈的這種傾向。但這種傾向經過台灣的這種制式教育，可以這麼講，是國民黨戒嚴體制跟美國的新殖民主義結合，我們從小看的是美國學生的英語雜誌，把美國看成一個人間的天堂，把自由、民主看成是人類歷史的終結，在這種情況底下，我到大學碰到一個我很崇拜的老師——殷海光老師，也是一個自由主義，但是他的思想裡面帶有很濃厚的貴族氣息，而不是對基層民衆的一種關懷，這種情形下，一直到釣魚台運動出現，我們經過釣魚台事件發現了美國帝國主義的本質，然後由美國帝國主義的本質再進一步探討中國的命運，跟到被壓迫階級的命運，在這種情況底下，我們也偷偷的看了一些書，譬如Snow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下的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的自傳，尤其是自傳的第三章從皇帝到做人，我們看了很感動，我

們也看到了中國的窮人，中國被壓迫的農民，怎樣翻身起來，然後來建設自己的國家，當時兩岸的資訊是完全隔絕的，我們認為如果中國是照Snow、溥儀這樣描寫的話，我們覺得這樣的社會應該才是中國的前途，應該才是人類未來希望之所寄託。而且當時戒嚴時期非常嚴厲，我們看這樣子的書，甚至於只能躲在棉被裡看，看了以後還要濕掉半個枕頭，當時是這樣的一種情形，這樣子的一種思想感染下。所以保釣運動到後來的發展，我們就漸漸走向社會運動，然後有台大學生社會調查團，當時我們也到過最貧窮的農業區，到過山地去，到過花街柳巷，都市最黑暗的死角，去瞭解、去探望被損害、被污辱、被迫害的人，這樣子的一種想法，雖然已經過了二十幾年，到今天我還是認為，在世界上不應該存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家與國家之間應該平等，民族與民族之間不應該有所謂霸權主義，不應有帝國主義的出現，不應壓迫小國，先進的國家不應剝削落後的國家，到今天為止，我還堅持人類的理想不可以人欺負人，人應該有他公平的待遇，不可以失去他的正義，失去社會的公道，那麼要如何達成一個沒有人壓迫人、欺負人的社會，也許今天爭議很多，但是這是人類不斷要奮鬥的一種理想。到今天為止，馬克思主義對我來講，除了感性的這個部份外，後來因為台大哲學系事件發生，我被排擠，失業了差不多兩年，被安排到大陸問題研究中心，接觸了大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一些理論的書，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講的話，我覺得很多東西都已經過時了，但是到今天為止，有兩

點是歷久長青的，一種就是馬克思歷史唯物論分析的一個方法，他實際來分析人的行爲，包括人的思想，是跟到人實際的生活，尤其是經濟生活是有相當大的關係，而不是一種空洞的思想，或者一種行爲模式而已；另外馬克思主義所標榜的一種，沒有人剝削人的、沒有人壓迫人的平等、自由的社會，也應該是人類永恆追求的一種理想，我整個思想發展過程大概是這樣子。

問：剛剛談到保鈞對於你自己的整個的轉變。

王：保鈞對於我的影響應該是比较直接的，由於保鈞運動才有另一個刺激，把幼年的一些想法、感受，經過理論化的整理，我們從保鈞運動才看到美國帝國主義的本質，也才透過美國帝國主義在理論上認識到資本主義的壓迫性。當時很有意思的一點，也與時代有很大的關係，那個時代正好是大陸文革的時候，文革的紅衛兵起來，帶動了全世界的學生運動，以及六〇到七〇年代的一種全世界的左傾思潮，或者說社會主義思潮，在這種情況底下，當然我們也受到這方面的影響。

問：所以就是經過保鈞運動的轉化，及進入大陸問題研究中心裡面，開始接受馬克思思想？

王：開始比較能接受馬克思的理論。

問：那時除你個人外，有沒有跟他人交流的一個過程？比如像是蘇慶黎？

王：我想當時有很多不同的思想，我們在一些思想層面上大概都有一些交流，當

時也不是那麼的清楚分辨得出來。比如我們爲什麼反對台獨，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是從反帝國主義論述，因爲我們後來發現台獨只不過是從美國帝國主義要想保有或者要佔有遠東戰略利益的策略工具，我也發現，台獨從二次大戰中，美國就已經是處心積慮的策劃了，所以在反台獨的反面，我們就主張統一了。當時也許有很多這種的朋友，後來的思想發展不是一致的，有一些在思想介入的比較深，有一些在現實面介入的比較深，比如王拓。

問：所以那時候一致性並不是那麼的強，其實是很大的差異性結合在一起？

王：沒有錯，其實是差異性很大，比如陳鼓應大概徹頭徹尾是個自由主義者，但那時比較radical的自由主義者，才會跟我們搞在一起。比如說陳映真是受到了他父親一代抗日思想的影響，跟到三〇年代文學作品，可能才走上這條路，大家的出發點都不太一樣，那大概很多人後來的著重點都不太一樣。

問：像唐文標代表著就是經過美國的保鈞運動洗禮之後回來，帶進來的是西方馬克思的東西，就是新馬的概念東西，你們對他的接受性如何？

王：我想我跟唐文標的距離比較遠一點，像陳映真跟尉天驄跟唐文標大概比較接近，因爲他們在文學上比較近，王杏慶大概跟唐文標比較近，他們搞一些美國基進主義的一些東西，我想這裡來講沒有所謂接納與不接納的問題，大家湊合在一起也不是有一個共同的組織，大家只是氣味相投。

問：南方朔後來在《夏潮》寫了一篇〈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分析《大學雜

誌》。就我的觀察，對一個想搞運動、革命的人，勢必要對他之前的思想，做一個總結，比如說對之前的保守主義、封建主義、自由主義會做一個總結，然後做一系列的批判，以奠定革命或運動的基礎，對於《大學雜誌》作同樣的分析，是不是企圖作那樣的工作？或僅是對那一個時代作解剖而已？

王：在我們看來，他這個東西出來之後，當時以我們來講，多少是有這樣的感覺和作用，至少以《夏潮》這一批人來講，我們是揮別自由主義的，揭示在這個情況底下，一個新思想格局的開放，我們對舊思想階段的一個總結，所以當王杏慶的東西一出來，楊國樞他們頗不以為然。

問：爲什麼《夏潮》會創辦？我問南方朔爲什麼後來要改成旗幟較鮮明，他的說法乃是因幾個左派的一個集結。

王：《夏潮》剛開始是台大醫學院那些人搞的《健康世界》，鄭泰安受到他們的排擠，然後就出來辦《夏潮》，所以《夏潮》剛開始有點像《讀者文摘》，完全不像後來那樣具有思想、自覺意識，可能跟王杏慶結合唐文標，然後《夏潮》就起來了。

問：我現在看《夏潮》，我把他分成三個階段，從內容上而言，一開始他比較是文化的面向，包括歷史、文學、美術、詩等，一九七七年中是鄉土文學論戰期，一九七七年底中壢事件發生，《夏潮》開始政治化，甚至去參選。我想進入《夏潮》裡面來問，《夏潮》用什麼樣的觀點去整理台灣的歷史？

王：中間會運用孫中山的思想，我們整理台灣歷史，尤其是日據時代，我們還是以抗爭的焦點切入，從抗爭這個焦點切入的話，當然這裡就有兩個部份，一個是反帝國主義，第二部份是反資本主義，但是當時的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大概是結合在一起的，因爲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人就是代表資本主義，當時在台灣有百分之九十的產業資本是日本人的，你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就是反對日本，當然還有一些反對地主，就是反封建，當時的反地主壓迫就是反日本人的壓迫。

問：那時對戰後的歷史比較沒有談到？

王：戰後的歷史當時仍相當的禁忌，不要說是戰後的歷史，像我們當時整理賴和的東西，賴和是扣上了台共的帽子請出了忠烈祠，後來是我們把他平反的，當時我們在《夏潮》介紹賴和，賴和還沒有平反，等於是在宣揚台灣共產黨的思想，當時還有呂赫若，呂赫若是彰化人，是後來五〇年代反國民黨的地下黨的成員之一。

問：在整個的文化論述裡，好像很強烈的表達民族主義的思想，還有社會的思想，像蔣勳去搞《雄獅美術》，王墨林談電影，這整個文化的論述有沒有經過討論，或者說大家思想上的一致性是什麼構成的？

王：說句玩笑話，是蘇慶黎的媒體集中制，確實如此，是蘇慶黎到處跟這個接觸，跟那個touch，最後她所擬成的，如果說有什麼特別計畫的話，沒那麼有組

織。

問：《夏潮》從一開始到鄉土文學論戰，大家對《夏潮》最大的一個質疑，就是它在談工人或農人的部份比其他的東西較少，或者說對社會調查的部份較少。

王：左翼是不是一定就是工農式的？在這種情況底下，所以我一直不喜歡用左翼的概念，你應該從一個相對的觀點來看，當時能從工農階級抗爭的立場來談工農階級的問題，最多的應該是在《夏潮》；而不是在《夏潮》裡面談得很少，而是全台灣知識界談得最多的是《夏潮》雜誌，我們不是在辦一份工農階級的刊物，我們談的是其他刊物沒有人談的，用工農抗爭觀點來看，當時來講，像這樣已經不得了了，台灣出現紅旗了。

問：到了鄉土文學論戰時候，大家之間有沒有討論如何回應，或者只是個別的回應敵方的指控。譬如說，彭歌指稱《夏潮》這些作家寫的是工農兵文學，我看起來其實也就是工農兵文學，但是像王拓就會自己詮釋「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這樣的回應除了不願意被扣帽子之外，有沒有一個不同樣的策略運用，您會如何去解釋這樣的回應？

王：以工農兵文學這樣的一個名詞扣上鄉土文學，顯然是扣帽子的方式，對當時的鄉土文學作家來講，什麼叫做工農兵文學，他們也沒看過，寫農民、工人的文學就是工農兵文學，當然這是一個扣帽子的行為，大家不能夠接受。後來所謂鄉土文學的稱呼也有問題，為什麼？譬如楊青矗怎麼是鄉土文學？他寫工人的

東西怎麼是鄉土文學，這種情況底下，鄉土變成一個「概稱」馬馬虎虎啦！當然如果鄉土文學在台灣來講是一種恭維，很有地位的說法，那就不會去推卸，不會去撇清，而工農兵文學在台灣來講是一種抹黑，殺傷力很強的一個血滴子，大家才會去反駁這樣的說法。

問：實質上，你覺得可能不是？

王：應該不是，為什麼呢！如果以特定的一個工農兵來講的話，是要歌頌黨的，可是台灣沒有，然後是一種很強烈的階級鬥爭意識，可是憑良心講，沒有啊！你看黃春明寫的那些鄉土人物，那些東西，某個意義上來講，是一種訴諸於懷舊的哀鳴，最多只有一些社會同情，不要談到階級鬥爭啦，太遠了。

問：我的觀察是就論戰本身的文字而言，例如陳映真也覺得鄉土文學論戰就是鬥爭的過程。

王：這裡面大概只有陳映真是比較自覺的，其他的只能是一種自發性的，工農兵文學必須是一種自覺的，用共產黨的話來講，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必須是武裝過的放在裡面，那他們完全沒有哇。

問：陳映真是想透過鄉土文學，提出階級這個東西，以及包括他想要將解析整個的生產關係、及剩餘價值都要提出來。

王：陳映真的確這樣想。

問：只有他一個嗎？

王：對，而且這裡還有一點，我可以告訴你，在《夏潮》裡經常有一些爭論，而這些爭論大概是陳鼓應與陳映真意見比較接近，王曉波和尉天驄意見比較接近。問：在當時時候？爭論的內容？

王：對，那為什麼會有一些爭論呢？陳映真與陳鼓應比較喜歡使用一些旗幟鮮明，比較radical的語言，語不驚人死不休，我就罵他們，深怕人家不知道你是什麼派。我跟尉天驄比較不贊成這樣子，這個裡面也有爭論，所以我跟陳映真就爭論過，我說「馬克思主義如果只能用一種語言來表達的話，這種馬克思主義不能推廣的。」

問：可是他還是堅持？

王：比如他寫評論王拓的《金水孀》都要用那種很明顯的，不太加以修飾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用詞，來作分析，當然在現在來講是無所謂，當時來講的話就惹起人家來抨擊。

問：另外就是說，《夏潮》一開始就在整理台灣文學，就是日據時代的東西，可是沒有寫出一個總論來，反而被葉石濤寫出一個《台灣文學發展史》。

王：葉石濤是因為他在寫台灣文學史，所以就讓他發表，那並不是說就是他寫出來的。後來李南衡也編了一套台灣新文學，是後來遠景出的那一套，李南衡客氣不願意講，那是葉石濤與鍾肇政把他拿來的，李南衡用自己的錢花了很大的力氣，到各處蒐集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的歷史，蒐集回來以後，請葉石濤與鍾肇

政前輩們做一個校正，後來呢，他們就把李南衡蒐集的資料記錄下來，賣給遠景，李南衡是個很厚道的人，不願意講。

問：後來李南衡有出書嗎？

王：後來李南衡出了以後，市場銷路競爭不過遠景，出版社都垮掉了，賠了幾十萬，以當時賠了幾十萬，很驚人的。

問：後來從中壢事件開始政治化，包括去訪問政治人物，也包括參選，還有一個就是納入一些政治記者，像陳婉真、吳哲朗，由他們策畫報導黨外的集會與活動，這整個的政治化過程有無經過討論？

王：還是我剛剛所講的，《夏潮》來講基本上是民主集中制，基本上是沒有經過討論的，大概是蘇慶黎跟一些朋友交換意見以後，就做了。還有一個人可以訪問的，吳福成當時是蘇慶黎身邊最貼身、最得力的一個執行編輯，現在在《自立早報》。羅利滾就是他的筆名，他是俄文系畢業的，他對台獨幹得相當凶悍。問：包括陳鼓應與王拓去選舉，都沒有經過討論。

王：沒有經過討論。

問：為什麼在評估裡面，他們兩個可以去選舉？

王：不瞞你講，我就反對陳鼓應去選舉，結果後來人家就講王曉波反對陳鼓應選舉，所以不支持陳鼓應，陳鼓應有問題，所以逼得我不得不表態支持陳鼓應，來勸說我支持陳鼓應選舉的就是王津平。王津平應該還記得他到我家來，我說

我不贊成這個選舉，我不贊成有幾個理由，第一是陳鼓應的省籍是外省，第二是沒有錢，第三他身體又很壞。首先你又沒有人，陳鼓應選舉的話，你找誰來給你幫忙？你的朋友都是軍公教人員，軍公教人員大都是給國民黨K得死死的，所以他的兩個助選員，已經登記的，一個叫孟絕子，一個是高XX，公教人員都沒有辦法公開的幫陳鼓應登記做助選員；第二沒有錢，陳鼓應的選舉可以說是被許信良騙的，當時許信良是跟陳婉真，許信良要拱陳婉真出來，陳婉真知名度不夠，要陳鼓應背陳婉真，在這種情況下，許信良答應「錢，沒有問題，你要選舉，人也沒有問題」，結果後來錢沒有了，人也沒有了，但是陳鼓應已經是鴨子上架了，當年台大哲學系事件後，他一直想要再回台大。

問：陳鼓應台大哲學系事件後，就一直在國關中心？

王：對，一直在國關中心領糧票。

問：《夏潮》在結束後，出現《鼓聲》、《春風》，《鼓聲》我沒有收集到，《春風》就是比較明顯的談到勞工的問題。

王：《春風》基本上是王拓的雜誌，到了《春風》經過了選舉後，大家對於具體的社會問題比較有了概念，就不緊緊局限在理念上，就王拓來講，他本來就不是有理論的基礎的，然而就帶到比較實務性的基礎東西。

問：爲什麼要加入《美麗島》？

王：我想當初是個聯盟性質，所以陳鼓應、蘇慶黎、王拓都是《美麗島》的成員。

問：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照王津平的說法，必要有些人進入《美麗島》裡。

王：我想王津平說法太高級了一點，沒有那麼高深複雜，沒有那麼深謀遠慮，王津平總是比較喜歡抬舉自己。

問：《夏潮》雜誌與《中華雜誌》的同質性與差異性，及到後來會結合在一起的過程？我這幾個禮拜看《中華雜誌》，它歷經幾個轉折，在《小市民心聲》時候，有一篇是攻擊陳鼓應的文章，並且《夏潮》系統與中華是沒有什麼樣的聯繫，直到鄉土文學論戰，當胡秋原站出來講話，《夏潮》作者才大批的到《中華》裡面寫文章，但是到美麗島事件後，可以看到只剩下你與尉天聰、陳映真，後來您成爲《中華》的編委，您可否談談《中華雜誌》、胡秋原接納《夏潮》，以及結合的過程？

王：這裡面可能要先瞭解到，胡秋原、鄭學稼這些人，這些人後來被稱爲老左派，他們這些人在年輕的時候大該都跟馬克思有過關係，那麼他們後來跟共產黨鬧翻了，沒有地方去，就都投靠國民黨來，那國民黨在台灣的發展策略，整個都是美國的自由主義，而他們當年就不接受西方自由主義，會去接受Marxism就是因爲討厭自由主義，但就是一直在那邊憋、憋得很厲害，你可以看出來胡秋原與李敖的論戰，說到底是什麼意思？說到底就是西化與反西化的意識型態的鬥爭，西方資本主義文化與反資本主義文化，這一批人來講思想非常複雜，你要說他們是社會主義也不是，他又反對社會主義，尤其他又反共，但用他們

的話來講，社會主義又是「少年時期的戀人」，這一批人最後有一個清楚的意識型態，就是民族主義，「反帝」是比較清楚的思想，你說他到底是不是社會主義，這東西又很難扯，這一批人，後來保釣運動，胡秋原是首先發動這個運動的。你看《中華雜誌》，我在《大學雜誌》不能登的文章，拿給胡秋原看，他馬上准許，我用茅漢的筆名來寫保釣的事，那篇文章後來在保釣發生很大的作用，包括在海外大量的流傳。我跟胡秋原的關係，是因為保釣事件，發生關係後，然後一直是反日，當時我們跟《中華》的關係，只有我認識胡秋原，是因為後來鄉土文學開了二次文藝大會，那時國民黨開始圍剿鄉土文學及《夏潮》雜誌，是我找了曾祥鐸，去向胡秋原求援，當時陳映真尚不認識，胡秋原就要求我們將鄉土文學作品拿給他看，收集了一些給他看後，胡秋原大為讚賞，所以後來有人攻擊胡秋原，說胡秋原看到了陳映真就像看到自己少年的影子。《中華雜誌》跟日據時代的抗日一批人結合，不瞞你講，那都是我中間穿針引線。七七演講會我請了這些，請了那些。到了鄉土文學論戰，胡秋原出來替我們講話，包括發生美麗島事件，是我和張國龍夫婦去向胡秋原求援，然後才發表了一九七九年元月號《中華雜誌》的美麗島事件專號，替美麗島事件講話，然後就引起《疾風》的攻擊，胡秋原就一狀告《疾風》，到現在為止，不知道告完了沒有？是這麼一個發展。後來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後，《夏潮》雜誌就垮了，垮了之後，王拓跟蘇慶黎去坐牢，所以跟《中華雜誌》接觸的人就

只剩下我跟陳映真，後來黨外的陣營統獨劃分，《夏潮》內部也有一些分化，比如潘榮禮靠民進黨，最後連林俊義、王拓都靠到民進黨去了。後來黃信介出獄當時，以黨外來講的話，他希望由他來當介紹人，介紹我跟蘇慶黎到民進黨裡去，王拓接受了，因為那時民進黨將台獨已列入了黨綱，所以為什麼民進黨《美麗島》雜誌時期有去參加，但是到了後來只有王拓去，連蘇慶黎也不去了。

《中華雜誌》對美國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批判，以及中國主義的領導上，我們是支持的，所以胡先生也很清楚知道，我們跟他是有很大的一樣，後來《中華雜誌》胡先生年紀大了，《中華雜誌》也辦不下去了，後來我們就糾集了一些人，辦了《夏潮論壇》，以及到《五月論壇》、《勞動評論》，然後又辦了一個《遠望》，我們另外一九九一年又辦了《海峽評論》，然後包括中國統一聯盟，勞動黨、工黨的成員，跟這些人是有關聯的。

問：《中華雜誌》一直是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

王：成立統聯《中華雜誌》是有參與。

問：之前都沒有？像曾祥鐸、毛鑄倫對《夏潮》的部份都沒有參與？

王：幾乎沒有，所以整個合流要到統聯成立以後，夏聯會也沒有，夏聯會我們當時是要比較廣泛的，作者、讀者、捐款者、編者組成的《夏潮》聯誼會，所以在《夏潮》聯誼會名單裡，胡秋原都有，但不是核心成員。

問：所以夏聯會並不是個嚴密的組織。

王：所以夏聯會在後來統聯跟勞動黨組織成立後，夏聯會就式微了。

問：整個《夏潮》系統到勞動黨成立之前都沒有組織性的功能形成？

王：只有《夏潮》聯誼會，組織還是很鬆散！《夏潮》聯誼會基本上還是統一戰線，包括王義雄、林忠男都是夏聯會的執行委員，共九個執委。

問：爲什麼沒有一個先鋒隊的組織出現？

王：不大可能，當時以整個台灣戒嚴的情況來講，而且這一群人來講，由《疾風》雜誌的表露就知道，「誰是真正的敵人？」當時把我們當作台灣最大的敵人。

問：可是相對而言，到了八四年、八五年新潮流成立，新潮流有一部份是《夏潮》所培養出來的年輕人，但是，很明顯的新潮流是一個民主集中制的小團體，並且爲什麼《夏潮》就沒有辦法集中起組織來？

王：我想可能有一些主客觀的因素，以主觀因素來講，《夏潮》這些人一開始都是比較知識份子，而不是政客成分較多。所以有記者問我，台灣統派或左派要如何發展？我就講要政客化，因爲只是理想的信奉，對個人來講完全沒有任何的回饋，完全受不了的。譬如新潮流、民進黨，年輕人進來，三、五年，然後就選市議員、立法委員，他有回饋、期待的，《夏潮》這個集團來講，期待什麼？大公無私的爲人民服務！沒有期待，不能要求每個人這樣子。這我想是路線上沒有問題，沒有走政客選舉的路，譬如像陳映真、我、尉天驄、蔣勳，不可

能出來選舉，這樣一群人結合，變成一種純知識份子的結合，在這種情況之下，有它主觀的限制，而且有路線上的問題。

問：路線上是什麼問題？

王：當時有些人不願意走選舉政客化，有很多的問題就變成這樣：像是《夏潮》的人馬首先成立勞工支援委員會，結果後來整個被台獨拿去，是《夏潮》首先成立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結果是被台獨拿去，爲什麼？因爲後來能給政治上的支持，都是台獨這些，我們不願意接受台獨，在這種情況下，只好一個一個退出。現在反省起來，當時黃信介希望吸納《夏潮》的人馬進去，然後他們要組織勞工部，要交給我們，當時我們因爲他們的台獨條款，我們不願意，所以現在檢討起來，是不是有問題呢？另外一個問題，因爲《夏潮》人馬主張統一跟社會主義，所以在台灣整個客觀生態上，就很難，然後在國際宣傳上，也受到排擠，美國人不願意捧我們，能抬舉我們的是北京，北京當時是與我們隔絕的，在這種情形下，有它主客觀的因素。

問：最後，請您對七〇年代的《夏潮》雜誌作一個總的評價。

王：第一個它是一個海外，或者包括海外，可以說七〇年代初期，保釣運動後在台灣的雜誌文字化，在台灣的思想上，對於長期來禁制的，戒嚴體制所禁制的社會思想，和民族思想（反帝思想），在一個殖民帝國半殖民地下的民族思想。他們老是扣帽子說民族主義乃法西斯，就是侵略，那是要在一個成熟的資本主

義的情況下，民族主義才是具有侵略性的。那在一個殖民帝國半殖民地底下，民族主義乃是一種防禦性，這樣一種思想、反省的，開風氣，或許可以這樣說，長期戒嚴之後，台灣知識份子主動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批判及反省，《夏潮》雜誌大概就是做到了這樣子。所以那一陣子黨外都是充滿了《夏潮》的影子，黨外提出來的公共政策幾乎都是《夏潮》提供的。環境問題、原住民、台灣史、鄉土文學這些都是《夏潮》開創出來的，唯一不被民進黨接受的大概就是反帝國主義，反美、反日，對美日的批判；農民、漁民、勞工、雛妓、弱勢團體的問題，都是《夏潮》開創出來所關心的，以當時與《夏潮》並行的《美麗島》雜誌開創出的議題只有選舉投票，所以歷史是公平的話，台灣的反對運動裡《夏潮》雖然只有播種，沒有收穫，但是《夏潮》的影響還是相當大的。

訪陳映真

時間：一九九四年三月三十日

地點：台北，人間出版社

陳映真簡介：台北縣鶯歌鎮，淡江文理學院外文系畢業，一九六六年有幸獲得閱讀左翼理論書籍，思想逐漸左傾，一九六八年因「民主台灣同盟」被捕，繫獄七年；獄中認識許多五〇年代被捕的政治犯，從而再認識了台灣左翼歷史的真相；出獄後立即與蘇慶黎一起草創《夏潮》。重要著作《第一件差事》、《將軍族》、《夜行貨車》、《知識人的偏執》。鄉土文學論戰時倡導現實主義文學，不斷透過文學評論，透露出左翼思考觀點，他仍認為當時以迄現在，左翼並沒有提出一套整體台灣本土社會結構分析。一九七九年十月三日再度被捕，經過兩天兩夜才回來。一九八五年創刊《人間雜誌》，從而訓練出一批台灣左翼文化工作者；一九八八年中國統一聯盟成立，陳映真任首屆主席。徐復觀曾謂其為：「海峽兩岸第一人」。現致力於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的重建工作。

問：《夏潮》雜誌在七〇年代中期出現，在內容風格上，相當明顯的是左翼的運動刊物，在國民黨二、三十年來的戒嚴，白色恐怖統治下，《夏潮》何以能夠出

現？以你自己本身的經驗來談談《夏潮》。

陳：談到《夏潮》，鄭泰安是創辦人，蘇慶黎，張國龍與《夏潮》也有關係，我是比較晚的，七五年從綠島回來，《夏潮》好像是七六年吧，我想我能幫你的忙是自己的經驗部份，我跟《夏潮》的關係，第二方面，是我怎樣認識《夏潮》？現在回想起來認識《夏潮》是怎樣的過程。我想從第二方面來講，台灣的左翼運動，最早當然是殖民地時代，在二十世紀初頭跟其他殖民地一樣，爲了追求自身的解放，特別是共產國際成立以後，左翼是一個重要的領導核心，對於列寧的論述以及提綱，相當震動，對於當時的殖民地解放有很大的期望，在中國半殖民地時代，列寧宣布放棄帝俄時代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以後，中國對列寧的宣布簡直感激涕零，甚至連孫中山都受到相當深刻的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下，當然是影響到半殖民地的中國的解放運動，產生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二八年台灣的第一個無產階級組織，台灣共產黨成立，在一九二八年與一九三一年中間，台共對路線上有着相當的討論，在歷史上這兩年有兩個綱領，對於台灣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或者說無產階級運動的綱領，這可以說是第一波的左翼運動，當然在二〇年代三〇年代，他們當然還受日本帝國主義相當多的迫害，嚴苛的鎮壓，鎮壓一來後，所有的運動從政治鬥爭的火線及社會運動的火線退下來，投向文化的戰線，像文化協會，農民運動等等，總而言之這是第一波。

第二波是一九四六年，在二二八事件之前，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中共黨中央就已經立刻從事台灣工作，派遣蔡孝乾到台灣，蔡孝乾當時從國民黨統治的地區，從遼闊的後方，千山萬水的花掉一年的時間，才到台灣來，邊走邊接觸、找尋可合作的幹部，四六年才進來台灣，之後，就組織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爲「省工委」，這個運動到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取得非常快速的發展，現在的台獨說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是台灣人運動的起點，現實的歷史背景其實並不是這樣，當然二二八給台灣的一般資產階級很大的 Shock（震撼），感到政府爲何如此？二二八事件讓知識份子理解到除了台灣人，中國也有對國民黨不爽的，才從蔣介石的視野，移向中國，才知道中國還有一個內戰，也知道這個政府，不僅不受到台灣人的歡迎，也不受外省人的歡迎，最典型的郭琇琮，是從二二八的幻滅後，接觸到蔡孝乾後，有了重新認識。第二梯次的階級運動，從一九四九年開始肅清，那年底從基隆中學案開始點火，到五〇年上半年，整個省工委的中央就完全被破壞，中央的三個重要人物投降，蔡孝乾、陳澤生、李幼樵，除張志中外皆投降，一九五一年五月，跟全世界的共黨一樣，有一種再建的功能，會自己長尾巴一樣，中央雖被破壞，共產黨有很奇怪的生命力，就是說，只要組織不是全部被毀滅，會自動的再集結、再組織，第二次的重建，沒有一個名稱，很自然的，突然的做起來，五月又重新集結起來，又檢討、批判過去的組織路線，思想路線的方向，以及工作

的發展方針，然後又開始活動，然而不幸的是，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韓戰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派來巡防、封鎖台灣海峽，國民黨繼續生存，也才知道這個地下黨還有一些不是中央破了就沒有，還有人在。老實說第二次的集結，在經過檢討後，應該這樣說，路線上是正確的，採取又勞動又發展的政策，撇開了在城市的知識份子的工作，深入到貧窮的桃竹苗的山區，主要吸收的黨員以勞動者為主，可是畢竟沒有用，因整個局勢逆轉，地下黨到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就宣告結束，一方面國民黨採取的是恐怖的虐殺，再來就是招降，這兩者相當巧妙的運用，使得整個地下黨被完全的破壞，這可以說是台灣左翼運動的第二梯次。

第三波就是這個《夏潮》，如果離開保釣運動，《夏潮》就無法理解，保釣運動跟地下黨、日據時的共產黨，沒有關係，完全是戰後第一次，跟五〇年代以後跟冷戰意識型態體系完全相反的運動。五〇年代，經過白色恐怖，日據時代以來的反帝反封建，以及階級解放的東西，整個的被剷除得一乾二淨，剛剛談到第二梯次的挫敗，殺了四、五千人，關了八千人到一萬人，白色恐怖不只是殺了一批人恐怖而已，消滅的是一個哲學體系，怎樣看世界、怎樣看人，怎樣生活，毀滅了一整個系統的社會科學體系，毀滅了關於藝術文學的論述，毀滅了哲學的歷史唯物論的辯證歷史；一種體系、一種意識型態、一種知識，整個的剷除，包括藝術、哲學實踐的方法，整個的被剷除，這是個很大的影響，直

到你們這一代，像那一場五月學運（一九九一年五月獨台案），學生在台上的表現，對我們的生活沒有理解力，對我們的歷史、社會結構、或者是國際關係，完全沒有分析的理解基礎。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五〇年的白色恐怖在血腥的主軸上面，徹底、乾淨的摧毀了台灣在日本帝國主義下反帝反封建，直到新民主主義時期，這一整套好不容易才累積起來的左翼的激進的主軸，完全破壞得一絲不剩，可以這麼說。

在此基礎上，五〇年代開始來了美國的那一套東西，大學生開始讀英文的教科書，什麼民主、自由、人權，現代主義啦，這些有空無損（台語）的東西，這種情況在很多的第三世界都一樣。可是不同的是，第三世界他們過去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來所遺留下來的球根，多多少少都存在，像韓國，韓國的學生會那麼猛，實在是因為地下的力量還存在，所以他們可以透過文學的論爭，學生運動，會化妝出現，出來以後總是比較有深度，有歷史觀點，有 global 地球的觀點，銜接著過去民族的解放，再翻轉過來。從五〇年代以後，校園裡較進步的像殷海光等，一直都是反共的、親美、親日，只有在對國民黨的態度上有所不同，國民黨是親美、親日、反共、反中國、擁蔣，那自由派是反蔣，其他與國民黨一樣，對美國的態度，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態度，對中共革命的態度都是一樣的。兩者只有擁蔣與反蔣的差別。這種在冷戰構造下，如果你自己沒有球根的力量，從世界史觀來說，殖民地、半殖民地戰後的 option，選擇，重

要的選項就是社會主義，像拯救自己的祖國、發展經濟，希望從用自己的方式割斷資本主義；所以這個選項，只有在冷戰結構底下的台灣，從開始先天就被排除，這個 option 完全被排除在外，社會主義不僅是一種立國的力量，而且是一種知識，一種思想體系。別的国家雖然也被排除，可是因為他們內部仍留有球根，仍有從二〇或三〇、四〇年代存留的這種力量，不管是文學界、音樂、戲劇，政治、社會或階級運動，都有存留下來一些人，有待無死的人留下來，台灣沒有。

所以你問到《夏潮》，提出非常好的問題，為什麼七十年代《夏潮》好像一個從半天空掉下來的，為什麼？你有理由這樣問，因為沒有人存留下來嘛！這個問題如果放到韓國，就不對了，韓國的左翼雖然被殺、被抓、被關，但是那些聲音仍聽得到，彌彌擠擠（台語）的仍有小道消息在流傳，然而我們都沒有。現在就要談到，為什麼會有《夏潮》。從結論來說的話，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戰後世界史影響很大，當然文化大革命有明亮的一面，也有陰暗的一面。它明亮的一面，是要求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勤勞、勞動的人應該受到保障，得到好的教育，這些都是影響得非常的深遠，包括日本的學潮，歐洲的學潮，美國的反越戰運動等都是，事實上美國的反越戰，是美國帝國主義侵略越南的戰爭，跟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兩者一齊震撼著美國，越戰說明毛主席對越戰的論述是相當正確的，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在五〇年代以後成長的、港台兩

地成長的知識份子影響很大，因為留學美國。當時因為越戰的關係，美國已經採取一種外交政策，叫聯中反俄，所以其媒體內容大量的播放各種新中國的 image，像周總理、毛主席等。遙遠的共產主義惡魔，忽然變成新生事物在美國媒體出現，這個對港台，尤其是華人的震動相當大。

據他們的回憶，當他們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共產黨的時候，不是好奇心，嚇了一大跳，趕快把電視關掉，後來想想為什麼這麼好笑。這個的背景是，美國的學界，重新思考到的，對卡斯基的重新評價，對胡志明、毛澤東的重新評價，對美國的重新評價，產生了反越戰運動，黑人民權運動，文化上有 John Baes 的民歌，這運動不斷升高後，以 U.C. Berkeley 為中心的言論自由運動，以及自由教育，學生自己管理學生等，這顯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對港台的學生而言，初則恐懼，繼則驚訝，三則慚愧，白種人那樣的高度評價中國，這是六〇年末代期，我的一些朋友回憶，他們就開始讀書，搞讀書會，從美國的大學圖書館借很多的三〇年代的書，或毛澤東的著作，他們到這個時期才敢去借這些書，他們大概是六六年開始。保釣運動只不過是個觸媒。保釣只是個單純的導火線，由於六〇年代末期的情況，所以產生了左右分裂，釣運就進入認同運動，認同後就進入統一運動，然後四人幫垮掉。當時因為這樣，港台的留學生，第一次接觸左翼思潮，有些放棄了學位，專心搞運動，港台的一些學生就用印刷 machine，可以民間的力量，不用排版，可以大量的將你的宣

言reproduce，不僅在全美各地訊息的網絡流傳，以很少的價錢複製很多的文件，他們用雪片的戰略，不斷的把文件寄給學弟学妹、親人，當然國民黨會截下來，但總有漏網之魚吧，這種知識，消息是這樣進來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僑生，僑生在戒嚴時期一直是警備總部相當頭痛的，因為他們僑居海外，較有那種被壓迫的，較有反省力，對著中國抱有強大的感情。且僑生在取得文件資料上相當快，但是台灣的學生就要慢半拍了。

應該說吧，《夏潮》跟整個的保釣運動是有很大的關係，《夏潮》在還沒改變面貌以前第一期到第三期，辦得像*Readers Digest* 那樣的刊物，後來是因為保釣運動，改變了形式的內容。《夏潮》的運動直接的是跟保釣有關，那麼它的背後是文革的影響。

問：而這樣子的保釣與《夏潮》連不起來，在《夏潮》裡的作者群多數沒有出國，及非直接受到美國左翼的洗禮，沒有一個直接的線索可以將保釣的成果與《夏潮》的群體聯繫起來，我們可以承認保釣影響的背景，然而《夏潮》那些人的出現與保釣並沒有清楚的聯繫。譬如，你自己本身就不是因為保釣的關係。

陳：我的歷程，其實說我們也必須實事求是，我不是天縱英明，一個人的一生中當然有一些chance，如果這些chance 再重新組織，我可能變成一個台獨，也可能變成一個搞企業的，很難說，我就是因為坐牢的歷程，還有一位日本友人，從他那邊得到一些資料，像我這樣的歷程，是一種偶然，不能看做是一般化。

還有一個是蘇慶黎，她的父親是蘇新，從小就被特務監視，上幼稚園特務常常在路上拐她，就被問，你家有哪些人來往啊等等，是在這樣的一種恐怖情況長大的，這種經驗到了台大哲學系，保釣的時候，很容易就激發出來。唐文標倒是從美國回來的。回想起來，必須說明的是，一方面在冷戰的結構下，冷戰的意識型態底下，《夏潮》有點是異軍突起，可是也必須承認我們當時是比較幼稚，當然我們提出帝國主義、階級、民族啦這些問題，可是現在看這些文章，比起海外保釣的刊物，還是比較機械、庸俗的。

問：那麼《夏潮》的人如何集結起來的？為什麼剛好會有這樣的一群人聯繫在一起？

陳：我自己就不要講了，唐文標雖然我沒有跟他細談過，可以瞭解他在海外接觸的比較多。像王曉波，當時政大的東亞研究所，很多禁書、匪書被反面的利用，會偷偷的拿出來影印，或是你所說的海外的朋友寄一些資料回來。王杏慶，王津平是海外回來的。唐文標的第一任太太是情治系統的，唐文標對蘇慶黎倒是相當的幫助。我想你問的問題是很合理的，就像是火把吧，點是點燃了，不過點燃的環境不好，或者是空氣太稀薄了，條件不夠下，形成這樣的情況，所以為什麼到八〇年代，《夏潮》的影響就沒這麼的大。我的看法是，《夏潮》的運動呢，有一個工作沒有做。在第一波左翼運動裡，對於台灣是怎麼樣的一個社會，是屬於哪一個階級的，是怎樣的物質的循環在支配整個社會，比如他

們認為上面有日本帝國主義，下面有最反動的大地主階級，互為表裡。所以一九二八年與一九三三年的綱領，雖然不是長篇大論，且是將列寧的分析套用下來，這是很重要的，這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左派團體一定要作的功課，因為他自認為他對於社會有一種科學的 approach，對於社會關係，社會性質，階級關係，誰是主要敵人？誰是次要敵人？誰是同盟者？目前是什麼性質的社會？規定現在是什麼樣的性質的革命，明明現在是半封建的社會，怎麼可以搞社會主義革命，一定要搞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不過因為這個社會的資產階級的薄弱無能，所以由工人階級來越俎代庖，可是他所執行的革命的性質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然後才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不管你信不信，一定要這樣做。台灣的左派，台共的時候有這樣做，可是必須指出當時的日共也好、中共也好，他們也才生下來不久，所以理論也許不是那麼的強，因為當時共產國際的威望太高，差不多大家都照套共產國際的東西，這是它的缺點，不過沒有關係，有就好。第二波，當然中國共產黨有一套相當完整的，不管是新民主主義，或是聯合政府啦等，在台灣來說，很簡單，就是解放嘛，迎接解放，迎接共軍渡江，所以那時台灣的黨員，實踐比理論還要重要，就沒有對台灣的社會進行特別的分析，這方面的理論差不多是空白的，這可理解，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部份嘛，解放全中國，解放全世界，所以當時台灣的黨員就照辦中國黨的那套東西，可是他沒有特別注意到台灣內部，因為當時的眼光，認為馬上就要解

放，問題不在理論。

回到第三波的主題上，由於環境條件更壞，理論水平更加的粗糙，沒有注意到中國分成兩個，台灣起到什麼樣的變化，一直到今天，這個問題懸而未決，這個才是一個深刻的問題。為什麼台灣學運搞不開，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這條船要開到那裡，我們的社會是什麼？基本的矛盾是什麼？誰是統治者，誰是被統治者？社會的動力在什麼地方？一直到今天，究竟為什麼《夏潮》的運動，以及後來會在文化運動開花一樣，在鄉土文學論戰裡，《夏潮》系統點燃了這個論戰，發展了這個論戰，即使在理論上也沒有好好的解決這個問題，我一直想要解決的，當前的台灣是個什麼樣的社會？

問：那麼當初您引進第三世界的理論，以及所謂依賴理論進來台灣，您認為那些是無法解釋台灣的嗎？

陳：其實那很簡單，就是認為台灣也是第三世界的一部份，可是沒有細緻的討論到台灣的社會的分析。

問：所以你談的，應該是一個運動的綱領？

陳：對，也就是綱領的背後的根據，對社會的分析。

問：當時《夏潮》的人如何加入？

陳：七〇年代產生的風潮，當時省工委被破壞之後是在極度的恐怖下，所以你問到為什麼沒有組織形態，其實是跟政治的嚴苛性有密切的關係，因為雖然大的肅

清運動，到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整個已經把省工委破壞了，可是一直到七〇年代、八〇年代中期以前，還是以莫虛有的方式，大量的戴上紅帽子，像余登發案子，中泰賓館事件，都把事件描繪成共產主義的恐怖仍在台灣潛伏，甚至對台獨的官方說法，就說成是共黨的外圍組織。七〇年代的思想運動，主要是重新認識美國的思想體系所否定的國家：中國、古巴、越南，特別在台灣是重新認識中國，特別是一九四九年的中國革命，這提到很關鍵的一種種族內涵，比如陳鼓應爲什麼被捕呢？就是海外留學生送他一卷數學家陳省身的錄音帶，當時有很多的著名的學者，跑到大陸去參觀訪問，回來後就講中國各種各樣的事情，講文化大革命，而且我們要瞭解全世界的左翼對中國的文革的評價是如何的高，文化大革命的成就，被認爲是公社式的國家成立，跟一般的state不一樣，在建立一個state的革命中，都會說前面的state是如何的壞，新生的國家是如何的好，建立政權後，也會繼續說黨中央政權會如何的好，可是只有中國共產黨告訴人民說要造反，國家是會腐敗的，黨幹部是會腐敗的，這種不斷革命論取得非常高的評價，我還沒坐牢前也受到這種評價的影響。我閱讀日本左派的書籍，對文革的中國謳歌得不得了，當時像沙特，還拿個紅小書，在巴黎街頭散發毛語錄，當時世界上的左派在資本主義體系下，已經處於絕望的狀態了，根本撼搖不動的情況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給全世界的左派很大的影響，在這個影響下，當然六〇年代末期，七〇年代初期的學生運動，毛澤東佔

了一個很重要的意義，毛澤東主義又延續到美國對越南的侵略，這種組合在理論跟思想上，很深刻的，當時中國喊的是革命外交，聯合黑種人、第三世界被壓迫的人反對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現代人恐怕很難想像當時的情況。

這種思潮在台灣引起很大的迴響，本來在這以前，對國民黨的反抗是照美國所要求的方式來改革的，可是基本上是反共、反對中國大陸，跟美國聯盟，是右翼的自由主義思想，一直到今天這種右翼的自由主義思想仍起了相當主導的作用，包括台獨也是一樣，堅持要在世界體系裡，堅持要反對共產主義，反對中國大陸，跟美國同盟，是這樣的情況。那麼保釣的左翼是真的全新的認識中國，保釣運動除了爭主權的時候國民黨的態度跟北京不一樣，國民黨說我們背後有共匪，美國、日本才是台灣的盟邦，不能破壞國民黨的聯盟，否則就是共產黨，另外北京的態度，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那套東西又出來了，有一批年輕人就傾向北京，開始思考一個問題，爲什麼我們都沒有注意到北京，它是誰？是什麼？就引起一個很熱烈的學習運動，讀書會、毛語錄、毛著啦變成很風行，然後就產生認同運動（identity），我是中國人，可是是哪一邊的人，是台灣或大陸？開始站邊運動，所以保釣運動就在兩岸民族、左右分裂情況下，問題就提到枱面來了，這是認同運動，認同運動就在文革高分貝的政治運動裡面，立刻跳入統一運動，是七一、七二年的事情，這是海外學生先叫起來的。一直到文革七六年結束，四人幫、林彪事件暴露後，跟全世界一樣，開始幻滅。日

本的左派就開始頭低下來，不曉得如何的革命，從那以後，保釣運動整個的掉下去，是這麼地一個原因。回到歷史的架構裡，倒也不是統或獨，一九五〇年以後，完全因為冷戰結構被排除對社會主義的選擇，台灣、香港地區的知識份子重新要開始突破冷戰的框架，由於民族、地緣的關係，特別是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且當時中國在世界的左翼運動裡，聲望又是非常的高，美共、日共、德共、法共都死了，所以才有新左派；新左派是對六〇、七〇年代狂飆運動的反思運動；在那樣的空氣底下，中國港、澳的留學生選擇中國為左翼的中心，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問：從現在來看，如何看待《夏潮》的定位位置？

陳：我個人的看法是，第三波僅僅是停留在思想期的運動，它的形成是有斷層的，像韓國在日據時代的左翼運動相當強，它的民族壓迫感也很強，一九四五年以後，雖然在麥克阿瑟佔領下被抓得很厲害，可是畢竟在土壤上連接北韓，空間也比較大，這種肅清運動不可能徹底，他們一直都有一種沒有斷過的傳承，用偽裝、用隱藏的方式，一有機會就在學生運動或者各種的爭論出現。台灣就沒有，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四年為止，整個台灣重要的左翼傳統被徹底的清掃，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在冷戰結構下一直被認為是惡魔的理論，在這樣的情況下，過來的完全是西方的東西，存在主義、自由主義等。我特別要指出這一點，第三波不是自發性的，就是《夏潮》這運動也是從美國輸入的，它是港台

留學生在美國那個環境，而不是在台灣的土壤，在美國受到改變，然後再回到台灣，是從外面打進來的，先天上就有它的缺陷。不管怎樣，我個人認為《夏潮》不能離開保釣運動來思考，它是保釣運動的一部份。

它是台灣歷史上第三波左翼運動，恰恰是透過美國這樣進來的，台灣才有機會脫離冷戰的思維，去看世界、生活、人，可惜的是，它有幾個缺點。第一個它沒有台灣社會內部的基礎，它是從外面轉了一圈回來，還是知識圈裡的一種運動，保釣的主要戰場在北美洲，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是北美洲留學生的風波，這當然受到冷戰格局的影響，因此在理論上跟第二波一樣，對認識台灣理論工作上完全付之闕如，這就是為什麼到八〇年代另外一種論述就取而代之，因為對於一九五〇年以後，一直到今天，台灣的左翼還沒有能力清算五十年以後所積留下來的問題，重新思考看待。比如說蔣介石的國家是什麼性質的，他是不是那麼簡單說外來政權欺負台灣人，一直到今天李登輝本土官商資產階級國家成立以後，我們的理論界也完全沒有力量來解釋，民進黨有點糊塗，可是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像這個問題，如果社會裡頭有左翼，我想重要的標誌之一，不是說成立什麼組織，而是有沒有真正的左翼思考，對台灣社會局勢的認識，對兩岸關係之間的認識，保釣運動在這方面就有缺陷；第一個它主要的運動母體在北美洲大陸，為什麼不在台灣，當然有很多複雜的原因，其中一個是反共的恐怖，但這不能過關，共產主義無產階級運動什麼時期沒有碰過白色

鎮壓，共產黨在陰森恐怖的白色地區裡，仍然頑強地結合人民而發展，不能用這樣來做藉口，當然因為長期封禁的政策，理論資料的缺乏，素養也不夠，而且現在重新檢視，當時的文章，連海外保釣運動的水平都不夠，顯得比較機械化跟庸俗主義。有一點必須說的是，它在啓蒙方面不可否認地，一直到今天還有碰到說「我是看《夏潮》長大的」，現在這些最年輕的四十幾歲了，雖然它的東西不是很深刻，它起了一種啓蒙的運動，比方說，怎樣看世界、階級的觀點，對中國的看法，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看法，台灣這個第三世界，一直到七〇年保釣才知道美國是個帝國主義這樣的觀念，可是在菲律賓、泰國，在亞拉非地區，而二次大戰後，就是美國佬滾回去，這樣一個學術風氣環境直到越戰爆發，在社會科學上都沒有人批評過越戰，只有我和黃春明用小說的形式批評它。一直到今天，有句話叫「戰後清算」，怎麼從二次戰後的冷戰結構，從學問的、知識的觀點去釐清，一直服從美國的政策，或者社會科學的派別是零星的，僅有局部的研究，而完全沒有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像這種哲學、文學、藝術、社會科學總的反省，來尋求上接日據時代以來，比較 *home* 的工作，一直到今天都沒有人做，這是為什麼我這個搞文學的人，最近辛苦的找了幾本書，有關政治經濟的書來翻譯，這本不關我的事，可是我覺得沒弄就走出去，就是些幼稚的話搬來搬去，老實說，嚴格的意義上，台灣沒有左派，一直到有一個台灣資本主義論、台灣社會性質論，比方像韓國，一九八〇年光州事件以

後，韓國左翼的發展非常深刻，因為他們堅持用韓文寫作，不翻譯，所以韓國社會構造論爭非常豐碩，而且韓國的社會性質論，比起前期的中國社會史論戰、日本資本主義論戰，還有更大的 *dimension*，是因為它的時間的優勢，到八〇年才開始，所以世界體系論它可以用，*dependent theory* 也可以用，所以它不會像五〇年代、四〇、三〇年代世界其他地區的左翼的社會性質論，只能用古老的、古典的、第三國際那套東西來分析而已，所以它的成就就很大，每個研究生、學生理論水準非常高。美國的學生運動六〇年代末期已經有小小理論家出現，他分析美國、分析世界，後來學運浪潮，這個人就是馬庫色，重新拿博士學位，現變成新左派的重鎮，台灣沒有嘛，我覺得這不能怪學生，是台灣整個知識界太美國，那麼多的 *P.H.D* 沒有一個老師告訴我們台灣的政經發展史，你從右派觀點沒關係，從韋伯的觀點也沒關係，你說一套來嘛！所以我希望我們出這一系列的書，能夠開始比較科學的來反省。總的說起來我覺得他有思想上的意義，台灣因為跟中國大陸的分離，所以很多東西沒有繼承過來，科學、玄學的論爭，東、西文化的論爭，這其實在三〇年代以前中國都已經解決過了，可是因為這種分隔的狀態，台灣有以比較淺的深度，小規模的，一定要 *redo* 一次就是。現在這個還沒解決，就是台灣社會論的問題。

問：就我的觀察，《夏潮》是個集團，這些知識份子是如何集結起來？

陳：很自然的，我現在回想起來，的確也沒有一個組織形態，組織的生活，僅僅只不

過是以文會友吧！人就靠過來，介紹過來，比方，《夏潮》的編務基本上都落在蘇慶黎身上，她常常會帶著資料找我們，向唐文標、王曉波討論，那我們會常常開會討論下期要做什麼，留學生有時會神神秘秘地回來跟我們聯絡，捐一點錢，基本上是同聲相求吧？走在一起，沒有什麼組織形態，基本上主要的生括是以《夏潮》的編務和發行爲核心在活動，像座談會，開編輯會議，寫文章，投稿、跑印刷廠等。

問：外圍的人士如何的吸引過來的？

陳：我們有辦一些活動，像搞校園民歌，我們徵求很多歌詞，就很多人填詞寄來，我們就舉行演唱會，然後是讀者會寫信來，會來雜誌社看一看，有些人是非常安靜的觀賞者，不曉得他站在哪裡，可是他每次都會看你的雜誌，類似我辦《人間》的時候，會走過來說：我年輕時看過你的雜誌，我那時才讀國中。

問：陳鼓應寫過一篇有關《夏潮》的文章，登載香港《中報月刊》，他談到人的部份，將《夏潮》的人分爲三個等級，老、中、青三個等級，認爲《夏潮》是有歷史的傳承，所以在每一階段都有人，這個跟我們剛剛談的不一樣，他這樣的分析法，很簡單的將《夏潮》這一批人看成是一個相對於黨外的集團，在當時具一定的影響力，這樣就變成你們在策畫，結果所呈現的讀者群與作者群之間，未必互相瞭解呈現出來的意義？

陳：他的講法蠻有趣的，事實上我的看法和他不同，像胡秋原，可以說是一個非常

聰明、天才型的，二十歲就跟中共當局發生爭論了，而且從時間的座標看起來，胡秋原當時的理論是左翼的，因他懂日文，後來因爲各種因素，被監錮，他在國民黨的位置是極爲邊陲的，可是我跟你講，一個人年輕時代走過左派，用句粗話來說，「狗改不了吃屎」，他對《夏潮》這些人，特別是來台以後，據他自己講，即使在大陸的軍閥政權時代，也沒有像當時這麼無恥媚外，知識份子講那種洋話的，真的很少，所以他心裡也很痛苦，他對《夏潮》這些人基本上有一種同情。我當時注意他很久了，從他的文章的反面去看東西，比如：我是想從他的資料裡面去瞭解中國三〇年代的思想，可是我從來沒跟他接觸過，可能每一期只看一篇文章。鄉土文學論戰發生以後，國民黨的確也是要整肅的，他是參加過三〇年代文學論爭的，工農兵文學相當的熟，王曉波去找他時，第一步他就叫人找我的書看，這個老先覺，一聞就知道裡面有什麼了，看完以後，第二步，就要人家帶我去見他，看了以後，第三步他就開始寫文章了。我當時在四面楚歌當中，牢剛出來，實際上我後來知道，他有中國古代知識份子的骨氣，只要他有能力，他願意用衣袖來遮蓋落難的人。所以他覺得《夏潮》這邊，第一個民族主義，第二個，在台灣這個徹底洋化的地方，你們這一點點左傾的思想也不爲過，如果你這是中共的第五縱隊，他可能就有不同的想法，他覺得左傾是可以理解的，在台灣這種極端媚外、資本主義色彩濃厚的地方，青年人有一點左的色彩，他老人家可能暗喜。我覺得不能把他歸爲

《夏潮》的人，因他是另一個源頭，像嚴靈峰過去也是，這都是前共產黨的，當然他對這邊有一定的同情，這個同情來自於他過去的信仰，對一個前左派來說，他對於台灣當時五〇年代以來極端反動的白色恐怖，也極為不滿，對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給予鼓勵與支持，這個支持不是來自於你搞得不好，而是說你要搞就支持你，那時這是不容易的，那時誰要給你站邊呢？特別是知道當局在注意時，他在情治系統有一定的地位，王昇對他是以師禮待之的，當時余光中在香港寫了一個小報告，把我的文章跟大陸新左派的比較，寄給胡秋原、鄭學稼就把余光中臭罵一頓，這是哪一門子的比較法！所以鄭學稼、胡秋原、嚴靈峰，這些人基本上對《夏潮》是同情的。可是他也沒跟我們參加編輯會議，他支持、同情、理解《夏潮》，我想這是事實，可是要我分類的話，我就不會把他放在《夏潮》的源流裡。當時鄉土文學是要抓人的，我想最後沒有抓人，他們的功勞不可沒，他們不斷的告訴國民黨不可以抓人，「像黃春明這樣的作家，頒獎的來不及了，還要抓人？」國民黨最後也改口說：我們支持鄉土文學，對於少數別有居心的要防範……。要不然當時的國軍文藝會議，大規模的聲討我們。

問：對其他作者而言您如何的分類？

陳：我沒有想到如何分類他們，不過你這問題提醒我一個問題，《夏潮》的確沒有一個明確的綱領，理由是我們沒有台灣社會分析論。講一個例子，中共提出一

套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主要來自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的分析，其分析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太少而不是太多，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那這個社會需要的言論不是社會主義的言論，而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democratic revolution，中國的資產階級太薄弱了，數量少，而且品質也不是很健康，為什麼，因為他是半殖民地社會所以這革命就落在以中國工人階級為核心，聯繫中國農民，這樣一個力量來代替資產階級，進行一場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一場革命跟歐洲不一樣，它是新民主革命，它就有這種綱領，他就知道誰是主要敵人，誰是社會變革中的主體力量，誰是同志，這都出來了。《夏潮》沒有，只不過嚮往社會主義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罵罵帝國主義，第三世界國家政府應為人民服務，文學、藝術應該說出人民的心聲，認識中國共產黨，就這些，迷迷糊糊的。比如說陳忠信是過去《夏潮》很重要的成員，他是王杏慶和唐文標一手帶出來，他以前也是自由主義者，後來又到民進黨裡去，像林瑞明現在也是台灣的想法非常明確，所以沒有一個綱領，《夏潮》當時取得了一種相對進步性的位置，所以吸引了不少年輕人，關於文學、藝術、世界局勢、中國觀點等，可是它沒有一個非常統一的思想，沒有共同的綱領，所以隨著時局的變化失散。

問：從社會運動的角度而言，必須尋求內部人員之間的關係，人的關係會在內部起著不同的作用，而且在《夏潮》結束後，各自在不同的崗位上起著不同的作

用。

陳：比如說後來的美麗島，陳忠信進入《美麗島》，因為他現在的地位，所以我現在這樣講會很不好，不是很有根據，他進入《美麗島》的編務，就我有限範圍所知，是一種戰略的部署，希望能夠影響或者掌握整個刊物，所以《美麗島》刊物與以前的黨外刊物有一點不同，把《夏潮》的 content，像對世界的看法，以前只有《夏潮》一家，後來就有一部份帶入《美麗島》，個別的文章帶進去，基本上帶來一定的緊張，比方他們比較保守的系統下，名字就不要講了，就很有意思，蘇慶黎跟他們編輯內部很熟，左派這些人有些特點，就是思想比較活潑，文筆比較好，反應比較快，他們又需要這樣的人，可是呢就好像一切左右鬥爭一樣，標籤非常鮮明，這以前是左派，這以前是《夏潮》，所以當時他起到緊張的作用。你當時已不是獨自一家了，可是你沒在群眾運動裡面。比方王拓、蘇慶黎、陳鼓應，他們是有決心透過群眾運動、選舉，為《夏潮》爭一席之地，像陳鼓應的選舉後來情勢出乎意料的好，後因中美斷交，不然選舉就走上去了。那王拓也參加《美麗島》的群眾大會，當時一直叫我下去，我當時是比較敏感的，我覺得去一定會遭殃。總而言之，《夏潮》想要參與地方選舉運動，後來因為種種因素失敗，這失敗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台灣的外交局勢關係，第二個是《夏潮》內部有一定的反對意見，相當的反對，所以說，主要的原因也就是這麼一個鬆散的組織。

問：在當時就社會運動而言，要跨步到政治運動的過程，應該會經過相當的討論，因為以階級運動來講要推翻的是資產階級代議式的民主，然而王拓與陳鼓應卻又跳入選舉裡面，這中間的決定過程有沒有經過辯論？

陳：我們說固然在五〇年代肅清裡槍斃了很多人，整個左翼的系統受到全面的打壓，可是我們更要注意到有好幾千個是新出獄的，帶過紅帽子進去的，判了十五年、三年才出獄的我們很有理由問：為什麼這些人並沒有起到很大的影響。他們被抓的時候如果是二十出頭歲，二十年以後是四十歲，從這裡可以看到重要的訊息，第一個，這些人等於深受大恐怖的影響，每個早上四點就有人被牽出去槍斃，然後彼此看到家庭怎樣的崩潰。第二個來說，回到社會以後也受到非常嚴密的監視，每個禮拜有人來查戶口，也規定什麼時候要去報告。所以就像一切的運動在大鎮壓、大恐怖以後的錯誤，變得非常右傾機會主義，世代主義非常強。他們會想，幹！沒死就很好了，出來還要養老婆小孩，作啥警察就要來趕。我講這些的理由是什麼？本來應該左翼是台灣最強大的政治傳統，反抗國民黨政治傳統，為什麼表面上的反對運動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黨外。這裡面有幾個原因，比較優秀、有領導能力、理論能力的通通死光光了，年輕的像郭秀琮這種人絕對沒有活路，活下來的（我現在這樣講沒有什麼不對）都是比較冤枉的，有些是不小心被抓的，有些是工農民衆，這也是個原因。再下來就是說，大整肅以後長期的失敗主義，一種保守主義，在組織、在鬥爭上面極端

保守，保守太多了，美其名曰慎重，因為這跟白色恐怖前，黨的錯誤組織有關。那時組織方針與中共一樣，非常嚴密、非常謹慎，甚至主張不要跟過去已經在日據時代出頭的左派人物聯繫，可是後來看到情勢這麼好，所以跟台共這些人有聯繫，一聯繫就很容易被抓。所以當時又過分大膽，我在苗栗探訪時，聽他們講，根本就是在客廳開組織會議，連警察到門口了說「喂！你沒看到警察來了還不敢快散掉，下次就要抓了。」整個情勢就要渡江嘛，所以甚至警察跟你通風報信，甚至於來跟你商量，說以後你要怎樣怎樣，那個組織路線的錯誤帶來沈重的打擊，也影響到這些出獄的人，因為他們牢裡會討論這個問題，過度地又陷入另外一個錯誤，整個黨外運動都是遠遠地看，只在私下品頭論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問：我的問題是跟政治運動有關係。

陳：所以，戰後整個反國民黨的政治運動，左派完全缺席，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那麼缺席的安慰就是我們左派不是像右派那樣的急躁，私下會很隱密的討論行事，比如說某人的傾向不壞，就給他支持，可是你叫他亮出來，他絕對不會，這是很複雜很複雜的歷史結果，不能完全說「幹！沒膽。」包括說他們在牢裡，一知半解的對組織路線的檢討，以及他們親身經歷的受到非常非常殘酷的打擊，都是親眼目睹那麼優秀的人，一個一個牽出去。相反來說，那黨外運動就有點初生之犢不畏虎，郭國基、李萬居啦，跟國民黨車拚，就是沒有被國

民黨整編的仕紳階級的反抗，一直要到第二梯次的黨外運動。在整個歷程中是缺席的，只是有個人、以個別的力量，注意那個候選人有好的傾向，便支持一下而已。所以說五〇年代那一批人在戰後台灣比較右傾的民主運動裡，一直都沒有參與。一直到第三波，陳鼓應跟張俊宏、康寧祥都很熱，這些同輩之間都很熱，後來思想不一樣，雖不一樣還是朋友！到後來像王拓這種在政治上企圖比較強的人，就想躍入政治部門。你問說我們有沒有討論，這裡有幾個問題，第一就是說，因為沒有組織生活，沒有非常清楚的綱領，大概就是一種默許，有一種共識，這樣的狀態下去搞政治，我們也不能夠提供人，也不能夠提供金錢，靠的是他們原先的知名度與人脈，連我的生態都跟他們不一樣，我以前跟黨外較沒有交情，他們有，比方說陳菊跟蘇慶黎很熟，蘇慶黎跟張俊宏很熟，王拓、陳鼓應也是一樣，那他們之間就有一個生態網絡，像我呢就沒有興趣，連陳鼓應的選舉我都很少去，我只是幫他寫大字報。我覺得你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一直到今天，我覺得左翼運動不能只是看到沒有當上立法委員就沒有效，這個道理大家都懂，可是不能只看到這樣，你就要跟人家爭著選，我是一直覺得左派應該從群眾或者從階級裡面去開展，開展到一定程度，它也無不必然一定要選，你有一定的強固、廣泛的群眾支持的話，你可以用這些群眾跟比較進步的政治家交換，那麼組織還是要保持一定的戰鬥力。韓國的學生運動、反對運動就是這樣，他們對參加議會的鬥爭不是那麼機械的排斥，而是知道不

會輕易的參加，話說到源頭就是，從認識社會開始來決定你要不要透過議會鬥爭的道路，還是要透過群眾的道路！這些我們都沒有！所以當時據我所知道的範圍裡面就是「好！就你們三個去弄看看」這樣而已，也沒有組織的綱領、策略，都沒有，那都沒錢，你就自己想辦法啊，陳鼓應就到處去拼命演講，好多錢就丟到台上來。

問：所以基本上，《夏潮》除了選舉外，沒有其他的群眾運動。

陳：沒有，真的沒有。

問：陳鼓應自己本身是如何轉變的？

陳：基本上，他是個自由主義者，即便是到今天，他也不會受到社會主義的思維影響。他在台灣的時候曾經對左派的方法論很有興趣，比方說社會主義的觀點，唯物哲學的觀點，偷偷的看這些書，用那些書寫文章，可以明確的說他是一個liberty，他主要的自由主義是跟著殷海光，由於受到國民黨的打壓，所以他的工作都受到影響，那這個人的反抗性很強，他的同儕經過保釣運動，使他受到非常大的震撼，以前的自由派是自由中國，相反地經過擴大化以後的文章，海外關於文革的資訊使他非常震驚，國民黨是他最大的敵人，那他又受到國民黨的壓迫，這是一個。那第二個就是他們夫妻倆，有一個很好的品質，就是對於受到政治壓迫的人非常關心，常常接濟他們，探訪他們，那時候沒有人敢接近的，那時候張俊宏最倒楣時候，我在牢裡的時候，就有人來探訪張俊宏，我說

這個政治犯是誰啊！誰會來探望他啊！原來就是陳鼓應，他這點我很尊敬他。從自由主義變成對中共的同情，還有一份就是他的愛國主義，他對中國愛國主義的感情。

問：王曉波對他們去選舉的看法？

陳：王曉波是支持的，他受法家的影響比較大，這不用避諱啦，他自己覺得他很靈活，有縫就插，有洞就鑽，找他助講的話他都會肯，他的態度就是這樣。而我就不一樣，像王津平跟我這麼要好，幾年前，他出來競選，我都懶得去，這也是我的缺點。

問：剛剛你談到陳忠信進入《美麗島》，是有一個策略性的，企圖去擴散左翼的思想，但問題就是說，《美麗島》出現時，《夏潮》停刊，《夏潮》停刊後為什麼沒有緊接著再度出刊？當時也興起很多的黨外雜誌，而黨外雜誌都是一波接一波，為什麼《夏潮》被禁掉之後，一直要到八〇年代初期才又起來？

陳：這是很簡單，《夏潮》在鄉土文學論戰時，不但賣得很好，而且暢銷，基本上是錢的問題，那後來運動的主軸轉到黨外的聲音，loos 越來越亮的時候，我們這個雜誌就很缺乏運動性，因為我們自己沒有自己的群眾，自己在整個戰場上沒有參與，當然我們也做些推波助瀾的工作，實際上銷路就受到相當大的影響。剛剛說到陳忠信的事，我必須很負責的說，這是我的理解，這樣的說法出來，對陳忠信很不好，我只知道當時唐文標、南方朔、陳忠信這三個人非常親

密的三角聯盟，他們大概整個支援到裡面去了，而且我被捕以後的事件，沒有陳忠信，他們本是不打算處理的，當時比較右翼的就反對，那陳忠信說，這不是左右問題，這是人權問題，黃信介說他講得很對，我這篇文章對我幫助很大，我當時覺得雖然我被放出來，所以我當時做了兩件事，一個就是把我這篇文章登出去，把我整個被捕的情況講出來，第二個就是我寫的小說「雲」，爲什麼我寫「雲」，我希望能做到對國民黨的破壞，那時實在很幹，所以這是個事實，到底有沒有這樣的策略，我必須負責的說：沒有。不過，無可諱言就是說影響陳忠信很大的唐文標跟南方朔跟他在一起在《美麗島》內，要出很大的力氣，工作必須要認真，他們在《美麗島》內地位不穩，所以必須以非常賣力的工作，取得黃信介的信任。停刊總地說起來就是沒有錢。

問：就時間順序而言當時就只有《美麗島》？

陳：還有《鼓聲》、《春風》，不過都是因爲沒有錢就停了，《夏潮》賣得最好是賣一萬多本。《美麗島》是個高潮，美麗島把台灣的反對運動都統合起來了，而且當時國民黨的壓力很強，它是在壓力下硬生出來的，可以說是《自由中國》以後，最受到全社會矚目的雜誌。

問：《夏潮》挑起了幾場的運動風潮，鄉土文學論戰、民歌運動，先談鄉土文學好了，比如我看鄉土文學論戰，我會覺得它跟文學沒有什麼關係。

陳：本來就是，你的看法非常準確。

問：如果他是個運動的話，那麼整個的思想形塑過程是怎樣的？

陳：我想如果要引起注意的話，不妨去查二〇年代、三〇年代或在中國、或在台灣，文藝理論的爭論，一直是左派運動極爲重要的戰場。這是很奇怪，比如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或大陸文學的論爭，第三種文學啦、第三種人啦，這些其實日本也是一樣，以及在台灣四七年到四九年在《新生報》副刊所進行的新現實主義文學論爭。講得非常對，是左翼的陣營裡面，常常透過文學的論爭來發展它的思想，幾乎沒有例外，因爲左翼文學理論有一個重要的東西，就是會問：文學是什麼？文學爲誰服務？文學寫什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任務是什麼？都是這些嘛！那他主要目標是什麼？就是要推翻政府嘛！推翻現在的生產關係嘛！比如說，鄉土文學說我們要寫大眾，大眾是誰？這還要進一步的階級分析啊！那就得分析當時鄉土文學論戰時，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是什麼？在經濟上，支配階級是誰？最底層的是誰？在文學上說people民衆這個字，在當前階段指的是工人或什麼階級。所以這個本身就是左派運動的大綱大領，爲什麼寫它？人民是誰？街上哪些人是人民？那這就涉及階級分析；爲什麼是他們？那就涉及社會分析；爲什麼要寫這些人？因爲他是改變當前歷史社會主要動力；你改變誰呢？那他的分析結果也不像台灣那樣泛泛外省人的國民黨，他可能分析出在國民黨這種獨特的state下面，所養育的財團資本，就像日據時代，大地主階級其實是總督府的幫兇，這個分析沒有出來不行。你去查各國各

個社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的文學論爭，左翼的文學論爭，會覺得這跟文學有啥關係？老實說，是沒有關係，但也關係非常密切，你說沒有關係看你從那個角度，你從社會分析的部份、經濟的部份，比方說外銷加工出口產業資本比例，看起來這跟文學有什麼關係，是有這一面，可是恰恰因為它的關係比任何文學都密切，它要解決文學寫誰，寫什麼，就是要說明這些鬥爭的性質是什麼，你就要寫什麼，那當前社會階級鬥爭的情況，首先就要瞭解階級矛盾是什麼？瞭解階級矛盾、鬥爭的本質，那麼瞭解整個變革運動的總方向，譬如一九三〇年當時是新民族革命，我們不談社會主義革命，很多歌頌民族資產階級的、上海民族資產階級怎麼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像茅盾那樣的東西出來了。那這樣的東西才能對文學的創作起到非常主導性的作用，它不僅影響到文學創作的實踐，也影響到批評的實踐，批評家也從新民族主義的道路批評你，批評你的社會矛盾作得不夠，它為什麼好？它體現了當前半封建社會中國，極少數民族資產階級受到雙重壓迫，它吃盡了苦頭以後，終於瞭解到中國如果要發展，就要跟共產黨合作，諸如此類的。可是台灣鄉土文學有這個味道，可是我剛剛講過，我常常反省，是我們的社會論不夠，在鄉土文學論戰裡，我們應該批出台灣社會性質論，王拓的貢獻是以非常素樸、非常粗糙的方式提出台灣經濟殖民地論，從歷史看起來，他這個有歷史價值，雖然他本身的漏洞非常的大，可是至少他行諸文字，敢於這樣講。那麼你如果說，此水平跟其他社會比

較，比方說菲律賓的運動、韓國的運動，那我們就落後了，他們六〇年代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他們六〇年代就對美國現代化主義幻滅，台灣是，嘖，在鄉土文學論戰曇花一現，它的後續的影響，理論上較遠。

問：整個的論戰時間大概什麼時候？《夏潮》之前就應該有了？

陳：對，大概一九七〇年唐文標提出現代詩的批評，也必須說這次的論戰提到一個層次，那些參戰的人是台灣的右派、現代派，跟大部份海外的留學生受到保釣影響的留學生，從海外寄稿回來參加論戰，像蔣勳也是在海外，新詩論戰就是重新認識文學，文學為誰服務？只有左派文學才有文學寫誰？為誰？怎麼寫的問題。那我個人的理解，鄉土文學論戰只不過是現代詩論戰的延長，它試圖理論化，比方說台灣文學與社會的關係，那前面只是說文學應該怎麼辦，應該老少都能懂，應該用民族的形式，諸如此類，那鄉土文學論戰時間較短，因為它介入政治的鬥爭，新詩論戰七〇年到七四年，鄉土文學論戰七七年就開始了。

問：整個風潮是怎樣的？

陳：彭歌那篇文章，就打出來了，緊張度提高了，我們盡量地抵抗，我們也寫一些文章，後來就是胡秋原出來干涉，國民黨自己召開會議，我們也有點被嚇到，本來以為他們要抓人了，後來他們不出手，我們也就算了，鄉土文學很可惜，沒有繼續發展，我覺得這課題還在。

問：比較重要的是它被鍾肇政、葉石濤等，認為鄉土文學論戰是所謂的本土文化論

戰。

陳：說那個是沒有用的，台獨運動我們也不能怪啦，任何一個運動都會爭奪歷史解釋權，對我們直接參與的人來說，當時台獨的人都沒有想法，而且當時台獨的人，個別的人有這種想法，可是沒有像八〇年代變成一種「顯學」，那當時像葉石濤沒有吭氣、李喬也沒有吭氣，說不定他們還有點幸災樂禍，當時出來打仗的就是我們這些人，而且我們這幾個人的想法，我們自己很清楚，那我們的內心裡都是燃燒著文革的那股氣焰，不是說我們是哪一派，而是那個歷史時期很自然的一種現象。我們從新詩論戰就很注意這個議題，我從牢裡出來就跟唐文標講，要發展這個議題，那麼彭歌他們也很注意，我們是一直在做，引起他們的警惕經常在聯合副刊上寫一些方塊，最後一篇〈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就點名批判。獨派的是沒有這個問題意識的。也必須說明〈夏潮〉的參與當然是很重要的一部份，可是應該給予歷史一個公道吧！不見得是〈夏潮〉挑起來的，如果說從現代詩論戰這樣看下來，應該有比較公平的說法，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信疆的人間副刊，人間副刊在七〇年代初期登了關錦鵬的三篇文章，從那裡引起的，然後所謂鄉土文學論戰，我還找不出文章，誰是第一個人講，當時是鄉土文學史，根據從哪裡來，我問高信疆，高信疆都想不起來，忽然間說這是鄉土，包括朱銘的雕刻、洪通等，包括小說家，忽然間就叫出這個名字來，我們是非常有意識地察覺到這個議題的重要性，然後編雜誌的

時候，可說是〈夏潮〉點燃了，發起的，我覺得是事實，我覺得應該給個公平。

問：那麼引進新左派的理論就是比較自然了？

陳：我告訴你一個小小的秘密，因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用中共的語言，沒有辦法再回復到第三國際或台共的語言，我們就說這是現代理論，好像現代化理論也不是獨家之言嘛！當時實在很有意思的，講一句話都不能明說，所以帝國主義的問題、殖民主義的問題、資本主義的問題，第三世界的問題，老實說台灣的思維到現在都沒有世界市場的觀點，沒有世界體系的觀點，總覺得台灣就是國民黨跟黨外，或者中國人跟台灣人，世界地圖就是國家跟國家，比較沒有台灣資本主義跟世界資本主義的關係，在南北的關係，就是說在美國的干涉，所以台灣的左翼沒有起來，先天被這個體制排除，我們拚命的想要排除這個體制，而且樂觀的認為，只要這個體制被排除，或者認為只要讓你們瞭解一點點外面的現實，你們一定會跟我們一樣，當然這是過度的樂觀，可是我們當時的想法，一直到現在，比方說別的国家解嚴以後，一定是解嚴前的discourse論述一定是兵敗如山倒，然後一個新的完全不同的discourse出現，台灣是按照過去的discourse變本加厲的內在化，非常有意思，沒有見過這種pattern，比方說弗蘭哥的西班牙垮台以後，左派的戲劇運動，文學運動、社會理論簡直是一夜之間成爲顯學，過去教會的、保守派的東西都丟掉了。台灣沒有，台灣所

有的菁英包括台灣大學，完全一窩蜂走向新保守主義，我個人覺得台灣的獨立運動，基本上是一種右翼的反共運動，冷戰時期的事情，很奇怪，很有意思。問：保釣有沒有文章或者專書？

陳：現在沒有，美國的朋友不斷的講，都沒有保釣簡史，這個簡史不是要給自己，第一個要事實的記載，你們這一代才能記載，才能作批判；第二個自我批評，比方說爲什麼這個運動是在北美洲，裡面的組織啊！路線啊！發生怎麼樣的問題，都應該有個交代。我一直希望保釣運動史能夠出來，這個涉及到從一九五〇年到七〇年，這獨特的十年，就是 *seventies*，爲什麼會有一種反冷戰時代的意識型態，然後忽然就消失了，這個很有意思，他媽的，這個問題一定要追究，所以我說你這個題目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你論文什麼時候要交，這個一定要做，就是所謂戰後反省或是戰後結算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保釣這批人，你要跟他談保釣，他一定懶得談，因爲這是一個挫敗的經驗。

問：從現在的角度來看，對於中國的改革，以及現代的開放情形，以你的統一的立場來看待中國與台灣關係？

陳：中國知識份子跟台灣知識份子在爲中國尋找出路時候，不但寄予期望更親自參加。比方說，蔡孝乾是一個從台到中共的一個歷程，張志忠也參加台共的成立，台共在當時第三國際的支援下面，在最黑暗的時候，台灣的共產黨都沒有放棄把台灣的解放從整個中國的解放到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解放提出來思考。這

個運動受到慘重的挫折，殺了四千人，坐牢的七千人。然後在冷戰結構下，在外力干涉下二度掉下去。在冷戰的構造當中呢。中國在強大的封鎖圈底下，進行了自己的現代化，我們也講了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要獨立的話，社會主義一直是非常強烈的選項，這與二〇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中國和台灣恰恰是一個明顯的對比，中國選擇了人民群眾的鬥爭，這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革命，動員了貧窮、無知、沒有組織力貧苦的農民，建立了一個真正把帝國主義趕出去的一個新政權，這解放後，就毅然地不得不去參加韓戰跟美國打，然後就開始自立更生，跟世界資本體系切斷關係，這樣發展到的動員的方式，跟美國相對的就是 *collective* 的集體主義的方式發展。那麼基本上，從鴉片戰爭以後，付了很大的代價，建立了自己的國防，在極低的水平下中國經濟取得了自己平衡，用我們這種消費主義來看，當然不成樣子，但它自己的發展，冷戰基本上並沒有拖垮進步，這是完全出乎美國意料之外的，美國在冷戰結構中消耗了很多能量，帶來今天沒落的跡象。而中國基本上那怕有那麼多的動亂、文革，是世界經濟發展史是罕見的，它的醫療、它的生活、每人平均熱量的攝取量，比較衛生等。台灣完全跟這個選擇斷了。所以我對統一的觀點，從歷史上看起來，比方說從荷蘭人、日本人統治下，到戰後的冷戰結構，基本上是一個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給中國帶來的後果，我的思考比較接近帝國主義衝擊下造成分裂的，所以作爲一個左派，一定要解決這問題。例如韓

國，韓國經濟上南方遠比北方好，北方一直落後在文革時代，可是他們的學生教授，如果有一個教授說要獨立，則其學術地位就不保了，同一個母親所生的小孩這樣的對立，是很羞恥的，特別是五〇年代的屠殺以後帶來的美國意識型態支配性，台灣戰後菁英都是一面倒的情況。所以我覺得很簡單，一個左派份子，第一步不能承認、不能接受在外來勢力的干預下，第二個問題就是怎樣評價中國大陸的問題。把它說成水深火熱，事實上不是這樣子，連文革時期中國經濟都在成長，不能否認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爲了要保衛革命，建設中國自己的國防，花了很多非生產性的錢在國防上，第二個無可否認的毛澤東用自己的方法，完成民族的積累，就是說 national accumulation 整個民族的資本積累，不管用什麼方法，就在這種很低的生產率下面，又要進行社會主義的分配，帶來低度的平等跟平衡，是很難經得起世界資本體系那種壓力。你看世界資本體系，在戰後發生了多少次的不景氣，所以整個歐洲垮了，東歐也垮了，無可諱言中共也在改變，我常跟他們開玩笑講，這不是中國式社會主義，這是中國式資本主義。我把這個問題看成是民族內部的矛盾，像毛澤東所說的，如果人民覺得社會主義是愚蠢的，就放棄它，目前共產黨官僚主義腐敗，我想人民應該推翻它，我個人是深惡痛絕，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說所有的官員都這樣，可是那怕十分之一，我絕不會接受說這個情況是難免的現象。我對工人主義、工民主運動有比較高的要求，我個人覺得這個矛盾在經過那麼偉大的革

命的民族裡面，是不大可能腐爛下去，最近我看到報導，大陸的工潮越來越厲害，這是很合理的，因爲他們從小就被教導，我們是工農階級聯盟的國家，黨的策略可以不斷的被質疑：我們工農還當不當家？共產黨在這件工潮上站什麼位置？所以我看中國大陸不會像台灣那麼快步入獨裁，我個人覺得應該對於戰後的社會主義中國調查，特別是開放改革以後，應該做科學的研究，這個研究大陸做不出來，爲什麼？他們的政策高於一切，小平說這是好的，就不能說是壞的，這是我個人的感覺，所以爲了台灣的左派，應該負起這個責任，我們也不罵中國共產黨，我們只是從科學來分析，目前這個制度下，你的剩餘是什麼積累的？當然你說剝削吧，在毛主席時候也是高度剝削，問題是在政治上他解決了這個問題，你跟貧農說，我們爲了子子孫孫百代，幹部也是清廉自持，毛主席也是幾個月才吃一次紅燒肉，告訴你，大家在政治上通過願意這樣自我剝削，那沒問題，沒有剝削就沒有積累嘛！你創造了五塊錢的勞動，然後把五塊錢通通還給你，到哪裡積累呢？積累過程不管是不是社會主義，一定會有剝削，問題是人民一廂情願相信社會主義積累是可以透過政治來解決，因爲它最終的目的是要消滅剝削，消滅國家。現在政治上不行了，幹部的確有腐敗現象，老實說我碰到很多中共老幹部，也是深惡痛絕。還有對台灣經濟產生非常展示性的作用，只要這個作用存在一天，反對帝國主義對面的民族主義弱者，我想這個問題還沒解決，比方說帝國主義意識型態的支配，經濟上的支

配，倒不是說像殖民地那樣支配，而是說它規定了我們經濟發展的方向、內容、性質，造成台灣沒有自己主體的經濟體系，在產量、品種、價格上，完全受到外面因素的影響，這種經濟不可能存在，因為世界經濟會不斷的改組，過去因為冷戰與國際分工，所以不但使你存在下來，而且有一定的市場，是因為這種國際分工使台灣對研究發展毫無興趣，他完全不必要自己決定，只要原料加工就可以生存，那你的外貿系統也在別人手裡，花研究經費也是無用。

問：即使台灣不管怎樣也都已經某種程度的資本化了，對岸的中國大陸也在邁向資本化的地步，那麼到那樣的情況您還是堅持一個 national 的國家，來作爲要達成的目標？我覺得該是從建立在現有的情況下做努力才對。

陳：我想應該分成兩個層次，作爲一個台灣的左翼，從日據時代第一波、第二波地下黨時代，第三波七〇年代，這整個傳統包括菲律賓、韓國的傳統式一樣的，民族獨立，只不過我不認爲台灣是一個民族，台灣的解放運動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部份，一直都是，即使是從過去的保釣運動的經驗也是傾向中國，那日據時代，現在有些人說日據時代的台獨綱領有民族獨立嘛，可是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當時台灣在行政是屬於中國嘛，所以他對日本獨立，當時殖民地提綱、第三國際殖民地提綱裡面，對殖民地民族主義實際上有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就是說，所有這些台共沒有一個變成台獨，在這樣一個傳統下面，這個矛盾一直都沒有解決，就是在帝國主義干涉下的台灣的分離，這個分離左派應該

怎麼看，是接受它成爲一個獨立的台灣呢！那獨立的台灣在目前世界經濟結構下是不可能的；第二個問題牽涉到現在中國共產黨又不是搞階級運動，它是資本主義的積累，這樣的情況下，我個人的理解就是說，馬克思恰恰是不對，而是對得令人可怕，一定要經過資本主義階段，那可是在經過資本主義階段的階段論裡面，以前是認爲可以跳躍過去，在共產黨領導下完成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然後爲社會主義階段準備好條件，現在中國的實踐、全世界的實踐，證明馬克思是對得令人發抖，就是說你沒有資本主義積累的話，是不可能的，可是另外也提供了一個在兩極對立下面，其實資產階級的高度積累也不一定會產生社會主義的因素，在消費主義下面整個中產階級化，也產生新的問題，不過這是一個大廣泛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像個樣子了，我的回答是那是人民內部問題，有必要時推翻它，重新來次革命，像老毛說的：重上景崗山。第三個問題，我覺得還要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未來經濟規模會愈來愈大，比方說我們現在除了經濟外，還有電子傳播的問題，看第四台，簡直亞洲分不清楚了嘛，這個東西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但並不是那麼快。比方說歐洲自己的問題，雖然它跟隨著物質上的統合，使歐洲市場逐漸統合成一的超國界的歐洲，這個趨勢是在形成，但在形成過程是一個長足的發展，可是從阻力來看呢，我們也看到了相當大，從歷史遺留下來的 national interest 在作梗的問題，可是做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者不應該排斥這樣一個可能性，將來一個泛東

亞的形成，那老實說，在左派裡面，早就有一種國家消滅論嘛！只不過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現在在後冷戰時代，世界經濟秩序會是怎樣的秩序，現在還在forming重組，world system怎樣重新分工，怎樣去組織，他的矛盾會以怎樣的形式的出現。現在的問題是說台灣現在這樣一種存在情況，是完全沒有地位的，比方說國民黨提出什麼國際金融服務中心，這就已經宣告了台灣沒有辦法獨立成爲一個industrial quart，會變成像香港用financial service來存在，那老實說，將來東亞成爲經濟中心的話，你台灣不能像香港，香港、新加坡、上海、日本的什麼地方都可以成爲經濟地區裡面所需要的邊陲或半邊陲的非生產性的服務單位，真的是沒有什麼展望可言，這個是很可怕的發展，香港化，媽的！那獨立就更不用說了，而且我們還相信物質的決定力量的話，現在台灣的中小企業對中國大陸的輸出，不但跟大陸中小企業私人性的發生聯盟，而且跟那邊的state也發生一定的聯盟，這種lines一定會產生，這種連鎖產生後，你獨立要到哪裡獨立，然後國營企業也會解體，解體到資本家手中，集團資本在過去可以靠冷戰結構吃飯，以後必須到像中國大陸的地方，他們說南向都是騙人的，資本有資本的智慧跟選擇，不必他們在那邊宣布，要可以去，早就去了，蘇比克灣能去的話早就去了。左派的另一個運動，我倒不是站在統一的立場歡迎這種資本的結合，這是一個我很矛盾的地方，我必須考慮這種資本的再組織、再結合當中，無產階級、勞動者階級在什麼地方，包括大陸農民階級的

再分化，也應該成爲左派的顧念。而不是說一刀切開，幹！大陸去給人幹幹啦！跟我們無關！這不是左派，是整個東亞地區裡面非常深刻的問題，如果東亞的新的經濟發展跟戰後四十年後一樣，這沒什麼好歡迎的，它付出了政治上的依附、環境上的破壞，文化的解體跟人的管理化，付出這些代價取得正當化，我們應是很汗顏的，這就是現在的台獨。所以中共的解體是全世界的問題，全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解體，比如說它的對立面是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可是又沒有，美國、法國、日本的生產力也是極速的衰落中。

訪蘇慶黎

地點：台中東海別墅

時間：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時。

蘇慶黎簡介：台共黨員蘇新女兒，但八〇年代前父女無任何聯絡，台大哲學系畢業，《夏潮》總編輯，《美麗島》雜誌編輯委員，八〇年代參與黨外編聯會、組成勞支會，從事勞工運動、原住民援救雜妓工作，現於紐約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蘇慶黎前夫鄭泰安與一群具社會正義感知份子創辦《夏潮》雜誌，三期後辦不下去，改由蘇慶黎接手總編，風格轉向社會主義。蘇慶黎實為《夏潮》雜誌實際負責人，包括雜誌內容取向、社會議題分析、雜誌擴大聯盟，集結鄉土作家群，打字排版印刷廠等一手包辦，七〇年代的女性主義僅開始播種而未發芽，蘇慶黎以一位女性進入左翼社會運動，對來自於政權、階級與性別的壓迫，感受更為強大。

問：你的家庭背景，跟你對左翼思想的認識，有什麼樣的關連性？當大家都知道你是蘇新的女兒時，為什麼你就當然是個左派？

蘇：事實上我們二二八逃亡回來，我媽就必須要工作，我媽就到高雄市當護理主任，我就是從一個舅媽到另一個舅媽，最後我安定在一個姨媽家，我的姨爹是

京都帝大畢業的，後來到上海去開業，廖文毅，廖文繼的堂兄，他們在上海開了一家大醫院，就是到他們家去當醫生，所以我姨爹在那邊幾年就會講很流利的國語和上海話，他回來就像我們一般所說的半山。

問：他是國民黨？

蘇：不是國民黨，就是有一個京都帝大的同學，當了衛生署的署長，叫甚麼名子我一下子忘掉了，已經去世！可能是第一任衛生署署長。就是找他出來說，當開業醫生實在太沒有出息！一定要當那種公共衛生的行政官員，所以我三歲半到我姨爹家，他已經進入高雄市衛生局當技正，很快就把他升到高雄港檢疫所的所長，等於是管整個高雄港整個進出口的檢疫工作，我們就住在檢疫所的給所長住的公館，就在西子灣旁邊，那是一個百萬富翁的別墅，就是因為他是醫生，方圓百里之內都沒有醫生，在那個年代，會有港務局局長的太太來看病，也會有很窮的漁民來看病，就是說這樣的背景對我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家很大，院落也很大，你可以想像那是日本百萬富翁的別墅嘛！我去他們家時是三歲半，就有三個佣人，還不包括司機，檢疫所的人還經常來修房子，維修之類的，我姨爹有二個司機，一個是開汽車的，一個是開船的，因為有時候有一些大的貨輪開不進來或者有问题，他就必須坐著汽艇出外海。所以在我家侍奉我們的就有五、六個，照理說這樣的人……我姨爹最崇拜的人是魯迅，他對國民黨是很反感，他原來是因為戰亂才回台灣的，一九四九年已經很亂了，他以爲

內戰很快結束他就要回上海，從我們的眼光看，他好像很大中國沙文主義，但是在他們那一代是很自然的，我很多的親戚都到大陸去經商，有的在大陸唸書，在那個時候台灣這兩邊往來是沒有太大政治因素……你懂我的意思，（我懂）對我姨爹來講，他就是喜歡待在中國大陸，對他們來說你是從唐山來，只是再回到唐山而已。他在日本唸書十年，又在醫學院當助教一陣子，那十年他每年暑假都到大陸旅遊，所以我們家裡有十本照相本就是他拍攝大陸的，大陸各種各樣的，很貧窮的一面，那些風光，人文的他都拍下來，那些對我影響很大，現在我回想起來，很奇怪就是他當了國民黨的官，好像我們一生下來就是應該痛恨國民黨，痛恨國民黨就像跟每天吃飯，吃下去的東西在你腦袋裡長，所有的大人的態度都非常痛恨國民黨。

郭：那他們會不會對妳談對國民黨的看法，就是在聊天的時候？

蘇：我們後來就有《自由中國》可以看，他們都在看《自由中國》嘛！他們在罵國民黨的時後都用日文，所以我小的時後日文很行，幾乎都可以聽，他們講比較敏感的事情都用日語，如果要聽他們講話，慢慢的就會學。就是很自然，比如說楊金虎，高雄市的第一任黨外市長，他也是一個醫生，要競選他就來找我姨爹，對我們來講好像都是很自然，現在想好像很奇怪，他當國民黨的官，還是會支持黨外，但對我們來講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每次都落選，最後一次才當選，後來又被搞掉，印象中楊金虎就是不斷在競選，然後就不斷在落選，然後

我們每一次都很生氣。總之，這一方面是很舒服的生活，有很多人侍奉你，一方面我們家是船進來的第一站，很多漁船在那邊做檢查，進來半屏山那個地方，我們就住那個地方，有時漁民在海上作業已經出了事，比如說手被機器壓到之類，知道這邊有醫生，上了岸過了馬路就到我們家，所以我常常看到漁民重傷，而且有很多貧窮的漁民都是病得很重才會來看病，所以這種階級的對比……，像港務局的太太沒有感冒也沒有甚麼她就要來針一針甚麼葡萄針，另外這些漁民這麼窮，老早需要看醫生也沒辦法看醫生，像這些都是我生活每天會看到的。另外來講我的一些表哥他們都喜歡魯迅三〇年代的文學，事實上我初中一些主要三〇年代的文學大概都看了，其它西方像舊俄的文學，像狄更斯這些英國寫實主義的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寫實主義文學。就是從來沒有人談我的父親，大家都不談，就是我的外祖父是貧窮的家庭，他是一個貧窮的農民，一家大小進台南府城，然後就去作苦工養將近十個孩子，他也做人力車伕，也去地主家當長工，所以我姨媽一直要我們不要忘掉我們的出生，就是你現在生下來看到我們住這樣的房子這種生活，當初妳的祖父……有時候我們會坐三輪車，我姨媽就會講：妳看以前我們的祖父就是這個樣子。所以她都會講說不管將來你坐汽車、坐甚麼車，寧可自己省一點錢你不可以去跟人家討價還價，就是說對所有的勞動者不可以想辦法要去佔它們的便宜，這幾乎是每天生活他們給我的教

育，我們後面很多窮人，每年我們都會收小孩子的衣服，大人的衣服，舊的穿不下的，我姨媽就會帶我去拜訪，剛開始我記得我怕得不得了，因為他們的房子是又矮又小，很多沒有窗子，我一進去我都覺得我要昏倒了。但是我的姨媽就是不斷的教育，比如你吃東西你不可以說你不喜歡吃，現在如果我不喜歡吃一樣東西或浪費一樣東西，我馬上罪惡感就很重很重，她會講說你現在有東西不吃，外面有很多人沒有東西吃。

我的意思是……因為你講到我的父親，我要跟你講說我一直到大學才比較知道我的父親是誰，我初中的時候曾經問過我姨媽，她就說：你相信姨媽的話，妳爸爸是一個很好的人，非常有正義感的人，將來你知道他，你會很尊敬他，我現在不告訴你，等你將來長大你就會知道，等你長大再告訴你。你知道小孩子每天就是這樣生活，我姨媽對我是非常好，所以我想我原來的父母跟我的生活，跟我的姨爹姨媽比不見得是更好，我姨爹、姨媽對我父親都非常崇拜，好像就是說為我父親做一件事情，所以他們一直希望不只把我帶養長大，希望我的教育我的政治立場也是一樣的，因為每天是那樣在生活，所以我也不覺得有甚麼特別，當我長大以後才知道他們是如此地刻意，比如說我姨媽要去拜訪窮人，她會帶我去，她不見得會帶我表妹去，因為一路上她就要開始教育我窮人是怎麼樣，她說：我們都說窮人是懶惰，但是誰使他們看起來又笨又懶惰，但事實上窮人是不是懶惰？是不是笨？我們家有時候被窮人偷了衣服，我真的看

見他們偷了衣服，但是我姨媽說我們不可以去抓他們，因為他們貧窮沒有衣服穿，但是誰使得他們貧窮？是這個社會使得他貧窮，她一再的重覆，就是說這種給小孩子社會主義的教育，在我小的時候可以說是非常的豐富，包括我們怎麼去對待那些佣人，我們是絕對不可能像其他有錢人家那樣對待佣人，其實小時候常常覺得佣人是頭大的問題，因為他們好像會告狀，根本不可能去欺負佣人或虐待佣人，所以我也許也不須要去念甚麼馬克思，我想我對階級的看法就會很素樸的接近馬克思，那這是一個很特别的例子。

問：從小……

蘇：對，包括我最崇拜的魯迅，魯迅對我的影響太大太大，我一直想成為魯迅那樣的作家，到大學的時候都還一直在想，一直到現在我還在想以後我回來我可能要找時間寫作，我還沒有放棄文學的寫作成為像魯迅這一類的作家。這可能很拉雜，但是讓你了解一下，這是我第一次跟人家談，王津平他們都不一定知道。

問：你跟蘇新一直都沒有聯絡嗎？

蘇：我後來瞭解，他們可能中間有聯絡過，但是你知道那是白色恐怖時代，那完全是不可能給小孩子知道的，我不太瞭解，應該是有，因為後來我從我父親的著作知道，我母親送過我小時候的照片給他，那他也有可能寫過信回來，那可能文革一開始就完全中斷。

問：在七〇年代一開始就是保釣運動，保釣有兩個部分，一部分在美國，另一部分在台灣，當時你在台大，保釣時台大似乎有兩派，一派屬於右派保守的，另一派比較有正義感左派。在保釣期間，你在台大有沒有從事什麼樣的活動，或者說，保釣運動對你後來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

蘇：我進台大那個時候，殷海光已經不能上課了，我想我已經長期的看《自由中國》雜誌嘛！那時已有一些同學開始聚集，比如說王杏慶、王曉波、徐正光，王曉波比我高兩屆，徐正光可能多好多多年，就是一票這樣的人，包括一些僑生，我想他們都有很素樸社會主義的思想，很素樸，就是說，沒有經過很理論化的。另外一種，就是國民黨這樣的歷史是我們不能接受的，我們一直想找一些國共內戰的，或者寫國民黨在大陸的歷史的書，大家在傳、在講。另外在校園裡面，比如說每次大新選舉，或者一些活動啊！我一直都跟他們在一起。我是畢業一年以後還在台大混，因為你知道台大很自由，那時已經退出聯合國，在這之前保釣已經起來了，國外會寄些東西來給我們看，所以在這幾年下來，我們在討論一些對國民黨的問題，已經是一個很自然的發展，所以不是說一個很突然的打擊或衝擊我。你知道在七〇年代初，台灣農業的危機已經是很大了，那時候有百萬小時奉獻，用台灣話講，台灣已經是熱滾滾了，又退出聯合國，那時我先生（後來我們離婚了）他是醫學院的，他也是很活躍，他搶下了《台大青年》，那時他很忙，那時他是總編輯，等於是我在當總編輯，我就去

跟《台大青年》那批人混，那時是我畢業的第一年，學生的示威啊！絕食啊！這類的事情很多！但在那個時候衝擊我更大的的是越戰，反越戰，那時候我在學校對面有一個馬麗諾修道院修英文，那些修女都是激進份子，她都教我們反戰的事情，用英文，然後教我們唱反越戰的歌，所以我對西方的反思，透過越戰整個對第三世界的觀念，事實上是透過反越戰，是很深刻的。你講保釣的話，那當然是一個潮流，對我們來講那是很自然的，就這樣上去了！我覺得在保釣裡面，不只是對國民黨，對歷史的反思，更應該看到的是對社會的反思。

問：你的意思說對社會的關懷，後來有所謂的「百萬小時奉獻」，為什麼後來演變成「百萬小時奉獻」對社會的一種關懷？

蘇：為什麼演變到百萬小時對社會的奉獻，我想台灣社會的問題也不斷的在出現嘛！不斷衝擊下，給予一個表達的空間，社會已經有矛盾，但沒有空間，只是在那個時候，整個的矛盾不斷的被打開了。原先就有一些山地服務之類的，基服社等，這些東西就匯聚起來要去下鄉，這很重要是香港的僑生帶來的，因為他們受到文革的影響，文革上山、下鄉，他們帶來這種走向社會的思潮，其實台大那時候，包括保釣，香港僑生是產生很大的作用，後來有一些人都被趕走了。那一年我編《台大青年》，那年《台大青年》還得了，是全省大學雜誌比賽第一名的，可見那時的影響。那時候王杏慶畢業了嘛，王曉波當講師，全部都跟學生混在一起。

問：由於保釣整個政治空間與社會空間出現隙縫，也當然由於國際上的矛盾，出現民族主義強烈討論這樣的東西。並且政治上康寧祥、郭雨新、黃信介都出來選舉，黨外開始浮現，這兩者這樣的氣氛是自然而然的起來，或者說各自會分辨出政治部門跟民族主義部門呢？

蘇：保釣是一個風潮，民族主義在那個時候是很明顯的，民族主義裡面有一些是比較反國民黨的，有一些是比較親國民黨的，這樣的區別而已，而社會關懷就是社會關懷，當時不太出現這個統獨問題，我們隱隱約約有聽到，像謝聰敏、彭明敏，都是在台大的嘛！隱隱約約有聽到台獨，但在同學之間不形成問題，所以你說民族主義是什麼問題？

問：我的意思是說，那時民族主義形成一種強勢的……

蘇：對！對！因為國民黨長期依靠美援，所以在那種高壓之下，對於那種依賴完全沒有辦法去反省，但這對知識份子並不是完全沒有刺激，只有到保釣時，隱約的美國帝國主義的問題，日本帝國主義的問題就變成一個公開的東西，從一個潛在的問題。

問：之前沒有人講帝國主義的東西？

蘇：沒有，釣魚台是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問：同時期，你有沒有在《大學》雜誌裡面？

蘇：沒有，《大學》雜誌我幫過他們忙，因為鄧維禎跟王曉波、陳鼓應他們都很

熟，所以他也是屬於我們那個幫派裡面的一份子，所以他畢業以後，到教育部工作，辦《大學》雜誌什麼的，所以他們也找我去幫他們錄音、整理稿件啊，到宿舍散發雜誌啊，就是說每個年輕人都會去介入活動的方式。

問：那時大家都沒有一個理論式的整理，就是一種社會關懷。

蘇：社會關懷還有期待民主的要求，期待國民黨能多改革。

問：對國民黨還有期待？

蘇：我是沒有啦！我們家來講對國民黨就像一條死馬一樣，我意思是說《大學》雜誌表現自由派對改革的期待。

問：你說的是剛講的那群人？

蘇：我是因為鄧維禎，他是老朋友，他做什麼，就去幫他，那這是給我一個學習，那時我已經編了《台大青年》。我第一個編輯工作就是《台大青年》。

問：在那個時候你們有沒有討論比較理論的東西？

蘇：現在想想，那個時候不太可能看到，馬列那樣的東西是在我畢業三年，我們去買政大國關所的《列寧選集》，《史達林選集》，《劉少奇選集》，當時沒有人敢組讀書會來討論這些東西，我們有不少朋友都在讀這些東西。

問：跟政大國關所的關係是不是因為陳鼓應？

蘇：政大的這套東西，大家私底下都在傳，你只要到國民黨一家書店，你只要告訴他，你是政大的學生，我們教授指定要我們讀，有的說你要有學生證，有的說

不用，他就會賣給你。我去，就真的買到了，很奇怪！

問：所以你畢業是在七〇年吧！我問王杏慶，爲什麼會成立《夏潮》，他的回答是一開始大家就有參與小本的時候，後來因爲既然大家都在唸這些東西，都看這些東西，就把它呈現出來，把思想呈現出來。我想問你一個確切的理由，你正式接手是在第三期，我看到你在第三期當編輯，第四期就改版，爲什麼有改版這樣的念頭？

蘇：王杏慶的這一段歷史回憶可能有問題，我那時真的有很多外面的朋友，就有人說在辦一本叫《夏潮》的雜誌，編了兩期就編不下去了，是小本的，那種文摘式的，找我幫忙，我編了第三期，編完以後，我說你們怎麼辦？你們編這種東西我也沒興趣啊！後來我也沒跟其他人討論，然後說如果你們不要辦了，是不可以給我，就送給我辦，我第一個去找的是陳映真，我說：「我們來辦一本社會主義的雜誌」，我們也不敢在那種冰果室，以前也沒有這種咖啡店，我們就在那種大街小巷，走在馬路上，看後面有沒有跟蹤，我就跟他講，「我們辦一個社會主義的雜誌。」他就問我：「你神經有沒有問題！」因爲他剛坐牢出來不久。而且我差一點被他們那個案子牽進去。我在台大的時候，那時候開始搞讀書會，他們案子裡面有一個叫邱延亮的，他是蔣緯國的小舅子（不是澳洲那個），他在那裡招兵買馬，這個人是個天才，他從小學到大學沒有一張文憑，從來沒有畢業，他一進台大就去做田野調查，在台大裡面就很轟動，那時

候只要一下鄉什麼的，大家就很興奮，他做民歌採集，他就開始在台大裡面招兵買馬，我就被他召去，他跟我這一群就很熟了，他說他去南部採集回來，我們就開始讀書會，可是從此他就不見了，所以他們那件案子就是陳映真這件案子。我認識陳映真是從他回來，怎麼認識的我已經忘了。就是在這個時候，我跟他說我們來辦一本社會主義的雜誌，他嚇死了，那時我也認識陳明忠，認識陳明忠也是張俊宏介紹的，都還不是左派，反而還是現在的台獨介紹的，我認識張俊宏是因爲陳鼓應的關係，陳鼓應是因爲《大學》雜誌的關係，《大學》雜誌倒了，就搞《台灣政論》，張俊宏就找陳菊來找我，然後要我幫他負責一個國際專欄，因爲我在《台大青年》的時候寫了一篇有關孟加拉國的成立，寫了很長的一篇，內戰啊！革命啊！那時很轟動，那時候台灣國際上的視野是不知道什麼東西的，因爲他們都不care，第一次有人寫這樣的文章，很多人就在問，蘇慶黎是男的？女的？所以那時張俊宏、許信良對我的印象很深，所以我去幫他們弄國際專欄，那時很大膽，就這樣接下來，一方面寫，一方面幫他邀稿，但很快的就被停掉了。《夏潮》這批人找我也剛好在這時，原來我跟王拓、陳鼓應都有在《台灣政論》裡寫，這塊園地沒有了，我就趁這個時候跟《夏潮》的人說，如果你們不要，就給我，我就接下來。張俊宏介紹陳明忠給我認識，這很奇怪的關係。這一點很敬佩陳明忠，當時他的處境很危險，已經第二次要坐牢了，他就答應幫忙，他問我一期要多少？我就說一期大概要

多少，然後他說「好，那我幫你募頭幾期的錢」，那時不知道要多少萬？然後有一天他就找我，說你哪一天去拿錢，然後他又臨時改變主意說，「你早一天過來！」我拿了錢以後，他第二天就被抓走了！然後我就是這樣的一點錢。我跟陳映真一起去找陳明忠，陳明忠說該辦，陳映真就覺得很不好意思，連前輩，坐牢的前輩都說：說辦就辦，要坐牢就坐牢！所以開始是陳映真、陳明忠和我三個人在弄，然後我就去找王杏慶、王拓、陳鼓應，都一個一個找，都不敢說大家來啊！開會啊！那時大家都不敢這樣子！全都是單線的聯絡，開始大家都很怕，第六期的時候才去找王拓，因為王拓在大學的時候也屬於我們那一幫的，他在師大，但是他都來參加我們這一 group 的聚會，所以後來我就去找他，他想了很久說：可以嗎？現在想起來我還是很敬佩他們。坦白講，當時那樣的情況，這些人等於是原來都認識，原來都是一幫人，那這一些等於和我一起的人，所以辦了一年才比較有小型的聚會，有時候在陳鼓應家，二、三個人的聚會，大家吃個飯等等，所以這些專欄、作者是不斷的以個人的接觸的。比如說王杏慶大概是第一個說要打台獨的，因為那時長老會嘛，我記得陳映真還不同意，他說這樣等於把基督敎跟基督敎會的 community 都打掉了！作爲一個左派的策略是不對的，那時發表的時候，陳映真打電話給我，叫我去，罵了我一頓，他說：你不應該這麼莽撞；可是後來他寫了很多罵台獨的，可是當時他並不是那麼堅持。在這裡面有很多分歧，在高壓的情況下，那分歧不是那麼重

要，大家的關係其實都很不錯。

問：《夏潮》出版情形大概是怎樣的？

蘇：《夏潮》從四百多本起家，正常時都是八、九千份，選舉的時候三萬份、四萬份這樣子。

問：你剛剛說，跟陳映真說要辦一份社會主義的刊物，對其他的人談《夏潮》時，他們曉不曉得你要辦這樣的刊物？

蘇：我只敢跟陳映真講社會主義，跟他講的時候，已經被他罵神經病了！跟其他人，像王拓、陳鼓應因《台灣政論》沒有了嘛，我們就說，因為《台灣政論》沒有了，那我們來辦一個比他們更有文化性的，也談文化，也談歷史的一份雜誌，綜合性雜誌，他們覺得這樣也可以，其實都已經開始辦了，第四期我就給它邀邀稿，就這樣出去了。少數有幾篇稿是前面留下來的，然後就一時期開始這樣抓人，他們看看第四期、第五期後，覺得這樣也可以，所以他們就願意慢慢靠近來。

你可以看出來，那本雜誌跟《台灣政論》有很大的不同，像帝國主義的問題，然後很快就進入文學與歷史的探討了，我當時的看法是，那時不能直接談社會主義，另外來講，我覺得台灣史是很重要的，所以事實上看台灣史就是想引入社會主義的問題！工農階級問題、帝國主義的問題，事實上又是面對我們自己的台灣史，當時覺得台灣史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問：那時一開始就整理日據時代的文學。然後在台灣史部分，好像是由黃師樵寫的關於農運、工運的？

蘇：那時候沒有辦法，只能找到他，事實上台灣史幫我最大忙的，是一個叫李南衡的，他是一個開拓者，嚴格講，現在台灣史、台灣文學能夠發展到現在，我覺得他的功勞真的很大，我認識他之前，他已經開始去訪問一些老先生，然後從那邊蒐集到很多日據時代的出版品，他後來有出版一整套的台灣文學，他自己出版，他花掉很多錢。他認識我的時候，他知道我是蘇新的女兒，他很高興跟我見面，透過我，他認識了王白淵，他是一個詩人，所以透過李南衡，我也認識很多老前輩，所以很多《夏潮》登出來的台灣文學跟歷史，都是李南衡給我的，或是介紹我去找人來寫。

問：我們系上有一位老師，林載爵，他現在在東海，那他怎麼會進去的？

蘇：對！林載爵，你下次碰到他，幫我跟他問好！他們有一陣子住在花園新城，我們當鄰居，他們剛結婚時住我家。當時我怎麼找到他的？我們就是到處拉人，他好像是搞台灣史嘛！台灣文學，對！台灣文學，大概透過李南衡，去找一些搞台灣史、台灣文學的人，那時候有楊達嘛，好像也因為這樣跟楊達認識，他太太幫楊達做了一個版畫，有一期楊達的版畫木刻當封面。黃煌雄也當過我們的社長，因為他研究台灣史。

問：蔣渭水，所以只要跟台灣史有關係的就拉？

蘇：對，當時談台灣史是很敏感的，國民黨當時的壓力很大，王拓有一個表兄在警總當特務，常透過王拓警告我們，那時候不斷有案子，《台灣政論》抓了人以後，顏明聖案，陳明忠案，那些人我都認識，自從認識了張俊宏以後，黨外的運動我都經常參加，每次有案子發生的時候，都警告我他們也想像我抓進去，有一回我到東海對面找楊達，特務就一路跟我到台中。

問：我自己把《夏潮》看了一遍，做了一下分期，第一期是文學、歷史都在裡面，第二期從一九七七年下半年，開始鄉土文學論戰，一九七八年後比較關注政治，訪問一些政治人物，動態等，七八年王拓與陳鼓應出來選舉，大概如此。在《夏潮》裡有沒有比較深刻討論文化的走向？因為包括當時的《仙人掌》、《雄獅美術》、《綜合月刊》等，我覺得似乎是整個的合起來的，我去翻閱《雄獅美術》，《雄獅美術》簡直就像《夏潮》一樣？

蘇：你可以知道這是一個思潮，對鄉土的文學，台灣的藝術的問題的討論，在不同的雜誌呈現出來，那當然有一些作家，在不同的雜誌都寫文章，蔣勳是我們拉到的很重要的作家之一，你知道他寫老國民。

問：他寫的那個老國民相當的尖銳。

蘇：對，以當時的情況來講是這樣的。

問：那個時候，《夏潮》和其他雜誌的互動過程的關係如何？還是大家直覺體驗到該做台灣的东西？

蘇：對！比較鄉土的，因為你知道在這之前是……，就是說我們搞《夏潮》、搞台灣史、台灣文學爲什麼這麼敏感？之前都是什麼反共文學、懷鄉文學，什麼白先勇的東西，歐風美雨的，「希臘的天空」余光中的那種東西，那種和台灣的歷史、現實完全脫節的，那種東西已經開始受到衝擊了。只是沒有人對他們的文學、文化挑戰，當《夏潮》做回到台灣本土和文化的時候，事實上已經對那個東西做挑戰了。對他們而言完全不把台灣當成一個東西，在一黨統治下沒有把台灣的文學和台灣歷史放在社會、政治的生活裡，其實我們已經在做挑戰了。這個挑戰是很尖銳的，這事實上是鄉土文學的前哨戰。鄉土文學論戰延續了保釣的問題，就是說內憂外患，外患就是說所謂的保釣，內憂就是整個七〇年代社會的問題，六〇年代農村已經出現問題，我記得大學雜誌有談農業問題，其實是說，作爲一個溫和的反对派，開始去關懷整個台灣的社會問題、階級問題，在台灣政論王拓已經開始寫這種東西了。所以這種東西是已經在往前推了，而文學已經不是文學形式的問題，而是社會批判的問題，所以爲什麼我們會扣我們工農兵文學的帽子。所以我們談這種階級矛盾，社會衝擊。

問：這樣問好了。從現在的眼光來看，所謂本土化的開始，變成是統獨辯論的開始，大家都會去搶當時的解釋權，會去搶這樣的本土化的想法如何表現出來的，會這樣是因爲「本土」是他們終極的關懷，他們搶著說從日據時代就有人喊獨立，從台共就開始喊獨立，所以最後會獨立是很自然的，可是當時的「本土」並沒有凸顯統獨的問題，就你剛剛說的，只是在凸顯一個反國民黨的思考體制罷。

蘇：很奇怪，提出本土化的是統一派，不是獨派，你可以看到張俊宏那個時候西化思想很濃厚，我們事實上是很本土的，包含了民族主義，也包含了對本土的關懷，因爲日據時代是殖民的統治，所以是一個反帝的思想，整個反映在文學、農民組合、工人運動，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一個階級問題，所以對我們這些素樸的社會主義運動者來講，很自然，你如果關懷社會，你就會從本土去挖掘。事實上我們也談了很多第三世界的問題，帝國主義和第三世界的關係，開始談污染和發展的問題，這也是從《夏潮》開始，那時候是林俊義，作爲一個社會主義者當然要對周遭的環境和人、體制，提出疑問和批判，這種本土化，並不存在本省人與外省人。

問：就你的看法，到了鄉土文學論戰的時候，我看那些文章直覺得並非在談那個文學該怎麼辦，而是在將「階級」這個概念提出來。

蘇：對。透過黃春明他們的作品，已經呈現出來。

問：問題在於說很多作家，很多人並不瞭解，或者他們並不覺得那是工農兵文學，我覺得，我只要談台灣的鄉土而已，當然也許是白色恐怖的影響，對社會主義的恐懼。

蘇：他們是沒有意識的，因爲反共嘛，像黃春明寫的這些東西，像我們成長的年代

美國大兵到處走動，而你們的年代就沒有，現在台灣的色情其實是延續美國大兵那個時候，在黃春明的小說很清楚，一方面是外來的帝國的勢力，一方面是本土的女性遭受蹂躪，很多地方展現了這種社會問題，所以你講的沒有錯，其實嚴格來講要去討論什麼現實主義文學，一些文學的理論根本沒有被引用到這裡來，就是說爲什麼不能透過文學的形式來談社會問題？爲什麼不能透過文學來關懷呢？

問：王曉波說，當時很清楚社會主義的只有陳映真，其他人其實並不清楚，爲的只是要去對抗國民黨的扣帽子。我要問你的是說，整個的論戰過程中，有沒有說討論如何去對付這種扣帽子？

蘇：有有，當時有，當時我們已經比較敢聚集了，當時我們已經被列爲左派，有問題的紅色，當時我跟陳鼓應跟陳映真幾個人，我們是認爲說事實上已經辦這麼久了，從我第一期、第二期他們就說要抓我，但鄉土文學時期已經走紅了，我是想說這種撲滅也是遲早的，我是想說反不反抗都要被抓，倒不如反抗，就給他大戰一場。之前就有唐文標搞現代詩，搞過反西化文學，這個事情事實上是唐文標那時延續下來的。唐文標很快成爲我們很重要的 member，鄉土文學論戰一開始他就離開台灣到美國，他那時感覺他的處境很危險。我們就決定大戰一場。現在回顧去看，拉了好多人馬，像潘榮禮，透過潘榮禮去煽動農會會員，又用農會會員去反應省議會，黃玉嬌她什麼也不懂，反正在省議會就給他

亂鬧。另外一邊，王曉波去找胡秋原，因爲王曉波跟他兒子在大學是好朋友。事實上在鄉土文學論戰前，我們就已經跟胡秋原掛勾了，就是帝國主義的問題，他們跟我們有比較一致的立場，我們已經開始聯繫了。國民黨裡面有一個左派，像嚴靈峰是莫斯科東方大學，像鄭學稼，他們都跟國民黨很好，嚴靈峰本來是共產黨，被抓到沒有槍斃，後來當蔣經國的秘書，我們跟他們掛勾，算是一種保護作用，讓他們在國民黨裡面起作用。所以那時打得是天翻地覆，除《中國時報》的副刊沒有打我們之外，全部的報紙，軍中的莒光教學，電台，全部都打我們，等於是陸海空，三軍總動員，然後政戰的、所有軍方、情治系統的刊物，那當時我們發生了這場大戰後，胡秋原就很感動，就決定站在我們這一邊，可能私底下也做了很多疏通的工作，因爲鄭學稼可能跟王昇他們都有一點關係，事實上政戰是王昇系統的，像軍中文藝等，本來他們是準備全部把我們逮捕，像陳映真、我，名單都列好了，但最後可能這些人在裡面活動，包括蔣經國，王昇最後被說動了，不要處理我們。當時像余光中，整個的被拉下來，余光中在那之後整個的身敗名裂。所以社會關懷已經透過保鈞在知識份子身上發酵，保鈞還是在台大，其他的學校少一點，什麼百萬小時服務，山地服務之類，有在淡江，在那個時候大學裡面，社會關懷已經在形成了，這也是那一個論戰的背景。意思是說有那樣的一批知識份子，他們已經知道不管是不是透過文學形式，最後就是要關懷社會。這是一個滿複雜的背景。我

們跟胡秋原的關係後來比較敏感。這裡面的運作事實上很少人知道，後來你看《中華雜誌》、跟《仙人掌》上面搞鄉土文學論戰。

問：最先是王拓在《仙人掌》的文章所引發的。

蘇：但他們都把《夏潮》當成是最終的，國民黨想要撲滅的是《夏潮》。

問：後來的焦點是轉移到《中華雜誌》上面。

蘇：也沒有轉移，是擴大戰場。

問：那是陳正醒寫的。我把《中華》跟《夏潮》做一比對，《中華》在鄉土文學論戰之前都沒有在《夏潮》上面寫文章，鄉土文學論戰後就兩批作者交換來寫，後來比較嚴的時候，是在《中華雜誌》上發表的，包括《夏潮》這批人，大量的在《中華雜誌》上發表文章，比對起來很多都跑到《中華雜誌》。

蘇：不算轉移，是擴大，因為事實上是擴大戰場，本來他們要搞《夏潮》這群人，所以我們就把一些稿子投往《中華雜誌》那邊，於是把胡秋原那批人也捲進來，所以胡秋原的東西也在《夏潮》，是用這種方式作戰的。

問：這裡面有一個問題，經濟方面有侯立朝的文章，當然是擴大作戰，可是在經濟上面的論述，似乎都交給侯立朝？

蘇：這其實都是我剛剛說的策略之一，侯立朝、曾祥鐸、嚴靈峰，都是《中華》那一派的，把他們拉過來，所以我們的稿子盡量往那邊登，我們的作者在那邊寫，也拉他們在我們這邊寫，就是要使他變成一個聯合陣線，這樣國民黨處理

起來也相當困難。

問：如果單獨來看《夏潮》就有問題了，因為社會主義的問題就在於主張的經濟跟自由派的經濟不一樣，若採用侯立朝的觀點就變得很矛盾，他是把很多東西全雜在裡面。

蘇：對，他不是那麼純粹社會主義的。國民黨裡面有一派很痛恨自由主義的經濟，什麼新古典經濟、社會新古典經濟學在國民黨內部長期是很吃香的，國民黨一直很不喜歡自由經濟，所謂完全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學，事實上到最近這幾年喊自由化，才慢慢抬起頭來。那時候侯立朝等於在幫國民黨作工作，對我們來講，我們也是反對完全自由派的經濟，所以他的東西在我們這邊也是很好的。但你更應該考慮我剛剛講的兩批人馬的擴大合流。

問：接下來就是政治化的問題。從中壢事件後《夏潮》才對政治在逐漸參與，後來陳鼓應與王拓競選。我要問的是在談論民主的概念裡，我們會覺得以選舉作為民主運動不見得是好的手段，更應該做底層的功夫，那當初採取選舉的動作的動機與理由？

蘇：事實上這是《夏潮》這一派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發展的關鍵，比較參與實際政治活動的是我、王拓、陳鼓應，事實上我們在台大的時候的延續，這種關係是從《大學》雜誌，嚴格來講是從殷海光這樣延續下來的，王曉波跟陳鼓應跟殷海光算是很好的，對國民黨的批判，比較是用西方民主式的批判，從殷海光

這樣延續的，當《夏潮》已經發展到這樣的階段，黨外已經大量的參選，當時內部已經出現了分歧，陳映真就很反對，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的議會民主，他不贊成我們直接的去投入政治，其他的人也都沒有興趣，包括尉天驄、蔣勳，一方面我跟陳鼓應在做人權的工作，所以我和陳菊一直在做人權，關係很好，一方面人家說我越來越教條。我說我就是教條式馬列，我越會是一個列寧式的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到現在我都自認為是社會主義者，要用你所有的條件去發展，問題在於你能不能建立起那樣的一個政黨，那個政黨要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去發展，到現在我還是一樣，雖然我也認為這是議會民主，但我也不能完全信服海光那一套。

但是在國民黨那種高壓統治底下，你一定要先打開那種政治跟言論空間，否則所有階級問題是不可能談的，做運動都不可能，也可以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台灣民主的發展如果不是透過不斷的民主運動，打開這個空間，後來的工會運動是不可能的，你只要稍微寫一下工人的問題，你可能就要去坐牢。它既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你就必須有資本主義的社會的一個初步的民主，不能讓他變成一個資產階級，或者說國家專政，在這個地方要打破，然後給我們一個活動的空間。我覺得當時介入反國民黨的民主運動是必要的，當時不可能組織工會，唯一能和人民取得接觸的是透過「選舉」，那我覺得王拓跟陳鼓應是比較接近我這樣的思考，陳鼓應更是一個典型的自由派，只是有些模糊的社會主義思想。

總而言之，我們三個人的看法和王曉波、陳映真就非常不一樣，後來我比較理解他們的想法，他們就是覺得反正中國一定會統一，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到時候台灣就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做一些意識型態文化的工作。事實上當初參加黨外政治活動也是很危險的，他認為好不容易有一塊陣地，也有一批文化人、知識份子，我們就一直做這個工作，我跟王拓，我們都不是很贊同他這個說法，當時我是有一個派系想法，所謂的派系是要去接近一個政黨的思想，如果你永遠只是會辦雜誌，你永遠就只是一個知識份子、文化人，那如果你逐漸去介入政治，那麼就會從知識份子、文化人的派系，走向一個雛形的政黨，黨外就是這樣。我跟你講，我高中、初中，看了很多舊俄文學，舊俄時代接近革命的時候，知識份子怎麼思考他如何參與整個文化的、歷史的衝突，這給我一個很大的啓發，我對知識份子的看法是來自舊俄時代革命前夕的知識份子的掙扎，他們也是有西化派、歐化派的問題，俄國本土派、俄化派、民粹派，到農村去，這些問題，我想要說，如果我們想要改變這個社會的話，我們不可能不參與實際的政治活動。即使是在這樣的資產階級社會，我們都要去做，事實上當年都已經處理到萬年國會、解嚴的問題，都已經開始被黨外提出來，覺得一定要解嚴嘛！在戒嚴下我們還能幹多少事情？另外憲法的修改，王曉波當時就很敏感，覺得憲法一修改可能會走向台獨，沒有錯，現在你看到憲法的修改，是可能往台獨走，當時那樣的憲法是不可能和這個社會

並容的。不管怎樣將來大陸和台灣是要解決兩岸的問題，你這樣一個憲法，放在這樣的社會是不通的，修改憲法我跟王拓就覺得，又怎麼樣，反正這個鬥爭就是一定要鬥下去，但對王曉波而言，他們就很敏感，非常敏感，我們內部在當時已經有分歧，但是大家也無法協調出一致的看法，但是也不是一個很有組織化的集團，大家也只是意識型態政治立場的相同，大家集合在一起，後來也有開會討論，就決定去選，就去幫忙，有點像打鴨子上架。也說不上很嚴格集體的策略，事實上是很分歧，是在一個分歧的狀況下發展。我覺得中壢事件是台灣政治的轉型期，當時他們幾個雜誌也都被禁，那篇中壢事件的文章還是我特別去寫的，就是說你當時一定要去介入這樣的事件。

問：意思是從中壢事件你就開始介入政治？

蘇：之前我就一直在介入，只是說如何在這個雜誌上展現，就我個人我一直沒有中斷我對黨外的介入。所以我跟張俊宏那些人的關係都很好，所以我們那樣的介入不是說一個集體的力量的介入，我說這是我們這個集團發展的關鍵，從中壢事件後，黨外的步伐不斷的加大，加快，那當時如果我們也去介入的話，可能跟後來的的情況完全不一樣。美麗島事件以後，我也被抓，但是我被關兩個月就很快的被放出來，陳鼓應跑掉了，這之間我們也拉了黃順興，所以在這個集團變成，黃順興、我、王拓，後來黃順興的選舉我們都有介入，但是已經不能像當時黨外那樣的集團，一步一步要走上組織化的策略都沒有，這整個發展可以

在美麗島事件上做一個很明顯的分野。

問：《夏潮》有沒有試圖去做組織化的工作，如何培養新的幹部群？

蘇：在這中間我也和陳映真談過，如何去募集更多的年輕人，包括用讀書會的方式，但他都覺得太危險了，因為當時我看到整個黨外對年輕人有吸引力，而且開始招兵買馬，像邱義仁，好像是最早期的之一，美麗島的時期他已經有接觸了，但當時好像都沒有他的角色，就是很熱心的小青年，散發傳單，這個時期是一個關鍵，我們內部經過這最後一個時期，有蠻嚴重的分裂，早期有人說要參選，大家都有一點礙於情面，整個黨外氣勢上升的時候，這分裂就明顯了。

問：你是說應該介入整個政治層面，還是說知識份子？

蘇：我覺得都有，我的觀察，像康寧祥他們是屬於現實性的人物，陳映真屬於理想性的人物、思考型的人物，我在舊俄文學看到太多這種知識份子，講社會關懷講什麼，很多，去實踐啊！你一定要去打破這個體制，如何打破？那種知識份子的軟弱，事實上都看得很清楚，當我們要選舉的時候，我們跟國外一些左派保釣團體聯絡，當時我們都沒有錢，想向他們募款，結果我們得到的回答是中國很快就會解放台灣，你們何必搞這些，那我在想，《夏潮》內部是不是也有這種思想，那時想說求生存最重要，不要大步的走，然後砸掉，不必要的犧牲。對我來講，要不要統一另外一回事，作為社會的份子，我覺得要介入，這跟統一不統一無關的，但有人卻因為要統一，所以現在可以不做這些事

情，那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

問：你是一開始先跟陳映真接觸，然後再跟老同學接觸，你知道老同學也是有那樣的左統觀念，不知道你們跟他們有沒有接觸到？

蘇：在《夏潮》時我們有透過關係向他們募款，當時他們人不多，不多的意思是有的人都已經坐牢出來了，都不敢動，很多人還在牢裡，敢動的人事實上是少數，陳明忠是其中的少數，他是主動出擊，介入現實政治的，陳明忠跟張俊宏、康寧祥、黃順興啊有聯繫，才再跟我接上，但他們並不成為一個突出的主力，跟後來很不一樣，他們都是盡量隱密。

問：陳映真他們認為中國的解放是一個必然的解放，但是你認為必然不一定是這樣，要從社會內部去解放！

蘇：是社會的人，就必須去參與，必須去實踐，這一點是最重要的，不然你怎麼去打破體制，當然文學工作、文藝工作是一個工作，但是你還是要透過政治的實踐。

問：我還想討論到《夏潮》後面的發展，其實整個《夏潮》集結大批的知識份子，後來這些知識份子都散到各地去了！

蘇：對，我們變成了訓練班，向陳國祥、吳福成、邱義仁。

問：後來很多新潮流的也是從《夏潮》出來，以你來分，當時候的《夏潮》大概可以分成哪幾個類型？像王拓、林俊義就到民進黨裡面去選舉。

蘇：我想那個可以這樣分，可以用意識型態來分，我、陳映真、林俊義、唐文標比較屬於同一類型，已經比較清楚社會主義、帝國主義這些事情，這個立場是比較鮮明的。另外王曉波、陳鼓應可以分為一個類型，他們一個是民族主義加社會主義，另一個是民族主義加自由主義，他們的共同點是民族主義，也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現實上反國民黨，反國民黨的一種反省，事實上是比較自由主義的思考，王曉波跟陳鼓應是殷海光的弟子。那我一進台大，同學都跟殷海光跑，我也一樣，可是我剛剛跟你講，我以前的背景，我自己自由主義的東西從來就沒有進去，所以像我是比較傾向陳映真，後來最接近的是林俊義、唐文標，林俊義當時也是覺得該介入現實政治，但他當時沒有，後來我請他幫黃順興，在立法院寫很多環保的質詢稿，很多是林俊義幫忙寫的，他是用這種方法介入，但是他也在想要如何介入現實政治，整個分野就在這裡，當我們看了無法對現實政治更加進入的時候，王拓跟林俊義就毅然走到民進黨，沒有別的選擇，工黨那時也是讓王拓覺得《夏潮》這批人不是那麼積極想要介入，搞了很多問題都搞不出來，所以他後來就離開了，林俊義更早就離開了去美國，受同鄉會的影響。本來藉著雜誌聚集人，但雜誌沒有了，人就沒有了，那黨外是以選舉做工具，以發展政黨為目標，雜誌可辦可不辦，但這個政團一直在發展，我們這邊就沒有雜誌，就逐漸萎縮，沒有一個組織戰。

問：後來有《鼓聲》跟《春風》雜誌，《春風》有兩期，《春風》的內容就完全和

《夏潮》不一樣，它完全在談工人、農民的問題，這跟剛剛談的路線，是不是有關？

蘇：對，鄉土文學論戰其實很尖銳的指向台灣現實的社會，我們對台灣的現實狀況其實是很不瞭解的，我們有一個立場，有一個大概的知道，但是論戰來說是國民黨太弱，他有強大的機器，因為他們是脫離現實，所以我們拿一個現實的東西去打一個脫離現實的，很好打，只是沒有武器，沒有監獄，沒有警察，而他們什麼都有，嚴格來講我們還談不及理論，但是因為觸及現實。但是我們非常清楚我們對於現實的不瞭解，《春風》事實上我跟王拓在搞，我和王拓都是《美麗島》的編委，當時《美麗島》也是一直在觸及現實的問題，《美麗島》如果你再翻開來看，也是那樣，我們採取的是事實地的採訪調查，汪立峽就去做採訪工作，有計畫的再做這些議題。王津平當時也幫我們做，去採訪農村。所以當時的政治氣候，是到現實裡面去。

問：現在大家對《春風》的評價相當的高。

蘇：對，那是很純粹的階級鬥爭的東西，我自己也是覺得在我的編輯生涯裡，我最懷念那兩期，很有計畫，很有組織的在做調查、訪問等。

問：同一時間《美麗島》也在，王津平說進去《美麗島》是一個策略的動作，陳鼓應、你、王拓、杭之、王杏慶。

蘇：杭之他不是我們《夏潮》的人，他是跟唐文標的關係很好。王杏慶沒有，他只

是寫稿。我的印象，我不覺得這是什麼策略，這個是很好玩的。其實我跟王拓也一直屬於黨外，到那個時候統獨問題已經越來越浮現了！當時《美麗島》的編委，是一個政團的中常委，在那之前已經有一個全省助選團，那已經朝向組織化的工作。我和王拓已經參加那個助選團，所以我和王拓到《美麗島》只是一個順勢。後來有人告訴我，就是說有人去向施明德、黃信介、許信良告狀，說我是統派的，但是施明德、許信良、黃信介他們都很堅持，像黃信介一直的想法，就是一起做，沒關係，他就是那種比較阿沙力，江湖的，他就覺得所有的反對派在一起，那種力量才會大，所以他們就很堅持，所以他們大概就彼此妥協，他就找我們，我們就這樣進去，沒有說什麼我們這邊開過會，派我們兩個進去《美麗島》，我的印象，我們兩個進去，還有人不高興。

問：那時統獨應該還不很明顯吧，黨外也未必然是那樣地一個全然的獨派。

蘇：是很模糊的，有些人清楚，有些人模糊，就一個政團來講，台獨還沒有到一個綱領，我們長期的對黨外的介入，在當時也還沒有。

問：到什麼時候變成綱領妳就不參加了？

蘇：變成綱領是民進黨，但《美麗島》之後，《美麗島》大審，施明德已經將整個的台灣建國計畫抖出來了，這已經造成我跟王拓要不要繼續跟他們走在一起，一定要做抉擇，我後來去了美國，聽說民進黨要成立的時候，有人提出來再討論，這是我後來聽朋友告訴我的，乾脆整個《夏潮》的人就去加入民進黨，成

為裡面的一個派系，台灣有人有這種主張，但好像也沒得到的共鳴。
問：那我想可不可以談一下民歌運動。

蘇：那時候民歌運動與學生運動是合在一起的，事實上這裡面也是一個鄉土文化的運動，因為民歌運動，有那個李雙澤做美麗島，所以和鄉土文學是一樣的東西，我猜我們那個年代，都有受到美國六〇年代反越戰那種歌的影響，像我那時最喜歡向人推薦John Baes、Bob Dylan，這些都是很有社會內容的，最主要就是你剛剛講的，胖胖的會彈吉他的李雙澤，他從海外回來，很快的就帶到淡江，校園民歌也是在那個鄉土文學前後。

問：七〇年代以後，整個《夏潮》這個集團，我們清楚的看到黨外集團一步一步的組黨，為什麼《夏潮》一直無法形成那樣的組織？我覺得夏聯會他也不是一個組織，一直到工黨、勞動黨，為什麼這樣長的一段時間，沒有辦法形成一個組織的形態？

蘇：我剛才大約都講到，現在比較精簡的講，包括就有人覺得兩岸將統一嘛！何必去搞這麼危險的事情！另外一個是知識份子實踐方式的問題，有人認為要用這一種，有人要用另一種實踐，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分野，但是不傾向介入現實政治的是大多數，這樣的群體就不可能走向政黨，但當時的環境來說要成為政黨，唯有透過選舉沒有別的路，一方面他們不願意介入政治，像陳映真的思考是覺得這是資產階級的東西，長期下來就變成是文人的相聚，所以一直到工

黨，大家有一種危機感了，還有就是被王義雄所逼，那時我在美國，也是這樣被硬拖回來的，儘管這樣還是很多人不支持，工黨還是又回到少數人在做，原來我和汪立峽本來就參加勞支會，所以我們在工黨之後，很快就轉進工會的運作，如果沒有汪立峽和郭吉人和我去搞這個勞支會，怎麼搞工黨，根本就不可能，就整個主力來講，是不支持的，這個就牽涉到知識份子如何實踐的問題。
問：美麗島之後，你可不可以談一下和新潮流的關係。

蘇：跟新潮流的關係，也是和黨外本來就熟，辦《春風》的時候，很明顯的工農問題，所以當時郭律師也是很特別的關係，因為許榮淑找他當我的辯護律師，我後來出來就不用他的辯護，我就跟他變成很好的朋友，當時我已經在參與一些原住民的運動了，我就把原住民的運動介紹給他，已經和郭吉人建立比較好的工作關係，當時邱義仁、賀端蕃要搞勞支會，他們馬上就找我，事實上黨外沒有幾個人想要關心勞工的問題，當時可以找的就那幾個。以當時的統獨氣氛，也沒有現在要死要活的這樣地步。

問：最後一個問題，你對《夏潮》的一個總體的評價。

蘇：就是在意識上，對台灣的知識份子如何介入社會，在意識上如何去關懷社會，做一個啓蒙的工作，我覺得它是成功的，以當時的條件他是成功的，當時對過去是一片空白。因為你介入社會以後，沒有歷史事實上是很荒唐的，對社會的關懷是歷史的延續，過去的、未來的，歷史的經驗，教訓智慧等等，作為一個

社會的群體，對於政治的內容，你不可能把他的歷史切斷，這都會成爲一個社會的政治的東西，一樣重要，他具有這個思想的啓蒙，我覺得是成功的，如果要作爲某一個立場的群體來講，他最終還是沒有發展出一個政團，這一點對台灣的左翼來講，是蠻可惜的，很可惜。整體評價大概是這樣，在意識型態上有一個啓蒙作用，但在現實實踐上他最終沒有走到一個更成型的東西出來。

《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

著者 郭紀舟
發行人 黃溪南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五九六三號
通訊處 (一〇六)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二二三號六樓
電話 (〇二)二三三一八五五二
傳真 (〇二)二三三一八六一一
印刷所 興海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 一九九九年一月
定價 四〇〇元

劃撥帳號 一四六八九二三六 方守仁帳戶

ISBN 957-99227-3-X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